



## || 中华学人 ||



费孝通，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1910年出生于江苏吴江，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教授，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师从史禄国教授。1936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人类学，师从马林诺斯基教授，193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在西南联大任教，1947年后在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任教，1952年转入中央民族学院任教。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1980年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85年创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并出任首届所长，现任该所名誉所长及学术指导。

先后出版中英文著作数十部，论文数百篇。其中 *peasant life in china* (1939年出版，中译本名为《江村经济》)、*Earthbound china* (1945年出版，中译本名为《云南三村》)、《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小城镇四记》、《行行重行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著作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截至2001年12月，出版有十五卷本《费孝通文集》。

## • “文化自觉”专题•

#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费孝通

[摘要] 无论是“戊戌”的维新变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还是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对立了起来；文化不仅仅是“除旧立新”，而且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关键词] 文化自觉 文化转型 中西文化 传统和现代化

[作者简介] 费孝通，北京大学教授，北京，100091。

近些年来我常讲“文化自觉”问题，具体的采用这个名词是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我提出这四个字“文化自觉”来标明这个研讨班的目的，我想总结一下，问一问，我们在这个研讨会上大家在做什么？这四个字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这个名词确实是我在这个班上作闭幕发言中冒出来的，但是思想的来源，可以追溯的历史相当长了，我想大家都了解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中。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燕京大学上本科时，曾选修历史系一位外籍教授开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一课程。他的教法是把清朝末年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以后到辛亥革命期间，他看到的外国作者对中国人的事情和说法的英文材料让我们阅读，以了解这段历史的变化。对这门课我是很用功的，他指定的书和文章我都读了，而且记录下来。所读的材料，历时约50年，经过四个皇帝，进犯的国家从老牌的英、法、俄开始，逐渐增加到12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有十多个之多。这段时间里还有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黄花岗起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至今仍然记得。那就是在太平天国宣布起义并定都南京后，有一位曾国藩手下的大将，名叫胡林翼，当时驻守在今安徽的马鞍山，他在阅兵时，有一只外国军舰，冲着他沿江而上，这位大将竟当场昏厥了过去。以后别人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是对付太平天国我们还有把握，但对付这些外国军舰就没有办法了。此事生动的反映了当时清政府上层的态度。他们看到了中国的物质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因而惧怕和退缩了。从而引起了以后丧权辱国的灾难性后果。

这说明在中西文化碰头时，他们认输了。这是一个大转折。过去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使节为“外夷入觐”，乾隆皇帝认为自己国家物产丰盈，并不需要“外夷”的货物，和他们贸易只是一种恩赐。英国使团提出觐见时，曾要求英使节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这个皇帝这时还没有认输。

中西文化碰了头，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就一直是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社会的变迁，争论不休，可以说至今还在继续中。在“五四”运动以前，大致上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已有了“西学”的观念，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人的长处，以求有所改进，可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概括。人们对中国原有一套政治伦理秩序并没有发生大的动摇。到了“五四”运动，碰到的问题已不是借用一些“西学”可以解决的了，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了。所以“五四”运动又叫新文化运动。不少人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观念作为推翻和取代传统制度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与科学，在“五四”之后发生过“科学和玄学”及“民主与独裁”的两次重要争辩。随后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是知识界不能回避的问题了。抗战开始，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使争论暂时停顿下来，但战后应该建立怎样一种社会文化秩序，仍然是知识界关心的主题。彻底打破现状，重建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无疑对于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那时主导的思潮是否定传统的，当时即使有人提醒人们应正视革新和传统的关系，也并不能引人注意。抗战结束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情况也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迅速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知识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上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归结起来看，无论是“戊戌”的维新变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还是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了起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了“现代化”的敌人。“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点，要把传统的东西统统扫清，使人们认为中国文化这套旧东西都没有了。

总之，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步履维艰。怎样才能使中国文化的发展摆脱困境，适应于时代潮流，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以探求中国文化的道路。由此涌现出各种流派，新儒家就是重要的一家，它主要在哲学一门之内，也涉及到史学，看法未必一致。这方面我不太熟悉，最近看到余英时先生的文章讲到：“新儒家”的名是指20世纪的思想流派，其事起于海外，特别指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位先生在香港《民主评论》上所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这些情况以及其后之发展在我当时的处境自然不会了解，同时也不会是大陆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问题。现在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作一番研究是有必要的。

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开始有所反思，我们要搞清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港台的知识界在上世纪60年代也对此提出了问题，不少人感兴趣的是怎样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找到接榫之处，说明文化不仅仅是“除旧开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并更新了“传统”。

就我个人来说，我受到的教育是从清末民初所谓新学开始的，这个新的学校制度是针对旧的科举制度下的私塾制度而兴起的。我的父亲是最后一科的秀才，科举制度在他那一代取消了。改革之后，他被选送到日本去留学，学教育，回来后就搞新学，办了一个中学。我母亲创办了县里第一个蒙养院，我从小就是在这个蒙养院里边长大的，所以我没有进过私塾，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教育。连《三字经》、《百家姓》也没有念过。我念的是“人、手、足、刀、尺”，是商务印书馆的小学课本，是新学的东西。不用面壁背书、坐冷板凳，还可以唱歌做游戏。初小后进入私人办的私学，也是由留学生办的新学。接着上了教会办的大学，从东吴转到燕京，又进了清华研究院，并再去英国留学，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新学”教育。父母主张新学，不要旧的一套，在儿女身上不进行旧式的教育。所以我缺了从小接受国学教育这一段，国学的根子在我身上并不深。中西方文化接触中，在我本人并没有感到严重的矛盾。这一点和我的上一代是不同的，他们是受中国文化培养成长的，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由于他们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对中国文化的长处有亲切的体验，甚至有归属感。所以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认同”。如陈寅恪先生讲“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钱穆先生说

“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像他们这样的学者是无法接受“进步”和“落后”的简单二分法的，他们求新而不肯弃旧，在当时的潮流中不免陷入严重的矛盾之中。

我在 70 岁时重新开始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进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当时预计还有 10 年的工作时间，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多做些工作。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所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去内蒙古鄂伦春聚居地区考察，这个民族是个长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传下了一套适合于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饲养为生。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衰败，威胁到了这个现在只有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90 年代末我在黑龙江又考察了另一个只有几千人，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存在的问题是同样的。中国 10 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 22 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得那么快，他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我认为他们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实际上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我回想起在上世纪末与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关于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对话，我提出了一些自己在思考的问题，并且认为研究文化的人应该注意和答复这些问题，譬如我们常常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特点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们都弄不清楚。我们交谈时涉及几个实例，一是谈到重视家庭的思想，注重家庭的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生产力一下子解放出来了。以后在农村工业化中，又看到了真正有活力的是家庭工业。同时让我进一步想到中国社会的生长能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我想是在世代之间联系的认识上。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二是“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而且是不同的东西能不能相容共处的问题，所以它还有文化的意义。这就是说中国文化骨子里还有这个东西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凝合在一起，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三是“多元一体”的思想也是中国式文化的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美的地方，才能真正的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处的认知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或一个什么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做到民族间和国家间的“和而不同”的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结合。四是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这是中国人际关系当中一条很重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说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这不是虚拟的东西，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里边培养出来的精髓，“文化大革命”对这一套破坏得太厉害，把这些东西都否定了，我看这是不能否定的，实际上也否定不了。

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还不能说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大体上说它确实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年积聚下来的经验性的东西，如果能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看来还是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特点用现代语言更明确地表达出来，让大家懂得，变成一个普遍的信息和共识。

长期以来在西方文化浪潮的冲击下，特别在“文革”时期，“传统”被冲刷得太厉害了，由此所造成危害及其严重性还没有被人们所真正认识，同时能够把有深厚中国文化根底的老一代学者的学术遗产继承下来的队伍还没有形成，因此我深深感到知识界的责任重大。我前面谈到由于自知国学根底不深，需要补课，近年来读了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先生的著作，很有收获。启发我们对中国文化精神更深入的理解，对中西文化比较作更深刻的研究。

同时自己感觉到对世界大潮流有些“隔膜”，虽然改革开放后我们已经重新“放眼看世界”，我也多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但开始看到的主要还是西方在新技术方面的迅速发展，有如我在《访美掠影》一书中描述的计算机信息技术等。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舆论“自鸣得意”，我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有批判，但对于中西文化中深层次的问题并不敏感。正如我前面所讲自己力争紧跟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行行重行行”，提出“文化自觉”看法，也是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中看到的。

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对我有很大的震动。在我看来这是对西方文化的又一个严重警告，而且事件后事态的发展使我很失望，这种“恐怖对恐怖”的做法，让我看到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里太轻视了文化精神的领域，不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处理文化关系，这是很值得深刻反思的。因此也促使我想从理论上进一步搞清一些问题，如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问题等，以利推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

去年5月我在南京大学建立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了“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的讲话，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我们这些人，从生物基础上看是和其它动物一样的，人的生命实际上同样有一定的限期，即所谓有生必有死，生和死两端之间是他的生命期。但由于人们聚群而居，在群体中又凭其共同认识相互模仿别人的生活手段以维持他的生命，这时人们已从生物人变成了社会人。每个生物人都在幼年逐步变成社会人而继续生活下去。只有作为一个社会人，生物人生命才能得以绵延直至死亡。我们一般说人的生命是指生物人而言的，一般所说人的生活是指社会人的一生而言的。生活维持生命的继续，从生到死是一个生物必经的过程。但是生活却是从生物机体遗传下来的机能通过有向别人学习的能力而得到的生活方式。一个人从哺乳到死亡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从同一群体的别人那里学习得来的。所学会的那一套生活方式和所利用的器具都是在他学习之前就已经固定和存在的。这一切是由同群人所提供的。这一切统统包括在我所说的人文世界之内。它们是具体的文化内容。当一个生物人离开母体后，就开始在社会中依靠着前人创造的人文世界获得生活。现存的人文世界是人从生物人变成社会人的场合。这个人文世界应当说是和人之初并存的，而且是历代社会人共同的集体创作，社会人一点一滴地在生活中积累经验，而从互相学习中成为群体公有的生活依靠、公共的资产。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就是指模仿别人而不断实践。这是人从作为生物个体变成社会成员的过程。

人文世界拆开来看，每一个成分都是社会中的个人凭其天生的资质创造出来的，日积月累，一代代人在与自然打交道中形成的。这些创新一旦为群体所接受，就进入人文世界的内涵，不再属于任何的个体了。这就是我们应当深入理解的文化社会性。

文化是人为的，但这里只指文化原件的初创阶段，它依靠被吸收在群体中的人们共同接受在群体中维持下去。一群社会人相互学习利用那些人文世界的设施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或说包括它的硬件和软件，进行生活。因而群体中个别生物人逃不掉生死大关，但属于社会人的生活用具和行为方式即文化的零部件却可以不跟着个别生物人的生死而存亡。文化的社会性利用社会继替的差序格局，即生物人生命的参差不齐，使它可以超脱生物体生死的定律，而有其自己存亡兴废的历史规律。这是人文世界即文化的历史性。

强调重新更深入地认识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我已注意到文化价值观方面存在着东西文化的差别，中华文化的传统在出发点上和西方文化就有分歧。前一辈的学

# 一位世纪学人的文化情怀

## ——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论解读

王俊义

[摘要]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反思的思想结晶，是当今世界文化转型的时代要求；费先生对“文化自觉”的界定和概括，包含了什么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涉及的范围和内容，进行文化自觉的目的和意义，实现文化自觉的途径步骤，以及文化自觉所追求的人类社会理想的目标等；费先生对“文化自觉”的分析和论述，已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文化自觉论”。

[关键词] 费孝通 文化自觉 文化转型 文化

[作者简介] 王俊义，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现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近年来，在国际上有崇高声望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再三呼吁“文化自觉”，撰写了大量关于“文化自觉”的论文，其中既渗透了这位学术老人广阔博大的文化情怀，也凝结了其不断发展的学术思想，并对学术界研讨这一课题有导平先路之作用。当然，对于“文化自觉”的界定与内涵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且不同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文化自觉”追求。不过，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则更赋有当今时代的特征，有其更为深刻的独特思考，他所思考的问题，直接关系到21世纪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命运。因此，自从他提出“文化自觉”的理念以来，在海内外学术界已有不小的反响，并以此为主题开展过多次国际性的研讨会，但却多限于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进行，然而“文化自觉”的理念及费老的论述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社会学、人类学范围，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乃至一些自然科学界的人士更为广泛的关注。还有，如同有些学者所说：“重温费先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讲话，每次都会有新的感想，往往是一些当时以为明白了的事，通过一段时间实践之后再回过头去看，才知道其中有些道理并未都懂，只有了解到这些

者，所谓新儒家，已经碰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用历史学的方法，做了具体而细致的研究工作，钻研得很深，提出了他们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作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里边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现在能够做这件事的学者队伍还需要培养，从现在起在几十年里边培养这样一批人是一件当前很重要的事情。当务之急是要在我们的知识界造成一种良好的风气。补上“放眼世界”这一课，关注世界大潮流的发展变化。我认为经济全球化后文化接触中的大波动必然会到来，迟早要发生的，我们要有准备地迎接这场世界性文化大论争。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认识这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叶金宝

问题的来龙去脉才有可能得到更深刻的体会”。<sup>①</sup>笔者对费老有关“文化自觉”论述的学习，也经过从不自觉到逐渐有所自觉的过程，至今也很难说都懂了。但是愿抱着“从实求知”的态度，谈一谈阅读费老“文化自觉论”之后的粗浅感受。

### 一、“文化自觉”是费先生晚年在学术反思中的思想结晶

费老诞生于1910年，是20世纪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是一位既有丰富人生阅历，又有深厚学术造诣的世纪学人。作为一位社会学、人类学学者，他坚持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力图使社会学中国化，并竭力消除国际上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文野之别”的偏见，他的研究既立足于中国乡土，又具有世界眼光，其成名作《江村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被国际社会人类学大师赞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sup>②</sup>他早期另一些代表作如《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也被视为社会学领域的典范之作。随着其在学术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与学术地位的确立，早在1949年之前及新中国建立后，便应邀到欧美各国访问讲学，成为一位沟通中西文化、开展跨文化对话的先行者。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57年至1980年他被迫中断了学术研究。

1980年当其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后，再度焕发学术青春，肩负着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重任，为研究机构的设立、研究队伍的组织、研究人才的培育、资料的积累、教材的建设、学科地位的确立、研究方向的制定，不辞辛苦。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确立、重建与发展，凝结了费老的大量心血，实为这门学科的一代宗师。

他学术研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发扬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精神，他根据对江南诸多小城镇的调查写出的《小城镇 大问题》，提出了“小城镇可以成为中国在世界上走出一条独特的城市的道路”，曾受到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的称赞：“费老毕竟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这些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给人以启迪”。<sup>③</sup>另外，他关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开发黄河三角洲，加快开发上海等十多项建议，都曾程度不同的被采纳，融入国家的发展建设之中。<sup>④</sup>同时，由于费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学养，且不惟上，不惟书，坚持独立思考，常思人之所未思，发人之所未发，如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苏南农村涌现了乡镇企业，在浙江温州出现了私有经济，却被受传统观念束缚、动辄兴问“姓社姓资”的人大加指责，费老则识在机先，早在1986年就明确指出，“无论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或其它群众创造的模式，评价的惟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是否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sup>⑤</sup>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费老确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而他却也为此而“碌碌未敢休”，“白发垂年犹栖栖”。

由于费老好学深思，笔耕不辍，目前，《费孝通文集》已出版的有十五卷，达600余万字，收入了他1924—2001年的著作，可谓著述等身。这些著述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也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及其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展望。

至今，费老虽92岁高龄，仍在不断地探索与思考，他抱着对后世、对文化负责的态度，从80岁以后，开始进行认真的学术反思，“就是要求自己对过去发表过的学术思想回头多想想，我的思想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样想，现在看来是否还有点道理，是否要修正，甚至改动”，他把这种反思视为是其个人的“文化自觉”，他说“反思是个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了解孕育自己的思想文化”。<sup>⑥</sup>他在学术反思中，还重新学习补课，不仅读自己过去的著作，读国内外社会学、人类学名著，还读前辈国学大师们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著，撰写了多篇反思论文，并在过程中，深入思考了“文化自觉”问题，不断就此发表谈话，开展对话，撰写了一系列论文。

由上可见，费老晚年的笔端下，持续多年一直抓住“文化自觉”不放，说明这是他进入学术反思后一直在思考的重大问题，而且对“文化自觉”这件事看得很重，把它看成是自己学术反思的思想结晶。他曾一再提倡要对人文价值再思考，认为“可以用‘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来代表我对人文价值的再思考”；<sup>⑦</sup>他又曾多次倡导开创学术新风气，又同样认为“可以用‘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来表达”。<sup>⑧</sup>这就值得我们认真思索：费老为什么这么看重“文化自觉”？

费老对其再三呼吁的“文化自觉”的内涵、途径、意义曾有这样一个界定和概括：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在生活各方面起的作用，也就是它们的意义和所受其它文化的影响及其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种文化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互相融合中出现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句话我想也就是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sup>⑨</sup>

如上界定和概括，包含了什么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涉及的范围和内容，进行文化自觉的目的和意义，实现文化自觉的途径步骤，不同文化之间对自己和他人的文化应有的态度，以及文化自觉所追求的人类社会理想的目标等，再从费老对文化自觉问题的许多具体分析和论述，可以看出他已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文化自觉论”，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包含许多新的思想，反映了这位世纪学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和正在发展的思想，正如李亦园教授在与费老的对话中所说：“您正在思考的问题，正在发展的思想，对整个学术思想界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sup>⑩</sup>正由于“文化自觉”是费老积自己学识与人生阅历，且是经过长期思考后而深思熟虑提出的，反映了他学术思想的新发展，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非是那一个人的主观空想。所以，他才十分看重“文化自觉”。

## 二、“文化自觉”的提出既来源有自又站在时代高度

费老提出“文化自觉”，绝非神思忽来，而是既有其自身的学术思想渊源，同时又立足现实站在时代高度，“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sup>⑪</sup>

费老终生所从事的是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不像以中国古典文史哲为研究对象的国学研究。一般说来传统国学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儒道佛各家经典的训诂与诠释，去分析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费老曾自谦地说：“我从小没进过私塾，没受过四书、五经的教育”，“国学的根子在我这里不深”。<sup>⑫</sup>所以，他直到晚年还好学不倦的“补课”，重新阅读梁漱溟、陈寅恪、傅斯年、钱穆、顾颉刚等前辈国学大师的著作，以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过，客观而实事求是地说：“那些前辈国学大师多是纯粹从大传统里边，从经典里边得到传统文化”，<sup>⑬</sup>而“以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为一生兴趣”，且早在 60 多年前，从他踏上学术征途就致力于要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的费先生，则是从深入实际、立足乡土，“从一般人的实际生活里得到中国文化”。<sup>⑭</sup>因此，费老所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更为切实与鲜活，他晚年再三论述的“文化自觉”，正同他早年致力的“使中国文化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一脉相承。

费老不仅是社会学、人类学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民族学家。他既反对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认为“在人和人、民族和民族之间划下具有质的差异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完全出于一些人的偏见、臆度或别有用心，和客观事实绝不相符。”<sup>⑮</sup>同时，他也承认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一些少数民族应该在保持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先进民族文化和科学。他曾在考察边疆地带鄂伦春、赫哲等少数民族中发现，这些民族曾长期在森林与沿江从事狩猎与渔牧生活，并形成了适合于这种环境的文化。但近年来由于森林等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些民族逐渐失去原来的存在条件，如果坚守原来的狩猎文化，就会威胁到这些民族的生存。由此，他想到面临社会大变动中的这些少数民族要长期生存下来，就必须在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进而由小见大，其他民族跨入信息社会后，也有文化转型问题，文化转型可以说是当前全人类的共同问题。<sup>⑯</sup>这就涉及到文化自觉。显然，这也是费老提

出“文化自觉”的思想渊源。

此外，费老在其学术反思过程中，还曾多次自我批评，认为其在以往的研究中存在“见社会不见人”，“只满足于社会生态而忽略了社会心态”，“偏重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和描述方面，最大的缺点是只见社区不见人”。<sup>⑦</sup>他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应更上一个层次，应注意人的心态研究，应重视人文研究，要加强文化自觉，这也是其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基础。

再者，如同费老自己所说，他从蒙养院到小学、中学、大学再到出国留学，受的都是西方新式教育。其学有所成后，又到过世界各国各地访问讲学，致使他有可能学贯中西，对中国以外的多种文化都有接触和了解，既看到其中先进与优秀的成分，又看到其糟粕与弊端，能够吸收其它文化中优秀先进的因素，融入自己的学术思想之中，又设法克服防止其弊端，而保持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认同，绝不主张“全盘西化”与“全盘他化”，而是主张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要真诚地相互吸收，取长补短，这也是他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渊源。

一个思想家提出的理论和思想，既以其学术思想渊源为基础，又同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费老是从20世纪走过来的人，曾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绝不希望这种灾难在21世纪重演。他又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的觉醒、各殖民地的独立，使世界上呈现出政治经济多元化的格局。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冷战结束，美苏争霸的局面被打破，国际社会进一步呈现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以及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信息的发达，又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势头。在这种新形势下，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另方面相互间的竞争也日益加剧。在这种局面下，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究竟如何相处？是和平共处，求同存异？还是对抗冲突，互不兼容呢？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重蹈两次世界大战的覆辙，那将会造成全人类的毁灭，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与发展的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另外，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既给世界人类带来福祉，也能给人类带来灾祸。事实上现代工业文明，已经造成地球上的资源匮乏，能源危机，生态失衡，物欲横流，精神空虚，西方的有识之士也大都看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还有由于世界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稳，南北差距扩大，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和人民，不是逐渐减少，而是日益增多。这些都是20世纪未能解决的问题，在21世纪能否加以解决呢？如果解决不好，也将是引起对抗与冲突的根源。因此，不管是目前在世界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强势文化，还是那些处于边缘地区的弱势文化，为了自身与世界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都面临一个文化转型的问题，都有一个既要清楚认识自己的文化，又要正确对待他人文化的问题，都需要文化自觉。只有提高文化自觉，才能使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之间，加强接触与交流，逐步消除隔阂与对立，和平共处，使世界沿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潮前进，使人类生活得更美好。而且，通过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和争取，这又是完全有可能的。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总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和观念。所以说：“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而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正是站在时代高度，对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格局作出的积极反映。

### 三、实现“文化自觉”首先要清楚认识自己的文化，还必须正确对待他人的文化

费老在论述文化自觉时着重强调，实现“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要做到并实现“文化自觉”，既要清楚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同时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是实现文化自觉的根本途径，也是“文化自觉论”的思想核心。

但是，要清楚地、科学地认识自己的文化，真正地做到有“自知之明”并不容易。从18世纪中西文化接触发生冲突碰撞以来，在思想文化界就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仍一直存在争论。有些人只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一面，产生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主张“全盘西化”；也有些学者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依然主张文化本位主义。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几位身居港台的著名新儒家，在联合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的宣言中，仍表示了坚守儒家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旨。近年来，在西方

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冲击下，全盘西化论及其变相一度又有所抬头，也有人认为 21 世纪将以东方文化为中心，或坚持新儒家立场、文化保守主义观点，也都还有相当影响。无庸讳言，在中国意识形态中居指导地位的主流思想，也曾发生过曲折，最主要的表现是以极左的思想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乃至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与诠释，统统斥之为“封、资、修黑货”，把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历史积累的世界文明成果都否定了，造成极为不良的后果与影响。这说明要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费老提出：“我们生活在悠久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认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还没有达到‘知之’的境界”，“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这个本质还不能从理论上说得很清楚”，<sup>⑯</sup>譬如他曾举例说：“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变成毛泽东思想，现在又变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也是中国化，同德国的马克思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这说明有一个中国文化里边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特点，在那里影响外边进来的东西，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总是在那里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色是什么？特色在那里产生出来，现在还没有人能把它讲得很清楚，原因就是没有好好研究”。<sup>⑯</sup>费老这样的分析和估计，我想学术界不见得都完全赞同，但是我想对我们民族的文化的本质和特色，仍有必要进一步给以科学的认识则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当深入到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去认识自己的历史和现状。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会、去认识、去解释，那是不自觉的文化”。<sup>⑰</sup>

当然，要清楚地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它也适用于世界上各国家、各民族和各地区，每一种文化的主体都应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否则就很难做到文化自觉。

正确理解和对待其它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这也是“文化自觉论”中的重要思想，为此，费老还有针对性的撰写了《必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并以形象的语言说，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既“各美其美”，还应“美人之美”，而且“需要懂得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为什么不同，只有抓住了比较研究才能谈得到自觉”。

但举目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既有互相友好，彼此和谐交流的一面，同时也有彼此对立，甚至兵戎相见的一面，要做到“美人之美”不容易。就今天的世界现实而言，这方面仍存在很大的阻力，相互冲突乃至发展到局部战争仍频繁不断，从长期对立的巴以冲突，到震惊世界的“9·11 事件”，再到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严重阻挠不同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与相互交流。这种阻力主要来自西方文化中心论而形成的当代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有固步自封的民族中心主义。

当代文化霸权主义源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由于近代工业文明首先产生发展于西方欧美国家，殖民主义者不仅不以民族掠夺、民族压迫为耻，反而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认为自己是高等民族，优等文化，把土著人视为野蛮，其文化也是劣等，并把西方与现代化等同起来，似乎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于是形成了西方文化中心论，并发展演变成今天的强权政治与文化霸权主义。他们依仗自己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企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想用自己的文化统一天下，认为自己的文化具有普世价值。由于近年来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在迅速崛起与发展，都在向现代化迈进，西方中心论与欧美霸权地位正在动摇，这一点当今西方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亨廷顿也已看到，他说：“伊斯兰运动与亚洲经济发展的势头表明，其它文明是生机勃勃的”，西方则“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亨廷顿还预测“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sup>⑲</sup>这就是大家熟知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宣扬的“文明冲突论”的思想和理论，与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论”显然是南辕北辙，根本不同。费老曾予批评说：“西方有个亨廷顿，他写了一本《文明冲突论》，他认为民族之间的文化不同，一定要冲突的，不会团结的，他所代表的各种思想，同我们是根本抵触的”。<sup>⑳</sup>同时，费老还鲜明地指出：“这种论调，基本上是围着西方中心论的国际关系政治需要提出的。”<sup>㉑</sup>

与“文化霸权主义”相对立、相伴随的“文化割据主义”，“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忽略了本文化存在的缺失，只强调它的‘纯洁’，而反对和其它文化的交往，结果必将是本身文化发展的停滞”。<sup>④</sup>其实，费老早就批评过与这种“文化割据主义”相类似的现象，他曾指出：“批判西方文化支配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是从一种文化偏见落入另一种文化偏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sup>⑤</sup>他还说：“在受到外来支配文化的冲击下，站在被欺凌的弱小文化立场上，一时的复旧意识是值得同情的态度。当这种态度发展到排斥外来文化的态度，那就可能忽略世界文化关系中‘适者生存’的无情现实”。<sup>⑥</sup>说明这种排外的文化心态，不利于本民族文化适应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文化的转型。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民族中心论，都使费老感到“在多种文化接触中，最难以多元取得一体的是文化价值观念。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提出‘美美与共’的问题”。<sup>⑦</sup>可见，他提出“文化自觉论”，既经深思熟虑，又用心良苦。

#### 四、“文化自觉”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美好的社会——“天下大同”

费老曾用四句话、十六个字来概括其提出的“文化自觉”，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也同时是对“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的确反映了实现“文化自觉”由低到高的发展程度与层次的步步提高。从“各美其美”肯定自己的民族文化开始，进而发展到肯定和容忍他民族文化的“美入之美”，再上升到不同文化之间取得文化价值标准的共识，做到“美美与共”，从而走向“天下大同”，实现世界人类的美好愿望。“天下大同”既是对人类美好愿望的反映，也是“文化自觉”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生活在现实社会的人都会有对未来的憧憬，都有想要实现美好社会的理想。费老作为一位社会学人类学家，其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去争取人类美好的愿望的实现。早在1990年他在东京举行的“东亚社会研究”的讨论会上便提出建立美好社会的构想。1993年，他在印度“英迪拉·甘地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又作了《对“美好社会”的思考》的学术报告。报告中认为人类都有追求美好社会的愿望，虽然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所追求的美好社会的内涵不同，但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则是人类的共同意愿。事实也确实如此，从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到中国古代《礼记·礼运》篇提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都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社会的追求与向往。深谙中外历史文化的费老，沿着上述思路，在其学术反思过程中，一再思考生活在21世纪的世界人类应如何生活得更好？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不同文化的人如何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息息相关的世界中和平共处？能否共创未来走上一条和平共存的新路？东西方能否共同努力为21世纪创造一个全人类可以享受到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美好社会？<sup>⑧</sup>而要共同创造美好社会，就必须有共同遵守的能够和平共处的新秩序。然而，当今世界虽然在经济上已把人类捆在一起，而和平相处的新秩序却远远未能建立，关键是人类尚只有利害上的联系，而缺乏道义上的认同。这就要求现今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不再惟我独美，摆脱本位中心主义，不强求别人“从我之美”，而要承认多元并存，能够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树立一个与多元社会相适应的心态，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尽可能做到“美人之美”。再在“美人之美”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接触、交流融合，在实践中寻求出一些能使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可以接受的价值标准，实现“美美与共”，大家都以共同的价值准则作为立身行事的标准，这样的社会也就是我们中国前人遗留给我们的理想，即所谓“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sup>⑨</sup>

如何建立“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呢？费老认为“经过几百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当前的人类已具有绰绰有余的能力为全人类提供丰衣足食的物质条件。现在所缺的就是和这些物质条件相应的精神条件。包括普遍接受的道义观，共同遵守的价值标准，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政治思想等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要在国际社会上建立和平、平等、互利的政治、经济关系，反对干涉其它主权国家的内政，反对强迫别国接受不平等的条约，用对话代替对抗，用平等协商处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矛盾，并以这些举措作为“人类进入‘天下大同’，即人类共同的美好世

界，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sup>⑩</sup>在这个必经也是过渡的阶段中，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去争取“天下大同”美好世界的实现。

当然，费老也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世界，距离“天下大同”还十分遥远，他只好将其作为人类追求的目标，他曾寄予期望说：“人类一定要在新的 21 世纪里，至少要在今后新的 1000 年中，能够促使我们中国人祖祖辈辈所追求的大同天下的实现”。<sup>⑪</sup>可见，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奋斗的目标。特别是 2001 年在美国出现的“9·11 事件”，曾使费老极为震动，而事件之后的事态发展更使他失望。他认为“这种‘恐怖对恐怖’的做法”使他看到“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太轻视文化精神的领域。不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处理文化关系，这是很值得深刻反思的”。<sup>⑫</sup>尽管当前世界上还很不安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还十分激烈，直至不断爆发局部战争。但这样的局势，并未使他争取人类美好社会的信念动摇，他坚信“历史是向着天下大同的目标前进的”，“虽然我们现在离实现全人类共同理想，荣辱与共的大同世界还比较遥远，但总得树立个信心向这方面前进”。<sup>⑬</sup>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看，历史的发展常会出现曲折，但总的的趋势是不断前进的，“天下大同”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经过人类世界的共同奋斗，最终一定会实现。从费老对人类美好社会的殷殷期望中，使我们进一步看到这位世纪学人胸怀博爱、矢志不移的文化情怀。

## 五、完成“文化自觉”使命，创建现代中华文化

费老在耄期之年反复呼吁和倡导“文化自觉”，绝非纸上谈兵，也绝非为“自觉”而“自觉”，而是怀着一个世纪学人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使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时期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能提高文化自觉，以便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共同去创造“天下大同”的美好社会的早日实现。当然，费老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他提出“文化自觉”，更多的是着眼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期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以清醒的头脑，跟上现代化潮流，完成“文化自觉”的使命，创造更先进的现代中华文化，以便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宏篇章，“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sup>⑭</sup>这一点也是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论”的重要思想。

费老在诸多文章中都提到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光辉灿烂，而且 5000 年来始终绵延不断，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与之相比。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显赫的汉唐盛世，中华文化远播域外，对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近三四百年来，从世界上实行工业革命以来，中国却逐步落后了，并有过相当长一段因落后而挨打，遭受列强欺凌与侵略的耻辱史。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才重新扬眉吐气。特别是近 20 年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实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新国策，才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近年江泽民同志又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和智能，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且在中共十六大上，载入新修改的《党章》中。费老认为“‘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共产党总结了 80 年的斗争经验后，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我们再次指明方向”，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实现新的伟大复兴。但还应看到，中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实行了三级两跳，从农业社会跳到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跳到电子信息社会，前一跳尚未充分完成，又不得不跳入新的阶段，与世界同步进入经济全球化的电子信息时代，外来文化的冲击进一步加大，中国需要通过文化转型，取得文化的自主能力。这就需要“文化自觉”，并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应该看到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宝库中有许多独有的思想精华，如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为克服争权夺利而处理义利关系的“重义轻利”思想；处理公私关系的“天下为公”、“先公后私”思想；解决尖锐对立冲突的“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的思想；解决不同思想文化之间如何相处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思想；解决民族关系的“多元一体”、“天下一家”、互补共生思想；解决国内不同地区、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一国两制”思想；处理对外关系的“和平共处”、“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内政”思想。这

些思想和主张对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生态失衡，冲突对立，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南北差距，重利轻义，道德沦丧，精神空虚等问题，都可发挥积极的作用和影响。重要的是运用现代语言渠道，让世界更多人了解、吸收，从而推动世界的“文化自觉”。

当然，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而且仍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作用与影响，如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和专制禁锢精神而造成思想精神缺乏独立思考的“惟上与惟书”，因循守旧不敢大胆创新；由于长期的小农经济而造成的宗族观念，固步自封、思想保守、安于现状，裙带关系、家长作风等。同时还要看到，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民主法制建设、综合国力等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安定因素还远未消除，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还不是很大。针对这种现状，费老在其“文化自觉论”中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要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文化，要发挥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要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创造，找出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更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化的重要和特点，使之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要自觉地清除传统文化中与文化转型不相适应的消极成分，诚恳地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使我们在文化转型中作出更好的选择，保持我们的自主地位。这都需要我们有高度的“文化自觉”。

由于“文化自觉”的实现和完成，需要几代人甚至数十代人共同努力，所以，费老特别嘱望年青一代能树立“文化自觉”的新风气。他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要关注的大事，是西方信息对我们的社会冲击得很厉害”，“这一冲击对年轻的学生发生了什么影响？这一代人要有文化自主选择权，既不能被同化，又不能关门。如何做到以德服人，自己应当有自信，有能力去主动接受外来文化冲击并做出自己的选择。”<sup>⑯</sup>教育工作者要从幼儿教育入手，从小就培养一个适合于21世纪生活和工作的人，以便使其日后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有与各种文化对话的心态和本领，<sup>⑰</sup>使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代一代新人能在未来世界的发展中处于主动地位。

通过对费老“文化自觉论”的学习与阅读，我想，只要整个学术界，乃至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上到下都能“文化自觉”，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我们一定能朝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前进，不负于前人，无愧于后人，既能符合时代潮流，又能适应未来发展，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中华现代文化。

<sup>①</sup>潘乃谷：《费孝通教授谈补课》，费宗惠、张荣华编《让社会更美好》，群言出版社，2002年，第45—46页。

<sup>②</sup>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序言》，《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16页。

<sup>③</sup>转引自张冠生著《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第70—80页。

<sup>④</sup>参见刘豪兴：《费孝通的学术价值观》，《让社会更美好》第70—80页。

<sup>⑤</sup>《费孝通文集》第10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sup>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⑯⑰⑱⑲⑳㉕㉖㉘㉙㉚㉛㉜</sup>《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371、186、145、196、380、160、384、384、17-18、385、386、146、192、201、4、7、7、7、8、340页。

<sup>15</sup> 转引自徐平：《费孝通民族学术思想述略》，《让社会更美好》第109页。

<sup>⑯</sup>⑰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

<sup>①</sup>转引自汤一介：《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王维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4、258页。

②③《费孝通文集》第15卷 第384-105页

<sup>④</sup>参见乐黛云《反对两种“主义”》,《中国文化报》2002年8月3日。

<sup>⑦</sup> 《费孝通文集》第12卷 第50页

<sup>⑤</sup>费宝惠、张莹华编《让社会更美好》 第47页

◎《费孝通文集》第11卷 第520-521页

责任编辑：叶今宗

责任编校：叶亚玉

# 文化自觉与人文学术研究

张岂之

[关键词] 文化自觉 人文学术 学术自觉 信息科学

[作者简介] 张岂之，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北京，100084。

文化自觉的具体表现在哪里？笔者认为，这首先在人文学术的成果中反映出来。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历史学、哲学和艺术乃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她从普遍性和永恒性方面体现了人类在文化创造方面达到的最高点。

从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可以看到，近代人文学术大家将“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从相同含义上加以使用的情况。王国维在20世纪初提出“学术自觉”口号，要求学人对于本国学术文化和外国学术文化，在比较中看到他们的特点及其长短，一国学术文化不可能都优，也不可能都劣。应研究外国学术文化之长以济本国学术文化之短并主张将中学与西学之优长加以融合，为学术文化开辟新路，他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加推动。且在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能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大师都是在中西学术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作出了贡献。

当历史推进到20世纪末，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照他的解释，其主要内容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sup>①</sup>这里所探讨的已经超越中西文化之异同及其融合，从更加广阔的角度，即从世界整体去探讨文化问题，说明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他们自身的文化，应当相互尊重。世界上不止一种声音，不止一种颜色，承认多样性存在，世界才能绚丽多彩，如果认为世界上只有某一种文化是优越的，这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这种观点会引导出文化与人类生活的苦难。今天真正尊重文化的多元性，是文化自觉的起点。

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在现实世界遇到的问题，似乎并不是“文化自觉”或“学术自觉”所能解决的，举例来看，在资讯科学中出现了虚拟实在生存和人生意义的问题。虚拟实在（Virtual Reality, VR）是通过电脑类比再现现实世界或凭空构造世界，当然与现实世界不同，然而能接近或酷似真实世界。虚拟世界给传统哲学带来冲击，面对虚拟，现实世界却成为了无数可能世界之一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生存也许是人的存在的结构性成分，J·米切尔在《比特之城》<sup>②</sup>中就憧憬了人的数字化生存的美好愿望。

在解决资讯科学面临的哲学问题时，人们可以借鉴某些哲学理论，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技术反思理论，贝尔（Daniel Bell）后工业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的科技批判伦理，C. A. 冯·皮森（C. A. Van Pearsen）的伦理战略论等等。这些哲学思想学说在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说明科技的发展并不摈弃哲学，需要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科技与人文的联系并不因为科技的发展而中断。

“文化自觉”或“学术自觉”给人们指出了解决科技带来的关于哲学、伦理、美学诸多问题的方向。这个方向似可作如此的表述：认识人类优秀文化的价值，对此发掘得越深，则人的精神生活越加充实。例如经过岁月洗炼的人文经典，以其简洁的语言文字讲述深刻的生命真理，给人带来无穷的活力。在充满技术功利化的世界中，自古迄今的人文经典可给人的心灵以不竭的灵感，并引进到一个非

# 征文启事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与研究，值 1993 年全国首届价值转化工程理论研讨会召开 10 周年之际，本刊与深圳市宝安区政府联合举办全国价值转化工程研究 10 周年座谈会暨第三届全国价值转化工程学术研讨会，并拟就“先进生产力与价值转化工程”组织专题研讨，初定年底在深圳召开研讨会。为确保大会研讨质量，我们特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论文。本刊将从来稿中挑选部分优秀论文发表。

价值转化工程是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深圳市杰出专家、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区长黄锦奎于 1992 年提出的一门新学科。其学术专著《现代点石成金术——价值转化工程》曾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本刊曾连载其专著部分章节。10 年来，不少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实际工作者对该学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从 1993 年底的全国首届价值转化工程学术研讨会，和 1998 年的以“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价值转化工程学术研讨会，到这次的以“先进生产力与价值转化工程”为专题的研讨活动，主旨在于推进价值转化工程这一新学科的深入研究与发展。

征文活动结束后，我们将组织专家对入选论文进行评选，对一、二、三等奖论文获得者给予奖励，对优秀论文者颁发优秀论文证书予以鼓励。并拟于今年 11 月在深圳召开价值转化工程研究 10 周年暨第三届全国价值转化工程学术研讨会，届时我们将邀请获奖论文和优秀论文作者参加，进一步研讨。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对该学科有兴趣的同仁惠赐稿件、参与研讨。

征文参考选题：1. 价值转化工程对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意义；2. 先进生产力要素的价值转化方法、趋势与特征；3. 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价值转化观；4. 价值转化规律与先进生产力发展规律；5. 价值转化工程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辩证关系；6. 价值转化思维方式与先进生产力；7.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与价值转化工程的思维模式；8. 中介在价值转化工程体系中的作用；9. 价值转化工程与知识经济及先进生产力。作者也可根据征文主题自定选题。

请作者于 9 月 25 日前将论文打印稿一式三份和软盘寄送至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学术研究杂志社征文组收（邮编：510050），以便会后结集出版。

联系人：荆艳芳；联系电话：83846163；传真：020- 83846177

电子邮箱：xsyj@xsyj.com（请注明征文）

学术研究杂志社  
2003 年 6 月 5 日

---

常美好的精神世界，这是真实而非虚拟。也可以说是现实与虚拟统一。她的神奇作用，体现在对社会产生正面的促进作用，而且可以转化为科技发展的动力。科技与人文、科技与艺术结合得越好，科学上的创新源泉越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与艺术是科技创新的酵母。许多大科学家同时是艺术家足以说明此种现象。

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人们对于科学理论和技术的理解，大都停留在“自然”的层面。至于“人类”层面的许多问题，好像没有进行过广泛深入的探讨，未形成共识。特别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理论研究，至今研究得并不充分。这种情况的存在也许就是我们更加需要关注人文科学的原因。先不说世界，仅就中国科学舞台而言，迫切需要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共舞。如果一方独舞，“文化自觉”从哪里去表现自身的力量呢？

---

①费孝通：《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 2000 年 11 月 7 日。

②参见 J·米切尔：《比特之城》，范海燕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

责任编辑：叶金宝

# 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自觉 ——《欧游心影录》的思想价值

陈其泰

[摘要]《欧游心影录》一书，以往论者多据以批评梁启超的文化保守思想，这种贬责实有以偏概全的缺陷。梁氏于一战刚刚结束后游欧，固然看到大战的灾难确实给西方思想界带来危机，但是，他更通过对欧洲社会的亲身考察，深刻认识到欧洲下层民众的自主自觉和“个性发展”，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竭源泉。故其结论是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一方面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要大力学习西方的进步文化。此书的思想价值所在，即表明梁氏晚年对中西文化问题达到自觉的认识。

[关键词] 梁启超 《欧游心影录》 中西文化探索

[作者简介] 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75。

《欧游心影录》一书，是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游历欧洲后写下的观感，由于篇中生动及时地报道了欧洲遭受这场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浩劫之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直接信息，处处透露出这位睿智哲人的深刻思考，加上梁氏特有的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因此在其发表的当时即引起极大的反响。这篇著作在近些年来论述五四时期社会思潮或梁氏后期思想的论著中也屡被提到，但其着眼点却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原因是，有的论者只注意到书中有“我的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一段话，据此批评梁氏文化观点的保守和倒退，而对全篇的极有价值的探索和文化反思则未作全面检讨。本文乃有感于此而发，旨在阐明书中梁氏对欧洲社会的观察和对中国文化反思的意义，乃在于表明他在晚年对于中西文化问题已达到自觉认识的阶段。

## 一、梁氏游欧的目的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此年年底至1920年初，梁氏偕蒋方震、丁文江、张君劢等人赴欧洲游历、考察，历时一年有余。梁氏于启程赴欧前夕，与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换一个生命。梁启超此行目的有三：“第一件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个空前绝后的历史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的和平基础。想拿私人资格把我们的冤苦，向全世界舆论伸诉伸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sup>①</sup>梁氏一行于1918年2月抵伦敦，先后到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再返回法国，年底到柏林。梁启超在巴黎时，正值国际和会召开，英、法、美等大国操纵和会，他们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居然牺牲中国利益，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全部权利的无理要求。对此，梁启超满怀爱国义愤，以中国民间代表的身份，向国际舆论界表示强烈抗议。同时，他与国内民间组织国民外交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报告和会消息，鼓动国内人士敦促北洋政府在收回山东主权问题上采取坚定态度。4月底，梁氏将山东交涉失败的消息报告国内，呼吁拒签对德和约。他在致国民外交协会的电报中说：“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勿署名，以示决心。”梁启超的坚决态度和努力，对五四运动的爆发产生过直接的影响。<sup>②</sup>帝国主义列强分赃和大国操纵国际事务的行径，使梁启超深受刺激

和教育，他称“惊醒了正义人道的梦”，并使他对于中国时时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威胁，有更清醒的认识。

梁启超欧游所抱定的第一个目的是开拓眼界、寻求学问，实则包含对欧洲文明的真价值之考察，和对中国救国道路的探求两个部分，在这方面他有更大的收获。欧洲之行引起他的强烈震撼，使他心灵深处酝酿着一场“绝大的革命”。1919年6月，他在英国写信给国内的弟弟梁启勋，报告他4个多月考察各地的感受：“至内部心灵界之变化，则殊不能自测其所届。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饮以雄伟矫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sup>③</sup>

梁启超是在特殊时刻进行对欧洲的考察的，他到处目睹欧洲各国经历世界大战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各国互相残杀的结果，欧洲人口死伤达3千万，法国失去壮丁近半数，到处满目疮痍。粮食及各种物品严重匮乏，物价飞涨，晚上连电灯照明都难以保证，进入冬季连取暖用煤都没有。诚如梁氏所言，连战胜国英法也“荆天棘地”。他又描述凡尔登战场留下的惨状，只好拿被维苏威火山毁成废墟的庞贝城相比拟。梁氏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国家间的野蛮残杀，痛斥文明人制造的武器造成的破坏比野蛮人不知要超出多少倍！他观察到欧洲战后劳资两大阶级之间矛盾更加尖锐，罢工风潮“看得见听得见的每月总有几次”，规模最大的英国铁路罢工，“简直就是两个敌国交战”。同时，他报道了一些欧洲人士对西方文明弊病的尖锐批评。大战以后，欧洲人对先前过分相信“科学万能”感到幻灭。“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眼看科学不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倒反带来灾难”，因而“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sup>④</sup>最典型的是美国记者赛蒙和梁启超谈话，他不赞成把西方文明输入中国，而说他“回去就是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援我们”。<sup>⑤</sup>可见大战灾难确实给西方思想界带来危机。梁氏在篇末所讲欧洲人愁着物质文明的破产，等着用中国文明去超拔他们，其导因也正在这里。

## 二、社会成员的自主自觉精神，是欧洲进步的不竭源泉

尽管梁启超目睹了欧洲“文明国家”互相厮杀造成的惨祸和战后的种种矛盾，并耳闻一些欧洲人士的悲观论调，然而，他在书中仍然明确地表达了对欧洲前途的信心。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梁启超经过一番考虑，认识到欧洲文明以往取得的巨大进步，优越的社会组织，发达的产业，先进的科学技术，各种学说的创造等等，其根基立在下层民众的自主自觉意识和“个性发展”，使社会进步和文明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基础之上。因此，这次大战虽然使战胜国和战败国都陷于一蹶不振的境地，但绝不会如同历史上的埃及、希腊、罗马那样，造成以往灿烂文明的中绝。梁启超断言，欧洲的文明“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好像盖房子从地脚修起，打了个很结实的桩儿，任凭暴风疾雨，是不会动摇的”。<sup>⑥</sup>他把欧洲民众发挥自主自觉意识的文化特征概括为“群众化”，并作了颇有深度的分析：“欧洲百年来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都是由‘个性发展’而来，现在还日日往这条路上去做。他和古代中世纪乃至18世纪的文明，根本上有不同的一点，从前是贵族的文明、受动的文明，如今是群众的文明、自发的文明。从前的文明是靠少数特别地位特别天才的人来维持他，自然逃不了‘人亡政息’的公例；今世的文明，是靠全社会一般人个个自觉、日日创造出来的，所以他的‘质’虽有时比前不如，他的‘量’却比从来得丰富，他的‘力’却比从来得连续。现在的欧洲，一言以蔽之，万事万物，都是‘群众化’。”<sup>⑦</sup>

现代文明的创造依赖于社会成员发挥自觉精神，这样，政治的民主、良好的秩序、物质的富裕等才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不竭源泉。梁启超早年著《新民说》，正是希望在中国造就出这样有责任感和创造力的现代国民。他在欧洲，特别重视从所见所闻的社会现实中，发现和感受“民众自主自觉”的精神，因为这些正是他反思中国文明的特点和缺点，思考改造国民性和探索中国前途的重要参照系。在法国兰士，正遇到当地驻军连队在广场上举行授勋仪式，由高级军官代表总

统向两名负伤士兵授予勋章，场面隆重、热烈，他十分重视这种做法确能发挥出“国家主义下一种精神教育”的作用。在著名战地凡尔登，他了解到，当日两军激战时，法军总炮台里面宽敞的地下室里，竟还经常为士兵演电影、举行音乐会，还有一个设备完备的士兵消费协会，为士兵购买各种价格低廉的生活用品，由士兵自己组织，军官加入，由此，梁氏对法国士兵所表现出来的国民高度自治能力和民主管理精神表示了由衷的赞叹！在另一著名战地梅兹城，梁氏最受感动的是这里将矗立起一座法国普通士兵的新铜像，取代被市民捣毁的过去德军所立德皇威廉第一的铜像。梁氏高度评价由此而体现的西方人重视下层民众意志的精神和现代欧洲“平民化”的时代趋势，说：“我看了这铜像，觉得他用意真是深长美善。他表示出一国中历史上大事业，并不是一两位有名人做出来的，乃是大多数无名人做出来的。所以这个铜像，我叫做‘平民化’的铜像。其实今后欧美大势所趋，那件事不是平民化！这铜像不过一种显著的表征罢了。”<sup>⑧</sup>

### 三、对中国文明前途的深刻思考

梁氏考察欧洲，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国如何才能富强的大学问。由于他相当深刻地认识到欧洲文明进步的基础在于民众的觉悟和能力，两相对照，学习欧洲文明的长处，提高中国人的自觉成为他思考的核心。《欧游心影录》“总论”下篇即以“中国人的自觉”为题，论述他对中国如何摆脱贫穷落后、寻求民族强盛之路的主张。

首先，梁氏提出“爱国”应与“世界眼光”联系起来：“一面不能知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即应确实知道世界局势，学习别人长处，赶上世界潮流，发奋努力，以期对人类全体文明作出更大贡献。当时，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社会弊病丛生，矛盾错综复杂，梁氏呼吁从西方文明曾经遇到巨大挫折、经受了考验、取得辉煌成功的历史，得到启示和借鉴，鼓舞中国民众在种种困难面前绝对不能悲观，而应该鼓起百倍勇气去争取光明前途。

其次，梁氏拿西方的法治精神、民众素质为对照，反思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有力地加以针砭，强调培养法治精神发展个性的重要。继《新民说》之后梁氏在此篇中进一步警告中国人若不改变缺少团体意识的劣根性，必将无法在国际社会立足，“结果非被淘汰不可”！这就需要借鉴、学习欧美的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的原因，一者生活方式是“单调生活，不是共同生活”。二者国家和家族，长期是权力至上的人发号施令，“不容有公认法则来束缚他”，别人只能随时无条件服从。故“法治”二字，在从前社会，可谓全无意义。明乎此，更应该下大力气在国民中进行教育、培养。他主张由市自治会、乡自治会这样的地方自治，来培养管理国家的兴趣和责任心。

再次，梁氏呼吁“思想解放”，这与“五四”精神是相合拍的。他提出，对于什么问题都要穷究原委，求出个真知灼见，不受束缚。欧洲现代文明，都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由自己的审择——批评，而必然引起别人的审择，由此便开了思想解放的路，互相激发，互相匡正，真理日明，世运日进。杰出人物的学说，必定是首先摆脱古代思想和并时思想的束缚，独立自主研究，才立出一家学说。而中国学术的衰落、停顿，正是由于长期受到“定于一尊”的束缚、禁锢之结果。“真金不怕红炉火”，针对各种问题敢于发表不同见解，自由进行批评，可以刮垢磨光，越发显出真价值。对于当时受人注意的“社会主义”理论，梁氏也直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国民生计上，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地注意研究它，也是很好的现象。但他主张区分精神的方法和实行的方法。其精神（即原则上）“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的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采用的程度如何，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具体而言，不同意有人所主张现在中国应注重生产问题而先不管分配问题。他主张“一面用全力奖励生产，同时眼光并须顾及分配。”梁氏对当时阶级的现状分析，并未能抓住要领，主张最好能避免发生社会革命。但他不反对社会主义原理，而提出应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实则主张首先大力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同时兼顾工人的利益，兼顾分配问题，“力求分配趋于公平”，“令小资本家以至赤贫的工人，都有正式的防卫的武器”，认为“这是坦坦平平的一条大路”，这种认识却是有正确的成分。（下转第99页）

•领导干部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现代科技革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陈建新 黄理稳

[摘要] 本文论述了现代科技革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并指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抓好科学文化建设。

[关键词] 现代科技革命 “三个代表” 中国共产党

[作者简介] 陈建新，中共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研究方向：科技社会学；

黄理稳，华南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科技社会学，广东 广州，510640。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向纵深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背景下作出的科学论述。它既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品格和决心，更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全面准确地理解现代科技革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将有助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助于增强科技和教育工作者实践“三个代表”的自觉性，更好地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 一、现代科技革命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课题

现代科技革命是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革命与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技术革命以及70年代兴起的新技术革命的合流。这场延续了近百年的革命，在给人类带来先进生产力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发生变化的重要表现。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面临着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存亡的考验。

1.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共产党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20世纪下半叶以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互联网的出现，使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成为可能，经济全球化得以迅猛发展。这预示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世界性竞争将在新的条件下全面展开。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社会主义国家在这场全球性的竞争中显然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2. 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怎样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受益于现代科技革命的推动。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改变。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大量涌现，使从事各类研究和开发活动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和服务性人员大量增加，脑力劳动者在就业人员中的比重大大超过体力劳动者。传统的蓝领工作岗位越来越少，有的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地位得到提高，知识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也向共产党人提出新的课题。一是以往被视为先进生产力代表者和共产党阶级基础的产业工人的数量在不断减少，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在减弱。那么，工人阶级是否还代表先进生产力？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否还具有先进性？二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彰显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科学技术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掌握科学技术来提高全党乃至全民族的素质？如何营造一个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

3. 在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日益显著的情况下，怎样保持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和生活环境，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人们在增加了对

物质享受的需求的同时，也增强了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现代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福祉，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如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全球性问题以及核技术、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网络技术等引起的社会安全和社会伦理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应如何处理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怎样才能在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也关系到如何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问题，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现代科技革命引发的种种新现象新问题表明，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影响甚至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领导国家发展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征程中，必须要有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新理论和新思维。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顺应了这一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

## 二、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重视发展科学技术

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sup>①</sup>的论述，不仅从生产力发展的理论上对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作了科学的论证，更重要的是强调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实现方式及其在先进生产力中的重要地位，更加深刻地阐明科学技术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sup>②</sup>从而进一步阐明“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必要性。是否重视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否把握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正是一个执政党能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主要标志。

1. 现代科学技术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是集中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是当代先进生产力形成的基本前提。自从20世纪70年代新技术革命兴起以来，在新技术的带动下，科学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速度大大加快，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发达国家已达60—80%，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先进的科学技术已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名词，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标准。科学技术渗透、作用于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中，有效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技能，改造了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再通过对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各个部门、各种人员的科学管理，从而提高生产力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先进生产力是现代科学技术物化、转化和提升的结果。可见，江泽民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判断，揭示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规定了主攻方向，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所要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的“先进生产力”的最好诠释。

2. 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敏锐地把握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切实的工作步骤，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sup>③</sup>党的先进性离不开阶级基础。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虽然使产业工人的数量大大减少，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改变的只是生产者的劳动特性——大量的体力劳动者转变为脑力劳动者和全体劳动者的素质的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化、智能化，更能体现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并没有因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而发生变化。

## 三、科学文化是当代先进文化的基石，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抓好科学文化建设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在创造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也创造着先进文化。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在阐述如何发展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时，特别指出要“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sup>④</sup>进一步强调了现代科学技术对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性。

1. 科学文化是当代先进文化的基石和先导。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文化是科学技

术革命的产物。新知识的涌现造成了“知识爆炸”，新的科学思想、新的思维方法、新的价值观念以及新的文化形态（如网络文化、生态文化等）不仅直接制约着科技的研究与应用，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发展，维系着人类的未来。科学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先进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显著。正是科学文化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形成了先进文化的基础框架，科学的创新理念、价值取向代表了先进文化的活跃前沿。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大力倡导和发展科学文化。

2. 发展科学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部分，它反映了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内在统一。据中国科协公布的我国2001年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结果，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人群比例仅为1.4%。<sup>⑤</sup>这说明发展科学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当务之急。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普及教育，提高教育素质和全社会的教育水平；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sup>⑥</sup>“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良好氛围。”<sup>⑦</sup>

#### 四、发展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主要手段与现实途径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之所在。正如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所说的：“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sup>⑧</sup>因此，发展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1. 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正确的科技政策。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都要认真对待，因为它们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而，要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升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对于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应在政策上重点扶持；还要正确处理发展高、精、尖技术与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生活环境和维护社会安定的关系。这正是党在发展科学技术过程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具体表现，也是保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具体举措。

2. 发展科学技术要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sup>⑨</sup>这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是一致的。我国的科技落后，生产力水平不高，现代科技革命和改革开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提高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良好机会，我们必须抓住机遇，采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生产技术和其它实用技术，在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方面的需要。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发展我国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维护和实现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在新世纪赋予我国科技界的使命。科技工作者要树立雄心壮志，在现代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努力实践“三个代表”，为实现我国科技现代化和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

①③④⑥⑧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

②尚勇：《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求是》，2002年第3期，第46—49页。

⑤郭传杰：《科学文化是先进文化的基石》，《光明日报》，2002年1月11日。

⑦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责任编辑：叶金宝

# 中国经济特区的路径依赖

## ——对胡锦涛总书记考察深圳的理论思考

苏东斌

[摘要] 寻找有效的“转型途径”，探索更快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经济特区的神圣使命，应淡化“特区”意识，强化“城市”观念；“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是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之举，确认“创造收入”是改革分配制度的重要内容；政治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制度保证，而法制的民主性是依法治国的特定前提。

[关键词] 中国经济特区 路径依赖 深圳 理论思考

[作者简介] 苏东斌，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广东 深圳，518060。

所有的发展只能是从它的历史开始，绝不会一切都做重新安排，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谓的“路径依赖”。对于中国经济特区的典型城市——深圳未来的预测，也必须遵循这一点，本文以领会总书记指示为纲就此展开议论。

### 一、使命神圣

此次考察，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排头兵作用”，并认为，只有这样，“深圳经济特区的历史作用才能更充分地得到发挥”。

那么，深圳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到底是什么？作为“特区”的深圳究竟还能办多久？这是今天的深圳人不应也不能回避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中国经济特区的基本含义是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地区。在1981年中央所规定的《十条政策性意见》中就曾明确指出：它的“特”在于实行国家规定的特殊经济政策和特殊管理体制。

显然，当时中央兴办中国经济特区的基本目的，就在于它要启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由于它的对象是广大的非特区所存在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办特区的实质并不是什么可成功也可失败的“试验”，而是起着带动、辐射、示范作用的“先锋”。

当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尤其是1992年底党的“十四大”正式确认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之后，首先是特区的“理论”使命，接着是特区的“实践”使命就开始在事实上逐渐削弱了。因为从主流上讲，已经没有任何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官方文件，从实践中看，特区不可能永远做“经验批发商”。也就是说，邓小平所讲的“敢闯”，江泽民所讲的“创新”已不再是“特区”所能够独有的品格了。虽然这丝毫不能否认特区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而当中央在2000年宣布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将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sup>①</sup>时，我体会它是有其具体的时间内容的。如果说2010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将基本大体建立，那么这个过程就还有近10年；如果说2050年中国现代化建设将基本大体实现，那么这个过程还有近50年。

重要的问题在于，无论是10年，还是50年，在全中国都走向市场经济之后，中国经济特区已经不存在什么“特殊的体制”、“体制外”，而在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特区也不会再被允许实行什么原来那套“特殊政策”了。

我理解，兴办中国经济特区的全部意义都在于：通过特区，来探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有效途径；通过特区，来发现由普遍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各种道路。对于全国来讲，可以说，寻找有效的“转型途径”，探索更快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经济特区庄严而神圣的历史使命。而对深圳本身来讲，这个使命的直接目标就是“率先”把深圳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城市。

我以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对于深圳的未来发展可作出两种不同的安排。

第一种，在“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求发展”的大战略下，将深圳这样的“中国”经济特区变成“世界”经济特区。

根据“APEC 非正式首脑会议”的承诺，中国将在 2020 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对根据 WTO 框架下多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中国也将在 2030 年才能实现，现在又主动提出在 2010 年实现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计划。为此，可以考虑，再把几个已经发展起来的特区，从计划经济中的特区发展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特区，即从中国经济特区走向世界经济特区，它不仅超越计划经济体制，而且超越一般市场经济体制，甚至超越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给特区赋予时代的新内涵、新定位。把它的性质、作用、意义重新规范。也就是说，它已不再是什么“示范”地区，而是特殊需要的特殊地区。

为什么今天在美国、日本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都可以再办“特区”，而我们就不可以利用以往的特区基础实行更大的优惠政策继续办下去呢？我们仍然可以划出一块地方，仍然可以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在 WTO 框架内运作。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充分利用作为中国经济特区的典型——深圳 20 多年来的发展基础，又可以进一步扩大开放，只不过它不再具有“带动”作用罢了。

如果能赋予中国经济特区这种新鲜使命，就会早日实现邓小平所期待的在中国“再造几个香港”的远大设想，我以为，这种大战略下的大布局，对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决不亚于 20 多年前兴办中国经济特区的伟大决策。

但是，如果因为国家的战略布局而无法做出上述安排，那么还有另外的一条路线。

第二种即在“特殊政策”与“特殊体制”双无的前提下，即由一个“特区”变为一个“地区”的条件下，仍然可以利用以往的经济实力去建设一座普通的现代化国际大城市。

我体会，胡锦涛总书记此次考察的对象，不仅是深圳，还有湛江、东莞、广州。他所提出的“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排头兵”的要求，也决不限于经济特区，而是广东全省。显然，淡化“特区”意识，强化“城市”观念，也是一种与时俱进。

作为一个地区、一座城市，深圳仍然具有三大经济优势：第一是体制优势。经过 20 年的探索与实践，显然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在相当一个时期仍然会高于其它城市，这为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是区位优势。不可替代的地理位置使它比其它地区能够更好地借鉴香港、澳门的体制资源，并为扩大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三是结构优势。当深圳把高技术产业定位于主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时候，已经顺利实现着结构上的调整。作为“十五”期间工作的主线，它比其它城市能够更快地实现以信息化来缩短工业化的进程，从而为完成产业升级奠定了良好基础。

值得强调的是，这三大优势是较牢固地建立在经过 20 年改革与发展所积累起来的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300 多亿元人民币的地方财政收入，为 400 万城市人口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显然，这一基础为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乃至粤港澳新经济区的形成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可见，无论是哪一种安排，都能够加快实现现代化的总目标。

## 二、战略机遇

此次考察，胡锦涛总书记再三提醒，一定“要抓住和用好 21 世纪头 20 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更快一些”，“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我理解，所谓“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源于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源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源于知识经济的大趋势，源于和平与世界发展的大环境。

在这种态势下，一旦再丧失时机，就如早年日本已完成“明治维新”，而大清依然闭关锁国，也如当初世界已经发生新技术革命，而中国正在热衷于“文化大革命”一样，所耽误的就不再是十年，而是几十年甚至是一个世纪。所以中央才明确宣告我们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显然，今天的关键已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怎样发展的问题。为此，胡锦涛十分关注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他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掌握核心技术很重要，不掌握核心技术就要受制于人。”但是，他深知，技术的背后是人，而人的背后是制度，所以他画龙点睛地指出“为加快发展创造更好的体制环境，形成新的强大动力”。而这一点又和“十六大”提出的“鼓励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在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前列”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决不能过高估计深圳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与完善程度。不能忘记深圳以往取得的骄人业绩正是改革开放的结晶，离开了改革开放，深圳就难以保持发展的高速度。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确发展迅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上仍有较大的差距，体制上的差距则更大。深圳决不能陶醉于已经存在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高比重上，深圳工业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目前深圳的制造业还需要大幅度提升，服务业还需要大面积建设、大幅度开放。所以，对于深圳来讲，当务之急还是要全面走向新体制。

我们应高度评价学者们“制度重于技术”的观点，同时，引伸应该说明“激励创造供给”的主张。因为体制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原动力。

中国经济特区 22 年的发展史表明，如果没有诸如当年的土地拍卖、劳动力市场、股票发行、国际招标等一系列全方位而不是单一领域、根本制度性而不是具体政策性的深层创新与对外开放，今天，在这里，就根本不会有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得以生长壮大所必须的前提、环境与内在动力，也就在总体上难以保证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真正实现。

所以抓住和用好 21 世纪头 20 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之举，就是切实贯彻中央提出的“从根本上消除克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深圳在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创新应是寻找“适应”而不是“超越”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则、机制。当前最快、最好的办法不是一切从头做起，而是“拿来主义”，走向国际惯例，这也是加入世贸组织的必然要求。只有在适应了国际惯例之后，才能够而且应当发生经济体制的再创新。从这个角度讲，深圳进行经济体制创新，实质仍是改革开放，方向就是国际惯例。因为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体制变动都可以称之为创新，只是在客观上符合“三个有利于”和主观上符合“三个代表”的变动才能叫作创新。

在这里，有两个重大的问题尚存在严重的体制性障碍。

第一，坚决贯彻“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总政策、总方针。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经济收入可分为三种形态。第一，劳动收入形态：包括体力劳动收入、脑力劳动收入，尤其是脑力劳动中科技、管理等的收入。第二，要素收入形态（本来劳动力也可以作为一种要素出现，只不过这里的要素仅仅指除劳动力以外其它一切生产性要素）：包括土地收入（地租）、资本收入（利息）、资源等收入（如在中国社会现实的资本运行中，非公有的资本所有者对社会财富的创造却有着自己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所要付出的风险却是：不是只要拥有资本就能获取利润。因为如果经营失败，投资失误了可能亏损甚至破产。所以这种对资本与劳动的经营管理以及对此所承担的风险，应当获得不低于银行利息的收益，舍此，资本所有者便失去了投资的必要与动力）。第三，机遇收入形态：包括中奖收入、彩票收入，甚至遗产收入等。第二、三种收入形态都不属于劳动收入形态，第二种形态是参与价值形成和财富创造，第三种形态虽然不构成任何生产性要素，但对于社会却能够带来经济利益，有利于公益事业。

当物质资本不仅获得补偿，而且参与利润的分配时，也必须让人力资本参与利润的分配，而决不仅仅是成本中的支出。这样，从“价值共创说”到“利润共享说”才标志着劳动价值理论的彻底完成。<sup>②</sup>如果说“价值共创说”的核心思想是在于论证资本等生产要素获得收入的经济合理性的话，那

么“利润分享说”的核心思想却从理论上突破了工资是劳动力价值这一传统的原始的经典结论。或者说，如果我们依然承认工资等于劳动力价值，那么它的构成也已经不再仅仅属于“补偿”的“成本”了。因为在这里，作为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即  $M = M_1$  (以税收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收入) +  $M_2$  (以利息为主要形式的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参与收入) +  $M_3$  (以奖金为主要形式的劳动者的创造收入)。于是，劳动者的直接收入也就由“V”(劳动消耗补偿的成本) + “ $M_3$ ”(创造收入)两大部分组成了。可以说，“创造收入”的形成提供了“利润分享说”的理论根据，它不是在再分配中实现，而是在初次分配中实现。

## 第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企改革现在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做大做强，二是先结构调整再内部改革。我是主张“先革命、再改革”的，先进行结构调整，砍掉一大批竞争性的国企，从而把国企的范围限制在社会公益事业上，然后再研究如何在必须保留下来的国企中实行责任管理。

本来深圳国企几乎是一片空白，但在发展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复制了一个旧体制，从而形成今天的一个巨大包袱。目前深圳约 1639 亿元的市属国有企业总资产，处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市属国有总资产高达 1031 亿元，占整个市属国有企业总资产的 63%，实现利润仅占全部企业利润的 29%，净资产利润率仅为 4.05%。国企在这种极其不协调的状态下如何做大做强？

国企改革的创新在于淡化国企的概念。在当前国有资本不可能一夜之间退出的情况下，就应该大力推行产权主体多元化，尤其是产权主体社会化。必须明确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只能建立在产权社会化的基础之上。

以往都是讲产权的多元化过程，现在看来，仅仅在若干国有企业之间进行一般的企业兼并，强强联合，都不存在产权制度上的实质变革，因为转移的仅仅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只有实现了产权社会化，即非国有的所有者进入，才能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真实基础。因为市场经济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市场的价格导向，而价格又仅仅是所有权的交换条件，只有不同的所有者而不是不同的经营者有必要与可能进行商品的等价交换。

以往相当一批国有企业老总不愿以及不再归还国有银行的贷款一事，就从反面证明了产权社会化的重要性，因为资源受益的权利与负担相应成本的责任相脱节。

但是在广东，民间投资已经大大落后于江浙等地的水平，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所有制结构调整中的差距。

其深层症结是，以往的工作重点一直是把国有企业如何做大做强，以及对外资引进如何更快更多。所以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往往十分关注产业升级，却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所有制结构改革。显然，只有从观念上修正只有国有企业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唯一基础这一传统认识，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从主观上讲，民营经济存在的根据在于经济民主与自由选择。个人为了实现其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无论是从政、学文、习武，还是经商，都是一个自由而非强制性选择的结果。而在经商中个人又有权选择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具体方式。这是人民主权的经济体制。否认了这一点也就同时否定了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

从客观上讲，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多变性和进步性，不仅使非公有经济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而且在高科技的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在以个人价值为基准点的发明创造时代，更显得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总之，民营经济的发展与任何“主义”无关，又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无关，它一直是所有制结构中一项重要内容。如果我们再进行一下动态研究，通过考察社会生产，尤其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通过考察财富的分配，尤其是再分配过程，那就不难看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这样，从经济学的原本意义上讲，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绝对的、它们

的关系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对立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作用更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相反的。

### 三、发展协调

此次考察，胡锦涛总书记针对广东与深圳特点，明确要求“坚持全面的发展观，通过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并殷切期望深圳“努力在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都交出优异的答卷”。

显然，我们现在要思考的问题是：深圳真正缺乏“继续走在全国前列”、“更好地发挥排头兵作用”的动力因素是什么？我以为，广大干部、知识分子、普通工人，缺乏动力的原因必须从他们所遇到的想干而不得干、想干而不能干、想干而不敢干的体制性障碍上去寻找。无论是对于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对于社会的全面进步，都必然要求我们恢复与发扬由邓小平所极为准确概括的、近几年来有所削弱的“敢闯”、“敢冒”的深圳精神。要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这种障碍既涉及到经济体制，也触及到行政体制、文化体制。

这里的突出问题就是政治文明建设问题。从最原始意义上讲，政治文明是相对于政治野蛮而言的。虽然人类社会中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有的文明，但是，今天我们讲的政治文明却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质。

毫无疑问，政治文明的提出，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提供了充实而具体的内容。因为，从职能上看，共产党已经从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的革命党，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领导整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执政党；从组织上看，共产党已经由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扩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行动规范上看，共产党已经由强调阶级斗争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主，转变为强调依法治国以改善现存社会秩序为主；从而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开始了由传统党向现代党的转化进程。

那么，为什么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外还要加上一个政治文明呢？我理解，第一，从狭义上看，政治文明完全可以分属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同行的不同领域。因为，物质文明主要表现于社会的高质量的生活，精神文明主要表现于健康的个人精神状态，而政治文明则主要表现于社会良好的运行秩序。相对地说，前两者是内在主体性的反应，而后者则是外在的强制性要求。第二，政治文明不仅是连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纽带和桥梁，更是上述两个文明的制度性保证。一般来说，就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并不缺少总路线、总纲领，而是常常缺乏使之真正彻底落实的中间环节，即体现政治文明的各种具体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见，这就要求我国的制度安排必须体现政治文明的根本性质，而政治文明的内容与形式又必须体现在各种具体的制度安排上。早在 1956 年末，毛泽东曾振聋发聩地讲过两段话，其一是“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亚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其二是“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是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sup>③</sup>这两段话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建设政治文明的必要性。今天，建设政治文明，不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而且本身也是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关于如何实现“政治文明”，我特别赞同中共“十六大”所表述的“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样的论断。这就是说，就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种脱离人民利益之外的党的单独利益存在，否则就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党，因而反腐败也就是共产党自我完善的应有之举；另一方面，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反抗社会秩序的个人的绝对的自由，否则就会发生无政府主义的群氓运动，因而国家导向也就是现代社会稳定发展的应有之义；第三方面，尤其不应存在任何违背共和国体、民主政体的法律法规，否则难免留下封建体制的“人治”隐患，因而法制的民主性才是依法治国的特定前提。这也就清楚地表明，各级党组织都要“通过”，而不是“超过”宪法及法律的各种条文去实现自己的意志。只有这样，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才能在法制与法治基础上得以充分实现。

我们应当说明，因为国情不同，我们可以不照搬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某些形式，但是，我们绝对

不应拒绝其中包括的现代民主化的内容。应该说，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民主政治的确立，而民主政治的首要制度，就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分权制”而不是“集权制”，以及它所带来的“制衡制”，而不是“专断制”。这两项制度的基本前提又是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普选制”。这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开放改革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不但在物质文明建设中可以借鉴类似市场经济那样的人类文明成果，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同样可以借鉴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比如对于交通工具，我们决不能说发展中国特色的交通工具的目标只能是自行车，而美国式的交通工具目标才可能是轿车。再比如，对于民主政治中的普选制度，邓小平曾明确设想本世纪中叶在中国得以实行。所以我们决不能说，西方的民主政治是选举制，而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就是任命制。我们在说明“中国特色”时，更应强调创造性地吸收“人类文明一般”，而在确认“初级阶段”时，更应强调体现时代步伐的“国际惯例”。我们应从历史上洋务运动的失败吸收教训，中国的社会转型可称之为“第二次革命”，而不是一场新的洋务运动。仅仅靠经济改革和技术创新不仅完成不了这一历史使命，而且也不可能保证经济本身的持续而稳定的发展。“一部宪法治天下”的历史生动地告诫着人们：政治文明恰恰是国家稳定的一块基石，是社会团结的一大法宝。

我们只有不断地一项一项地从根本上排除束缚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各种体制性障碍（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才能为广东及深圳当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排头兵”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

①转引《人民日报》2000年10月27日江泽民讲话。

②参见《苏东斌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③转引肖冬莲：《求索十年》下册，红旗出版社，1999年，第1098页。

责任编辑：雷比璐

# 切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张育彪

(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518129)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定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对推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南岭村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特区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缩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2日到这里视察时提出要“致富思源、富而思进”。胡锦涛总书记今年4月12日视察南岭村时又勉励我们要“不自满、不松懈、不停步”。我们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倍受鼓舞，决心以总书记的鼓励为动力，认真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切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把南岭村建设得更加富裕、更加文明、更加先进、更加美丽而奋斗。

一、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不自满、不松懈、不停步，加快发展，率先发展

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不仅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第一要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了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无法维护和实现。能不能解决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因此，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要的就是要把发展作为我们所有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永远把发展生产力，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放在第一位。对务实的农民来讲，这尤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南岭是一个人均收入不到100元的穷村，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因为“穷”和“脏”，被人叫做“鸭屎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一股春风吹绿了岭南大地。20多年来，村党支部一班人带领村民艰苦创业，抓住了四次发展机遇，使集体经济迈上了大台阶。2002年，我们村集体经济总投入1.9亿元，人均收入10万元，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增长了1000倍。

今后，我们决心不辜负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对我们的期望，努力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不自满、不松懈、不停步”，率先发展，加快发展。今年，我们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实业型经济，实现经济从物业型向实业型的转型，壮大集体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力争使南岭村的经济迈上一个新台阶。

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记“两个务必”，做到“三心”、“三情”、“三大民主”

十六大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我们认为只有加强党的建设，自觉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不断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不断把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才能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南岭村党支部现有党员79人，平均年龄39岁，大专以上学历31人，占党员总数39%。长期以来，南岭村党支部一班人坚持做到“三心”，使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三心”是指“公心、责任心、事业心”。我们村党支部规定：党员干部第一要有公心——做到一

心为公，遵纪守法，想问题、做事情，始终把集体利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要有责任心——每个干部分工不同，但人人都要以对党、对群众、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尽职尽责，真抓实干，开拓进取；第三要有事业心——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服从大局，乐于奉献，艰苦创业，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20年来，村党支部一班人自觉按“三心”要求办事，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党员干部以“三心”做事，按“三心”做人，极大地激发了全体村民的创业热情。

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胡锦涛同志去年冬天到西柏坡考察，重新强调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作风。胡锦涛同志这次到南岭村考察，再次勉励我们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永远“思进”，永不停步。南岭村是全国的先进典型，获得过无数的先进荣誉，如果头脑不清醒，就会在骄傲自满和贪图享乐中消解正气、朝气和锐气，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求全体党员干部牢记两个“务必”：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过去“三心”教育的基础上，我们要求党员干部努力做到“三情”：对党要有感情、对群众要有亲情、对工作要有热情，始终做到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为了保证“三情”能落到实处，我们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做到“三大民主”：一是民主管理。过去我们已经实行了村务公开、民主理财制度，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这一制度。凡村里的重大事情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都要向村民公开。集体财务每月定期公开，分细目向全村详细公布。我们认为，群众参与管理，有利于加大工作的透明度，密切干群关系，更好地调动群众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群众有否参与民主管理，也是村领导班子有否真正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表现。二是民主决策。凡涉及村集体经济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都要提请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三是民主监督。要进一步健全组织监督机制，进一步制定健全村务公开、村干部评议、村民议事会、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把村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 三、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三个文明”一起抓，协调发展，全面发展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三个文明”一起抓，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我们南岭村，不但重视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为了走出“穷时坑蒙拐骗，富时吃喝嫖赌”的怪圈，我们很早就提出：“穷时要有穷志气，富时没有富毛病”的口号，在村民中大力倡导富而好劳、富而学德、富而好学、富而思进。我们拆掉神台建书台，破除迷信树新风，做到村有图书馆，厂有图书馆，甚至家有图书馆。做到崇尚劳动，热爱劳动。我们重视教育，狠抓学习，目前全村有大学生79人，10%的村民达到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为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将“三个文明”一起抓：一是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大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强全村的经济实力。我们正在投资1亿元用于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搞好村庄的绿化、美化、亮化；投资200万元建设“数字南岭”，利用计算机网络将各单位、各部门和每户村民联结起来，实现智能化、信息化管理。二是坚持“越富越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但要富口袋，亦要富脑袋，使文明村建设更上一层楼。三是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坚持村务公开，依法治村，实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力争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南岭村“经济更加繁荣、生活更加富裕、村民更加文明、环境更加优美、管理更加先进”，把南岭村建设成经济强村、科技强村、“数字”新村、文化新村。

责任编辑：叶金宝

•哲 学•

# 人文学科的本性及其科技化变异

曹文彪

[摘要] 发端于西方17世纪的现代科学与技术的急剧扩张与膨胀，使人文学科的本性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即由原先的经由人文文本的陶冶而造就“有学养的人”（韦伯语）变异为通过对人文文本进行纯粹科学的认识、研究及技术的操作而培养出类似科技专家的人文专家。

[关键词] 人文学科 科技 变异

[作者简介] 曹文彪，浙江省委党校文化学教研部教授，浙江 杭州，310012。

正像题目所已提示的那样，我写此文的目的，是想对人文学科在今天的处境——其本性（目的、态度及方法）日益表现出向科学化与技术化的变异，作出适当的论述。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这种变异如果不是灾难性的至少也是致命性的。人文学科的确正受到每况愈上的重视，撇开传统的文科院校不谈，即便是理工院校，在今天，也在忙着增置人文学院或者人文课程，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努力似乎并没有真正有助于“有学养的人”的出现，情况似乎是，距离这一目的的满足反而日渐遥远起来。

—

如果我们同意《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的作者、英国当代文化史学者艾伦·布洛克把宗教文化与科学文化分别笼统地定义为以某种至高无上的神与自然为焦点的文化的话，那么，人文文化，完全依然可以像艾伦·布洛克所认为的那样，被定义成这样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聚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sup>①</sup>孔颖达把《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的“人文”一词解释为“礼、乐、教化”，<sup>②</sup>以及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人文”一词理解为“情文”，并且认为构成其基本要素的乃是人的五种基本品性——仁、义、礼、智、信，<sup>③</sup>为此提供了颇具启发意义的例证。至于从外延看人文文化包括哪些科目，则纵观布氏在《传统》中所曾提及的以及今天世界上各主要大学里所通行的那些科目，大体上不外以下几种，即文学、艺术、历史、语言、文字、道德以及古希腊罗马意义上的哲学。古希腊罗马意义上的哲学，从其本性上看，乃是关于人生智慧的学问，即便是关注有关上帝及自然的问题，其最终的目的依然在于更好地回答有关人生的种种问题。正像早期犬儒学派的重要人物安提乌斯所指出的那样，在于依据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的意见，“科学研究，除非对积极的人生具有某种直接的影响，否则便没有任何价值”。<sup>④</sup>罗素把哲学视为介乎宗教与科学之间的一片特殊的领地。<sup>⑤</sup>德国当代学者O·马库阿德认为“哲学很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属于人文科学”，<sup>⑥</sup>也表现出许多迂腐浅薄的哲学教授们所望尘不及的对哲学本性的深刻的领悟与觉解，虽然他把人文归入科学的范畴又给他的这个领悟与觉解蒙上一层令人遗憾的阴影。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和科学文化的各个学科，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以及生物学等，所面对的乃是与之对应的各种其本身是中性的或即没有价值取向的自然存在物不同，人文文化的前述各个学科所面对的却是大量各不相同的、作为对人的经验世界之反映及表现的、非中性的或即具有明显而强烈的价值取向的人文文本，例如各种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的创作作品。

人文学科与科学学科的目的有着根本的差异：后者的目的在于对人们进行旨在了解自然、控制自

然甚至是改造自然的各种科学技术的训练，以使人们成为不同专业的科技专家；前者的目的，正像古罗马的西塞罗所认为的那样，则在于“发扬那些纯粹属于人和人性之品质”，<sup>⑦</sup>以使人们成为韦伯所说的那种“有学养的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之所以要致力于复兴古希腊罗马的人文文化传统，是因为他们普遍坚信，人文学科的教育为的是把人从自然主义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并且发现他（她）自己的 Humanists（人性）。换句话说，这种教育的目的在于“从人的整体观念出发来培养人”，<sup>⑧</sup>这一点在当时的意大利有着尤为突出的表现。究其原因，在于当时的意大利人坚持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中，教育除了培养他的智力以外，也要培养他的社会适应力。”<sup>⑨</sup>熟悉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读者们，可以轻易地从整个中国古典的时代找到有力的例证。以哲学为例。在差不多整个中国古典时代，哲学普及得几乎是人人从小就必须研习的科目。正像冯友兰教授指出的那样，“在旧时代……儿童入学后，首先教他读《四书》……《四书》是新编儒家哲学的最重要课本。有时，儿童刚开始识字，就读一种课本，名叫《三字经》……就是它，开头的两句也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哲学的基本观念”，<sup>⑩</sup>但是却很少有人把研习哲学视为一种专业，并且因此也就很少有人由此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哲学家。事实上，在整个中国的古典时代，除了常常被称为子的哲学而外，其他与子并列的所谓经、史、集以及所谓琴、棋、书、画等，其目的也都在乎即便不是像哲学那样可以直接使一个人成为圣人，至少也是有助于使他成为圣人。要不然，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的古典时代，上述人文科目特别是琴、棋、书、画常常被称之为“善性之学”。所谓善性，用黑格尔的术语说就是教化，它意味着“一种极其深刻的精神转变”，这种转变的最本质的特点，在于被教化者“放弃欲望的、个人需求的和私人功利的直接性”，并且因此形成一种“对普遍性事物的追求”。<sup>⑪</sup>

## 二

为了能够真正达致上述善化人性的目的，在差不多整个古典时代——中国的以及西方的，人文学科对人文文本基本上采取了一种与之相应的态度：不把人文文本看成纯粹知识的、研究的以及操作的对象，而是像贡布里希教授所说的那样，看成可以亲近的、并且因此可以从中获取快乐的对象；孔子针对学生的提问所作的回答“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许可以被视为对这种态度所作的最好的表达。这是不难理解的：一个打算接受人文文本的教化的人，如果不怀着对文本的喜爱与信赖，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文本之中，去领会，去体味，去感悟，或者如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罗蒂所说的那样，去“与作者、人物、情节、诗节，或某个古代雕像相遭遇”，<sup>⑫</sup>文本又怎么能培养出他（她）的美好人性，或者改变他（她）的不良人性，并且最终使其成为一个“有学养的人”或者所谓“圣人”呢？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不得不认为，陶渊明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辄欣然忘食”，的确堪称理想的读书态度。这里，“不求甚解”表明他和文本的关系是非常轻松的，随意的；而“每有会意”则说明他并不想逐字逐句地去认识、研究甚至是任意地操作文本，而只是与文本进行精神上的交流或者对话；至于“辄欣然忘食”，其所表明的，除了是这样一种状态——个人的精神世界与文本的世界融为一体，忘怀万物——以外，还能是其他什么状态呢？事实上，在陶渊明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待人文文本所采取的“乐之”的态度，不过是中国古典时代绝大多数读书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已。

在西方的古典时代，从总体上看，人们对待人文文本的态度依然是倾向于采取“乐之”的态度。尽管古希腊的人的确如同荷兰科学史学者 R·霍尹卡所说的那样习惯于“运用逻辑学、数学和观察的方法去理性地探索自然”，<sup>⑬</sup>但实际上，他们更喜欢遵循着前引德尔斐城的神谕去探索有关人自身的问题，因此，他们对待任何与之有关的人文文本普遍都表现出如同苏格拉底所坦言的那种“喜爱”的态度。在古希腊的雅典人看来，与人文文本的接触，不但开启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智慧，更给他们自己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无论是像匹脱拉克这样一种竭力称颂“闲逸生活”的人文主义者，还是其他绝大多数倾向于过一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生活的人文主义者以及其他众多的各色人等，都对一切美妙的事物，如自然、人体、语言、讲演、文学、古希腊罗马的遗址以及特别是几

乎所有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家们的所有人文作品，表现出和古希腊罗马人一样的热爱之情或即“乐之”的态度。例如：在14世纪的佛罗伦萨，“无论哪个阶层的人对文学都很感兴趣”，“就连驴夫也能吟哦坦丁的诗句”。那不勒斯的国王、阿拉贡王朝大阿尔方索，“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古代经典著作，如果有一天没有读到他就认为这一天是虚度了”；“现时用来听音乐的许多社交时间在那时（即文艺复兴时期——本文作者注）都用于听拉丁语或意大利语的演讲”，“讲演者的社会地位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所要求的只是造诣深湛的人文主义才能”；<sup>⑭</sup>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与上述对待人文文本所采取的这种“乐之”的态度（用孔子的另外一个术语说，就是“为己”的态度；所谓为己，指的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以及特别是因此而善化自己的人性）相应，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古典时代，人们在对待人文文本方面差不多都采用了共同的方法——领悟与感受。领悟什么？感受什么？简单地说，不外是文本的意蕴、神髓及美质。通过这个领悟与感受，人们的自我便进入了文本并且慢慢地与文本两相融合，难分彼此，最终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文本所陶冶，所善化，或被文本所文——化。有必要提请注意的是，不应该把领悟与感受简单地等同于特雷西所竭力倡导的诠释，因为诠释似乎偏重于客观准确地理解文本的意图，而很少涉及在与文本发生关系时人们的精神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sup>⑮</sup>如果一定要和西方的某一概念相比附的话，也许狄尔泰提出的解释这一概念差足近之。原因是，狄尔泰赋予解释这一概念的内涵，除了理性地把握文本的意义外，还包含着一种移情的过程；而正是在移情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才实现了与文本的交融会合。当然，为了达成这种领悟与感受，还必须借助于其他一些更为具体的技术，比如吟咏、背诵、反复、抄写及临摹等。仅以反复技术为例来分析。为什么要采用反复的技术？因为这有助于对文本意蕴的领悟，用中国古典时代的一句极为流行的话说，就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解”。当然，反复所发挥的作用也绝不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助于人们感受文本的神髓与美质。正是后者才使人们有可能进入文本，并且与文本融为一体。意大利15世纪那不勒斯的国王、阿拉贡王朝的大阿尔方索“命人像读李维和塞尼加的作品一样为他读圣经，一直读了十四遍，他几乎能背诵下来为止”，<sup>⑯</sup>以及欧阳询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索靖的章草石刻，最后干脆露宿一宵，以便充分感受它的神髓与美质，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

### 三

不幸的是，上述人文学科的本性——目的、态度与方法，在今天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变异为科学，变异为技术。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今天，人文，除了极偶然地被视为一种文化学科以外几乎清一式地被称为人文科学。人们只要浏览一下陈列在各大图书馆里繁多的期刊就不难发现，90%强的文科学术刊物差不多均被冠以“人文社会科学”的名号。这些名号表明，这些刊物的目的在于发表有关社会与人文的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暗示：正如自然科学是对自然所展开的科学的研究一样，人文社会科学也是关于人文及社会所展开的科学的研究。此外，在大量的讨论科学与人文或者单独讨论人文的论著中，人们可以注意到，绝大多数情况下，人文也被称为科学而不是学科（参见法国《科学与哲学的对话》第一、二两册中有关的文章，<sup>⑰</sup>以及类似《论文学学科的科学化》的文章）。再者，在大学系科的划分中，人文的后面所跟随的通常也是科学而不是学科。最后，关注大众传媒的读者们还不难发现，无论是电视还是广播或者报纸，在提到人文时，一般说来，也是把它归入科学的范畴。

上述把人文定性为科学的倾向引发出了以下一系列重大的变化。首先当然也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此一来，人文学科的目的便不再像西塞罗、韦伯以及冯友兰等人所共同强调的，在于培养“人性之品质”、“有学养的人”以及“君子”或者作为其最高层次的“圣人”，而是像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那样致力于培养各种专业的专家。这些专家，用贡布里希教授的话说，往往在许多“很小的事情上面知道得很多”。<sup>⑱</sup>此外，一般来说，他们都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掌握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以及了解对做好研究工作来说很有意义的最新的研究动态。这样，他们就可以针对其专业领域内的各种人文课题进行各种据说是很有价值的研究，并且最终还要能够把研究成果用各种规范的形式（如学术论文与学术论著）表达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使其学术的、社会的，特别是经济的地位不断地往上移升，至少能

保持原状而不致下降。总之，无论他们对人文文本所拥有的知识还是对人文文本所做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职业化行为，因此对其自身的人性状况大体上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用海德格尔发明的颇为形象生动的术语说，他们事实上只是人文学科的一些高级的“技术员”<sup>⑯</sup>而已，而用我所发明的术语说，则均属于与“被文化拥有者”相反的“拥有文化者”。所谓“被文化拥有者”，指的是一个人通过亲近文化的文本，逐渐地成了其所亲近的人文文本的“俘虏”而被其拥有，被其文——化；所谓“拥有文化者”，指的是，对这些文化专家来说，人文文化只是他们经由学习、研究、操作等而逐渐获得的东西，他们获得这些东西的目的只在如同商人一样根据经济的、社会的及政治的需要随时将其抛售出去。正因为如此，在今天，人们常常根据一个人的学位、职称或职业去判定一个人是否是一个文化人，实在是太过外在并且因此也太过浮浅了。事实上，从本质上讲，一个人只要具有美善的人性以及与之吻合的优雅的举止，就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否则无论他（她）的学位多高、职称多高以及职业是多么地“文化”，也断然不是一个文化人，而只是一个文化的“技术员”。因此，正像萨义德所敏锐地觉察到的，在今天，真正的文化人似乎并不是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而是大量的业余人士。<sup>⑰</sup>也正因为如此，雅克·勒戈夫才把15—16世纪的西方人文主义者看成与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相对的另一种类型的学者，他的意思是说，后者“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播思想为职业的人”，<sup>⑱</sup>而前者研究人文文本的目的基本上在于完善自己的人性。

其次，与之相反，在今天的人文学科的领域，人们对待人文文本的态度也变异为和科学技术专家对自然存在物一样的态度，即认识、探索与操作。细察一下，这种态度其实是以另一个更为基本的态度为其前提的，这个态度就是由马丁·布伯尔早在17世纪初指出的“我—它”的态度。这种态度被布伯尔称为经验的态度，“讲的是人在生活中的客观和功能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有某个‘东西’作为目标：要保持、要做、要思想、要繁荣某种东西”，总之，这种态度“让我们看到了有许多客体的世界”。<sup>⑲</sup>众所周知，罗素曾经把西方的科学传统分为两种。其一是对自然采取纯粹认识及探索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助于人们了解自然，但其目的却不在控制与驾驭自然，<sup>⑳</sup>而是为了更好地热爱自然。其二是对自然采取的态度依然是认识与探索，但其目的却与第一种相反，即不是为了更好地热爱自然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与驾驭自然。不难看出，第二种态度其实就是科技的态度。把这种态度移植到人文学科中来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人们面对人文文本时，想到的不是如何地亲之、乐之，并且与之达成精神上的交流与融合，而是设法了解它是个什么东西，以及更进一步对之施加各种各样的操作。因此，一点也不奇怪，在今天，许多人可以对有关的人文文本知道得很多，但也就仅仅流于知道而已。换句话说，这些关于人文文本的大量的知识是外在于知识主体自身的，因此不大可能对其人性状况产生多大的影响。对于这些知识主体来说，这些知识的作用，尖刻一点说，大体上只在于使他们显得博学多闻，当然，也许还会为他们赢得相应的声誉与利益。此外，还有许多人则更习惯于以一个“技术员”的身份把人文文本视为供其操作的“持存物”（海德格尔语，意指无个性的、非定的、持续存在的资源），<sup>㉑</sup>借助各种各样的方法与技能，如分析、解构、重组、复述、压缩等，对之进行任意地改造与加工，其目的，借用罗蒂的话说，在于“将文本锤打成符合自己目的的形状”，<sup>㉒</sup>并且因此制造出大量的所谓论文与论著。这样做的后果，正像萨义德所说的那样，人文文本便被这些技术员们给“窄化”了。<sup>㉓</sup>因此，一个让人啼笑皆非并且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在今天，人文学科已经变异并且分化出各种各样的人文工业，如西方的拉康工业（Conradian industry）、乔伊斯工业（Joycian industry）、叶芝工业（Yeatsian industry）、狄更斯工业（Pickensian industry）以及中国的屈原工业、陶渊明工业、李白工业、杜甫工业、曹雪芹工业、鲁迅工业等。最为糟糕的是，对于这些人文工业的“技术员”们来说，他们每一次的技术操作，差不多都只是一次“例行公事”（萨义德语）。而这样一来，无论是作为操作者的主体还是作为被操作者的人文客体，便都“作为持存物而被吸收了”，换句话说，双方的本性便都被“耗尽”了，最终剩下的便只是一种技术化的“空洞性”的存在。<sup>㉔</sup>

最后，在今天，古典时代人文学科所采用的那些教学方法，不但普遍受到了措辞严厉的质疑与抨

击，而且大多数均被当作过时的东西废弃不用，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系列被认为更为有效的科学的以及技术的方法。举例来说，在古典时代非常流行的背诵与抄写的方法，一方面随着被抨击为死记硬背，不能启发学生的思维及理解，另一方面随着电脑技术的广泛采用，据说人们根本不再用大脑去储存信息，大脑的功能只在于思考。再比如，作为中国古典时代的一个极为独特的方法的评点，也被谴责为简单模糊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及知识的系统性，代之而起的则是由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构成的严密的逻辑的及哲学的方法。因此，在今天，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里的人文教学，到处都充斥着和用解剖刀解剖动物尸体并无二致的对人文文体的解剖与拆卸，这样，原本表现为生命有机体的人文文本便四分五裂为一大堆毫无联系的部分与元素。关于这一点，读者们只要试着去阅读一下结构主义者们对文学文本所作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分析与研究，就可以了。事实上，今天的人文教学，正像人文研究变成了一种纠缠于细微末节的繁琐研究，一种迂腐的研究<sup>⑩</sup>一样，也已经变成了一种繁琐迂腐的教学。而过去的那种借助于只言片语的评点以唤起学生自身的领悟与感受的冲动，以及让学生们在吟咏、背诵、抄写以及临摹等的过程中去实现这个领悟与感受的方法，却被视为教学上的无能与逃避——即不善于或不愿意进行长篇大论式的讲解而丢弃了。其结果是，正像贡布里希教授所一再慨叹的那样，今天，在人文院系学习的学生们所能接触到的，主要的已不再是各种各样的人文文本的本身而是大量的针对这些文本的无以计数的、过剩的学术工业产品，这些过剩的学术工业产品，事实上已经成为横亘在人文学生与人文文本之间的一堵堵庞大无比并且坚不可摧的墙壁。

#### 四

我知道，要找出导致上述人文学科的科技化变异的全部原因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我将试着说出至少在我看来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几个原因。首先，我以为，这无疑与人类文化的演化（当然，主要是从西方的角度来看的）趋势有关。尽管布洛克教授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曾经提醒人们说，虽然宗教的文化模式在中世纪占支配地位，人文文化的模式在文艺复兴时期正式形成，而科学文化模式则迟至17世纪才得以形成，但是决不能把这简单地“作为孔德的三个阶段规律的另一个翻版，即人文模式超越了神学模式，反过来又被科学模式所超越。17世纪以来，所有这三种模式都继续有代表，继续吸引信奉者”，<sup>⑪</sup>然而，正像事实所一再表明的那样，17世纪以后，科学模式的确处于每况愈上或者日益扩张的过程之中，而其他两种模式却处于日趋式微的境地。特别是随着英皇查理二世在1662年授予旨在鼓励和促进科学的研究的皇家学会以特许状，“从事科学者的地位几乎达到了身份等级制的顶点，而在一个位置上向来只有教士代表着知识界”。<sup>⑫</sup>事实上，在17世纪，由于类似英国的这种皇家学会很快就受到西方其他众多国家的仿效，因此，科学在英国所获得的这种“顶点”的地位也很快扩展到了这些西方国家。加之此后科学对经济的发展及财富的增长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正像科塞在他的《理念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从此以后，科学在西方社会的显赫地位就再也没有被剥夺”。<sup>⑬</sup>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在西方，此后对科学的崇拜便逐渐地取代了对上帝的崇拜，对自然物的关注也逐渐地取代了对人自身的关注。总之，此后，科学事业在人们的心目中便成为至高无上的事业，而科学一词则成了光华四射、魅力无穷的词语，以至人们普遍坚信，一切问题，只要得到科学（当然还有技术）的帮助，就能获得理想的解决。就知识的领域而言，如果说科学的这种魅力起初只表现为使许多学者相信研究自然的方法应该同样适用于对社会及人文的研究的话——例如，在孔德的著作中，“科学第一次应用于社会”，穆勒坚决“反对那种认为社会不适于进行科学的研究的‘直觉主义’观点”，并且公开承认他的《逻辑体系》一书的主要目的，就是系统阐述一种“道德科学的道路”，而斯宾塞则干脆就把他的社会学的著作命名为《社会静力学》，<sup>⑭</sup>那么，此后所发挥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使人们普遍认为只有自然科学的知识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知识（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中的知识，主要就是指自然科学的知识），关于社会及人文的知识也只有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知识，才是有意义的知识。这样一来，某种程度上，科学事实上便成为用以衡量其他知识是否是知识以及是否有意义、有价值的唯一尺度。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的是，在19世纪，几乎所有有关社会及人文的

知识均被纳入科学的范畴，尽管具有的名称各有不同，例如，关于精神、历史、文化及心理的知识，便分别被称为精神科学、历史科学、文化科学及心理科学。此外，正像李凯尔特在他的《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一书中指出的，在19世纪，尽管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否同样适用于上述精神、历史等领域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是否应该把它们纳入科学的范畴这一点上，却并不存在什么分歧。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要一改传统的历时的研究方法为共时的研究方法，或即一改传统的致力于考察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为致力于研究意义是如何从能指之间的差异之中产生出来的。回答只有一个：使语言学成为真正的语言科学。这一信念及冲动在今天不但不见丝毫的减弱反而日趋增强。例如，人们不难注意到，在今天，讲到人文学科时，无论是崇尚者还是贬抑者，他们用以作出评价的标准都不是人文自身而是科学：前者认为它是科学而后者则认为它不是科学或者还没有成为科学，言下之意是，它必须尽快成为科学？

上述把人文学科视为人文科学的科学冲动，正像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所表明的那样，必然导致人们习惯于以冷静的理性态度把人文文本当作与自然文本（比喻意义上的）一样的纯客观的存在物去加以认识与研究。这里所谓认识指的是，致力于对人文文本形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如知道有什么人文文本，它们各是成于什么时代以及成于何人之手，它们的内容特点各是什么等等。换句话说，人们面对人文文本，并不企求与之达成精神的交融会合，而只希望对之有所知即可。总之，对于这种理性的认知态度而言，人文文本只不过是由大量的符号构成的无机文本，而不是由某一生命主体创造的有机作品。所谓研究的态度，简单地说，就是探索奥秘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支配之下，正像自然科学家们坚信在表面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不变的规律，而他们的职责便在于运用各种方法与技术去发现这些规律一样，人文专家们也坚信，大量的各不相同的人文文本其实只不过是隐藏在它们底下的某些模型的无限的变形而已，而他们的职责便在于把这些模型揭示出来。例如，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便是这一态度的最典型的表现。此外，为达此目的，结构主义者们最习惯于像自然科学家们借助实验的方法去拷问沉默的自然一样地运用各种技术（最常用的乃是拆散与组装）去拷问沉默的文本；结果是，完整而有机的作品不是被拆卸得七零八落，便是被组装得面目全非。

其次，我以为，这还与今天的人文学者普遍趋于职业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今天，大量的人文学者不是在学校从事人文的教学与研究便是在研究院所担任专职的人文的研究工作；不管情况属何，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对于他们来说，这都是一种职业或谋生的手段。因此，一个乍一看十分奇怪但其实却非常自然的现象是，这些人文学者中，有许多人对人文学科其实并不怀有真正的热爱，他们从事人文的教学与研究，就像技术人员从事某一技术工作一样，仅仅是出于谋生的考虑。退一步说，即便有些人的确是因为对人文学科有着浓厚的兴趣才从事人文的教学与研究，但是，在长期的枯燥乏味的职业化的技术操作过程中，原先的兴趣也会逐渐地消退以至于荡然无存（请参阅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一书的“引论”以及鲁迅有关爱好与职业之间的矛盾的论述）。因此，无论他们是否愿意，他们都得不断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去生产大量的据说是有学术价值的所谓论文或论著，这些论文或论著中，绝大多数充满了千奇百怪的专业术语（或即贡布里希教授所说的“自命不凡的行话”）、繁琐无聊的考证，冗长乏味的论述、花样百出的所谓研究方法及研究技术等。其结果，不但对人们接受人文文本的陶冶或善化并且因此而成为“有学养的人”或“君子”及“圣人”难起些微的作用，而且正像齐美尔早在70年前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事实上，这些研究已经“变成了涉及其自身的方法研究，变成了一种自成一体的研究范围的膨胀，这种规范有其独立的路径，不再与作为一种圆满生活的文化相统一”，“这种为了积聚的贪得无厌的创力与人的生活的各种形式完全无法相容”。<sup>⑥</sup>

最后，正像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类似英国皇家科学学会这样一种科学建制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的旨在促进科学事业的各种管理制度一样，上述人文学科的科技化变异，也从今天广泛实行的针对人文学科的各种管理体制、制度及方法得到了极大的鼓励。在今天的所有文科院校里，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设有一个与理工院校同一名称的机构——科研处，从事本院校的人

文研究的管理。撇开这一机构几乎是清一式地采用了极其理性的、刚性的、外在的以及数量的管理方法不谈，仅仅从这一机构的名称就可看出，在这些院校看来，人文学科乃是与自然学科毫无二致的科学。试想：在这一机构的名称及其所实行的管理方法的压力（尽管也许隐性的）之下，人文学科除了变异为科学以外还能怎么样呢？

然而，人文学科决不是并且也决不应该变异为科学。首先，这是由人文学科的目的所决定的。如果人文学科的目的在于善化人性的话，那么，我们针对人文文本的所采取的态度及方法就只能是人文的而不能是科学的与技术的。否则，我们努力得越多我们距离这个目的就越遥远，用冯友兰教授的话说，我们“走得越快就错得越狠”。其次，这也是由人文文本的独特性质所决定的。如前所述，自然科学所面对的是各种自然存在物，这些存在物的运行基本上表现为可逆性与循环性（如太阳的升沉、月亮的圆缺、四季的更迭等），或者就是所谓规律性（规律一词的涵义就包含了循环与可逆），并且因此可以用简洁明了的数学语言加以精密的表述；而人文学科所面对的各种文本，特别文学艺术及历史的文本，由于其主要是对人的不可逆的非循环的经验世界的描述，因而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用数学语言对之进行精密的表述。因此，尽管人文学科的学者们一心想把人文学科提升为人文科学（难听一点说，是挤进科学的行列），然而，遗憾的是，始终无法成为科学！为此，在我看来，如此一厢情愿地硬是把人文学科推挤进科学的行列，不但表现出对学科的本性缺乏起码的认识，同时显得非常可怜与可笑。事实上，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各有其自身所独具的价值：前者的价值在于培育人性，后者的价值则在于改造自然；这两种价值，既不可互比高低，更不可互相取代。因此，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是：衡量人文学科价值大小的标准便只能是人文而不能是科学。

如果上述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很自然，我们对人文文本不应该采取科学的与技术的或纯粹的认识、研究及操作的态度，而应该以“乐之”的态度对待人文文本，即把人文文本看成可以亲近的对象，看成可以把自己的精神投入其中，接受其意蕴、神髓及美质的陶冶，以使自己形成美善的人性的对象。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完全不需要对文本进行必要的认识、研究甚至是操作。但是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认识、研究或者操作，必须是适度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只能被视为有助于进入文本的手段与渠道。换句话说，我们要做一个“忠实的传达者，而不是为新奇而新奇的食物筹办员”。<sup>④</sup>此外，“我们也力图向任何科学成果学习，但是，只有我们知道了的位置、力量和局限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这样做”。前述人文学科的科技化变异的一个最致命的后果，就是把针对人文文本的认识、研究及操作，由手段异化为目的，而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乃是最典型的证例。事实上，对于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来说，一个最具讽刺意味的后果是，它的成功之日正是它的灭亡之时。试想，一旦找出了文本底下的基本模型或模式以后，它还可以做些什么呢？由此，另外一个结论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今天的人文学科普遍盛行的所谓科学的方法与技术，没有理由继续被不加怀疑地推崇与采用，而中国及西方古典时代广被采用的那些方法，也没有理由不加分析地一概被视为过时的旧货而弃置不用。今天的人文学者们所以普遍对前者趋之若鹜而对后者鄙夷不屑，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普遍把人文学科视为探索奥秘、寻找规律的科学而不是善化人性的学科，一旦这样的误解被加以澄清，即一旦人们明白了人文学科的本性不是前者而是后者的话，这样一种方法上的颠倒的取舍就会重新颠倒过来。确实，“把落日的余辉分解成波长和频率”，<sup>⑤</sup>余辉的意蕴、神髓及美质又在哪里呢？

①⑦⑨⑪⑫⑬ [英] 艾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北京三联书店，第12、5、43、247、13页。

②《中文大字典》“人文”条目，香港出版社。

③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37页。

④[德] 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第117页。

⑤参见 [英] 罗素《西方的智慧》的“自白”部分，世界知识出版社。

⑥[德] U·伯姆编《思想的盛宴》，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0页。

⑧[英] 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北京三联书店，第89页。 (下转第55页)

# 中西美育“净化”说之比较认知分析

庞跃辉

[摘要] 由于中西的人文背景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尽相同，中西美育思想家在论述“净化”的具体含义、途径及方式时，也便有所不同。比较中西美育“净化”说的异同，科学认知中西美育“净化”说的特征，对于深入把握美育“净化”功能的内涵，充分发挥美育“净化”的作用，积极促进人们构建正确的审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重要的美学理论创新价值和审美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中西 美育 净化 认知

[作者简介] 庞跃辉，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员、重庆市委党校教授，主要从事美学研究，重庆，400041。

## 一、中国美育思想对“净化”的本质特征的认知

在中国美育思想史上，认知美育“净化”的本质特征的重要思想，可谓渊源流长，博大精深。早在两千多年前，教育大师孔子的美育思想就以其“仁礼之学”为基础，把“仁礼”作为美育思想体系的核心，其突出体现就在于把“伦理教化”视作美育“净化”的根本目的。这一美育“净化”思想的提出，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处于“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孔子，从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基本立场出发，借“仁”释礼，以“礼”服人。据《论语》记载，孔子认为孝子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把“仁”置于以人们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孝道之爱的基础上；进而则“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扩展成为调节整个社会人们之间伦理关系的“礼道”规范。另一方面，孔子又指出：“为仁由己”，“克己复礼”，把仁礼看成是人本身的内在欲求，是人应有的自觉行动。那么，怎样培育人们的“仁礼”之道呢？孔子认为，通过良好的审美艺术教育，在净化人们的内心世界中提升人们的伦理道德，就是一种有效途径。孔子指出：“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君子修身养性不仅要归依于仁，服从于社会的伦理道德准则，而且要广游六艺，增长知识才干；仁人立业，初始于学诗，养育其“好善恶恶之心”，终成于以仁礼为乐，把外在的伦理道德规范转化其为内在的心灵怡乐，在良好的审美艺术熏陶之中促进道德品行的完善。这样，孔子就把美育纳入了“仁礼之本”的教育治理思想体系之中，从而导引出他的以“伦理教化”作为美育“净化”的根本目的的美育原则。

这一重要的美育原则，成为了中国古典美育思想认知美育“净化”功能和作用的主导思想，在中国美育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孟子继承和发扬了“伦理教化”的美育“净化”目的论，提出了以“充实于善”为中心的美育“净化”学说。在孟子看来，集中体现于伦理教化中的就是“从善”，因而美育的“净化”作用就是教化人们充实于善。据《孟子》记载，他指出：“可欲之谓善，有诸于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认为美是基于善的，是内在于善的，充实于善才有美可言；培育美的人格就是教化人们弃恶扬善而净化心灵，以求“大”、“圣”、“神”之境界。荀子认为，人的“性”和“情”原都是一种“恶”的本能，必须通过良好的教化使人“抑恶扬善”，他很强调“顺乎礼义”的诗和艺术具有教化“鄙俗之人”的美感陶冶和心灵净化作用。金圣叹认为，小说塑造的一些英雄人物的典型性格，也可以对人的灵魂起一种净化、升华的作用，可以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在《读第五才子书》中金圣叹指出，当人读到作品中所生动描绘的英雄人物的性格时，便“使人读之，龌龊销尽”；“令人读之，油油然生好善之心，有谦抑之心，有不欺人之心，有不自薄之心”；“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

此外，中国美育思想对“净化”的途径和方式的把握，也有其独到的认识。老子就认为，音乐对人的美育净化途径主要体现为对“大音希声”的鉴赏。在《老子》中他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提倡“节欲”的道之音。他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只有鉴赏节欲之道的“大音希声”，才能不被欲望所羁、物质所绊，进而达到其精神世界的净化目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认知美育“净化”途径和方式的重要思想，提出了追求“天人合一”、“心道合一”的审美感悟途径和净化方式。在《达生》中庄子借梓庆削木的故事，指出审美就是要遗形忘体，成为与道合一的精神本体。在《天运篇》中，庄子说，黄帝奏《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此乐“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北门成听后，“始而惧，复而怠，卒而惑”。听第一遍时，不知至乐无穷之变，故惧然悚听；听第二遍时，忘形忘己，与乐同化，故而退息而不追逐外物；听第三遍时，完全超然于听音之上，释疑惑而明道，进而“与道合一”，此时，人亦为道，乐亦为道，最终积极进入其“天人合一”、“心道合一”的审美感悟和心灵净化境界。

## 二、西方美育思想对“净化”的本质特征的认知

在西方美育思想史上，由于诸多美育思想家尤为重视美育对人的情绪感染的积极作用，因而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把握美育“净化”的本质特征的重要思想，则是其主流。古希腊重要的哲学美学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就从音乐的和谐及人与艺术的关系，认为由于人的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同声相应”，人才能欣赏艺术和美，进而强调音乐的美育“净化”作用。在《法规》中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指出，音乐有刚和柔两种风格，不同的音乐风格可以使审美主体产生相应的美感活动而引起性格的变化，使人恢复内心能力的和谐，增进身心健康。柏拉图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美育对人的情绪感染和心理健康的“净化”功能和作用。他在《大希庇阿斯》中曾多次提到过古希腊人有宗教的音乐来医疗精神上的狂热症，并且拿这种治疗来比作保姆把婴儿抱在怀里摇荡来使他入睡的办法。柏拉图认为接受审美艺术的情绪感染，从精神上的极度狂热到心平气和，就是一种“心理净化”的过程，这对于人们特别是未成年的心理健康是十分有益的。这一重要观点直接影响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可以通过音乐或其它艺术的感染与净化，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因此恢复和保持住心理的健康。在《诗学》中他提到的是“悲剧净化哀怜和恐惧”两种情绪；在《政治学》里他提到的是“宗教的音乐净化过度的热情”，并同时指出“受其它情绪影响的人也都可以受到净化”。

休谟、柏克等美学思想家在美育净化有益于心理健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美感应当成为一种“心理快感”的论断。在《论审美趣味的标准》和《论人性》等论著中，休谟认为，美是各部分之间的一种特殊秩序和结构；由于人性的本来构造，由于习俗，或是由于偶然的心情，这种秩序和结构适宜于使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这就是美的特征；因此，美感也就是一种快感，鉴赏美的事物必然使人产生快乐；基于此，美育“净化”的功能和作用应首先显现为一种“心理快感的满足”，在获得心理快感之中有效促进心理健康的发展。柏克也认为，美感是一种心理快感，然而这种快感对心理健康的有益作用不同于一般的快感，而是鉴赏美的事物所生发的“爱或类似的情感”。在《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论著中，柏克指出：“我们所谓美，是指物体中能引起爱或类似情感的某一性质或某些性质……我把这种爱和欲念或性欲分开：‘爱’所指的是在观照一个美的事物时心里所感觉到的那种满意，欲念或性欲只是迫使我们占有某些事物的一种心理力量，这些事物之所以能吸引我们，并不是因为美，而是由于完全另样的缘故。”从美感是一种“爱或类似的情感”的心理满足出发，柏克认为美育“净化”的功能和作用应着重体现于对“欲念（性欲）”的消解，因为“美和美所引起的情感（爱）是不同于欲念（性欲）的”。所以，美育对人心灵的净化，能够帮助人们清除欲念（性欲）的心理，产生爱或类似的美好情感，而爱或类似的美好情感正是“心理健康”的一种重要体现。

西方美育思想在从“心理健康”角度认知美育“净化”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对美育“净化”的途径和方式的把握，也有其独到的见解。这主要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从崇高（壮美）和优美的审美角度，把握美育“净化”的途径和方式。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就认为，崇高美的风格

具有巨大的审美效果，对人的心灵净化的作用也是强烈的，指出“崇高风格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它能唤起人强烈的情感，使人“惊心动魄”，因而具有巨大的审美感召力。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则认为，优美的事物也具有重要的审美效果，鉴赏优美的事物对人会产生不同于壮美的心灵净化作用，其审美净化的途径和方式就在于：“优美的客体，能使理念的认识更为容易地、无障碍地、因而不动声色地为意志服务”。另一方面，是从悲剧和喜剧的审美角度，把握美育“净化”的途径和方式。丰丹纳尔就认为，悲剧对人的心灵震撼和净化，是通过必要的艺术虚构的途径和方式而实现的。丰丹纳尔指出，我们在鉴赏悲剧艺术作品时，为自己喜欢的英雄人物的不幸而哭泣；与此同时，我们又想到这一切都是艺术虚构的，并用这想法来安慰自己；正是这种混合的感情形成一种悦人的哀伤，使眼泪带给我们快乐，从而被英雄人物所感动，心灵得到净化。柏格森则认为，喜剧的审美效果与“滑稽”直接相联，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笑”，而“笑”也具有重要的审美感染和净化作用。

### 三、比较分析中西美育“净化”说的重要启示

由于中西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尽相同，人文背景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不尽相同，因而决定了中西美育思想对“净化”的本质特征及途径和方式的认知，也不尽相同，各具特色。

一是中西美育思想在认知美育“净化”的价值取向上各具特色。美育“净化”的价值取向，就是美育净化所产生的功能和作用的需求取向。在中国美育思想史上，众多美学家十分强调良好的美育对于人的伦理教化作用，着力倡导充分发挥美育在净化和提升人们的道德过程中的特殊功效。如特别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价值取向就是目标在道、根据在德、依靠于仁、观赏娱乐于艺术园圃之中。因为“艺”和“道”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审美艺术教育中既学道，又学艺，于艺术观赏娱乐之中得到美的熏陶，使人的精神世界更加完善，以更加符合伦理道德的规范要求。至于通过“顺乎礼义”的“诗”、“乐”、“小说”，对人进行良好的审美教育，以培育和充实内在的“从善之性”，从而使受教育者“油油然生好善之心”、“使人龌龊销尽”，无疑更是一种道德上的积极净化和极大升华。而在西方美育思想史上，尽管也有美学家重视美育净化的伦理道德作用，如别林斯基就认为普希金的诗美具有很高的伦理道德净化作用，鉴赏普希金的作品是净化人性的最好方法，指出“总有一天，人们将用他（普希金）的作品来培养和发展不仅是美学的、而且是人道的情感”。然而，大多美学家则更加强调美育净化对于优化人们的心理结构、促进心理健康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强调在美育过程中使人心中的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如“哀怜”和“恐惧”）获得调适，从而导致心境平静、促进心理健康的美育净化观点，还是强调在美育过程中使人心中郁积的某种消极情绪（如“烦恼”和“焦虑”）获得“宣泄”，从而恢复正常心理情绪、保持心理健康的美育观点，都是强调审美净化具有改善心理状态、增进心理健康的特殊功能。当然，中西美育思想的立足点都是建立在有益人生、有益社会的根本价值取向上的，都着力倡导发挥美育“净化”的特殊功能和重要作用，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是中西美育思想在认知美育“净化”的重要途径上各具特色。美育“净化”的途径，主要是指美育“净化”活动所经历的过程。在中国美育思想史上，众多美学家特别强调美育净化的“心灵感悟”过程，重视运用“内心反省”的认知手段。如强调对“道之乐”的音乐作品的鉴赏过程，就是首先进入“遗形忘体”的阶段，再进入到“超物节欲”的层次，最终达到“心道合一”的审美理想境界，才能被视作圆满完成了美育净化的心灵感悟过程。而在整个美育净化的心灵感悟过程中，都必须运用内心反省的认知手段，通过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心衡量，以找出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的差距，从而促进自我意识和行为的完善，如在鉴赏描写英雄人物作品时而“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的自我心灵感悟，就是一种典型的“内心反省”的审美净化体现。在西方美育思想史上，诸多美学家则特别强调美育对于优化心理结构的“情绪转化”过程，并重视运用“心理分析”的认知手段。如强调鉴赏崇高（壮美）的事物所产生的审美效果，对人的心灵净化就是通过唤起人强烈的情感，使人在无动于衷向惊心动魄的情绪转化之中获得巨大的心灵震撼，从而消解“怯懦”、“哀怜”的

消极情绪；而鉴赏优美的事物所产生的审美效果，对人的心灵净化则是通过消除过分激动的情绪，使人在心烦意乱向心旷神怡的情绪转化之中获得有益的情感体验，从而使心灵净化“无阻碍地、因而不动声色地为意志服务”。还有美育思想家从分析“混合的情绪”入手，指出“在鉴赏悲剧艺术作品时，人们为自己喜欢的英雄人物的不幸而哭泣；同时，又想到这一切都是艺术虚构的，并用这想法来安慰自己；正是这种混合的感情形成一种悦人的哀伤，使眼泪带给我们快乐，从而被英雄人物所感动，心灵得到净化”。这一见解可说是从心理分析的途径对美育净化功效的把握达到了相当的认知高度。

三是中西美育思想在认知美育“净化”的主要方式上各具特色。美育“净化”的方式，着重是指美育“净化”所运用的手段和表现的形式。在中国美育思想史上，诸多美育思想家特别强调通过自然美、社会美的鉴赏与陶冶的方式，来培育人的良好品格，净化人的精神世界。在《论语·雍也》篇中就指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乐”即美感。时常鉴赏水所展现的川流不息的自然美，有利于培育人的勤于思索、敏于应变的内在品性；而时常鉴赏山所展现的巍然厚重的自然美，则有利于培育人的稳健厚道的内在品性。因为在中国美育思想家看来，作为审美对象的大自然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而是同人的精神品质有着密切联系的自然，因此，鉴赏与陶冶自然美，有助于培养良好的人格品性。对于作为社会美的主体的人之美的鉴赏，中国美育思想家十分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审美观，提出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审美观。所谓“质”就是“君子以义为质”之质，核心是指人的道德品质；所谓“文”就是司马光说的“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之文。“质胜文”因其缺乏包含审美在内的文化教养，因而是粗野的；“文胜质”因其缺乏仁义的品质，因而是虚华的。唯有“文质彬彬”，使内在的仁义道德品质与外在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和谐统一起来，方才为君子，方才有人之美。在西方美育思想史上，一些美育思想家虽然也同样重视通过自然美、社会美的鉴赏与陶冶的方式来发挥美育净化的作用，但与中国美育思想家的认识有所不同的是，西方美育思想家对自然美的审美净化功效的把握，更多的是认为鉴赏与陶冶自然美是一种良好的休闲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观察自然变化现象、把握自然变化规律的科学活动。而对社会美之主体的人的美的鉴赏，西方美育思想则表现为两大审美观：一种是认为应主要从道德品质的要求来鉴赏人的美；另一种则强调从人体方面来鉴赏或展示人的美，有的美学思想家还提出了鉴赏人体美的数学公式，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提出了鉴赏人体美的“黄金分割律”数学比例公式，有的美学家认为维纳斯美女的人体就是黄金分割律的典型。

通过以上的认知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古典美育思想特别重视发挥美育“净化”对于“伦理教化”的重要作用，把提升人们的伦理道德视作美育净化的基本功能。而西方古典美育思想则十分强调发挥美育“净化”对于“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把优化人们的心理结构视作美育净化的基本功能。因此，从认知美育净化所产生的提升伦理道德、有益修身养性、促进人格完善的功效和作用的角度上看，中国古典美育思想可以说是见解独到，透彻精辟，这比之西方古典美育思想来说，毋疑要深刻得多，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其次，中国古典美育思想对自然美的陶冶所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审美净化观，对人的美的鉴赏所提出的“心形统一”的审美净化观，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审美活动仍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值得我们发扬光大。但是，在有效运用心理分析的科学方法探讨美育净化对于优化人的心理结构、改善人的心理状态、促进人的心理健康方面，中国古典美育思想则显不足，而这正是西方古典美育思想所见长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此外，由于古代西方特别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艺术发展就极为繁荣，艺术种类也很繁多，例如雕塑、绘画、悲（喜）剧、音乐、史诗等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因此，在广泛而深刻地探讨不同的艺术种类所产生的审美净化功效方面，西方古典美育思想就比中国古典美育思想要具体深入一些，如在古希腊时期就有美育思想家指出，由于不同艺术作品所利用的材料和表现的方式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不同，欣赏者的不同，因而所产生的审美净化效果不尽相同。在远古时代就提出这种带有辩证意味的看法，委实是了不起的贡献，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责任编辑：罗 萍

# 复杂系统的目的性与深层生态伦理

范冬萍 张华夏

[摘要] 复杂系统具有目的定向行为，即目的性，并因此具有内在价值。根据控制论，在控制系统中“是”与“应该”的划分以它的原始形式出现了，而复杂控制系统的多层目标的控制行为的出现，则为解决“是”如何转变为“应该”这个“休谟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并进一步为深层生态伦理学的可能性论证提供了新途径。

[关键词] 复杂系统 目的性 内在价值 深层生态伦理

[作者简介] 范冬萍，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副教授；

张华夏，中山大学哲学系、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教授，广东 广州，510631。

生态中心伦理（又称为深层生态伦理）与人类中心的环境伦理，谁是谁非，争论激烈。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追溯到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是否存在内在价值，是否应该受到人类尊重的问题。终极地，生态伦理学的争论可以追溯到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复杂系统的目的性及其价值。控制论等学科已从科学上证明，目的性范畴绝非人类独有，而是复杂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从复杂系统的目的性，可以为深层生态伦理的可能性论证提供一条途径。

## 一、复杂系统的目的性行为

系统性和复杂性，是一个程度的概念和相对的概念，很难说世界上存在一些事物是完全无系统和绝对不复杂的，因此对它们采取的二分法的分类考察未必是十分恰当的。不过，不同程度的事物之间有着某种质的区别，如果不作一些简化的分类，建立模型，辨明主要特征，那么我们对系统和复杂性的研究，就会过于泛化。对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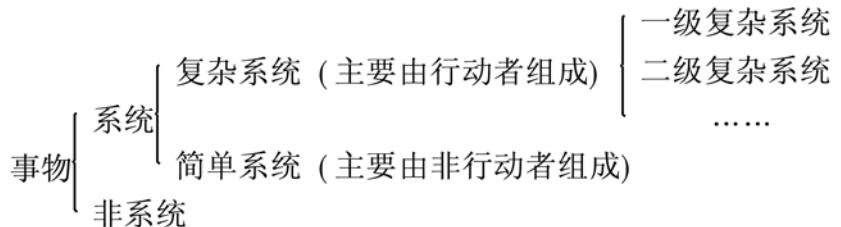


图1 事物与系统的分类

在这个分类系统中，事物是行为的主体。系统是相互联系的元素的集合。系统性是指元素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当这种联系的数量和多样性达到一定程度，以致于很多时候不能直接达到所有的元素而必须有所选择，这样的联系叫做复杂性联系或复杂性。复杂性表征系统元素、结构与功能的差异性(differentiation)与多样性(Variety)的量度，它可以信息量的单位进行计算。复杂系统的显著特征是：1. 系统元素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包含非线性、随机性、偶发性，因而其结构与秩序是突现的，我们往往是通过它的型构(Patterns)来认识。并且，系统的历史是不可逆的，未来是不可测的。2. 复杂系统的基本元素是行动者(Agent)。而所谓行动者，按照Kevin Dooley的定义，“行动者是通过历时的进化寻找自己的最大的善或最大的适应性的半自主性的单元。”<sup>①</sup>它们是主动的作用者，并按一定的模式行动，诸多行动者共有的行为模式构成该系统的“文化”。3. 复杂系统的行为随着环境的变化而相适应地进行变化，这种适应性行为是一个目标定向行为(goal-oriented behaves)，也是复杂系统一个最根本的特征。4. 复杂系统对环境的适应性是多层次的，一级的适应性是以自己的行为模式

(schema) 调节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环境，二级的适应性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来适应环境，这就是一个学习过程，以改变未来的系统响应 (system responds) 来适应环境。如此类推还可以有三级的响应，这实质上就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淘汰那些不适应者。这里多级的适应性对应着多级的复杂系统。微生物、植物、动物、人、人类的各种群体与社会，市场、生态系统都是复杂系统，有一些无生命系统，如大气系统、非平衡化学系统以及一些带自动控制的人工物，如恒温器、导弹等也是复杂系统。

目的性是复杂系统的一个主要特征。没有目的性，复杂系统的元素（行动者）就没有行动的主动性，而复杂系统就不能适应环境，更不用说对环境作多级的适应。将我们的事物分类表与控制论创始人 N·维纳于 1943 年提出的行为分类表作一个类比，就可以看出目的性在自然界中以及在系统世界中的地位。维纳的行为分类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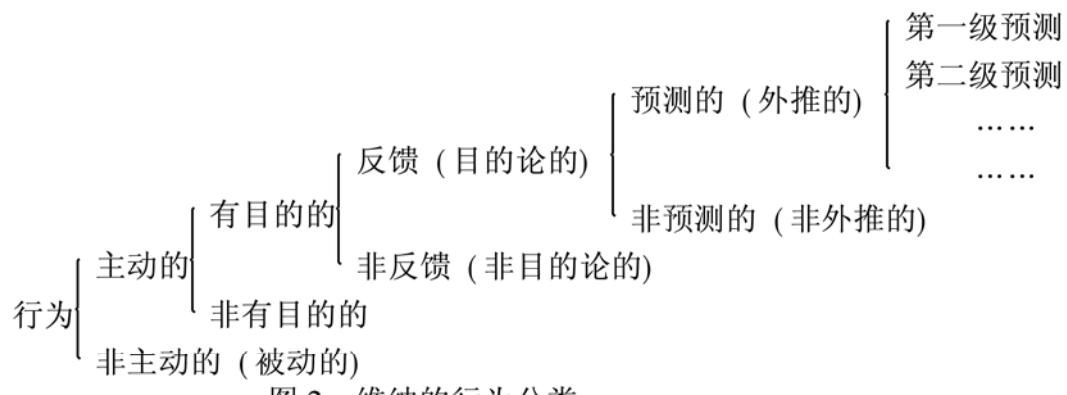


图 2 维纳的行为分类

图 1 与图 2 是对应的，只不过我们的图 1 是从行为的载体（行动者与复杂系统等）来看目的性，而维纳的图 2 是从行为本身来看目的性。他说：“主动系统的行为会更多地显示目的性”。<sup>②</sup>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维纳的主动的、有目的行为系统看作是行动者以及行动者系统，即复杂系统。因此，如何运用系统科学和复杂系统理论来研究和调整价值理论将是一个崭新的问题。

## 二、目的性的概念与事实/价值对应原理

我们并不是将自然界一切现象都看作是有目的的，我们需要严格区分目的性行为与非目的性行为。目的性行为至少有两个特征：

1. 目的性行为是有目标的。这个目标可以是行为主体或行动者与另一客体发生的时空关系（为声纳导向水雷要命中的目标，捕食者要追杀的猎物，航船要驶向的码头等）；可以是保持系统自身某种参量的恒定性（为恒温动物的体温，空调房间的温度）；可以是生命保持其生存状态本身；也可以是生物群体的物种的繁衍。一般说来，目标状态是复杂系统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存在状态：该系统的运动、活动和行为总是倾向于 (tend to)、会聚于 (converge to) 它，而不论它的初始条件、边界条件和外界条件如何。于是它就成了结局 (find state)、目标 (aim)、目的 (purpose, goal) 或吸引子 (attractors)。而与其相关的并促进其达到目的的事件、条件、活动和行为便成了手段。如果采取控制论创始人艾什比的方法，我们可以将目标看作是系统的这样一种存在状态，其状态空间域值为  $\{x_1, x_2, x_3, \dots, x_n\}$ ，而系统的任何别的状态  $x_i$  ( $i \in 1, 2, 3, \dots, n$ ) 总要经历一定的变换  $\Phi$  达到这种状态即  $\Phi(x_i) \in \{x_1, x_2, x_3, \dots, x_n\}$ 。因此，依这个定义，不仅人是有目的性的，也不仅生命是有目的性的，非生命的东西也可以是有目的性的。当然目的性可以作出由低级到高级的分类：从导弹要命中的目标到一个政党要实现的政治目的，有着各种不同的层次。而外在的目标（靶子）和内在的目的（自稳定的生存状态）又有所不同，讨论这个分类不是本文的目的。这里我们所要表明的是：目的不是心灵的特征，而是客体或系统的特征。在最基本的层次上自主系统 (autonomous system) 或复杂系统 (complex system) 的最基本目标是适应性生存，即保持它的本质的组织。所有的生物都通过自然的选择建立这个基本目标，而所有不能使自身的行会聚于适应性生存的生命体的变异

都将被淘汰。正是生命的这个基本的目标派生出它的各种子目标，例如，保暖、觅食等。

2. 目的性行为是通过负反馈的调节与控制行为来达到目标的。这就是说行动者必须与一定的目标相耦合，即行动者必须从它的内部环境或外部环境中获得信息，并依据这个信息和目标信息的差距，来不断调整和修正自己的行为，以缩小这个差距，从而达到目标。这样，追求目标的行为可以是完全无意识的，它是通过负反馈机制来实现的。只有当我们观察到有这类依据环境信息校正自己行为的情况，我们才能判明目的性以及目的性行为。适应性生存、通过负反馈达到目标构成判别目的性行为的基本标准。有了目的性和目的性行为的概念及其判别标准，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分析目的性行为的控制论模型。控制论创始人和革新者之一，Willian T. Powers 提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模式：<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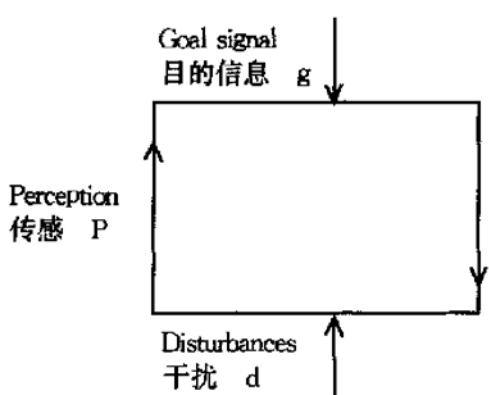


图 3 Powers 的控制系统图

以恒温动物的体温调节为例， $36^{\circ}\text{C} \sim 37^{\circ}\text{C}$  的目的信息是由基因规定的，当外界环境升温  $d$  使体温感觉  $p$  升高，动物以出汗等方式  $a$  使  $p$  下降，以达到  $36^{\circ}\text{C} \sim 37^{\circ}\text{C}$  的目的。

在这个图式中，反馈回路有两个输入，即干扰  $d$  与目的信息  $g$ 。回路中从  $g$  到  $d$  中间有行动  $a$ ，从  $d$  到  $g$  中间有个传感信息  $p$ ，控制器输出控制行动  $a$ ，是其输入  $p$  与  $g$  的函数，由于这种控制行动旨在缩小被控对象的状态与目标状态偏差以便达到目标，所以

有： $a = K(g - p) \dots\dots\dots (1)$  而被控对象的输出是控制行动  $a$  与干扰  $d$  的两个输入的函数，它通过传感信息  $P$  报告行动  $a$  抵销干扰  $d$  的情况，所以有： $P = F(d - a) \dots\dots\dots (2)$  在最简单的情况下， $K$  与  $F$  是常数，公式 (1) 与 (2) 变成线性方程。这样，所谓目的性行为，就是使目的信息变量与传感信息变量的偏差  $(g - p)$  达到最小化的行为。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1. 复杂系统的适应性自稳定和适应性生存是系统的内在目的。由于它的一切行为都围绕这个目的而运作，所以实现这个目标就成为复杂系统的内在价值之所在，而有助于达到目标的各种手段对于该系统便具有工具价值的意义。在这里，目的与价值这两个概念是相互定义的。<sup>④</sup>这样，对于复杂系统，或更一般地说对于控制系统，它们的信息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或陈述：事实的或描述的陈述和规范的或指令的陈述。陈述传感器获得的信息，如动物感觉器官获得的信息，是事实陈述或描述陈述，是无价值负荷的，而陈述由控制器或执行器发出的信息，是规范陈述或指令陈述，说明行动者应该这样行动，才能达到目的。“是”与“应该”的划分，在控制系统中已经以它的原始形式出现了，同时“是”如何转变为“应该”这个被称为休谟问题的古老的哲学难题，在生物控制论中也有了一个很好的模拟方法的分析。且看控制器的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在公式 (1)  $a = K(g - p)$  中，或更一般地说，在  $a = K(g, p)$  中， $p$  的信息，用事实判断来表示，而  $a$  信息用规范判断或价值判断来表示。这里，规范陈述虽然并不是单独从事实陈述中推出，但一旦目的信息已经确定，表示“应该”的规范陈述就是事实陈述（有关被控对象状态的陈述）的控制函数，与工程控制论所说的“传输系数”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将公式  $a = K(g, p)$  视作“是”与“应该”的对应原理，事实与价值的对应原则，因为它既包含了“是”陈述，又包含了“应”陈述。换一种表达方式来分析：公式 (2)  $a = K(g - p)$  写成  $g = \frac{a}{k} + p$  的形式。它说明系统  $x$  的目的的实现是依据环境感受变量的事实情况由行动的指令的实现来决定。将  $g, a, p$  看作谓词变量，得： $g(x) = \frac{1}{k}a(x) \& P(x)$ 。它表明系统  $x$  的目的陈述可表述为  $x$  的某种行动指令的规范陈述和  $x$  的某种状态的事实陈述的合取。目的本身由规范陈述与事实陈述的合取来表示，意味着目的性的陈述既是描述的又是规范的，它本身就是事实与价值的对应原则。这种看法和上述的目的性行为的两个标准又是一致的。一旦将这个对应原则补充到论证的前提

中，依据于它，某些规范判断便可以从事实判断中加上对应原则来推出，这既避免了自然主义谬误，又可由此便可以建立各种“实然”与“应然”的关系逻辑。这是我们对解决“实然”、“应然”鸿沟的一种新见解。也许决策理论、功能解释、进化伦理学、生态伦理以及技术解释结构等问题的解决都可以从这个对应原理中获得启示。

2. 整体目标与个体或子系统目标的冲突与协调。在复杂控制系统中，诸行动者组成新的复杂系统，行动者或子系统的原有目标可能相互冲突，于是有些原有目标可能被控制，服从于新的系统的目标；也有可能被完全排除；还有可能的是诸多行动者的目标相互整合，整合成一个新系统的目标体系，这样便出现了复杂控制系统的多层目标的控制行为。以二层目标控制为例，可用下列图式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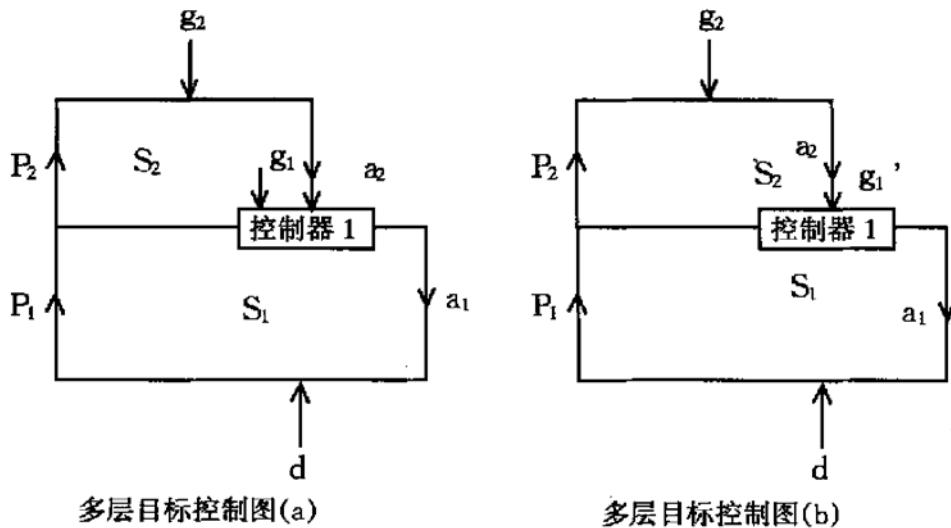


图 4 多层目标控制

图 (a) 表示高层次目标  $g_2$  与低层次目标  $g_1$  的价值区别或价值冲突，例如一个社会的适应性生存  $g_2$  可能与社会成员的适应性生存  $g_1$  发生冲突。在一个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有些民族英雄牺牲个人的生命来保卫民族利益就是这种冲突的一种解决。图 (a) 中同一个控制器 1，同时接受  $g_1$  与  $g_2$  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指令。图 (b) 表示高层次目标  $g_2$  与低层次  $g_1$  整合成目标体系  $g_1' = f(g_2, g_1)$ 。例如：恒温动物（如人）的体温控制目标为  $36.5^{\circ}\text{C}$ ，这是低层次控制，而这个属于  $35^{\circ}\text{C}-40^{\circ}\text{C}$  范围量值又是由高层次目标，即恒温动物的适应性生存来控制的，当着外界病菌侵入人体，适应性生存的目标会将体温调至发高烧的温度（如  $39^{\circ}\text{C}$ ），以抑制病菌生长。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层次目标和多层次价值中，到底那一个层次的目标与价值是基本的目标与价值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就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言之，个人的目的与价值是基本的目标，社会的首先目标是保证每个人在不妨碍他人目标与价值实现的情况下，各自的目的与价值实现。而社会的终级目的是保证社会全体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得到实现。

如上讨论的问题，对于研究生命价值和生态伦理具有方法论意义。

### 三、生命系统的目的性与价值

生命是一个复杂的控制系统，它的目的信息存在于基因组，即特定的 DNA 大分子中，有了这个目的信息系统的作用，才有生命的一切结构、功能与活动，甚至我们的偏好这种价值的倾向也多少是由这个目的系统所决定。没有这种信息的作用，生命立刻崩溃为一盘散沙，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这些信息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形式因或目的因的现代非神秘主义的等价物，如果要给它起一个名字，称它为信息因也未尝不可。这是一个语言系统，比起我们日常运用的语言不知要多多少倍。它既是描述性的，描述纪录了庞大的生命信息，特别是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信息；它又是规范性的，对新生命的合成提供各种规范。这样，它是一个意向系统（propositional set）和指令系统（command System）。某种生命的目的、计划、意图、期望都在这里加以规定，并驱动它从基因型潜在形式向表现型功能形

式运动，将环境成为它的资源，以自我保存生命和繁殖同类型的生命。同时它又是一个评价系统，对环境和对自我进行评价，所以它能够区分“好”、“坏”，哪些对生存有利，哪些对生存不利，哪些是适应环境的，哪些不是适应环境的，并及时作出反应。正因为这样，我们将生命看作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有自主性、有能动性的价值主体是毫不过分的。

既然生命是一个有目的行动者，并具有上述意义的语言描述系统、意向系统、指令系统和评价系统。因此依据该种生命的生存与繁殖目标，它的确能在环境区分出好与坏、善与恶。它将自己的自我保存和自我繁殖的目的，作了内在价值的评价，对于环境的有利与不利因素不断作出工具价值的评价。你拿起猎枪将华南虎打伤，华南虎当然视作是恶的，虽然它没有“恶”的概念，也不会将你告上法庭，要求你承担道义责任，因为它不是道德主体或法律主体。但它逃跑或反咬你一口，便是它对“坏的”、“恶的”的环境的一种反应或响应，即一种肢体的评价语言。这就是生命客观的内在价值和客观的工具价值，它是不依人类的评价标准为转移，也不依人类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动植物的目的与价值。因此我们面临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只承认人类的评价系统是存在的，而不承认其他生命的评价系统也是存在的呢？为什么人与其他高级动物的基因序列大多数相同，而我们只承认人类的需要及其满足对人类是有价值的，而不承认熊猫的需要及其满足对熊猫也是有价值呢？为什么我们应该连自己的基因评价系统也加以否定而只承认自己的自由意志评价系统呢？为什么我们只承认人类及其文化是解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有关问题，而不承认其他生命也在解决自己的怎样生存、怎样繁殖、怎样适应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呢？这些问题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质疑。哲学家波普尔也正是面对着这个问题而承认了广义的自然选择理论和广义价值的。他说了许多有关“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都是解决问题”的话，他指出阿米巴是通过试错，在环境中区分出什么是“好”的和“坏”的，从而解决生存问题的，这与爱因斯坦通过尝试与批评来解决理论问题是同一个模式。然后他就说：“价值同问题一道出现……就问题而言，我们可以着眼于某些人（或者某些动物或植物）作这样的猜想，他（或它）是在试图解决某一问题，即使他（或它）可能一点也没有意识到那个问题。……人们常常提出，价值只有同意识一起才进入世界。这不是我的看法。我认为，价值同生命一起进入世界，而如果存在无意识的生命，那么，我想，即使没有意识，也存在客观的价值。可见，存在两种价值：由生命创造的、由无意识的问题创造的价值，以及由人类心灵创造的价值，这种创造以先前的解决为基础，是要尝试解决那些可能或好或差理解的问题”。<sup>⑤</sup>

#### 四、生命个体之间和生物物种之间的价值冲突与协调

如前所述，当几个不同的控制系统联系在一起时，它们的不同目的会发生相互冲突，有些目的被排除，有些目的被整合，于是产生了一个高层次的目标或价值来解决这些低层次目标冲突与整合问题。解决生命系统的价值冲突与价值协调的目的层次结构中，有一个高一层次的价值或原则支配着，这就是适应性的协同生存和适应性的协同进化。从生态总体的角度上说，这就是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完美，这是调节整个生态共同体（人类是其中一个成员）的存在和发展的最高层次的客观价值。

对于人类来说，描述这个生态共同体的客观的目标或价值可以表述为一个事实判断。描述这个生态共同体由于人类活动的负面作用面临生态危机甚至面临崩溃的危险也是一个事实判断。但由于它的总体价值是一切生命价值的总和与整合，我们人类应该遵循这个目标，把趋于保护生态共同体完整、稳定和完善的事物与行为看作是好的、善的，趋于破坏生态共同体的行为看作是坏的、恶的，则是一个价值判断，并且是道德价值判断，道德规范判断。这是人类道德规范的第一个公理，它是有人类活动参与的生态系统控制的实然、应然对应原则。在道德哲学中它是人类规范伦理的出发点之一。从逻辑看，无须证明，但可以论证。本文所作的就是对 A. 莱奥波尔特和 H. 罗尔斯顿提出的这个公理作一种系统论的和控制论的论证。

这样看来，一切生命都可以是价值主体，但只有人才是道德价值主体，因为他们有自由意志从而

有道德责任。我们并没有要求老虎和病毒为其损害人类的行为负责，我们只要求猎杀华南虎的和放出炭疽菌的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不仅是为了人类及其后代，而且是为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完美性。的确，我们并不主张，在人类的生存和健康需要同动植物的生命的保护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毫无疑问地作出维护前者牺牲后者的选择。因为这只是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的最高原则，它假定在人类行为的目的控制中只有  $g_1$  没有  $g_2$ （见图 4）。但这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深层生态伦理的最高原则。“三 T 原则”（地球生态系统的 integrity, stability 和 beauty）才是最高原则。在许多国家自然保护区周围，常常有人被老虎或其他野兽吃掉，可是自然保护区还是需要的。这可以看作牺牲了人类的部分利益甚至生命来保护某些动物及其物种的生存和繁衍。至于深层生态伦理推出许多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政策在此暂不作详细讨论。

## 五、对称性的浅层人际伦理和不对称的深层生态伦理

伦理关系可是对称的也可是不对称的。“你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必须怎样对待别人”，这个伦理关系的黄金法则是对称的。自然并无意识，动物无法理解和遵循道德规范，无法像人类那样对存在着权利与义务达成谅解，因此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系，人对非人的生命的伦理关系，是不对称的。但不对称的关系也可以是一种伦理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例如：未成年的婴儿或儿童、弱智童、精神病患者、植物人……我们也无法与他们通过交谈程度达到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的谅解。为什么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人权？特别是要给他们予以伦理的关怀呢？至于代际伦理、代际公正，本身是不对称的。那些后代人尚未出生，也不知姓甚名谁，又如何进行对称性的交谈呢？所以不对称性并不能给予我们多少逻辑根据说人对自然、人对非人生命没有伦理关系。

不对称的单向的伦理也是一种伦理，这种伦理在生态伦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人对自然应有爱，人对自然应有责”，虽然在历史上起源于一种原始神秘主义或自然崇拜，但今天却不复归于神秘主义，它是人类道德进步的表现，是人类变得更加文明的表现。现在，在欧洲，人们通过交谈程序达到共识，反对人类虐待动物的行为。人们反对穿着野生动物的皮毛，甚至动物的皮毛贸易几乎绝迹了，许多国家逐渐结束了工厂式的动物饲养，将它们放回自然界，放回开放式的牧场中去。瑞士已禁止鸟笼式的养鸡场，英国已立法禁止在畜舍内养牛，并逐步结束厩内养猪。而 1988 年瑞典议会通过法律，10 年内完全禁止工厂式的牲畜饲养场，让家禽家畜恢复其自然行为。<sup>①</sup>所有这些，我们都很难论证这完全不是为了动物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后一代人的利益，可见，除了对称性的浅层人际伦理（浅层生态伦理是这种伦理关系的表现）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深层的生态伦理，它可以从复杂系统的目的性一步一步地推演出来。

<sup>①</sup>K. Dooley, (1996).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A Nominal Definition. *The Chaos Network*, 8 (1): 2–3.

<sup>②</sup>A. 罗森勃吕特, N. 维纳 (1950):《目的性行为与非目的性行为》*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17, Oct. 1950.

<sup>③</sup>Willian T. Powers, *Behavior: The Control of Perception*, Aldine de Gruyter, 1973, Fifth Printing 1997.

<sup>④</sup>Mark Bedau, “Goal- Directed systems and the Good” *The Monist*. Vol 75, No. (January 1992). P. 31–54。作者指出：“价值与目的性是概念的统一理论系统的组成部分。……以价值为中心的目的理论和以功能为中心的价值理论可以同时正确的，但不是有判断力的和明智的人们所不同意的那种平庸分析。所以即使价值与目的是相互定义的概念家族，以价值为中心的目的理论是有意义的和有信息量的理论进步”。另一翻译见盛庆来：《实然/应然鸿沟：自然主义和效用主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

<sup>⑤</sup>卡尔·波普尔：《波普尔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年，第 274–275 页。

<sup>⑥</sup>张华夏：《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326 页。

责任编辑：何蔚荣

# 生态文明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科学建构

方世南

[摘要] 生态文明呼唤科学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方式是以人类的全面发展和对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为价值尺度，与自然界充分和谐的，有利于生态环境优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产力和资源劳动率以及绿色消费是阻扼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支持生态系统发展的强大力量。

[关键词] 生态文明 生活方式 生活质量 环境保护

[作者简介] 方世南，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苏州，215021。

生态文明是人类告别非生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理性选择。生态文明超越了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是一种具有崭新质态的更为高级的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呼唤科学的生活方式，促使传统生活方式按照生态学的要求嬗变、转换和创新。现代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理应蕴含生态文明的内容。简而言之，现代生活方式应该是一种与自然界充分和谐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优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绿色的生活方式。

## 一、黄色、灰色、绿色：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色彩变化的意蕴

人作为类的存在物，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我们的生物起源就决定了我们必然也是相互依存的生物圈里的一分子，要吸收水和氧气，分享植物进行（也就是生化能源）光合作用所制造的净产品以及在生态系统中循环的营养物。”<sup>①</sup>生态环境是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生活方式作为人类生存的活动方式之一，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与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相适应，为一定的生态环境所制约，在一定的价值观、人生观指导下形成的人们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生活活动模式。不管是狭义的生活方式，如人们日常生活活动的方式和形式，即衣、食、住、行、用、娱乐等日常消费生活方式和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还是广义的生活方式，如包括劳动方式、政治生活方式、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家庭生活方式等，都须臾不能离开生态环境。人类的所有发展以及生活和消费都要受到生物圈的限制。如果说生产力是生活方式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没有生态环境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包括生产者一人本身），生产力就只能是抽象的，而不是现实的。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于它来进行生产的材料。”<sup>②</sup>从这一意义上说，生态环境构成了生产力的源泉和生活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可称为始基的东西。有助于生态环境和人类双赢的生产力应该是绿色生产力，即有益于和支持生态环境系统发展的生产力。否则，生产力就是一种对自然和人本身都构成巨大威胁的破坏力。科学技术也是如此。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有利于或有害于生态环境问题上，是一把双刃剑，它的两面同样锋利。

生活方式始终追随着生产力的踪迹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的生态环境所能提供给人类的生态资源状况，以及人类对生态环境认识和利用的不同，使生活方式具有不同的色彩。大致表现出从绿色到黄色和灰色再到绿色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是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产生的是狩猎文明或渔猎文明，与此相伴的是建立在极其匮乏的消费基础上的生活方式。人类对生态环境虽然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为

了生存不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由于人类数量的稀少和对生活方式要求的低下以及利用自然界能力的有限性，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干预力量和程度是极其有限的。生态环境对于人类对它的破坏，具有强大的还原和修复能力。因此，整个生态环境呈现出绿色。据科学家考证，现在属于沙漠的地帶，在古代都是绿洲。“公元前 5 世纪，希罗多德提到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能够步行穿越北非，从大西洋到印度洋，一路上总是行走在树荫下。这种情形当时已不存在：那片土地正在变成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沙漠。希罗多德归纳道：‘人类大踏步地走过风景秀美之地，而沙漠紧随其后。’”<sup>③</sup>这一时期，经济学家塞林斯把它称为“原初丰裕社会。”

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是小生产者的生活方式，长期的农业社会，人们是以反复利用土地来得到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农业文明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从匮乏型走向温饱型。然而，耕种长期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的荒芜，像古代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在其《克利梯斯篇》中就希腊的景色进行了截然不同的阐述，他认为他目前生活的希腊不是“生就”这个样子，它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绿色之所以荡然无存，是人类的某些欠考虑的行为强加其上的结果。希腊的荒芜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因燃料和木材而砍伐森林，以及大量不受控制的羊群的过度放牧，它们靠树苗而茁壮成长。近代历史上也有过典型的例子，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能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活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4000 多年以前，那里森林茂密，水美草丰。据古籍记载，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超过 50%。在农业发展中，由于盲目开发，滥伐森林，使得这片森林草原成为今天千沟万壑、满目苍凉的荒山秃岭。在农牧业阶段引起的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时期，生态环境染上了令人痛心疾首的黄色。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是农业文明的典型写照。

工业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超越。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温饱型进入到富足型。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资产阶级仿佛像巫师那样，用法术呼唤出巨大的生产力，各种消费品琳琅满目，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实行了革命性的飞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sup>④</sup>但是，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建立在对资源大量利用的基础上，是不计生态环境资源成本的经济活动，出现了物质资本的增加和环境资本的减少这一奇特的二律背反现象。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对生态的破坏和对人的健康的危害，又使表面增加的物质资本成为一种空洞的资本。在生活方式上，富裕国家采取了扭曲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即能源的高消费及其制造的大量垃圾，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可以说，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 20 世纪是全球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世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浪费和大量废弃是这一时代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岩左茂在《环境的思想》一书中说：“全球的环境破坏可以说是从本世纪开始的。据说，由于煤炭、石油的使用使二氧化碳增加（产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增加了 25%）等原因，地球表面的气温在这 100 年间平均上升了 0.5 度，海平面也因此上升了大约 10—20 厘米。根据日本气象厅的预测，如果二氧化碳等温室效应气体就这样增加的话，到 2030 年，地球的平均气温将会比现在上升 1.5—3.5 度，海平面也将因此上升 20—110 厘米。”<sup>⑤</sup>“地球上的所有公民绝对无法共同享受这样一种以加重自然生态负担为代价的福利。地球正在限制人类的发展。”<sup>⑥</sup>罗马俱乐部认为全球规模的复杂问题已使整个地球陷入了如同革命般的急剧变化的旋涡，并称其为第一次地球革命。罗马俱乐部警告说，第一次地球革命是席卷政治、经济、环境、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涉及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的根本转换，错误地估价这一转换将会招致重大后果。<sup>⑦</sup>由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灰蒙蒙的天空成了工业文明的象征。从黄色进入灰色，人类

在进步中隐含着巨大的代价，开始品尝着破坏环境所带来的苦果。破坏环境的生活方式的必然图景是：贫困国家的温饱问题解决不了，环境污染，使人类疾病丛生，严重影响人的寿命和子孙后代的素质，使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失衡。“到 2020 年世界范围的能源消耗将要增加一倍。造成温室效应的废气将增加 45% 至 90%。”<sup>⑧</sup>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牺牲。全球气候变暖，其后果为风雨成灾，洪水泛滥成为客观事实，海洋上的一些岛国无法生存下去。子孙后代被抛到了日益恶化的环境和资源状态中生活的境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对人类社会来说，自从文明发祥以来，除细菌和病毒以外，屠杀人类的最可怕敌人，不是别的，正是人本身。《全球化陷阱》一书的两位作者也在书中使用了这样的大标题：“敌人就是我们自己。”<sup>⑨</sup>

现代生活方式必然选择绿色，是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扬弃。所谓绿色生活方式就是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合理的调节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劳动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按照社会生活生态化的要求，培育支持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和生活能力，创建有利于生态环境和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型的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要求人们充分尊重生态环境，重视环境卫生，确立新的生存观和幸福观，倡导绿色消费，以达到资源永续利用，有利于人类世世代代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目的。

## 二、生产、生活、生态：生活方式的传统理念到现代理念的跃迁

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现代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态化的绿色生活方式的确立，需要生活方式理念的转换——从传统到现代和未来，从单一到全面和丰富，从非生态化到生态化。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生活方式理念是对生活方式起指导和统率作用的精神动力源泉，是有关生活价值、生活意义、生活宗旨、生活目的以及对生活的合理性、人文性、可持续性予以价值评价等一套观念性因素的综合，是生活价值观、质量观、幸福观等问题的理论总和与抽象。科学的生活方式理念作为生活实践的行动指南，能够有效地保证生活方式朝着合乎科学性、人文性、价值性和生态性的方向发展。

追根究源，正是陈腐的理念并在此支配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严重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首先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理念。生活方式理念的变革是建构科学的生活方式的前提条件。变革生活方式理念的关键，是要处理好生产、生活和生态三者的辩证关系。

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是在生物圈中进行的，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一旦超出生物圈的限度，如过度地消耗环境资本所造成的环境退化，有毒物质对环境的污染超过了环境的自我清洁能力，就会引起生态系统的作用丧失殆尽并且受到极大损害的一连串的反应。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错误理念在于，把经济视为可以游离外部生态环境的孤立系统，可以无限制增长，与此相联系，消费水平也可以无限地提高。高扬的是“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大旗，其认识论根据是“物质主义”。其实，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对它的利用应该保持在生态环境可持续的水平上。由于环境资源的基础是有限的，因此，地球的可供给能力存在着极限，生产和消费都不是无限增长的过程。人类生产和消费的合理性应该服从生态的合理性。总之，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都与生态环境的状况密切关联着，生态环境制约着生产和生活。

将生态环境这一长期被人们忽略的系数纳入生产和生活中考察，就会清楚地看到三者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互馈式关系。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也直接是生产。生产作为整个社会经济的起点和居于支配地位的因素，它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消费的增长速度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改变，反过来又向生产提出更高的社会需求。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要与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生产资料的生产要与生活资料的生产保持合理的比例。生产和消费都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消耗，只有保护环境，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才能使生产、生活、生态三者保持最佳状态。生态作为生产和生活的有力支撑系统，它也要求生产和生活对它的反支撑。否则，它不能发挥对生产和生活的能动的支撑作用。

生产、生活和生态三者辩证统一的关系说明，对于生活方式，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环境作孤立的考

察。一句话，生活方式并不是与自然环境无关的过程，而要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影响。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构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生活方式不能破坏作为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整体生态结构。生活方式应该是也必须是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和共生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就是说，生活方式要依赖于生态环境的持续性发展。即是要遵循生态学高效、和谐和自我调节的原则，不超越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更新能力。为了生活得更好，人类要主动支持生态系统，就是要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不断提高资源劳动率。生活方式又是持续的过程，必须考虑社会和人类世代生命延续和持续性发展。即要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体现公平和效率的原则，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全面进步。在生活方式问题上应体现出公平性原则与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既要评价生活方式对“代内公平”（即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实现当代人在发展机会上的平等，满足当代人要求过较好生活的愿望）的影响，又要评价生活方式对“代际公平”（即当代人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损害后代人应该享有的发展条件），也包括资源利用分配的公平以及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两者的效益，即费用分配和负担的公平。要公平分配有限的自然资源。所谓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是指生活方式既要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促使人格的完善和智慧的进步，还要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价值目标。要为人的全面发展营造一个有利于工作和生活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即实现生态环境的人文化，人文环境的生态化。

在全球资源已经十分匮乏和整个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的情况下，按照生态环境对于资源的可供给能力进行适度生产和消费就十分必要。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耗竭速率应该考虑资源的临界性，不应损害支持地球生命的大气、水、土壤、生物等自然系统，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加勒特·哈丁在《生活在极限之内——生态学、经济学和人口禁忌》一书中指出，传统的增长和无限发展的理念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我们的地球只有有限的承载力。他认为，“以公共利益为代价的个人获利”使村庄的公地牧场过度放牧：因为每一个牧人都想放养更多的牲口，过度放牧的结果由所有牧人承担。而增加牲口的利益则为个体牧人所有。这一公地的悲剧适用于全球的生态问题。发达国家应该放慢那种以消耗自然资本而使经济规模持续膨胀的速度，加快发展绿色生产力，即支持生态系统发展的经济，按照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调整生活方式，使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持平衡状态。

### 三、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现代生活方式的系统结构

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科学的生活方式，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将生态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纳入生活方式，就应该推介全面生活和全面健康的概念，确立新的生活观和新的幸福观，提高生活质量，倡导有利于生态环境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

社会生产是全面的，社会生活也是全面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全面生产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全面的生产是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的本质区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时指出：“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sup>⑩</sup>生产与生活是紧密联系的。全面的生产也意味着全面的生活。全面的生产和生活主要包括物质生产和生活、政治生产和生活以及精神文化生产和生活等方面。物质生产和生活是其他生产和生活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sup>⑪</sup>政治生产和生活是人类所特有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参加政治活动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政治知情权、政治参与权、政治决策权和政治监督权是人的基本政治权力。“不自由，毋宁死”道出了政治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精神文化的生产和生活也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主要指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和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

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sup>⑫</sup>精神文化生活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们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着物质和精神生产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sup>⑬</sup>由此可见，生活方式是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合系统，不能只是归结为以损耗生态环境为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以及消极的消费享受方式，而应视为是人们的一种能动的理想创造活动和行为方式，是一种完善自己人格的选择方式和人生哲学。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保证的前提下，现代生活方式应该更多地考虑非物质领域的东西，如积极的政治参与、丰富的精神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等。这样，即使因生态环境资源的匮乏而抑制了人们的物质消费，人们也不会放弃进一步改善整个生活状况的希望。人们将会倾注于非物质领域未充分开发的潜力而使生活更加充实和美好。

科学的生活方式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人的全面健康。全面健康是与全面生活紧密联系的概念。按照麦克迈克尔的观点，健康不单是指不生病，不虚弱，而且必须是指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方面都处于健康的状态。<sup>⑭</sup>“从长远来看，如果超出生态系统的容纳量，便不能保证人类的健康和生存。”<sup>⑮</sup>全面健康建立在生态环境基础上。健康就是适应生态环境的表现。环境衰退和生态系统超负荷，人类的健康就无法保证。“许多澳大利亚人现在外出时通过穿防护衣，来减少癌症威胁，这是因为外部环境中平流层臭氧的减少正开始增加众多人口患皮肤癌的威胁。”<sup>⑯</sup>

健康的生活应当是节俭的生活。现在必须以新的幸福观取代传统的幸福观。新的幸福观着眼点是，人的个性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个人智慧和创造性获得充分的发挥，家庭生活更加融洽和谐且富有情趣，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更加丰富和协调，人的心理、信仰、审美和道德等精神生活获得高度的充实和满足。而旧的幸福观关注的是所谓吃得好，穿得好。“口福”一词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传统幸福观的指导下，生活方式的价值取向是物质第一主义。按照这种价值取向，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消费成为人生的目标和时尚，人们以大量地占有高档商品和奢侈品为荣耀，以此炫耀自己的富裕，表示自己所拥有的金钱、名誉和地位。这种奢侈的生活远远地超过了人类的合理需要。为了满足这些要求，人们大量开采资源，耗尽森林、草原和土壤，污染水域和大气，破坏生态平衡，表现出对大自然的贪婪。这种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不仅超过了自然界的支付能力，造成生态平衡被破坏，而且对人本身也形成巨大压力。“当丰富的饮食增加了预期寿命时（主要通过减少儿童死亡），一系列的慢性病也随之增加：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各类癌症、龋齿、胆石、慢性肠炎以及各种骨关节炎。大量的流行病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造成过早死亡最普遍的原因是心血管病和癌症，而饮食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广泛认识。”<sup>⑰</sup>

健康的消费应该是绿色消费。即非但不损害生态系统，相反有助于生态系统发展的消费。皮蒂把“绿色消费”定义为：“所谓绿色消费，是购买时至少一部分，从环境、社会的角度进行的购买或非购买的行为。”<sup>⑱</sup>据他介绍，在英国的《绿色消费者指南》中，把“绿色的消费”定义为避开以下产品的消费：危及消费者或他人健康的产品；在生产、使用或废弃中明显伤害环境的产品；在生产、使用或废弃期间不相称地消耗大量资源的产品；带有过分包装、多余特征的产品，或由于产品的寿命过短等原因引起不必要的浪费的产品；从濒临灭绝的物种或者环境资源中获得材料，用以制作的产品；包含了虐待动物、不必要的乱捕滥猎行为的产品；对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的产品。<sup>⑲</sup>从绿色消费需要开始，经过生态化的生产和绿色产品贸易，形成以绿色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值得倡导和实践的以简朴、方便、健康为目标的科学的生活方式，它既有益于人和社会的健全和持久的发展，又有益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布朗说：“自愿的简化生活，或许比任何其他伦理更能协调个人、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的各种需求。它是对物质主义空虚性的一种反应。它能解答资源稀缺、生态危机和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压力所提出的问题。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实行了自愿的简化生活，可

以减轻人与人之间的疏远现象，并可以缓和由于争夺稀少资源而产生的国际冲突。”<sup>⑩</sup>

总之，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摒弃对物欲的过分追求，应该更注重生活质量。1958年，加尔布雷斯在其所著的《富裕社会》一书中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他认为“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消费，而是生活的效益和享受”。他在后来的《经济与社会目的》一书中把经济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称为“文化价值”，把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加以表示这个总的价值标准，这就是生活质量的内涵。人并不是庸俗的经济动物，不能为满足贪得无厌的物欲不惜掠夺自然，置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退化而不顾，不能将物质消费视为生存的最终目的，而应该主动构建与政治、知识、教育和文化有关的丰富多彩的精神需要，提高生活品位和生活质量。建构科学的生活方式理念，在全社会形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绿色生活方式，人类将会告别生态环境困境，迎来人与自然和谐的绿意盎然的美好明天。

①⑭⑮⑯⑰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64、81—82、63、102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页。

③加勒特·哈丁：《生活在极限之内——生态学、经济学和人口禁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④⑩⑪⑫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42、32、30、29页。

⑤⑦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⑥⑧⑨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2、43、41页。

⑯⑯转引自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65页。

⑰布朗：《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科技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283—284页。

责任编辑：何蔚荣 罗 萍

---

(上接第39页)

⑩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页。

⑪[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第16页。

⑫[意]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北京三联书店，第15页。

⑬[荷兰]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页。

⑭参见[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

⑮参见[美]特雷西《诠释学·宗教·希望》，上海三联书店，第1章。

⑯[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第221页。

⑰参见[法]阿尔努等《科学与哲学的对话》，北京三联书店。

⑱[英]贡布里希：《理想与黄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90页。

⑲⑳⑳参见[德]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㉑[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第67页。

㉒[法]勒戈尔：《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第1页。

㉓参见[英]罗素《我的信仰》，世界知识出版社。

㉔[意]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北京三联书店，第30页。

㉕参见[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

㉖参见[英]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㉗㉘[美]科塞：《理念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第37页。

㉙[澳大利亚]巴斯摩尔：《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商务印书馆，第18—19页。

㉚[英]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8页。

㉛[英]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1—192页。

㉜[英]戴维斯：《上帝与新物理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第9页。

责任编辑：罗 萍

# 建立网上信任感

刘琨瑛

[摘要] 本文从多个风险承担者的角度来透视网上信任感，论述了网上信任感的前因和后果，影响网上信任感的决定因素有网站的特性、用户的特性和其它因素。网上信任感的后果包括行为意向、股票持有者的满意感、忠诚感和网络公司的业绩。

[关键词] 网上信任感 网下信任感

[作者简介] 刘琨瑛，《广州日报》主任编辑，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121。

戴尔电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说：“现代企业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利润，而是信任感。”信任感受到挑战不仅是因为企业间存在金融欺诈和企业的经济情形深不可测，而且还因为企业使用信息技术的强度越来越大。信任感已经成为数字化经济中任何组织的一个重要的、显著的成功因素，因为组织的策略，组织的结构、实施业务的过程和组织间的关系以及组织内的关系都变得必须依靠信息技术。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互不相识的双方通过电子网络进行互动，网上信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 一、有关网上信任感研究的简要评述

对信任感的研究管理学、营销学、会计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系统和电子商务等学科都有很多论述，但是大多是有关(网下)信任感的。

### 1. 管理学有关信任感的研究。

在管理学的文献中，信任感是满意感的一个很好的预测指标(Driscoll, 1978年)。信任感可以减少不确定性(Mayer, 1995年)。信任感是组织控制的一种形式(Creed 和 Miles, 1996年)，信任感是一种减少交易成本的机制(Wicks, 1999年)。特别是在网络的环境里信任感很重要，因为互联网影响组织中的信任感(Zubof, 1982年)，信任感和虚拟组织有关系(Handy, 1995年)。

在管理学里，信任感的定义有很多，管理学者Mayer认为信任感是“容易受另一方的行为影响的意愿”；Hwang 和 Burgers 认为信任感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合作行为的可能性”；McKnight 则认为信任感是个体对一个目标是否以一种善意的、胜任的、诚实的和可预知的方式行事的信念。

管理学和组织学中的大多数有关信任感的理论都是与组织内的信任感或者是组织间的信任感有关的(Jarvenpa 和 Leidner, 1999年；Pearce, 2000年；Zaheer, 1998年)。虽然他们是从员工和组织实体的角度来透视信任感的，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与顾客的网上信任感有关联，因为对组织的信任感和对个体的信任感是有关系的(Zaheer, 1998年)。

在影响组织的信任感的几个因素及信任感的后果中，有一些因素与网上信任感有关联，全球虚拟的工作环境影响组织之间的信任感。跨越时间、空间和文化组成了全球虚拟团队，而对全球虚拟团队建立的网上的信任感可能是脆弱的和暂时的。管理学者Zaheer的研究结果显示，组织之间的信任感和个人之间的信任感都会影响公司的业绩，信任感对减少不确定性和提高组织的业绩有积极的影响。

以上这些对信任感的研究对网上信任感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善意、能力和可预测性也是网上信任感的重要因素。在网络的环境里，网上信任感是风险承担者对在网上提供服务的公司的可预测性的期望，信任感的潜在的后果可提高满意感和降低不确定性。

### 2. 营销学有关信任感的研究。

营销学对信任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关系营销，因为信任感对一个公司的关系营销策略相当重要 (Doney 和 Cannon, 1997 年; Dwyer, 1987 年; Ganesan, 1994 年; Kumar, 1996 年; Morgan 和 Hunt, 1994 年)。营销学中最常用的一个信任感的定义是“信任感是对所信任的交易合伙人的一种依赖的意愿” (Moorman, 1993 年)。信任感可以视为是一种对值得信任的合伙人的信念，也可以看成是在一种在易受攻击的情况下对合伙人有所依赖的行为意向。可靠性和善意是信任感的两个基本要素 (Doney 和 Cannon, 1997 年; Canesan, 1994 年; Ganesan 和 Hess, 1997 年)。可靠性是指买方对卖方有效地完成工作的专门技术的信心，而善意是指买方对卖方积极意图的信赖 (Ganesan, 1994 年)。营销学者 Singh 和 Sirdeshmukh (2000 年) 则认为信任感是一个多维的概念。

营销学者 Ganesan 认为买方对卖方产生信任感的前提包括卖方的信誉是否可靠，是否一致以及卖方的行为是否公平。营销学者 Doney 和 Cannon 认为买方对卖方产生信任感的前提包括卖方对特定关系的投资和卖方的投资规模。营销学者 Anderson 和 Weitz (1989 年) 以及 Ganesan (1994 年) 认为买方与卖方的交往经验对于建立信任感很重要。营销学者 David 认为品牌对发展网上信任感也很重要，品牌是信任感的一个标尺，品牌代表了过去的所有产生信任感的活动，品牌是在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的条件下信任感产生的基础，品牌是质量的一个符号，品牌是确保能够产生信任感的一个重要基础。

营销学者 Ganesan 认为，信任感的后果是建立长期的交易关系。营销学者 Morgan 和 Hunt 认为信任感的后果是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营销学者 Singh 和 Sirdeshmukh (2000 年) 的研究显示，信任感作为中间变量居中调节满意感和忠诚感之间的关系。

营销学者 Geyskens 对营销关系中的有关信任感的元分析显示，环境的不确定性、依赖感、沟通和经济后果是信任感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满意感和长期关系是信任感产生的后果。

当把以上这些营销学的有关信任感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网上信任感时，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发作用。首先，可靠性和善意也是网上信任感的两个重要的要素，因为它们不管在网下还是在网上的环境里涉及的内容都一样。其次，一个公司的名誉、规模和用户过去与公司合作的经验，网站、用户对公司的依赖，用户和公司之间的沟通是网络环境里产生网上信任感的潜在前提。最后，满意感、归属感和与网站长期的互动关系是网上信任感产生的后果。

### 3. 信息系统和电子商务有关信任感的研究。

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系统和电子商务这些新兴的学科也开始对信任感进行研究，主要侧重于顾客的角度。电子商务专家 Fukuyama (1995 年) 认为采用新的技术特别是使用网站以后，在虚拟社会里信任感就变得更为重要。因为电子商务中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公司可能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方式在互联网上运作，网络公司的行为更加不可预测，所以网上信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2000 年香港大学所作的相关研究认为信任感跨越几个方面：包括浏览网站、购买、售后和安全性。从隐私的角度来说，信任感可以视为顾客期望网络公司公平地对待顾客的信息。

管理学者 Sultan 等人 2002 年广泛分析了 25 个网站的 6700 名被调查者，调查结果显示信任感有三个基本要素，它们是可信性/可靠性、视觉的感觉/舒适和网络公司的性质。

有的研究探讨了网上信任感的影响因素，信任感是受过去的经验、长期的取向、积极的信任态度和控制感影响的 (Jarvenpaa, 1999 年)。管理学者 Urban 等人 (2000 年) 所作的研究发现信息的数量、信息的质量、信息的及时性和个人指导可以提高信任感。管理学者 Dayal 提出了一个信任感的金字塔理论，超级安全、贸易合理性和满足感是网上信任感的核心影响因素，而消费者的控制、消费者的态度、周围环境和消费者的合作是边缘影响因素，网上信任感的其它影响因素还有网站的年限、项目的选择、网上的沟通、与其它网站的联系、网站的搜索引擎和隐私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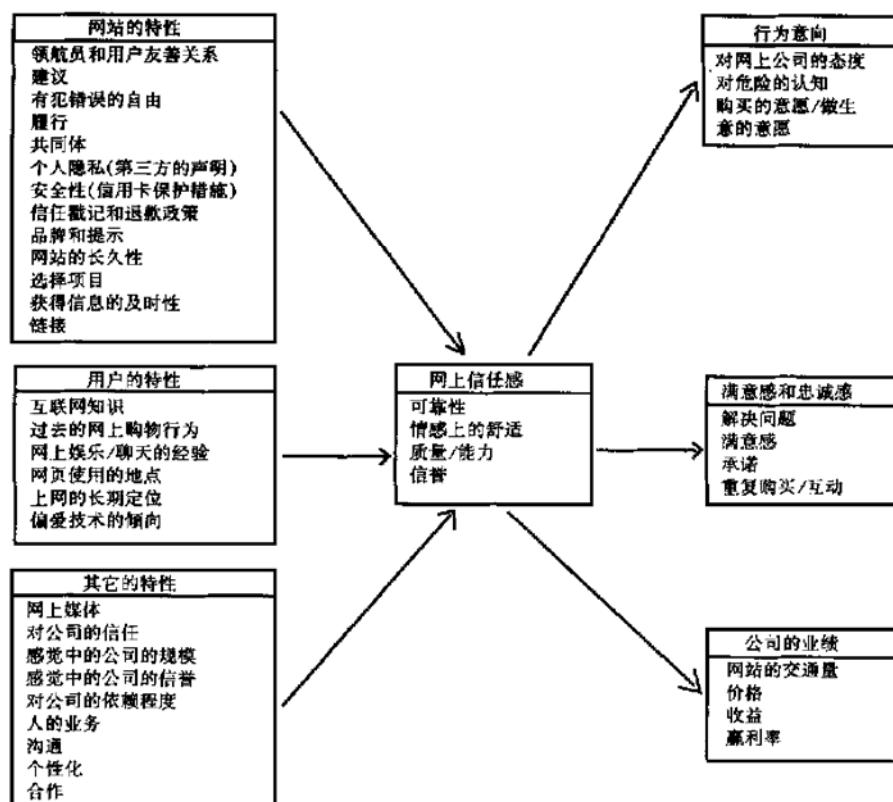
管理学者 Huffman (1999 年) 把安全问题和隐私问题视为网上信任感的关键影响因素。管理学者 Jarvenpaa (2000 年) 发现感觉中网络公司的规模和信誉会影响消费者对电子商店的网上信任感。管理学者 Sultan 2002 年的研究结果显示，顾客感觉中的信任感是由网站和顾客的特性决定的。其中

网站的因素包括 9 个方面：领航、建议、没有错误、履行、社区、隐私/安全、信任戳记、品牌和表现形式，这 9 个因素都影响信任感。顾客因素包括 4 个方面：互联网知识、过去的网站经验、互联网上的购物经验和娱乐/聊天，还有网站的使用也会影响网上信任感。

不同的研究结果显示网上信任感有不同的后果。管理学者 Sultan 等人 2002 年的研究发现网上信任感会影响顾客的行为意向，包括购买意愿和忠诚感。他们重要的发现是信任感作为中间变量影响和调整顾客特性和网站特性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信任感影响态度、冒险意识，反过来，态度和冒险意识又影响在电子商店购买的意愿。所以对网站的信任感最终影响购买意愿。

以上对网上信任感的研究，缺少对信任感的基本要素和网上信任感的影响因素的区别研究，在许多研究里，网上信任感的组成要素和决定因素常常混为一谈。另外一个缺陷是对信任感的研究，大多是站在顾客的角度，而很少站在风险承担者的角度。

根据过去的研究和不同的学科对信任感的不同理解，我们提出了一个研究网上信任感的概念框架（如图所示）。



## 二、如何建立和维持网上信任感

风险承担者分析理论和网上信任感的概念研究模型为网络公司建立和维持网上信任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根据风险承担者理论，网络公司应该采取主动的营销措施来建立网上信任感。具体来说，有下列方法：首先，网络公司应该清楚地了解不同的风险承担者对网上信任感的关键需要是什么；其次，网络公司应该明确众多的风险承担者的共同和一致的需要，同时列出他们有冲突的需要；第三，对于影响网络公司业绩、未来的成长和竞争优势以及其它与组织目标有关的因素要列入优先考虑的要素；最后，应该选择与优先需要相一致的信任感发展方向。当两个或多个风险承担者的需要发生冲突的时候，优先化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指导原则。

从信任感的概念模型看，虽然信任感可以在网上得到增强，同样也可能因为产品质量差，网上浏览比较复杂、不易操作、网站内容贫乏、技术失误、服务水平不高、反应时间不够和执行指令错误等原因而降低或失去网上信任感。

赢得或失去网上信任感的难易程度是不对称的。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认为失去的机会要

远远大于获得，失去信任感的代价要比赢得信任感大。所以，对于一个网络公司来说，获得信任感很难，而失去信任感却很容易。建立网上信任感的过程是渐进的，而失去信任感的过程是突然的、快速的。网络公司可以通过不断改进网络公司的服务和网站的建设来逐步地建立信任感，但是一旦有一个重大的失误，以前建立的信任感会消失殆尽。即使网上信任感是多么的强大，如果网下的经验是不值得信任的话，网上信任感也会失去。所以，多渠道的营销策略对于建立信任感至关重要。

根据以往的研究，网上信任感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增强。Urban 等人（2000 年）提出用以下的方法来增强信任感：最大化提示建立网上信任感，使用虚拟顾问的技术来赢得消费者的自信心和信念，提供没有偏见的、完整的信息，包括竞争对手的产品和坚守承诺。

Dayal 等人（1999 年）认为用户个性化服务是提升网上信任感的一个关键。传统商业提供大众化的服务，而电子商务能使产品和服务非常精确地个性化。运作个性化服务的站点的用户回访率常常是其它的服务方式的 5 倍，查看的页面数是其它服务的两倍。网上商业企业现有的技术手段已经提供了 E-mail（电子邮件）自动回复系统，它能及时对每一个顾客的需求及时作出响应，同时把订单传输给生产厂商，而生产厂商按订单生产，没有库存，反馈时间极短，真正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Jarvenpaa 等人（2000 年）提出制定退货或者退款的政策赢得消费者的满意感，从而提升网上信任感。Hoffman 等人（1999 年）认为当涉及到交易信息和网上支付方式的时候，可以通过给消费者使用匿名或者是使用笔名的机会来增加网上信任感。

Schneiderman（2000 年）认为网络公司可以通过提供过去和现在的用户指导方针获得第三方的认证，加强保护个人隐私和网络安全的政策来增强网上信任感。如何在网上保证交易的公正性和安全性，保证交易方身份的真实性，保证传递信息的完整性以及交易的不可抵赖性，成为推广电子商务过程中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于安全问题网络公司采取一定的技术措施，如密码、数字签名、数字时间戳服务、身份验证、防火墙、安全审计、灾难恢复、防病毒、防黑客入侵等安全机制措施加以解决。

Mathew（2001 年）认为网上信任感还可以通过信用卡遗失保险，产品保证和商品退货政策，提供有第三方保存附带条件委付盖印的契约服务，可以预订服务时间和提供友好的界面等措施来提高。

Palmer 等人（2001 年）提出，保护个人隐私的声明和第三方的介入可以增强信任感，因为不同的组织比如批发商、货运商和银行也介入每一次网上交易活动，如果这些组织齐心协力的话，就会增加网上信任感。

### 三、简要的结论

网上信任感是网络公司的一个重要的电子商务策略。虽然网上信任感与网下信任感有许多共同的要素，但是二者还是有不同之处，特别是网上信任感牵涉许多技术问题和虚拟社会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把组织实体视为一个信任的对象。网上信任感可以从风险承担者的角度来透视，站在消费者、员工、供应商、分销商、合伙人、股票持有人和调整商等风险承担者的角度来考虑。

网上信任感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它还包括可靠性、情感上的舒适、质量和信誉等内容。影响网上信任感的决定因素有网站的特性、用户的特性和其它因素。网上信任感的后果包括行为意向、股票持有者的满意感、忠诚感和网络公司的业绩。

一个网络公司应该很清楚地了解不同的风险承担者对网上信任感有什么有关的要求，找出他们共同的要求，把一些有冲突的要求列入优先考虑的次序，增强网上信任感。未来的研究还应该探讨多个风险承担者的作用，战略联盟对网上信任感的影响以及对信任感的跨文化研究等问题。

责任编辑：何蔚荣

## •经济学 管理学•

# 我国产业劳动生产率与产业利润率的国际比较

王述英 蓝庆新

[摘要] 基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和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目标或路径选择，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下从国际视野上对我国产业劳动生产率和产业利润率作简要比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本文对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中国产业劳动生产率 产业利润率 国际比较

[作者简介] 王述英，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蓝庆新，南开大学经济系博士生，天津，300071。

工业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工业在自由和公平的市场条件下，争夺有利的生产条件和销售条件，在竞争中获得最佳利益的能力，它是工业国际竞争优势的表现。提升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使我国工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途径。

## 一、我国产业利润率的国际比较

由于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变化必然引起生产者利润的变化，因此，可以用产业和企业的利润率水平来衡量产业竞争力的大小。利润率主要指投资利润率，在自由、良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常用税后投资利润率（税后利润/投资总额）反映产业经营效益的高低。该值越高，证明该产业处于比较良好的经营状态下，其竞争力也就越强；反之则越弱。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某产业利润率长期居高不下，则证明了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产业间通畅流动，有违背市场竞争规则的力量在起作用（为了研究方便，我们这里的产业利润率是在假定在国际市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利润率）。

下面我们对反映工业竞争力的产业利润率指标进行国际比较，通过比较，来透视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状况（见表1）。为了保持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我们选取的部门大体上是已经进入到市场竞争中去的产业，较大程度上排除了行政力量所造成的垄断现象。

表1 2000年我国与美国及世界平均产业利润率水平比较

行业	我国 (%)	美国 (%)	世界平均水平 (%)
食品加工制造业	6. 6	5. 2	4. 91
纺织业	10. 88	6. 66	7. 82
鞋帽制品业	15. 91	8. 83	11. 2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12. 73	5. 12	10. 11
造纸及纸制品业	6. 10	11. 8	9. 23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9. 36	25. 13	24. 56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19. 54	15. 37	10. 14
化学原料及制品	7. 35	10. 98	7. 1
医药制造业	12. 93	16. 63	10. 26
橡胶制品业	10. 18	15. 53	13. 63
塑料制品业	9. 57	13. 97	10. 38

金属制品业	17. 53	18. 79	15. 34
普通机械制造业	8. 32	20. 13	16. 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9. 11	16. 23	13. 32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9. 88	15. 43	12. 55
电气机械制造业	8. 36	13. 97	10. 14
专用设备制造业	6. 09	10. 31	7. 1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国际统计年鉴》（2000年）。

从产业利润率来看，我国食品加工制造业、纺织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的产业利润率较高，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高于美国平均水平；除此之外，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工原料及制品业、医药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也高于世界水平，而其他产业不仅低于美国水平，而且也低于世界水平。这说明我国的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资金利润率相对较高，而像机械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设备制造业等附加值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资金利用效率仍然较低，而这些产业正式代表当前工业进步的方向。因而可以说，我国工业总体的资金利润率较低，我国工业发展很大程度上走的是粗放式经营的路子。

## 二、我国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劳动生产率反映的是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它作为衡量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研究的是产业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系。往往是产业技术进步越快，其产业劳动生产率越高，竞争力越强。因此劳动生产率反映了产业技术进步情况，进而反映了产业的竞争力状况。为直观起见，我们用全员劳动生产率即各产业的劳动者一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总额来反映产业的竞争力大小。其值越高，产业的竞争力越强；反之则越弱。

表2就是以2000年的数据为准对我国工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进行的国际比较。

**表2 2000年我国与美国及世界平均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

行业	我国(美元/人·年)	美国(美元/人·年)	世界平均水平(美元/人·年)
食品加工制造业	3400	21700	5200
纺织业	1600	22100	4300
鞋帽制品业	1623	11078	4800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1100	12465	2430
造纸及纸制品业	1300	29863	6890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1286	68210	5420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7800	76900	10900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2400	65389	3490
医药制造业	3875	66290	9820
橡胶制品业	1896	39870	7360
塑料制品业	1924	38097	7270
金属制品业	1965	42980	7820
普通机械制造业	1687	47936	8920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598	43860	6790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3400	68320	8200
电气机械制造业	2100	42190	5890
专用设备制造业	1796	34720	678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世界统计年鉴》（2000年）。

从国际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简单的对比来看，在2000年，我国工业平均全员劳动生产率0.25万美元，而同期美国则为4.3万美元，世界的平均水平则为0.65万美元水平，我国只相当于美国的5.8%，世界平均水平的38.5%。从各产业来看，我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也普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低于美国的平均水平。我国总体产业劳动生产率比较国际平均水平明显偏低。这是与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过剩的国情分不开的。

### 三、几点启示

1.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优势的重要表现。从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和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来看，我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是我国国际竞争力优势的重要体现。这是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国情分不开的，正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使得我国产业整体竞争力水平在国际上有了较大的提升，同时也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靠劳动的投入带动经济增长，资本和技术含量偏低，产品附加值低。该产业是一个高风险市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拥挤在这条路上，竞争相当激烈，收益相当不稳定。这类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占竞争优势，并不能说明我国工业整体国际竞争力水平已经在世界上处于强势，只能说明我国工业在国际分工中还是处于低级层次。从长远看，工业发展只能沿着现行趋势缓慢前进，在发达国家后面发展那些发达工业国已经转移出去的工业，而难以保持高质量的运行和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2. 我国附加值高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处于劣势。从分析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国附加值高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些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不强。这是与我国资本积累不够、技术水平薄弱的国情分不开的。但这些产业目前处于相对稳定的收益状态，代表了国际产业升级发展方向，也是一个国家竞争力得以增强的重要方面。我国在这些产业竞争力的弱势正反映了自身产业层次的低水平。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更多地取决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缺乏具有长远发展潜力的高层次产业，产业升级滞后。

3. 我国产业经营效率低下。从对我国产业的利润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产业经营效率低下。产业的经营效率是由资金使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共同决定的，也反映了产业的技术水平状况。我国资金利润率普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反映了我国在资金使用上存在着巨大的浪费，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将资金这一生产要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比较薄弱。同时从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也是相当低下，劳动生产率尚不及国际水平的一半，不及美国的10%，劳动生产率在国际比较中处于劣势，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企业中人员冗杂，生产效率低下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低，技术利用率低，产业发展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经营的路子。

总之，我国尽管在工业国际竞争力方面有了极大的提升，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水平不高，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不高，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也比较缓慢，仍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进一步提高。

###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2002年11月8日。

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麦克尔·波特：《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1997年。

王述英：《现代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金碚：《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

李辉：《工业化中结构转变的趋势和特点》，《经济纵横》2000年第9期。

责任编辑：黄振荣

# 品牌资产与经营策略因子关系的回归分析<sup>\*</sup>

## ——对 105 家大中型企业的问卷调查

卫海英 王贵明

[摘要] 本文在对 105 家大中型企业的调查基础上, 通过数理统计方法, 分析了国内企业品牌资产经营状况, 在品牌资产各组成要素中提取了五个品牌资产最重要的构成因子: 品牌地位、顾客认知价值、品牌定位、品牌创新能力和市场执行能力; 并在对企业品牌经营策略分析基础上, 建立了品牌资产与策略因子关系的回归模型。

[关键词] 品牌资产 品牌因子 品牌策略 实证分析

[作者简介] 卫海英, 暨南大学 MBA 中心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 广东 广州, 510632;  
王贵明,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40。

### 一、引言

随着企业购并风潮的兴起, 品牌资产的无形价值得到营销界的重视, 但什么是品牌资产、它的主要构成因素有哪些? 至今尚无一致定论, 其中较具权威的是大卫·艾克 (Aaker, 1992) 的品牌理论, 他指出品牌资产是品牌的资产与负债集合, 它与名称及象征有关, 存在于产品或服务之外却能为消费者和企业提供价值, 提出品牌资产的十大主要构成因素 (Aaker, 1996) 是: 价差效应、满意度、品质认知、领导性、价值认知、品牌个性、企业联想、知名度、市场占有率、市场价格、通路覆盖等, 并可归为五个类别: 忠诚度、品质认定、联想性、知名度及市场状况。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较多集中于理论研究或偏重于概念性论述, 实证性研究还很缺乏, 尤其是品牌资产的主要构成因素以及和品牌资产经营策略关系方面的实证研究。为此, 我们对 105 家大中型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与研究, 所调查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日用化工品、保健品、食品、家电、房地产等行业。通过调查研究, 清楚地看到我国企业品牌资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品牌资产与品牌经营策略关系的实质。

### 二、品牌资产的构成因素的衡量及因子分析

品牌资产所含因素的衡量方式以艾克 1996 年所提出的品牌资产十项指标为基础, 结合产品、市场等方面因素及国内实际情况进行适当修改, 选定了 20 个变量以刻画品牌资产的构成因素, 它们是品牌地位、市场占有量、领导属性、品牌信任度、品牌忠诚度、品牌个性、品牌形象、独特卖点、顾客满意度、品牌价值、品牌知名度、产品延伸力、产品触及率、市场欢迎度、市场铺货率、产品品质、相对价格、附加价值、重复购买率、研发与创新等。运用利克特尺度将每个因素对品牌资产构成的重要性从弱到强分为 1~7 个等级, 对 100 多家调查企业进行打分, 将数据回收整理后, 对此进行因子分析, 找出能控制所有变量的少数几个变量因子 (见表 1)。

从表 1 可得, 第一负荷因子由市场知名度、市场占有量、品牌的领导属性、品牌的行业地位和水平、相对价格等组成, 特征值 3.591, 因子负荷 17.91%, 构成了品牌的市场地位。第二负荷因子由品牌信任度、忠诚度、满意度、重复购买率、品牌价值、附加价值等组成, 特征值 3.56, 因子负荷 17.79%, 综合反映了顾客对品牌的偏好和价值评估, 即顾客价值取向或认知价值。第三负荷因子由品牌个性、品牌形象和独特卖点等组成, 特征值为 3.056, 负荷 15.28%, 综合反映了品牌形象与个性在消费者心目中产生的印象。第四因子为产品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产品延伸扩展能力与产品品质, 综合反映了产品品质和量即产品创新能力。第五因子为品牌在市场上的铺货程度和消费者对产品的可触及程度, 反映销售渠道和

终端的执行能力。五个负荷因子总解释负荷量为 70.92%，即提取了 70% 以上的信息，在品牌资产众多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品牌地位、顾客价值取向、品牌定位、创新能力与市场执行力，而不是目前流行的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的直线模式。通过研究可以得出品牌资产经营的核心与动力因子，即品牌地位、顾客价值取向、品牌定位三大要素组成品牌资产的核心因子，创新能力与执行能力则组成品牌资产的动力因子，是品牌延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表 1 品牌资产构成因素衡量指标及因子分析结果

项目名称	变量	因子负 荷	旋转特征值	累计负 荷总量(%)
品牌的市 场地位	品牌地位	0.791	3.591	17.96
	市场占有率	0.745		
	领导属性	0.739		
	品牌知名度	0.715		
	相对价格	0.604		
顾客认 知 价 值	品牌信任度	0.821	3.56	35.75
	品牌忠诚度	0.699		
	顾客满意度	0.719		
	重复购买率	0.619		
	品牌价值	0.539		
	市场欢迎度	0.509		
	附加价值	0.444		
品牌联 想	品牌个性	0.847	3.056	51.03
	独特卖点	0.786		
	品牌形象	0.671		
创新能 力	研发与创新	0.755	2.123	61.65
	产品延伸力	0.664		
	产品品质	0.499		
市场执行 力	市场铺货率	0.774	1.855	70.92
	产品触及率	0.720		

表 2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品牌经营策略	因子得分			
	1	2	3	4
进入市场时机	0.036	-0.063	0.020	0.702
目标市场	0.021	0.292	-0.204	-0.187
产品品种	-0.14	0.414	-0.093	0.073
市场环境变化	-0.067	-0.044	0.370	-0.241
市场增长率	0.013	-0.075	0.347	0.251
产品质量	-0.092	-0.075	0.423	0.189
产品线	-0.057	0.234	0.107	-0.045
产品规格	-0.126	0.302	0.100	-0.091
价格策略	0.096	-0.222	0.344	0.343
分销策略	0.115	0.208	-0.137	0.175
流通渠道策略	0.202	0.121	-0.177	0.074
促销策略	0.279	-0.066	0.010	0.088
广告策略	0.347	-0.106	-0.051	-0.082
公关策略	0.344	-0.181	0.041	-0.061

### 三、我国品牌资产与品牌经营策略关系的回归模型

品牌经营策略可概括为以下 14 项：进入市场时机、目标市场、产品品种、市场环境变化、市场增长率、产品质量、产品线、产品规格、价格、分销、流通渠道、促销、广告和公关策略等。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105 家企业根据其品牌资产形成过程中上述品牌经营策略所起作用的不同按七个等级打分，通过对问卷的分析，我们发现广告投入与公关费用成高度正相关，即是说，广告投入高的企业，其公共宣传上的费用也较高；其次，产品品种、规格与产品线的宽窄也有明显正相关，另外，分销策略与销售渠道、促销与广告及公关也呈现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依次为：0.79、0.723、0.703、0.635 和 0.65。为了提取出重要的品牌策略因素我们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因子旋转分析，得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如下（见表 2）。

从表 2 可看出，旋转后的品牌策略因子系数明显分化，第一主成分主要为推广策略，包括广告策略、促销和公关策略、流通渠道和分销策略；第二主成分是市场细分策略，包括产品深度与广度、产品的规格、品种、产品线数量以及目标市场策略；第三主成分为产品经营和延伸策略，包括产品质量策略、价格策略、品牌在市场的增长速度和市场环境变化程度；第四主成分为进入市场时机策略。

从中可以得出，在众多的品牌策略中，对品牌资产起主要影响的策略因子是市场推广策略、市场细分策略、产品经营和延伸策略和进入市场时机策略。

为进一步分析品牌资产因子与品牌策略因子的对应关系，我们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将前面分析得出的 5 个品牌资产因子作为因变量  $Y_1 \sim Y_5$ ，分别与当前的 4 个策略因子  $X_1 \sim X_4$  构成线性方程。首先，将品牌的市场地位因子作为  $Y_1$  因变量，策略因子  $X_1, X_2, X_3, X_4$  分别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显示方差分析结果为：检验统计量  $F=9.403$ ， $P=0.000 < \alpha (\alpha=0.05)$ ，可以认为品牌资

产因子 1 与策略因子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对应的 t 检验 P 值均小于 0.05，可决系数  $R^2 = 28.6\%$ ，说明品牌因子 1 与策略因子 1、3、4 之间存在线性回归关系，且策略因子 1、3、4 可解释近 30% 的品牌因子 1 的变动；显示回归系数  $B_1 = 0.286$ ,  $B_3 = 0.341$ ,  $B_4 = -0.273$ ，得线性回归模型为：

$$Y_1 = 0.000218 + 0.286x_1 + 0.341x_3 - 0.273x_4; \text{ 同理可得出以下方程:}$$

$$Y_2 = 0.000185 + 0.433x_3, \quad R^2 = 19.9\%; \quad Y_3 = -0.000745 + 0.382x_2, \quad R^2 = 18.5\%; \quad Y_4 = -0.00025 + 0.184x_2 + 0.258x_3, \quad R^2 = 13.6\%; \quad Y_5 = -0.000543 + 0.182x_1 + 0.357x_2, \quad R^2 = 15.7\%$$

其中， $Y_2$  表示顾客认知价值， $Y_3$  表示品牌联想， $Y_4$  表示品牌创新因子， $Y_5$  代表品牌执行能力； $X_1$  表示市场推广策略， $X_2$  为细分市场策略， $X_3$  为产品经营和延伸策略， $X_4$  为进入市场时机策略。从  $Y_1$  回归方程式中可以看出：品牌的市场地位主要决定于市场推广策略和延伸策略，其次为进入市场的时机。 $Y_2$  表示顾客对品牌的认知价值受品牌市场定位策略影响，包括顾客对产品的质量感知，相对价格认知，市场增长率和环境变化程度，定位策略因子可解释近 20% 的品牌资产因子 2 的变动。 $Y_3$  品牌定位受品牌分化市场策略影响，包括目标市场策略、产品品种、数量等方面，分化市场策略因子可解释近 19% 的品牌资产因子 3 的变动。 $Y_4$  表示品牌创新能力，与品牌分化市场和产品经营策略有关，包括产品的种类、数量、目标市场、品质质量等因素。若目标市场多，产品品种多，则代表产品创新和开发能力较强，策略因子 2、3 可解释近 14% 的品牌资产因子 4 的变动。 $Y_5$  表示品牌执行能力，与市场推广策略和分化市场策略有关。若产品促销、广告操作策略好，经销商数量和渠道层次控制能力强，则其品牌执行能力就越强。策略因子 1、2 可解释近 16% 的品牌因子 4 的变动。

为了更进一步揭示品牌资产与策略关系，用品牌资产的各项总和为因变量  $y$ ，策略因子为自变量  $x$ ，得出品牌资产与品牌经营策略因子的回归模型：

$$Y = 35.22 + 7.141x_1 + 2.726x_2 + 2.654x_3 + 2.165x_4 - 3.019x_5, \quad R^2 = 67.2\%, p = 0.000$$

其中， $Y$  为品牌资产总分数， $x_1 \dots x_5$  分别为质量策略、促销策略、市场增长率、产品线宽度和进入市场时机等因素；由于 F 检验的  $p$  值 = 0.000，小于  $\alpha$ ，其线性关系显著， $R^2 = 67.2\%$  表明策略因子可解释近 68% 的品牌因子的变动，说明企业的品牌经营策略对品牌资产影响很大。

从上述品牌资产与经营策略关系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出，品牌资产与促销策略、质量策略、市场增长率和产品线宽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市场进入时机与品牌资产成负相关关系。

#### 四、主要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品牌策略和品牌资产之间存在较密切的关系，品牌的经营策略造就品牌的性格，不同的策略形成品牌资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企业在品牌资产与经营策略的关系上具有不同的程度，例如成熟型企业在品牌形象、创新能力与市场执行能力等方面表现都比较强；领导型企业在市场地位及市场执行能力上分数较高；顾客导向型企业比较注重顾客需求与品牌价值；务实型企业在市场执行能力方面，如销售渠道、销售终端的产品可接触率方面比较强，在经营上比较注重产品质量、品种规格和数量，而在广告投入、促销、分销等方面比前几个类型较低，但又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创新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很强，注重产品开发、创新能力，但对品牌形象方面比较弱化，对广告、促销、公关等方面投入很少。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阶段研究成果（项目编号：70072009）。

#### 参考文献：

- [美] Paul Stobart.: 《品牌的力量》，中信出版社，2000 年。
- [美] 杰弗里·兰德尔：《品牌营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年。
- 宋秩铭：《奥美的观点》，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年。
- [美] 艾克：《品牌领导》，新华出版社，2001 年。
- [美] Keller K. L: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

责任编辑：黄振荣

#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企业分拆动因考察

吴三清 徐义雄 吴维库

〔摘要〕本文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三个著名企业的分拆案例，从中找出企业分拆的一般动因，透析影响企业分拆成败的内外因素，解释了企业的战略收缩通过市场协调与企业内部协调的互相转化和替代机制来实现的基本内涵。有效的分拆既能够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又不增加市场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关键词〕企业分拆 交易成本 资源配置

〔作者简介〕吴三清，暨南大学EMBA工作部主任，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企业管理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徐义雄，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吴维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100084。

## 一、关于交易成本理论

科斯(R. Coase)在其经典性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指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即企业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企业用于寻找贸易伙伴、讨价还价、订立合同、执行交易、监督违约行为并对其制裁等方面的费用支出。因为“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例如，假设要素的配置全部由价格机制来协调，那么，与要素配置相关的每一项活动都必须分别定价，要素所有者必须就每项活动签订一系列契约，频繁的签约活动可能会导致极高的交易成本。如果将一部分市场活动内化在企业之内进行，企业家便可以运用行政权威来支配企业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用长期合约代替短期合约，这样就不必签订一系列买卖合约，节约那些用于签订和执行这些市场合约的费用。节约交易成本是企业实行外部企业组织内部化（如垂直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动机。由于市场中存在的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等因素常常导致市场失灵，迫使企业试图以内部组织替代外部市场，以行政安排替代市场交易来配置资源，进而提高交易的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一些原来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逐渐转移到企业内部进行，企业逐渐演变成为具有多个下属单位，执行多种经济职能的规模庞大的科层制组织。

钱德勒通过考察美国企业发展史中企业内部管理协调取代市场协调的历史过程，论证了“大规模生产过程与大规模分配过程结合于一个单一的公司”的科层制组织的形成。但是，既然企业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安排，利用企业机制来配置资源就不可能免费。我们把企业配置资源所需要耗费的成本称为“管理成本”，主要包括企业组织和协调的费用（如与职工签约的费用等）。管理成本的高低与企业的规模和管理层级（管理层次和幅度）有这样的关系：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规模越大，管理层级越多，企业支出的管理成本越高。因此，管理成本是决定其规模和有效范围的关键性因素。

因为管理成本的存在，以及因规模扩大可能引起组织失灵——组织内部摩擦增加、官僚作风影响士气、组织效率日益降低等，企业不能无限扩大其规模——把所有外部的企业组织都“内部一体化”。而如果通过品牌、人力资源、资金、技术、销售等纽带与它们保持密切联系，形成网络，就可以在不增加企业管理科层的情况下，实现规模经济。通过市场协调与企业内部协调的互相转化和替代机制，既能够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又不增加市场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是企业分拆的理论基础。

## 二、企业分拆的动因

### 1. 惠普的分拆——安捷伦的出现

20世纪90年代末期，曾一直以18%的年均增长率成长的惠普公司在全球经济蓬勃发展的紧要关头反而露出疲态。不仅在通信领域难有作为，在一向称雄的PC市场上也逐渐受制于Compaq、Dell以及IBM等公司，而在一直不占优势的高端服务器市场上，更遭遇SUN和IBM的两面夹击。而完全不同的业务模式又大大加重了公司的管理负担。

面对来自市场和投资方的双重压力，老惠普不得不作出分家的无奈选择，也许只有分家，才能让两块业务更好地存活。拿拆分来说，惠普和安捷伦要分割 600 项不动产、11000 项专利以及 16000 个基层人员。而且，双方的业务联系十分紧密：绝大多数惠普打印机安装有安捷伦的零部件，2000 年公司还向惠普销售了价值 7 亿美元的集成电路。不过，热衷于创新的纳德当然不会满足于仅仅做比尔·休莱特和大卫·帕卡特的“产品”。纳德在多个场合强调安捷伦是一家全新的公司，并在惠普的企业文化中添加了“速度、专注和勇于任事”三个要素，以塑造安捷伦自己的企业精神。

专注+多元+创新。安捷伦的最初业务是电子产品、化学分析和医疗仪器，从惠普分离出来后，就开始专注于新的增长点：通信和生命科学。现在的产品主要有三类：测试测量产品、半导体产品以及生命科学和化学分析仪器。多年来，安捷伦一直遵循产品多元化的原则，以提高竞争优势，减少风险。

在高速增长中，纳德一直在对居于领导地位的大公司，比如思科（Cisco）、戴尔和英特尔（Intel）进行研究。他发现，这些公司的一个共性是将企业的力量集中于某一点，也就是古老的 80/20 法则。他意识到，总有一天，安捷伦 80% 的业务将被另外 20% 的业务代替，就像多年前英特尔撤出了存储器市场，集中力量于微处理器，诺基亚（Nokia）摆脱掉大部分业务，专注于无线通信业务一样。通过在多个业务范围内的投资，安捷伦最终将发展重心集中在通信和生命科学领域，因为正在高速增长的通讯和生命科学无疑将是今后最主要的两项技术革命。而与多数起步者不同，多年来一直投入重金进行研发的安捷伦事实上已经是这两个领域内的佼佼者——这确实是一个好的起点。1999 年 11 月，安捷伦在首次公开募股（IPO）时，不少和纳德交谈过的投资者都惊喜地发现，安捷伦几乎是他们在 18 个月以来所见的惟一盈利的、实施首次公开募股的企业。

## 2. 明基（BENQ）分拆

2001 年岁末，原台湾宏基集团旗下的明基电通在苏州宣布放弃宏基的共有品牌“ACER”，开始启动“BENQ”的新品牌。1984 年，台湾电脑制造业巨人宏基电脑决定分拆出一部分业务，成立一家新公司，于是明基电脑诞生了。此时，明基电脑只是为宏基分担部分电脑代工订单的小小子公司，使用 Acer 品牌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1991 年，当时不到 40 岁的李焜耀从宏基电脑走出来，执掌明基。到 1996 年，形势发生变化，明基电通分拆上市，成为一间独立的上市公司。1996 年前后，宏基对组织机构进行了重组，原先的庞大支系被分为伟创、新宏基和明基。新宏基的业务集中在电子商务、企业级服务以及解决方案等领域，对于明基的定位即明确瞄准数码时尚产品：“这块最厉害的是日本和韩国，或者说，索尼和三星有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同时以此次分拆为契机，明基完成了独立上市。在明基的成长过程中，宏基在明基中所持股份也由最早的 48% 下降为 28%：“未来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下降到 20% 以下，大致在 18.5%–19% 之间。会有一些国外的战略投资人接手这批股票以维护明基发展的持久稳定发展。届时，宏基将仅是明基的股东之一。”

原宏基集团共有 120 家企业，覆盖了软、硬件的许多领域，去年营业额达到 95 亿美元，今年有望超过 100 亿美元。明基集团今年的营业额预计在 32 亿美元左右，比去年增长 33%，其中第四季度的营业额将是 7.35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2%。明基人的心里早已有些不平衡了，一位区域经理向记者抱怨，明基自行研发和生产的扫描仪、CD-ROM、液晶显示器等产品市场反映都很好，但是使用的品牌却都是 Acer，明基要向宏基缴纳与营业额成正比的品牌使用费，2001 年明基电通营业额达 20 亿美元，自有品牌营业额成长率超过 20%，占据营业额的 60%，然而越来越大的营业额背后是越来越可观的品牌管理费用，越来越多的市场推广费用，维护和提升的“Acer”却不是属于明基自己的品牌。眼看自己的血汗钱这样轻松地被抽走，明基员工心中的滋味不言自明。

自从明基、宏基选择了各自的业务重心以后，二者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明基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推广自己的新产品，在品牌使用上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与宏基协调，以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谅解，这样，包括时间和金钱在内的高昂交易成本也令李焜耀很头痛。李决定创立自己的品牌，于是就有了“BENQ（意思为 bring enjoyment and quality to life）”。

## 3. 神州数码的分拆

2001 年 6 月 1 日，神州数码在香港中环交易广场联合交易所正式上市。2001 年 6 月 7 日神州数码行使了超额配股权，多发行 13238722 额外股份。超额配股股份占公司（经行使超额配发权扩大后）已发行股本的约 1.54%，并以每股 3.68 港元发行。超额配股后神州数码已发行总股本为 858680331 股，大股东联想控股占 50% 的股份。神州数码分拆上市共募集资金 3.7 亿港元，所募集资金将用于包括物流、企业资源计划（ERP）及其他支持系统在内的电子商务平台的构建和完善、软件和应用解决方案相关产品的开发以及一般营运资金三个方面。

2000 年 5 月，联想集团做出重大调整，将业务定义为互联网相关业务及电子商务相关服务两个方向，并以此为

导向，重组为新的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集团。神州数码集团承接原联想集团电子商务及相关服务业务，在国外著名IT产品分销、系统集成及网络产品业务上开拓进取。经过一年的发展，重组已经顺利完成。神州数码的分拆上市将从资本层面为这次重组画上圆满的句号。

分拆上市后，神州数码的管理层可以更专注于业务领域，有效加强决策程序，改善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提高运作效率并加快业务发展；也可以加强公司的运作透明度，便于投资者监督，并为投资者提供独立投资神州数码的机会；还可以使公司以独立的机构，按照融资需要，灵活多样地安排其资本结构，开拓资本市场。在吸引人才方面，通过股市提高了公司社会知名度，并通过实施独立认股权计划，可以提高公司招揽及挽留业内高水平专业人士的能力。神州数码与联想集团的分拆，经过了一年多的过渡期，最终得以成功地在中国香港上市。神州数码的成功分拆上市，表明了投资者对于分销企业价值的认可。而这一点曾经是业内人士最担心的，因为分销商被认为从事的是简单的搬箱子的工作，并没有自己的价值。其实，除了提供增值服务以外，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物流运作，同样是分销商的核心竞争力。

### 三、分拆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分析

1. 惠普分拆。很明显，惠普公司的分拆是非常成功的。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惠普公司分拆的原因是公司目前的组织结构限制了两大领域的发展，在竞争极其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公司如果不能向有潜力的领域集中资源缔造竞争优势，难免会落后于竞争对手。公司在发展的初期需要集中资源做一件事情，即集中战略，通过集中战略完善内部管理体系、缔造核心能力和培养品牌号召力，在此基础上实现多元化成长。但是，多元化以后的管理是公司成长中面临的问题。惠普公司的分拆实际上是解决多元化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业务争夺资源、高层管理知识和精力不足、品牌力度分散、内部出现多种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把一个大的集团，拆分成两个集团，每个集团集中资源和精力于高度相关的领域，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一个企业的资源和精力总是有限的，所以，业务分拆后，可以实现资源集中使用，减少内部交易成本，提高组织绩效。惠普分拆后的数据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分拆成功是有条件的。惠普成功的条件是：(1) 老惠普的品牌、知识和文化对新企业有支持作用。安捷伦与老惠普之间具有血脉亲情，纳德说他是老惠普缔造者的“产品”。他把惠普之道看做是安捷伦文化的源泉，而且在文化上还有创新，并添加了“速度、专注和勇于任事”三个要素，以塑造安捷伦自己的企业精神。(2) 原来的基础上创新。惠普分拆后的两部分，各自都在强调自己的品牌，安捷伦的广告也不再宣传“弘扬惠普之道”，而是在建立“安捷伦”品牌。这属于品牌创新，而不是靠祖宗吃饭。纳德对新企业的经营领域也进行了创新的确定，即专注于新的增长点：通信和生命科学。这是在实现专注以后的新见解。(3) 分拆后的业务领域同原来的业务领域界限清楚，不会发生同业竞争。惠普的两大块业务领域是“计算机与成像产品”与“测试与测量及生命科学”两大块业务之间，界限清楚，没有冲突。这样实现了利益分配划分清楚，不会因为利益冲突而导致出现纠纷。(4) 使用和提拔内部培养的人才。纳德是原来的执行副总裁，继承老惠普的精神财富，有能够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拓展业务。(5) 分拆后，业务上相互支援，具有协同效应。能够实现活动共享及核心能力传递。分离出来的安捷伦同新惠普之间，在业务上存在相互支持。(6) 多元化专注，存在于优势领域。分拆是为了专注，但是过于专注又会产生风险，所以要多元化，而多元化又导致老惠普的问题出现，这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安捷伦是通过多元化专注实现的。纳德工具20/80原则对公司的业务进行梳理，将总体竞争优势不明显的业务剔除出去，集中行业前景广阔和公司具有竞争优势的通讯和生命科学领域。安捷伦实现了在核心能力基础上的多元化专注。

2. 宏基分拆。台湾宏基集团分拆成伟创、新宏基和明基三个集团以后，从明基的发展看是成功的，说明分拆后通过专注能够实现竞争优势。宏基分拆后存在的问题是品牌争端，明基没有自己的品牌，而是使用老品牌宏基，当公司迅速成长利润丰厚的时候，品牌的拥有者老宏基索要巨额的品牌使用费而产生摩擦。明基在此情况下推出自己的新品牌BENQ。给我们留下的思考是：为什么明基没有一开始就考虑树立自己的品牌？在宏基品牌已经被用户广为接受的时候，改换品牌要付出多少代价？老宏基是否会为同样的产品再度启用宏基品牌？新品牌BENQ是否会被消费者认同？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传统名言：亲兄弟，明算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宏基品牌纷争使得我们进一步从惠普公司分拆成功提炼出一个重要程序：品牌也要分拆。公司经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个品牌，公司分拆时老企业从新企业如何获得利益，有两笔账目要清楚：股权收益和品牌收益。

3. 联想分拆。联想集团分拆为神州数码和联想电脑两个集团是成功的，分拆后两个集团都在迅速地发展，没有出现宏基拆分后的品牌纷争问题。成功的原因是：两个集团业务领域划分清楚，没有同业竞争问题；二是品牌分拆清楚，联想分拆为两个品牌：联想和神州数码。分拆后两个集团的资源能够实现专注，在有限多元化的领域中获得竞争优势。联想的分拆还同领导者的培养有关，柳传志同时培养了两个领导者，而这两个领导者的思维又完全不一样，都

# 论发展我国民营经济的制度变迁需求

陈雪华

[摘要] 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发展民营经济与制度安排之间的内在联系，可知当前发展我国民营经济的主要“绊脚石”是制度性的原因。因此，制度性的缺失是发展我国民营经济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有长期影响力的主要障碍。为提高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促进市场长期稳定和发展，降低民营企业的交易费用，必须进行制度变迁。

[关键词] 民营经济 发展障碍 制度创新

[作者简介] 陈雪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东 广州，5104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扶持政策进行了不断的改善和加强。在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民营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民营企业的壮大，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等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中国民营经济已步入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在前进道路上，却遇到了不少的障碍和阻力，这不能不说是在新时期下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 一、制度经济学与民营经济

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sup>①</sup>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所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生产活动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同样，交易活动也必须在遵循一定的规则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这种交易规则就是制度，而与交易活动相对应的现代社会中三种基本制度安排，即市场、企业和政府。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都同样要消耗资源，生产活动产生生产费用，交易活动产生交易费用。所谓“交易费用”就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进行交易、讨价还价、谈判签约、解决纠纷等等）的费用。因此，人们在优化和整合社会资源过程中，就要处处考虑到如何降低交易费用的问题，而要达到这种帕累托最优状态，就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道格拉斯·C. 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的新经济史理论提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变量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而正是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才给欧洲工业革命这一根本性变革铺平了道路。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也说明原有的经济组织出现了不适应性，这迫使经济组织发生变革，从而降低了技术变革的费用，加速了经济增长。<sup>②</sup>

可以成为一方两地的霸主，所以，有远见的柳传志为每个人设计了一片新天地。

运用交易成本理论考察以上案例，不难看出，分拆有三大好处：实现多元化专注，在有的经营领域实现竞争优势；品牌裂变，扩大品牌价值；为领导者施展才华设计平台。成功的分拆有两个要点：一是要能够实现活动共享以及核心能力传递，二是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都要分拆。

## 参考文献：

- 吴维库、富萍萍、刘军：《以价值观为本的领导》，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吴维库、金征：《老板的个人文化决定了企业文化》，《中国工商》2001年第4期。  
柯林斯：《从优秀到卓越》。  
黄泰岩、牛飞亮：《西方企业网络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4期。  
罗仲伟、罗美娟：《网络组织对层级组织的替代》，《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6期。  
责任编辑：黄振荣

民营经济可以满足人民生活多样化需求，在经济激励、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民营经济产权多样化，资本社会化，可吸引大量公民参与，体现机会平等。当代欧美发达国家，无不制订政策、设置管理机构扶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在推进工业化，有必要充分利用私人部门这种供给能力。因此，民营企业是我国最贴近市场的一个主体，天然与市场经济相融，其同时又具有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高度统一，家族制、内部组织结构简单化和管理人格化，以及经营风险大、资产负债率较低等特征。这些特征一方面与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有关，融资交易成本较高；另一方面也与民营企业的家族观念强、现代企业制度意识薄弱有关，以至民营企业经营态度谨慎，生产规模扩充困难和发展受阻等内外生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要解决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就必须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来降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交易成本，减轻民营企业由于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而造成的经济负担，深化体制改革，以促进民营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 二、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缺失问题

实践证明，民营经济是我国当前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时期，存在着许多制度性缺失的不确定因素，给大多数民营企业发展造成了各种不同形式或不同程度的障碍。

### （一）信用制度的缺失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虽然已确立十余年，但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信用秩序仍比较混乱，信用缺失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此外，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中介服务市场规模小，经营分散，市场竞争基本处于无序状态，没有发挥对信用行为的奖惩作用。

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信用制度缺失问题的产生应源于信息不对称，通常状况下，信用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非正式的合约安排。从发生时间的角度来看，信息不对称可以分为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和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前者容易存在逆向选择问题，而后者则容易存在道德风险问题。结合中国实际，我们可以发现，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属于信用的逆向选择问题，信用的非正式安排的重要作用在于减少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降低可以使原本不能够发生的交易变得有利可图，社会也就可以藉此向前发展。而信用的缺失则会增加交易费用，使得原本可以发生的交易不能够维系下去，社会发展也就会因此失去应有的动力。从社会的角度看，信用缺失实际上是一种威廉姆森意义上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欺诈性地追求自利。实际上，机会主义行为本身也会导致真实的或人为的信息不对称。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是相互加强的。换言之，信用缺失很容易陷入制度经济学上有名的“锁入效应”。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与注意，因为目前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着这种恶性循环。市场交易中因信用问题而造成的无效成本已经占到了中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减少2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因信用问题而产生的过高的交易费用正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并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我国信用制度缺失表现为：一方面信用中介市场供需严重不足，企业普遍缺乏使用信用产品意识；另一方面，信用信息的采集有很多障碍。社会到目前为止仍没有真正建立起信用信息的公开制度、个人隐私的保护制度，以及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建立和采集制度。因而，现阶段我国难以依靠商业化、社会化并且公正、独立的信用调查、征信、资信评估等方式提高社会信用信息的对称程度。

由我国信用制度的缺失而造成的企业融资难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最大障碍之一。在我们最近对民营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有59.3%的企业反映，担保条件难是向银行贷款难的首要原因，而担保条件难的根本又在于我国信用制度的缺失。

### （二）产权保障制度的缺失

所谓产权，就是三种权利的同时占有：使用权、自由转让权和不受干预的收益享受权。如果说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经济的话，那么财产所体现的主要还是经济权利，而信用所体现的则主要是经济义务。上述所说的信用缺失的实质，实际上是失信的一方只想拥有权利而不愿履行义务，这就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挑战财产关系和财产规则。由于我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财产关系还未完全理顺，财产的保障制度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因而整个社会的财产意识和履约意识也没有随着市场的发育和市场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相反在经济生活中无信用规则约束、失信行为不能得到有效惩治、信用链条不能连接整个经济运行，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因此，我国产权保障制度的缺失直接影响了民营企业的财产意识和信用意识，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的链条无法得到正常的连接和运行。

### （三）民营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缺失

民营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简单，没有太多的管理层次，管理权利统一地集中在所有者手中，管理者与一般从业人员之间的距离较短，且多具有一定的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组织、指挥、协调、监督的过程较为迅速，费用支出较少。民营企业的内部管理职能没有进行专业分工，往往是所有者身兼多职，生产技术、市场营销、人事财务均需直接过问或亲自承担，因而对所有者的素质具有一定的要求。在所有者精力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也进行一定的职能分化，但相对于大企业的职能分工而言，中小企业的职能分工程度或许只能称为简单的分工。

由于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简单化，民营中小企业不像大公司那样有健全和规范的规章制度，管理的人格化现象比较突出，管理者尤其是企业的创业者的个人魅力往往就成为维系企业管理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民营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缺失，给民营企业发展带来的效应是经营风险的不断增大。

## 三、发展民营经济的制度变迁需求

企业的创新可分为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三类。对民营企业来说，这三类创新都是相当重要的，同时，这三类企业创新又是相互作用和有机联系的。它们的有机联系构成了企业生存发展的、完整的创新机制，而企业制度创新又可为企业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制度基础，形成相应的激励机制。因此，为提高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促进市场长期稳定和发展，降低民营企业的交易费用，就必须摈弃原先不合理的、交易成本较高的规则或制度，而切实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和国际惯例进行制度创新——变迁的体制改革。

### （一）产权制度变迁

经济有效率的前提就是产权明晰。产权明晰就是对所有权、使用权、自由转让权和不受干预的收益享受权等进行明晰。产权制度是经济制度的核心。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人们不同的行为，同样，不同的经济制度决定着人们不同的经济行为。而产权制度作为经济制度的核心则对个体和企业的经济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国苏南企业改制的成功，一方面印证了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观点：产权制度节约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表明，通过改制，明晰产权，会使企业、政府、社会乃至个人的效率都得到提高。因此，要使民营企业尽快从家族企业转变到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形态，笔者认为必须改变由原来按资本投入的单一要素分配产权的制度，变迁为按生产投入要素，如按资金、管理、技术、商标品牌，以及各种有形或无形资源等要素进行分配产权的制度。也就是说，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变迁，就要以建立产权激励机制为目的，实行按投入生产要素大小的方式，有差别地分配产权或持有本企业的股份进行制度变迁。

### （二）融资制度变迁

如前所述，信用缺失已经危及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强化我国的信用制度建设已刻不容缓。信用制度的变迁直接反映的是融资制度的变迁，而当前民营企业要求最迫切的就是对融资制度的创新或变迁需求。

制度经济学表明，如果一种机制为了达到某种社会目标被设计出来却无法自我实施，那么就需要附加一种额外的实施机制，这样才能改变博弈形式，从而改变后果函数。民营企业过去融资难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其难就难在由于信用制度的缺失而造成企业担保难问题。笔者认为，改变这种状况，一是政府要扶持设立一批专为民营企业融资担保的公司，以解决民营企业在向银行贷款时的担保难问题。二是要对民营企业的融资制度进行改革，由原来以间接融资——向银行贷款为主的制度变迁为直接融资——向资本市场融资为主的制度。此外，要为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打通渠道，政府有关部门除通过自身制度建设制止“寻租”行为之外，还需要解除政府隐性担保契约，促使“政策租金”消散等制度创新措施。而政府要解除这个隐性担保契约，就要改变依靠国有企业发展民族经济的战略意图，把国有经济和政府职能定位于弥补市场缺陷。这就要求通过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使其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在此基础上，政府逐步淡化对国有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进行保护的角色，不再通过各种“救市”政策向国有上市公司注资，切断国有上市公司将直接融资成本转嫁至国家信用的途径，使起因于政府隐性担保的“政策租金”逐步消散。同时，政府还需要通过调整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局面，使国有上市公司面临被“恶意收购”的可能性，迫使其将直接融资成本内部消化。这样，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就可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争取上市机会，有利于民营企业直接进入证券市场进行融资。

### (三) 企业组织制度的变迁

民营企业组织制度的选择，可以是多样的、灵活的。笔者认为，一是从企业的外部的组织形式来看，可以建立紧密的企业集团，也可以建立松散的以专业化协作为中心的合作生产制度。围绕着一种或多种产品，以大中型企业为中心，以众多的中小企业为卫星，建立中心卫星制度；也可以以营销企业为龙头，以制造企业为基础，建立生产经营一体化企业集团。在素有“中小企业王国”之称的意大利，中小企业形成了多种风格的以市场为基础、以分工协作为目的的联合模式，同时，许多中小企业为减少风险、直接增强自身实力，还对组建企业集团表现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在国内，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的民营中小企业的联合已经呈现出良好的态势，成为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有力武器。如温州柳市的300多家低压电器中小企业进行了紧密的联合，先后在全国320多个大中城市，230个县级行政区设立了统一的销售子公司、分公司和门市部，在18个国家、地区开设直销点、销售公司53个，形成一张庞大而灵敏的营销网络，避免了自相残杀，又为各企业产品的销售和企业形象的树立提供了保证，使得这个行业中的数百个中小企业都得到了有效的发展，并产生了今天的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和天正集团等我国工业电器行业的巨头。二是从企业内部的组织形式来看，对于大多数规模较小的企业，尤其是微型企业，完全可以采取简便有效的直线制，特别要求组织层次小，管理职能划分不必过于严格，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益；而对于规模稍大的企业，也可以采取直线职能制，但仍以短小精干为主要原则，在设置职能部门时，不能走国有中小企业的部门齐全的“小而全”之路。三是从组织治理制度看，民营中小企业不宜过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使是有限责任公司，也没有必要建立完善的三权分离的法人治理制度，相反，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的结合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科斯、阿尔奇、安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
- 韩志国：《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 张宗新等《中国证券市场制度风险的生成及化解》，《经济研究》2001年第10期。
- Rothschild•M and J. Stiglitz, 1976, Equilibrium in Competitive Insurance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0, 629– 649.
- Stiglitz•J., and Weiss, 1981,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 393– 410.
- 道格拉斯•C. 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 [美] 康芒斯著，丁树生译：《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
- W. 舒尔茨：《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责任编辑：黄振荣

# 新经济地理学的进展与评价<sup>\*</sup>

郭利平 沈玉芳

[摘要] 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地理学应被作为一个核心的分支学科回归到主流经济学中去，为此他们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严重挑战，它是以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作为假设前提，以数学建模为工具，研究区域产业聚集、经济增长和贸易活动的新学科。它的产生对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但严重依赖数学建模、区域过分抽象化、缺乏实证研究是它发展的不足，不利于经济地理学的新发展。

[关键词] 新经济地理学 产业聚集 区域 数学建模

[作者简介] 郭利平，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沈玉芳，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062。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日益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的今天，经济地理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由于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最近几年来，以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波特（Michael Porter）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地理学来，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和新观点，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sup>①</sup>对西方经济地理学提出新的挑战。本文旨就新经济地理学在内容、观点和研究方法上的新发展作简要概括与评价。

## 一、新经济地理学在研究内容上的新发展

新经济地理学最近的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另一个是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动态变化。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报酬递减与完全竞争是最基本的前提假设条件。然而，现实经济的增长动力很多来源于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这是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无法解决的。由此，经济学家再次提出了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前提，提出了经济增长新模型，这些假设和模型更加现实和复杂，对全球化下的经济现象解释得更好。

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核心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报酬递增、空间聚集和路径依赖。<sup>②</sup>首先是报酬递增。报酬递增是相对于报酬不变、报酬递减而言的。当经济学家把报酬递增和空间地理位置联系起来后，报酬递增就有了新含义。以往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模型是非空间的或是虚拟的空间。克鲁格曼在这方面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报酬递增本质上是一个区域和地方现象，报酬递增、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要比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和比较优势重要得多，这主要表现在贸易和专业化方面。支持报酬递增的市场、技术和其他外部性因素主要来源于区域和地方经济集聚。总之，新经济地理学的报酬递增是指经济上互相联系的产业和经济活动，因为在空间位置上的相互接近性而带来的成本的节约，或由于规模经济带来的产业成本节约。其次是空间聚集。空间聚集和报酬递增密切相关，两者是外延和内涵的关系。主要指产业或经济活动由于集聚所带来的成本节约而使产业或经济活动区域集中的现象。空间聚集是城市不断扩张和区域中心地形成的主要因素。区域一体化和大都市圈以及大都市带的发展是空间聚集的典型现象。新经济学家的大部分著作讨论的主要是产业如何在某些区域集中分布。如克鲁格曼的多中心城市结构空间自组织模型，他以对厂商之间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及其相互作用的分析为基础，试图阐明有规则的经济空间格局的内在机理。在传统城市体系研究中，经济地理学家只是假定有集聚经济的存在，但新经济地理学希望导出空间集聚的自我强化特性，以便阐明产业或经济活动集聚的本质机理。第三是路径依赖。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家认为在区域聚集和城市发展存在着“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路径依赖最初是由保罗·大卫于1985年提出，由布赖恩·

亚瑟克和克鲁格曼发展完善的。某个历史偶然性，将使某一区位在产业聚集方面获得一定的先发优势，这将形成某种经济活动的长期聚集过程。历史偶然因素所确定的模式一旦建立，这个最初的区域和城市模式将有可能通过在报酬递增基础上的聚集过程而进一步强化而变得“锁定 (locked-in)”。另一杰出新经济地理学家藤田 (Fujita) 对路径依赖有新的看法：在特定的活动发生的地方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和灵活性，一旦空间差异定性，它们就变得具有刚性。<sup>③</sup>路径依赖主要用来解释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活动。

区域增长收敛的动态变化是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又一主题。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对区域经济长期发展和收敛进行了重建。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是收益递减的，发展中国家具有较低的人均资本存量，却有较高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和资本报酬率，由此可预测发展中国家应该具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最终赶上发达国家。但现实的情况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有很大距离。报酬递增生产函数则表明区域收敛率很慢，存在着内生变量和内生效应，区域将有条件地收敛于不同的区域稳定状态，而没有一个统一的稳定状态，由此认为区域增长存在着收益递增。新经济地理学对这一课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有些从区域经济一体化解释，认为一体化经济对区域经济活动和财富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将取决于市场规模效应的相对大小、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及区域间劳动流动性的增强。如果区域一体化使得劳动流动性和金钱外部性增长，则区域经济活动将会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产生聚集，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差距将会拉大。另外一方面，如果劳动力不具有流动性，核心区的经济成本将会上升，这会导致空间经济的进一步分散。区域一体化将会导致劳动力和资本充分流动，产业和经济活动会有更大规模的聚集。

## 二、新经济地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进展

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数学模型方面上，尽管在实证方法有些研究，但并没有太大影响，没有取得太大的突破。

克鲁格曼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在模型策略、技巧和原则 上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他们利用模型来解释发展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在研究空间问题时沿袭了经济学的传统方法，大量采用了数学方法，将现实中的现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这些模型主要包括：核心—周边模型、国际专业化模型、全球和产业扩散模型以及区域专业化模型。<sup>④</sup>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核心—周边”模型最先见于克鲁格曼 (1991) 的研究。该模型展示外部条件原本相同的两个区域是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交互作用的情况下最终演变出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的。模型假设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和两个部门——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模型显示，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下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效应最强：一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价格指数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变得不可持续，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核心—周边结构。其次是国际专业化模型。维纳布斯 (1996) 凭借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系假设建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这一模型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实行高度的对外开放，不仅需要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而且需要各国在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第三是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全球性的产业扩散及其规律对于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来说一直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以上述国际专业化模型为基础，蒲格和维纳布斯 (1996) 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用 L 表示由技术所决定的效率水平，假设技术进步使所有基本要素稳定地递增，并用效率单位测度各基本要素，建立起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第四是区域专业化模型。为了进一步考察全球化对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影响，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 (1996) 从分析一些厂商与某类厂商存在比与其它厂商更强的买方和供方关系这一重要的投入—产出联系特征入手，建立起区域专业化模型。以上四个模型讨论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产业聚集、区域贸易和区域专业化展开的。这些模型主要通过改变方程中的关键参数的方式模拟不同区位的产出，克鲁格曼等人认为正是经济过程的数学建模的进步，导致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

新经济地理学在实证分析上也尝试有所作为，但由于数据信息的缺乏和现实的复杂性，实证分析的例子很少且不能让人满意。如阿瑟对硅谷的成因进行了有益的分析，克鲁格曼对美国中西部产业进行了分析，对美国与欧洲产业聚集进行了比较，对马萨诸塞州进行了考察。但这些案例分析和他们构筑的模型还不能形成良性互动，现实中的许多实例理论模型还无法解释，这些实例分析也不具有一般代表性和典型性。

### 三、对新经济地理学的评价

由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理论在解释现实经济发展时遇到极大困难，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国际贸易论还没有树立应有的权威，主流经济学本身的地位受到了包括制度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越来越多的挑战，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与经济学有密切联系的新经济地理学方向上来，希望在此领域有更多的收获。

1. 新经济地理学的创新。第一，克鲁格曼等人所倡导的新经济地理学丰富了经济地理学的内涵，特别是丰富了国际经济学研究中有关跨国企业的区位选址问题。他们提出的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有很大的前瞻性，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假设条件来研究区域经济问题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接近于现实。第二，从经济全球化视野下重新考察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把区域经济的发展不是仅仅纳入到国家体系，而是更大的全球化空间。在区域一体化、全球一体化共同发展的今天，很大程度上经济的竞争主体发生了转移，国家的竞争让位于区域之间的竞争。对产业和经济活动的聚集研究有一定的深度。第三，尽管新经济地理学的某些模型过于抽象，但这些模型的建立毕竟相对于传统的区位科学模型有了很大进步和改观，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尤其是克鲁格曼对有些不确定性的复杂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建立了多中心城市空间自组织模型还是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的。

2. 新经济地理学的不足。第一，严重依赖数学模型。新经济地理学再把经济地理学纳入主流经济学过程中应用最多的无疑是数学模型，这是主流经济学家最擅长的工具。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地理学在时代中迷失了方向主要是缺失数学模型所致，“最终，我们会借助巧妙的模型把空间问题纳入到经济学中来”，“问题是没有什么可以取代模型，我们一直都在借助简化的模型思考问题”。<sup>⑤</sup>他认为复兴经济地理学首要的是重建数学模型的权威。而这些建模思想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家并没有太大吸引力，因为 20 世纪 60 年代的计量革命对地理空间模型应用已相当成熟。第二，区域过分抽象化。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收敛感兴趣，首先是因为区域能为他们的模型提供更多的“控制”实验数据；其次是他们希望为区域的长期增长和发展提出新见解。尽管新经济学家知道区位、区域和场所常常代表某种经济景观中抽象的点或其他的形状，而文化、社会、制度、历史等重要因素却被排除在模型之外，很少或没有找出一个实际的区域规模，在这个区域规模上分析收敛问题，没有得出不同的空间规模是否具有不同的趋于收敛趋势的结论。第三，缺乏实证研究。新经济地理学注重的仅仅是抽象、简化的数学建模，这些建模和复杂的现实相去甚远。经济总体发展和产业空间聚集可以用数学建模来研究，但数学建模存在着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局限，现实中的某些因素是不可能用简化的数学符号代替的。克鲁格曼和其他新经济地理学家在他们的模型中使用了一些经验检验，但这些经验检验典型性较差，没有说服力。例如，新区域聚集模型被批评为几十年前就被威廉森等人检验过，在本质上与新古典方法相似的模型。<sup>⑥</sup>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个缺陷是忽视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他们强调的是资本外部性而不是技术和信息外部性。第四，缺乏网络对经济地理学影响的研究。这不仅表现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上，也表现在传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里。在克鲁格曼的论著中，很少见到网络对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网络经济的出现使许多生产无形产品和服务的产业的区位选择几乎不受运输成本和空间的限制，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相互作用在网络经济现实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而消费者偏好对其的影响却大大增强。

此外，除了理论上的不足外，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虽然在动态化、综合化、模型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就整个理论研究而言，还缺乏系统性。

•区域经济竞争力讨论•

# 当代国际资本投资的新区位观与区域性合作选择

金润圭 刘冬林

[摘要] 区位优势是吸引投资(尤其是国外投资)以及当地企业赢得相对竞争优势的一大重要地理因素。寻求区位优势的种种努力中,存在着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的竞争关系,进而有利益上的冲突。那么,区位优势的充分发挥与增强,对于单一的区域或城市来说,无疑将受到很大的局限。只有将区位优势摆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整体竞争力提高的宏观大背景中,这种优势才具有更大的持续性、潜力与前景。

[关键词] 区位优势 区域合作

[作者简介] 金润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冬林,浙江大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博士生,上海,200063。

## 一、当代国际资本投资的新区位观

区位优势随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相对于国际生产体系而言的区位优势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区位优势是指一个地区在地理上拥有的某些对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生产力布局)起积极作用的、相对其它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因素。主要存在于这么一些方面:生产要素投入和市场的地理分布、要素及运输成本、基础设施、政府干预能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差异程度、文化差异等。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吸引FDI以及影响跨国公司活动地点的因素分析中,特别强调以下方面:政策自由、迅速发展的技术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与信息)和新的管理与组织技术。其中摆在第一位的政策自由既涉及贸易自由、投资自由,也涵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等方面。与此同时,在2001、2002年这两年的世界投资报告中都突出了这样一个新的变化:产业集聚在决定跨国公司的投资地点选择中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长。在产业集聚上具有不同特色和比较优势的区域吸引着不同的国际投资。波特认为:产业集群一旦形成,集群内部的产业之间就形成互助关系。产业集群也帮助产业克服内在惯性与僵化、破解竞争过于沉寂的危机,进而将这些现象转为竞争升级。完整的产业集群也会放大或加速国内市场竞争时生产要素的创造力。当一群企业在彼此相牵连的关系中,目标一致地投资科技、信息、基础建设和人力资源时,必然会发生外溢效果。对于谋求增强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来说,产业集群本身就有鼓励专业化和投资的效果。因而存在着产业集群的区域,也就意味着有较强的吸引外部资源和投资的磁力。

决定区位优势的因素,既有传统意义上的硬件优势,如地理优势、资源优势、基础设施优势、交

\* 本文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基金项目(01JA790125)。

①④刘安国、杨开忠:《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与模型评介》,《经济学动态》2000年第4期。

②③张发余:《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及其评价》,《经济学动态》第11期,第72-76页。

⑤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4-94页。

⑥顾朝林、王恩儒、石爱华:《“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地理学报》第4期,第497-504页。

责任编辑: 黄振荣

交通运输条件等；更有现代意义上软件优势，如政策优势、市场潜力与市场机制优势、信息优势、技术水平与能力优势，以及法律、制度与文化优势等。此外，还须特别强调的是集硬件和软件于一体的产业集聚化优势。影响集聚规模的因素则包含这么些方面：资源条件，地区经济基础（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地区及地区核心城市的管理水平、组织能力、城市的承载能力、政策环境，居民素质与观念，地区的自然地理位置、知名度，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在上述种种因素当中，无论是资源的合理配置、要素的有效供给与高效流动、基础设施的有效共享、城市承载能力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城市与区域的知名度提高等等，这一切对于狭义上的某一区位而言，必然需要得到周边地区的支持，必然与周边环境和关系的改善分不开。尤其是产业集聚，它的功效体现与持续，不是单一的某一个行政区所能决定的，必须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因为它是区域性经济合作与协调的客观性产物。同时，产业集聚的变化，可以引起区位图形的变化，使区位优势的地理中心发生移动，区位优势的特点发生变化。

活跃的区域市场竞争会吸引来自外部市场的需求。当区域性的产业在区域市场乃至国内市场激烈竞争时，会吸引区域外和国际间的注意力。外部的客户必然将该区域的相关产品列为可以考虑的采购来源。毕竟，该区域中厂商的厮杀竞争将会减低外部客户采购时选择不足的风险。从远处来说，跨国公司在寻求资源当地化的动机中主要考虑的因素是成本和质量，信誉和当地供应商和国外供应商相比具有的适应性。造成一个区域的竞争优势衰退，最常见也最致命的原因就是该区域的市场竞争消失，因为它会造成企业自我改善和自我调整能力的大幅度衰退。

## 二、提升区位优势的区域性合作选择

区位优势是吸引投资，尤其是国外投资，以及当地企业赢得相对竞争优势的一大重要地理因素。纯粹的地理优势只有与相应的社会努力与文化整合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寻求区位优势的种种努力中，存在着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的竞争关系，进而有利益上的冲突。但是，如果任由这种竞争关系变成相互排斥、相互封锁、相互制肘，而不是竞争中的合作，那么，区位优势的充分发挥与增强，对于单一的区域或城市来说，无疑将受到很大的局限。为此，需区位优势摆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整体竞争力提高的宏观大背景中。

1. 建立有效的资源共享体系，在实现资源互补与信息共享的同时，充分突出地区性资源综合性优势。为此，需要加快区域性要素市场的建设，完善区域性的生产要素流动机制。由于人力资源在形成区域综合优势中有独特的作用，因此必须注重的一点是：在完善区域内各城市间互补的人才流通体系和人才市场的基础上，对人才的吸引、培养、激励和使用制定统一政策，合理规范人才的流动，并通过改善科研的政策环境、服务设施等，充分挖掘和利用区域内资源优势和特色优势。在此同时，一方面，要积极促进统一大市场体系的形成、完善和发展，以市场原则实行跨地区的产业组织的重组，打破城乡分割、地区封锁格局，尽可能减少市场运作中的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成立省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协调处理省际之间的技术合作与贸易上的争执，促进区域外城乡之间商品、资金、劳动力、技术和信息的相互交流，实现生产力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功能互补。另一方面，加强投资与政策方面的协调，政府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决策时，应当从整个区域乃至全国角度进行战略性规划。在制定本行政区内的经济政策时，致力于降低通信和交通的成本，减少税费壁垒，提高区域内的竞争程度，推动当地产业的创新，使区域环境有利于磨练出对外界市场更强渗透力的企业和产业。另外，还须针对区域特点和区位特征，选择高科技领域，培育地方性创新优势，建立区域性自主创新体系。

2. 在实现合理分工与投资协调的基础上，提倡错位竞争，推动产业集聚的区域性合作水平提高。在合理分工与投资协调中，需要十分关注的是竞争的形式，因为这是互利合作的前提。为此，有必要大力倡导错位竞争。所谓错位竞争，也即竞争主体基于专业化分工中的相对优势和各自特色而进行的竞争形式，它与趋同式的竞争是相对立的。错位竞争意味着能有效地避免盲目重复以及不经济的相互比拚；也意味着竞争是建立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整体提高的基础之上。错位竞争既是合理分工的

体现，也是专业化特色有效实现的要求，同时对产业集聚起着有利的导向作用。在此基础上，以产业集聚为契机，充分利用几种产业组成产业集群时所形成的促动效应，利用因此而形成的共同的供应、技术和环境条件，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政府、教育机构、企业和个人对生产要素和产业的投资动力，进一步增进相应的投资。同时，利用专业化环境建设的扩大与集聚中形成的扩散效应，进一步推动供应增加与生产要素的质量提升，并在产业集群的专业化基础建设逐渐完备基础上，孕育全新的、有区域特色、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产业。并充分利用产业集群出现后的磁性效应，使国家与地区性的经济资源自动远离单打独斗的产业，转向产业集群集中。与此同时，充分发挥产业集群内顺畅的互动机制，信息的流通更顺畅，缓和经济利益的冲突，替垂直或水平连结的公司创造合作与信任的空间。

3. 增强区域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与区域经济特色的合作。有必要探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的有效合作模式，研究区域经济特色，培植可行性合作方式。要重视推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高度优化的互动，促进跨地区的产业融合，培育区域性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形成合理布局、协作关系紧密的生产体系。要以国际国内市场为导向，协同和整合产业优势，培育若干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群落，以及合理分工和梯度互补的产业体系。为此，地方政府应该停止“积极地通过增量投资调整区域竞争性产业结构”的努力，各地（城市）不宜强调在自身行政区域内培育和形成所谓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避免重复建设和产业同构现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同时应在区域性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定位中寻找自己的合适位置，因地制宜地配合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各地要着力于发展特色产品，提高某些重要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各地列出的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项目计划，既要符合产业政策，又要进行城市间的合理分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

#### 参考文献：

- 金润圭：《国际企业经营与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
- 钟昌标：《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与国际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
- 陆大道、薛风施：《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商务印书馆，1997年。
- 孙久文：《中国区域实证研究》，中国轻工出版社，1999年。

# 海岸带区域层次的划分与区域核心竞争力分析

容景春 韩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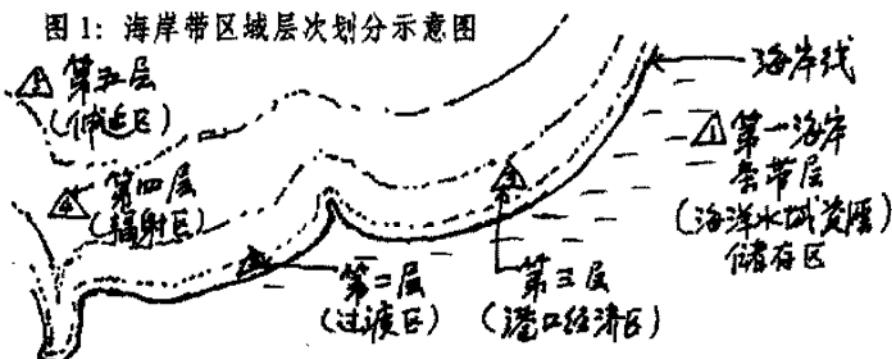
[摘要] 本文以沿海地区空间为透视线点,提出海岸带区域的经济概念,并就海岸带区域空间的划分,区域核心竞争力的提出等方面进行研究。最终抓住海岸带区域内海洋产业化升级为主要矛盾的解决作为区域经济竞争力持续发展的最好途径。

[关键词] 海岸带区域 核心竞争力 海洋产业化

[作者简介] 容景春,湛江海洋大学副教授,广东 湛江,524025;  
韩卿元,延安大学学生处长,陕西 延安,716000。

## 一、海岸带区域的层次划分

海岸带,指由海岸线向陆、海两侧扩展一定宽度的带形区域,即海洋与陆地的交接地带。这一宽度的多少随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进步的不同而不同。我国在全国海岸带和海洋资源综合调查中规定,海岸带调查的宽度为海岸线向陆侧延伸10千米,向海侧延长10—15米水深线。关于海岸带的划分,美国学者约翰R·克拉克的海岸带范围认为是一个平行于海岸的水、陆线状带。用第一维眼光看,是一个走廊;用第二维眼光看(从向岸到离岸的宽度)的朝向是一条模糊的直线。海岸带的界限没有任何标准的描述。限定海岸带所采用的实际边界,根据管理的特殊功能而有所不同。人们所希望的是,海岸带应包括受海洋影响的所有陆地(干地)和受陆地影响的所有沿海水域(湿地)。然而,这样的定义可以包括所有的沿海平原和所有入海河川流域,这可能向内陆腹地延伸数百公里。今天,我们从研究经济发展动力的角度出发,从发展的不同管理理念和对策可以规定海岸带不同的纵深地区,由此而预见不同的海岸带管理类型和划定多个管理层或管理条带。从区域经济的开发、利用、管理的功能需要出发,我们这里把海岸带系统地划分为五个条带层。以海岸线近岸水体为第一海岸条带层;海岸线向陆侧延伸的过渡区(漫滩、潮漫滩)为第二海岸条带层;海岸线向陆侧延伸10千米为第三海岸条带层;向陆侧延伸100千米为第四海岸条带层;再向陆侧延伸的经济腹地为第五海岸条带层,如图1。



从海岸带条带层与人们经济生活关系的功能划分，我们假定第一层海岸带的近岸水体为海岸带海洋水域资源储存区，第二层海岸带的海陆过渡区（漫滩）为海岸带海陆生态圈资源过渡区，第三层海岸带为港口经济聚集区，第四层为海岸带城镇工业群辐射区，第五层为海岸带海洋经济伸延区。在第一区域中，富集了海洋水中生物的渔业资源、能源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矿石资源；同时也承载着陆地人们生活生产对海洋自然资源的超负荷利用和对自然资源生态系统的污染和破坏。在第二区域中，富集了河口入川带来的淡水和丰富的微生物源，产生了特有的生物资源的生态环境，同时也直接承受人们对海洋的污染的冲击，所以这一区域有海岸的保护生态圈的红树林区、潮漫滩生物资源区，它对浅海生态系统和陆岸生态系统是一种相互作用和生态置换。同时也是海盐业生产的区域空间。在第三区域，富集了港口、矿产资源，是经济、生态、社会物质资料流动的平台，是产生聚集效应的区域地带，经济核心竞争力高度聚集这一地带。广东沿海有大的港口 70 多个，从东至西沿海区域中心港口有汕头、汕尾、广州、江门、中山、新会、太平、深圳、珠海、湛江、水东、阳江、海安，还有大小渔港 133 个，整个区域就渔港区人口就超过 1000 万。在我国，居住沿海人口占整个人口的 40% 以上。第四区域中，富集了沿海工业群，海岸线工业镇经济突显，是海岸带经济区的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平台地带，承载了广东人口的 50% 以上。人口密度很大，经济总量很高，物资流量很大。是广东经济增长和经济贡献最大的区域，也是承载广东经济持续增长压力最大的区域地带。第五区域，是海岸带产业的经济腹地。海洋与内陆的经济往来和海岸带区域经济向内陆扩张消化依靠这一区域。这一经济腹地是海岸带核心经济区规模效益和比较利益传递、渗透、回流和扩散效应得以实现的最直接的区域，是海岸带第一、二、三、四区域经济利益的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区域。根据海岸带区域功能的划分，可以这样认为，增强海岸带 10 千米的港口经济区域的竞争力，它解决的是广东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区域的经济动力，是区域经济中的增长极。增强海岸带 100 千米的海岸带工业镇经济和产业群的核心竞争力，就解决了广东经济翻两番的点轴区域增长带。两者是解决广东率先实现现代化在经济上的数量增长和质量上的提升问题。它也是今天我们要论述的最核心经济发展的区域问题。

## 二、海岸带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问题的提出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中国加入 WTO，我国各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将在 WTO 协定的框架下加快，区际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由此将进一步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城市和空间结构上体现，各种生产要素将逐步向优势地区集中，区域竞争更加激烈，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地位突显出来。

在我国沿海地区，海岸带区域投资环境和产业配套条件的优越，沿海工业镇企业聚集效应造就企业较强的核心竞争力，为资金投资产生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因而资本追逐利润和人才要求实现最大价值化的趋势必然在这一区域强化。增强区域竞争力，吸引更多资金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流入，就成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决策的头等大事。同时，由于加入 WTO，国内市场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市场竞争的国际化将促使产业组织变革和产业布局由分散走向集中，生产要素流向优势地区和优势产业聚集更加迅速。但是，区域的优势竞争也同步激烈，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在区域间的变化也更加频繁。如中国经济版图上的“珠三角”，吸引了中国大量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长三角”，因为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凭借的科技力量更雄厚，开放的优惠政策更超前，思想观念更活跃，观察世界的眼光更深远，长江沿岸的经济腹地更广阔，因而也更具竞争力。还有“环渤海”海岸带、厦门“金三角”海岸带，甚至“环北部湾”沿海都市群等竞争区域。沿海区域经济优势动态的变化已经是当前经济的现实。如果把这些“经济圈”或“经济块”、“经济角”看作为每个省区的中心城镇的块状区域，那么沿海省市区的海岸带就是各地区条状区域，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聚集着产业要素，在优化升级中展开激烈的竞争。失去优势区域的危机随时存在。各地区为了抢占市场和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将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步伐，发展壮大优势产业，增强区域优势。这种区域优势既取决于区域资源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大小，也取决于以产业竞争力为核心形成的竞争

优势的强弱。宏观层次的区域比较优势仅仅是区域优势产业发展的必要和前提条件，而微观层次的产业带和企业群竞争优势则决定区域优势产业发展的充分条件。

产业的空间分布合理和逐步升级是区域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动因。它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优势定位问题。这种区域经济优势定位总是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联接的，我们只有在今天的市场开放的竞争态势中审视区域经济所处的国内、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和可能发生的变化，才能正确认识自身的劣势和及时增强区域自身的经济优势。这种区域经济优势主要指区域内的产业优势，其标志是这种优势产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的市场占有竞争力。

### 三、海洋产业化升级与提高区域竞争力

海岸带区域产业优化升级，其“优化”强调的是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其“升级”强调的是培育新的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而且这种优化和升级是结合和利用好本地区的要素条件和优势条件进行的产业升级，聚集人流、商流、物流、资本流等资源要素形成规模化生产，从生产的批量化和连续性形成区域经济的效益，并把这种聚集的手段达到区域经济的扩散。聚集和扩散的目的都是取得区域经济利益，取得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实现，最后形成市场经济的发达和成熟。只有这样，才能说海岸带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增强。

1. 升级的基础。就广东而言，广东有非常优越的海洋资源条件，大陆海岸线长达 3368 公里，约占全国的  $1/5$ ，大小港口 510 个，海岛 1431 个，岛岸线长达 2400 多公里，约占全国岛岸线的  $1/6$ 。由广东省管辖的海域面积共 45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面积的 2.5 倍多。在广东的珠江口盆地，估计的石油资源储量达 50 亿吨以上。而且海滨砂矿富集，盐业开发潜力很大。还有海洋潮汐能、潮流能等资源。在区位环境方面，西有环北部湾经济区，东有台湾岛、厦门经济区金三角，南临南海，是内陆出口香港、东南亚、太平洋地区的主要通道。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海洋产业年均增长率在 20% 以上，大体上每年翻两倍，海洋产业新增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以上，其贡献率是很高的。在广东经济的持续发展中，海洋经济的贡献远远高于其它产业，1997 年全省海洋产业总产值达 926 亿元，比 1990 年的 145 亿元年均增长近 30%，到 2002 年全省海洋产业总产值达 1950 亿元，占全国的  $1/3$ ，居全国首位，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 6.1%。海洋产业的发展，为广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带、调整产业结构、产业化升级创造了条件。

2. 第一区域层的竞争力重在加快海洋渔业产业的升级。海洋渔业产业指海洋产业中的第一产业，主要指海洋捕捞业和海水养殖业。海洋捕捞必须建立在海洋自然生物资源量基础上进行生产的第一类产业。海水养殖业建立在海洋水域空间的利用上，他对部分海洋生物在自然增长和人为增长过程结合而进行的第一类产业。广东的渔业产值是全国渔业总产值的  $1/8$ 。广东海洋渔业总量占海洋经济总量的 25%。渔业产业在海洋产业发展中占有主体地位，是 21 世纪发展海洋产业的主导产业之一。

3. 第三区域层的竞争力重在海洋水产品加工产业化的升级。海洋水产品加工业是建立在海洋捕捞和海水增养殖业产品基础上的水产品价值增值和使用价值便利化多样化的第二产业。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食品工业发展的趋势表明，近 10 年以来，食品工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国家中，食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目前，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是农业产值的 3 倍以上。而我国还不到其 70% 左右。发达国家农产品产后加工能力达 70%，加工品在膳食中的比例也在 70% 以上，而我国农产品产后加工能力只有 20% - 30%，加工品在膳食中的比例不足 30%，在我国沿海地区海洋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到 2010 年占 10%。但从产业结构看，我国海洋产业一、二、三产业结构为 50.5: 23.5: 26。沿海地区是 44.3: 28.5: 27.1，广东是 2.2: 3.5: 4.2。正因为加工转化程度低，综合利用比较落后，也造成了农副产品资源的极大浪费和产业竞争力的低下。把广东的水产品加工业进行产业升级，带动机械制造、包装、运输和餐饮等多个行业，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实现农产品、水产品多层次、多环节的转化增值，带动海洋其它产业的发展，增加劳动就业机会，繁荣城市市场，拉动内需，带动小城镇建设，扩大外贸出口，增强海岸带竞争力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

4. 海岸带区域中加快海洋油气化工产业的产业化升级。海洋油气化工产业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高新技术应用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海洋第二产业。我国具有较好的海洋油气资源，有远景的海洋沉积盆地60.5平方公里，占世界海洋沉积盆地的2.3%。近海石油可采储量4—16亿吨左右。我国管辖海域油气资源约占全国油气资源量的25%，目前海上石油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10%。我国海洋油气产业的产值一直属于海洋产业产值的首位，已经纳入战略性资源产业的行列。由于整个亚太地区都属于石油入超地区，天然气生产消费需求大，将促进中国迅速发展石油天然气产业。

5. 海岸带区域中加快海洋交通运输产业的产业化升级。从世界各国国际化城市发展过程看，以贸易的国际化为先导，引发城市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是带动整个经济走向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广东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增强沿海经济竞争力，建成世界上的经济特区，不管是贸易为主型、工贸结合型、综合型和科技型，都需要发达的交通海运事业。在今天增进海岸带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建设中，广东必须以能源、外贸运输为重点，加速以港口为枢纽，水运交通通道为支架的港群建设和航运建设，调整船舶结构，发展与国民经济和现代海洋开发相适应的海上交通运输体系，加快海洋交通运输业的产业化升级，打造广东的现代化建设最好的物流平台和网络。

6. 在海岸带区域中滨海旅游业的产业升级。旅游业正在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和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中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滨海旅游业的自然资源潜力更大，而且自身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和第四大旅游出境国。在加大供需双向互动作用下，滨海旅游业无疑将成为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支撑产业。就广东而言具有丰富滨海旅游资源的，一是丰富的滨海旅游物质基础，如有宜人的气候资源，有海岛、海洋生物、海水、沙滩、阳光。二是有海洋旅游资源的文化沉淀，如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相关文化，古建筑群及文物古迹。三是有优越的市场时空结构，如港澳台的客源、东南亚国家、日本和广东华侨之乡客源的优势等。

# 简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竞争力的三个支撑点

谢玉红

[摘要] 培育有竞争力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培育有现实经济基础的竞争力，而不是虚化的竞争力。在产业选择上，应在最有优势的某一产业或某一产品上培育其竞争力既采取集中化战略，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大农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上，要处理好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上，应把人力资本的投资作为战略来考虑。

[关键词]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竞争力 产业选择 农业产业化 人力资本

[作者简介] 谢玉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管理学系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660。

随着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和买方市场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市场进入的门槛提高了，一个地区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没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力，要想占有市场一席之地是根本不可能的。

## 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市场竞争劣势

地区经济竞争力，指企业的盈利能力或占领市场能力。总体而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条件差，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高，处于竞争弱势，产品基本上无竞争力可言。

首先是地区经济产出能力和盈利能力弱。例如工业，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投资遗留的国有资产，企业不但技术层次低，设备落后陈旧，无论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还是产品品种、结构都适应不了市场需求，而且都是规模非常小的企业。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转轨这20多年间，自治县也投资了一些工业项目，能够进入一部分领域，但也只能是大部分经营者已经进入而变得特别拥挤，竞争变得格外激烈的资金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低端产品市场，而且基本上是政府行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从国有企业的退出，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将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竞争优势而处于萎缩状态。

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有着许多富有特色的潜在优质农、林、牧、副、渔产品，但是生产规模小，产业化经营水平较低，这种零星分散的小生产无法和多样化的大市场需求相适应，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特色优势。如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有潜在优势，但是与发展旅游业关联性较强的其他配套产业的落后可能会影响旅游业的良好发展。例如饮食业，城市顾客到山区旅游，在吃的方面对农、牧、副、渔产品，比较讲究口味的传统纯正、鲜美、地道。当有一定数量的旅游者连续不断地进入旅游时，当地的某些产品不一定能够做到有效适时的供应，服务质量就大打折扣，这就会因配套产业不够成熟而对旅游业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从经济主体进入市场交易的费用来看，因进入市场交易的费用太高而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主体通过市场交易很不经济。任何一个经济主体，都会遇到来自市场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构成了经济主体经营成本的一部分。相比其他地区的经济主体，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主体在生产经营中所发生的交易费用更高。这种更高的交易费用主要来源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远距离运输的高成本与小规模生产之间的不对称性以及对远距离的大市场信息掌握的不完全性。产品要大量生产的先决条件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没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大规模的生产就毫无效益可言，这个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主体来说也是无法达到的。这种弱小的市场地位使他们成为价格接受者，在与外部市场交易中必然会牺牲一部分利益。因此，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价格低廉优势很容易被过高的

市场交易费用所抵消，从而使经济主体进入市场交易很不经济，因而干脆放弃进入市场交易。结果可能是农民自己吃多少就种植多少。这样，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产品供给就不是市场导向，在农产品结构上，生存性农产品多，优质性农产品和奢侈品农产品少。这是少数民族地区虽有优质农产品的潜力却打不出好品牌的原因所在。

## 二、培育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市场竞争力的三个支撑点

培育有竞争力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主要应抓好三个支撑点：

1. 在产业的选择上，应在最有优势的某一产业或某一产品上培育其竞争力。即采取集中化战略，提高产出水平，实现规模经济。有人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竞争劣势归之于农业占的比重高以及产业结构单一化，言下之意是要发展种类齐全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可能在所有的产业或者产品上有竞争优势，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一种产业或产品有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的今天，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突破建立本国、本地区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框框，而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参照系，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建立起国际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专业化经济结构，这个国家或者地区就能快速发展。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讲何尝不是这样。

当今培育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竞争优势和竞争力，不可能建立和发展在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上，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目前尚不具备发展高新技术的现实的经济基础（技术条件和专业协作户）。即使是要建立与其他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相配套的服务产业也难以达到协作户所要求的技术标准。

少数民族地区能否通过大量吸引如珠江三角洲等比较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换代中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培植其经济竞争优势呢？一个地区能否吸引发达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转移的产业，一要看该地区的投资环境，有无完善的配套功能；二是看该地区的成本优势；三是看其经济基础（可供其合作的对象）；四是还有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约束。少数民族地区除了劳动力成本低廉以外，其余的条件目前都还不太具备，特别是发展一定的产业时缺乏所需的上、下关联性较强的产业之间的协作和服务。例如纺织业、制鞋业等这类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成本方面的优势，但是，原料来源、销售等两头都还是在原来的母厂地来提供，依靠其原有的销售渠道。劳动力费用低廉的优势就会被远距离的各种费用所抵消。另方面，少数民族地区本身基本无市场潜力。随着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通信的改善，缩短了该地区与大中城市的距离，原有的市场潜力也将有可能失去。可见，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承接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经营环境还不具备，少数民族地区充当发达地区的后厂所带来的利润远不如发达地区所带来的利润高。从而使原产业转移者觉得在少数民族地区投资很不经济。

把“山区”牌重新打响的优势产业只能是大农业。即农、林、牧、副中的农副产品、竹产品、木材产品、各类山果、药材产品和畜牧产品。发展这些产业，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进可攻，退可守。也就是说，如果农业在市场竞争中，确实能够为该地区带来经济的和社会的效益，就可以从整个地区出发，向该产业的上、下游延伸产业链，进行纵向一体化生产经营，可以保持经营业务在技术上的统一性，同时又能将风险分散到大农业的多种产品经营中。如果做不到，则集中抓一类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创出名牌，创出效益。其他产业只能维持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也未尝不可。第一，对传统的竹、木、药材等的生产经营，要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才能大批量供应市场。即使不能在当地形成该类产品的专业性市场，也可成为其他地区市场的稳定的供应产地和供应商，能形成这样局面，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讲，其竞争优势就得到显现了。第二，对传统的农副产品，应注意充分抓特色抓质量、创牌子。有些农副产品受产地的自然条件影响比较大，在品质方面具有其他产区的产品所不具备的独特风格和特色。例如，粤北连山冬菇的浓香；纯度较高的冬蜜糖的药用价值；连南笋干的甘香、爽脆；地瓜的甜香等等。农副产品的这些内在特性都是创牌的重要基础。在产品被异地市场所认知后，则要注重品牌的质量。农产品的生产也和工业品生产一样已变成买方市场，大路货的农产品卖不动的现象比较突出。在创牌的过程中，为了提供符合安全性标准的优质农产品，应抓企业式规范化的质量管理，力争取得各个标准认证，好处是别的厂商看到有这一认证的产品就可以放心地签订合同。还要避免地

区内同业相煎，通过并购、合并可以把规模做大，提高同一类产品的竞争力。第三，调整农产品结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观念的变化，消费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人们崇尚绿色产品和有营养的健康食品，这为山区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有些产品在当地市场还是空白，尝试发展这些新的品种，试探本地市场需求也未尝不可。

2.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上，处理好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经济主体是指从事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各类企业组织、家庭户、个人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政府。任何的经济活动，最终都要通过从事供、产、销活动的各类经济主体作为载体来实现。从事农产品加工、销售的各类企业组织，包括农产品加工企业、贸易公司、批发商、中间商、超级市场等等。他们经营的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由于其经营需要一定规模才能有利可图，而且由于本地市场容量有限，必然使其经营要扩展到外地市场甚至大中城市。所以，从理论上说，各类企业组织是带动千家万户农产走向市场，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分散的小生产与社会化需求矛盾的一条渠道。所以全国各地在发展农业经济时，都非常推崇“公司+农户”或“公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等经营模式。

从市场地位来讲龙头企业还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因为，当前的市场是买方市场，竞争激烈，农产品价值的实现，还要靠公司的带动。龙头企业通过收购各户的农产品，使该地的农产品有一定的集中性，才能对市场形成大规模的适时的供应。也只有龙头企业才可以承受进入市场所需的成本负担。

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容量有限（小生产造成的有限供应和狭窄的销售市场空间），各个环节的各类经济主体要有利可图，必须通过不同形式（合股经营、合伙经营、合作经营、契约经营或买断经营等等）的合作来结成利益共同体，方能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基地化、规模化和专业化，从而促进农业作为优势产业的建立。因此，除非自然垄断性行业、基础行业政府可以介入投资经营外，任何行业都应当鼓励本地的和外地的民间投资，并且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给予他们享受国民待遇，“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对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培育竞争力有很大意义。

### 3. 在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上，应从战略上抓住人力资本的投资。

提升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竞争力也需要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无论从个人的发展、就业，还是从整个地区竞争力的提升的来讲，人力资本的投资都应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又一个战略来考虑。由于粤北少数民族地区还是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 2000 元，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现在也认识到，孩子读书是将来出来打工找到工作的关键。但是，困难家庭要完全承担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解决这类问题，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对学习比较好的困难农户家庭的孩子实行补助，使他们得以接受和完成一定程度的正规教育，对能够考上大学的孩子免学费和给予生活费补助，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措施。目前的问题是面还不够广，还有许多亚贫困的农户家庭的孩子读书受到经济条件方面的压力。因此，资助少数民族地区孩子读书的面应当再广一些。扶贫资金与其用于那些无效的工业生产项目的投资上，还不如用于资助困难、亚困难的农户家庭孩子的读书费用的补助上。使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发展以及群众的脱贫致富产生普遍和长远的意义。

本栏责任编辑：雷比璐 黄振荣

•历史学•

# 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模式与演进轨迹

江林昌

[摘要]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也有两河文明，但与西亚的两河文明有明显不同。西亚两河文明是同一模式的文明，所谓“文化一体化”。而中国的两河文明则具有鲜明不同的特征：黄河文明是连续不断的文明，长江文明是断而再续的文明。本文还指出，在不同的文化圈内，其文明要素也显示出不同的特征。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古文明多源并起、相互促进的态势。

[关键词] 文明起源 黄河文明 长江文明 文化圈

[作者简介] 江林昌，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教授，山东 烟台，264005。

过去，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五帝与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的文明起源模式与演进轨迹，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如张光直先生的《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1987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1986年)<sup>①</sup>、《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1986年)<sup>②</sup>等。随着中原以外有关五帝与夏商周时期考古材料的不断涌现，学者们开始考虑黄河文明与其他地区文明的比较。如，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了童恩正先生的《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一文；1994年，王震中先生出版《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其中第十章《文明的道路与区域特征》专门讨论了“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几个特点”；李伯谦先生于1995年《华夏考古》第4期和1997年《考古与文物》第4期先后发表了论文《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及《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1999年，苏秉琦先生总结他几十年的考古体会，于三联书店出版了《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内中提出了文明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文明起源模式的“三类型”说。这些研究，虽然还都处于初创摸索阶段，但已为我们的深入讨论开启了许多有益的思路。

## 一、黄河文明是连续不断的文明，长江文明是断而再续的文明

放在世界文明史的大背景下来看，中国的两河文明与西亚的两河文明有许多具体不同。就地理角度看，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彼此相距不远，上游稍稍远隔；中游已开始接近，最近处恐不足百里；其下游更近，今天已合流为一。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的基本相同，使得那里的文化体现出了许多共同性。早在公元前2320年，那里已出现了统一文明古国（阿卡德—苏美尔），形成了“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西亚两河文明的最大特征是她的“文化一体化”。

而中国的黄河与长江要比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长大得多，两河相距近者数百里，远者越千里。两河的地貌、气候、人文环境均大异其趣。因此，黄河与长江所孕育的文明必然会具有鲜明的不同特征。

就纵向的角度看，黄河文明的演进轨迹是连续的。这主要以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区为代表。它以晋南、豫西、陕东为中心，以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四省为范围。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早期有老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到新石器晚期融合为仰韶文化，再后来又发展为中原龙山文化。仰韶文化晚期与中原龙山文化，与历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及其活动范围基本一致。紧接五帝之后便是夏商周三代的前后延续。而夏商周三族文化又都源于中原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包含有许多地方类型。“在河南西部的一支以王湾三期为代表，其后发展为早期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即是夏代

夏族的文化，果真如此，王湾三期就当是夏文化的直接前身了。位于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的一支以后岗二期为代表，人们认为它可能是商文化的前身。而渭河流域的一支以客省庄二期为代表，它同后来的周文化虽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至少应是它的一个重要源头。”<sup>③</sup>

从历史学角度看，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由五帝酋邦时代的文明起源到夏朝第一个文明方国的建立，到商周文明的繁荣发展，前后是紧密相连的。从考古学角度看，由仰韶文化而龙山文化而夏商周三族文化都存在着前后承继关系。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追溯文明起源时便会发现，从五帝到夏商周，有关城市、礼仪中心、青铜器、文字等文明要素，都经历了由初始到壮大、由简单到丰富的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才出现了此后的秦汉统一帝国，乃至于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以中原文明为主体的是连续发展的文明，悠悠五千年奔流不息，从未间断，为世界古文明所罕见。这是中国古文明的主流。

但长江流域的文明演进轨迹并非如此。如长江中游，在新石器时代，由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形成了一个前后相承的文化序列。其中石家河文化，已处于文明起源阶段，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城堡、制作精美的玉礼器和随葬品丰富的大墓等文明因素。其发达的程度可以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媲美。按照常规的发展趋势，石家河古城文明之后，相当于中原的夏王朝时期，这里也应该出现源于石家河文明并高于石家河文明的独立文明古国。然而，由于夏商文化的南下，打乱了这里的发展序列，使该地区最终失去了独立进入文明古国的机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家河文明起源不久，在进入夏商时代，却断绝了。在长江中游代之而起的是夏商文明。夏商文明与石家河文明是属于不同渊源的异类文明，彼此之间不能衔接。对此，李伯谦先生曾作过具体分析。他说：“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文化二期夏文化已进入江汉平原，然后不断向周围扩展，并逐步取代了石家河文化。不过，当夏文化还没有在这里站稳脚跟之时，夏王朝便被新兴的商王朝代替了。早商时期，商王朝向南推进的势头比夏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长江沿线的许多地方如湖北的黄陂、江陵、湖南的澧县、石门等地都发现了早商文化遗存。”“这些发现无可辩驳的说明，原来石家河文化分布的一大片地域此时已纳入了商王朝的版图，成为商王国的一部分。因此，长江中游一带文明的出现不是当地石家河文化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商文明向这里传播的结果。”<sup>④</sup>

在长江下游，继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年代与中原龙山文化大致相当。良渚文化因其大型礼仪性建筑、高规格的大墓、精美的玉礼器和陶器、玉器上的多个相连的文字符号等因素的出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文明已处于一个相当辉煌的阶段。因此，按照一般的发展趋势，良渚文化之后，相当于中原的夏代，这里也应该出现更高程度的文明方国。

然而至今还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开始，即相当于中原夏王朝初始，良渚文明突然在她的家乡消失了。“土筑金字塔”式的大型礼仪性建筑不见了，成套的玉质礼器及其“饕餮纹”悄然绝迹，扁薄穿孔石斧也明显减少，成组的刻划文字也少见了。这种衰落现象持续了三四百年，其时中原正处于夏文明的兴起与繁荣。大约到了商代，在良渚文化区域内，才开始出现越文化的前身马桥文化和吴文化的前身湖熟文化。虽然，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中都出现了青铜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两种文化的文明程度高于良渚文明。正因为如此，《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马桥文化的子孙越国人“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商代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来到湖熟文化的后裔吴地时，仍要“文身断发，示不可用”。由此可见，长江下游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明，到了夏商周时期便开始衰落了。

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明的情形也是如此。据 2000 年初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的再次发掘，发现三星堆古城内城墙残长 400 至 500 米，高度为 5. 6 米，上端宽 10 多米，墙基宽约 40 米。专家们估计这一中心城区有 3. 5 平方公里大小，与郑州商城的规模接近，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居民估计在 3 至 5 万人左右。自从三星堆古城兴建之后，成都平原上原先散布的多座宝墩村文化古城

便销声匿迹。因此，专家们认为三星堆古城的兴起过程反映的是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从古城众多的酋邦时代转变为单一都城的国家时代的历史轨迹。

然而，到了商周交替之际，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正当其发展的高峰时，突然从成都平原消失了，三星堆古城被废弃了，许多精美的用于宗教活动并象征主权的青铜器、玉器等被毁坏或掩埋。俞伟超教授曾就学术界对三星堆“祭祀坑”的命名表示异议，他说坑中所埋的器物是祭神祭祖先的，但不可能每次祭祀之后都要埋葬这么一大批器物，当时还不可能有如此的财力和物力。他进而推测当时古蜀王国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故，三星堆古城被迫废弃，而王朝中不便携带的各种神器宝物只得埋葬起来，以便将来再回来取。因此，俞教授认为，与其称“祭祀坑”不如称“埋葬坑”更合适。至于遇到了什么变故，是什么原因使其突然在成都平原消失，至今还是一个谜。我们今天所确知的一个事实是，三星堆文明发展到商周之际，没有延续下来，而是突然中断了。

综上可知，长江流域的古文明，无论是在其文明起源阶段的良渚文明、石家河文明，还是在其文明发展阶段的三星堆文明，都没有很好地延续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世界上有许多古文明之谜，如印度古文明与玛雅古文明的消失，以及埃及金字塔与古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出现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古文明之谜与长江流域古文明一样，均处于北纬30度左右。这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暗示着世界古文明发展史上的某些共性？这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需要讨论的世界性课题。虽然在长江中游，继石家河文明以后，有盘龙城商城文明；长江下游继良渚文明之后，有江西清江吴城商城文明。但盘龙城商城实际是商文明南下的结果，是商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石家河文明没有联系。清江吴城商城是在商文化强烈影响下而发展起来的赣江流域一支土著青铜文明，与良渚文明没有联系。因此，在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起源阶段到夏商周时期的文明形成发展阶段，虽都有文明中心的存在，但这些文明中心之间却是断续的关系，与黄河流域的连续的文明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应该是中国两河文明的最大特点。

为什么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在起源与形成过程中会出现如此迥然不同的演进轨迹？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而目前尚未有满意答案的课题。据我们所知，最早系统思考这一问题的是童恩正先生。他在《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上发表的《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一文，以黄河流域中原龙山文化与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的比较研究为背景，就南北文明演进轨迹之异同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童先生从地理环境、农作物品种、相邻民族关系、水利工程、基层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六个方面的差异来讨论这个问题。如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看，北方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物质的交换，从而刺激文明的产生。而在南方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自然的障碍将他们分割在不同的文化龛中。每一个文化龛的范围都不是很大，它所能供养的人口以及社会剩余产品都有限。因此，在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中，酋邦制的出现便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不必再向国家发展。这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又影响着他们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方式。在北方，由于地势平坦，经常会受到外族的入侵，而人们的衣食住行又离不开黄土，于是他们只好组织起来进行抵抗。由于战争的需要，就必然形成一个统一的指挥集团和有组织的机构，国家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而在南方，由于众多的族群分散在山林河谷之中，交通不便，没有经常性的外界威胁。促进北方民族团结整合的力量，在南方不存在，等等。

用这些观点来解释长江流域石家河文化与良渚文化在进入文明起源阶段后，为什么不能继续向更高层次的文明国家阶段发展，自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这不能解释良渚文化为什么会自行消失。而且，这种观点对于长江下游赣江流域的清江吴城商城和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也是不适用的。因为这两支文化已完全进入了文明国家阶段，时代是在商代，在某些方面其文明的程度完全可以与中原夏商文明相媲美。看来，解释长江文明为什么会出现断续发展的演进轨迹，仍是一个艰难的课题。有关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出土和理论的深化。由于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是中国文明的主体，因此继续探索长江文明的演进轨迹，对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上古文明，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这里我们愿引

用童恩正先生文章的结束语作为本小节的结语：

中国南北古文化的发展存在差异，这是一种表面现象；探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才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可以想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将会刷新既有的许多认识，而随着这些新认识的日渐积累，最终将使重新改写中华文明史的课题摆在我一代学人的面前。

## 二、文明起源过程中，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异同

学术界曾将判断是否出现文明的要素概括为青铜器、城市、礼仪中心和文字四个方面。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事实上，文明起源具有区域性和多样性。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区域的文明在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物化形式是有差别的。我们可以分别归纳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各自不同的物化标志物。因此上述青铜器、城市、礼仪中心和文字四要素，并不能作为绝对统一的标准而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中美洲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是没有铜器的文明；而南美洲秘鲁的印加文明，虽已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式的国家，却没有文字的使用；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的诺姆文明不是以城市或都邑而是以灌溉区的修建和划定来体现，为了表明古埃及文明的这种个性，有学者称埃及文明为“没有城市的文明”。<sup>⑤</sup>

这种情况不仅在世界古文明起源与形成发展过程中是这样，在中国也是如此。以往由于大家的视线只集中在黄河流域中原文明这一点上，而中原文明又都具备上述文明四要素条件，因此，有关讨论便不再展开。如今，随着考古发掘的拓展与研究的深入，中华文明多源并起，如同满天星斗，互相辉映的景象已为大家所熟知。因此，搞清楚不同区域文明的不同发展轨迹及其呈现出来的不同的物化形式（文明要素），便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在本节，我们试以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例，试作比较研究。

### （一）青铜器与玉器

1. 中原文明以青铜器见长。考古工作者在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属于王湾三期类型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西城内，已发现了一件青铜容器残片。此外，在郑州西郊斗砦也出土了坩埚碎片，经检验分析，确认是熔化铅青铜的炉壁。<sup>⑥</sup>在河南临汝煤山二期文化的两个灰坑里，都出土了铜器皿坩埚碎片，上面残留凝结的铜液，经化验分析，含铜量大约是95%，为红铜。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已较发达，<sup>⑦</sup>既有较多的生产工具，如凿、锛、锥、刀、鱼钩之类，又有武器如曲内戈、直内戈和戚之类，更有复杂的礼器如鼎、爵、觶等；同时还有乐器，如铃；此外，还有特别引人注目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学者们认为，这已不是普通的装饰，而应该是祭祀用具，具有神秘的内涵。总之，中原地区从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过程中，青铜器一直是其重要标志。

2. 长江下游文明和燕辽文明以玉器显胜。从年代上看，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大致相当，马桥文化的前半叶与二里头文化相近。但我们至今未在良渚文化遗址里发现铜器，在马桥文化遗址里虽发现有铜器，但数量既少，水平又低。显然，长江下游的文明，不能以铜器作为标志。

真正能代表长江下游文明水平，并可以与中原青铜器相媲美的，是良渚文化的玉器。良渚文化玉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内容之丰富，早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赞美。良渚玉器的种类有琮、璧、钺、镯、璜、管、珠、锥形饰、半圆形额饰、冠状饰、三叉形饰、柱形器、柄形器、插座、杖端饰、圆牌、坠、纺轮、新月形饰以及鸟、鱼、蝉、龟等20多种，不少器种目前只能暂用描述性的名称。在这些玉器中，琮、璧、钺可视为礼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的玉件。其共同形制为外圆内方，分镯状和柱状两种。在任何一件玉琮上都雕琢有“神人兽面纹”，只是繁简程度不同而已。琮只出现在大墓之中，表明它是特殊身份和地位的人才能使用。玉琮应该是神权的象征，其内圆外方的形状可能与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有关，而“神人兽面纹”则与巫术观念中借助动物伙伴以沟通天地神灵有关。在酋邦制文明起源阶段，神权与政权是统一的，且为少数统治阶层所掌握。因此，张光直先生指出：“我们很

清楚地看到，在良渚文化社会中有权力有财富的人物，使用有兽面纹，内圆外方的玉琮，亦即使用贯通天地的法器，作为他们拥有权力的象征。”<sup>⑧</sup>璧是良渚文化中平面面积最大的玉器。琮是神权的象征，而璧可能是财富的标志物。至于玉钺则是军权的象征。玉钺磨制精细，大多为素面。其中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一件玉钺，两面都刻有完整的与玉琮一样的“神人兽面”图像，说明钺还与神权相统一。在良渚文化大墓里常见钺、琮、璧三器同在的组合，这应该是墓主军权、神权、财权三位一体的象征。

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年代与中原仰韶文化、长江下游崧泽文化大致相当，后红山文化（小沿河文化）则与中原龙山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大致同时。苏秉琦先生认为，在新石器中晚期各文化圈中，红山文化最先步入文明古国阶段。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红山文化也不见有青铜器，而以大量的玉礼器为其文明标志。

燕辽地区各地发现的红山文化墓葬中，主要的随葬品都是玉器。与良渚文化一样，红山文化的玉器不仅制作精致，而且数量多，形状各异。据初步统计，有大型玉龙、双龙首玉璜、兽形玉、鱼形坠、玉龟、勾云形玉佩饰，马蹄形玉箍、玉璧、玉钺、双联玉璧、三联玉璧、玉珠坠、棒形玉饰、玉环、玉鸟、玉鸮，虎形玉佩等等。

红山文化玉器有些可能是装饰品，但大部分应该是宗教礼器，具有深层次的含义。如玉璧、玉钺，应该与良渚文化玉器一样，是财富、军权、神权的象征。特别是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大件猪首“C”形卷体玉龙，墨绿色，高26厘米。还有许多被命名为红山文化的兽形玉，也都有猪首龙身的特征。这应该是红山初民的神灵之物，与他们的猪龙图腾崇拜有关。总之，红山文化玉器与良渚文化玉器构成了中国文明起源阶段南北对应的两个“玉器王国”。

青铜器在中原文明起源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是等级地位、社会财富、酋邦政权、宗教神权以及礼仪制度的物化形式。同样，良渚文化玉器和红山文化玉器在长江下游与燕辽地区文明起源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也是行政管理、军事统辖、宗教意识的物化形式。良渚文化玉器和红山文化玉器构成了长江下游文明起源、燕辽地区文明起源有别于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个性模式。

还有一点值得在这里一提的是，良渚文化之后，良渚玉器及其“神人兽面”纹饰母题在长江下游消失，而中原夏商周宫殿遗址及墓葬里都出现了与良渚文化十分相像的玉器及青铜器上的纹饰母题。学者们大多相信，这之间有渊源关系。<sup>⑨</sup>如良渚文化的重要礼器有玉琮、玉钺等，二里头文化也出有同形的玉琮、玉钺；良渚文化玉礼器上的“神人兽面纹”，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的饕餮纹，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也有密切的联系。宋建先生指出：“有理由推论，商周铜器与动物纹样的结合主要渊源于良渚玉器与动物纹样的结合，换言之，商周贵族的意识观念可能受到良渚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sup>⑩</sup>

## （二）城市与大型礼仪中心

原始城市的产生，是古代文明进步的一个重大标志。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即已出现了许多古城，如淮阴平粮台古城，郾城郝家台古城，安阳后岗古城，辉县孟庄古城，登封王城岗古城等等。其中王城岗古城由东西两座小城组成，四周有夯土城墙，城内有重要建筑，以及“奠基坑”等等。到了夏商周时期，城市的规模更大，内涵更丰富，完全成了国家的中心。如二里头夏王都，内有具有王宫性质的一号宫殿，成为夏王朝发布政令、集会朝聘的重要场所；又有具有宗庙性质的二号宫殿，成为祭祀盟誓的中心。商周王都又沿此格局而更趋完善，一般城内都具备宫室和宗庙两大部分。宫室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而宗庙则体现了中原民族敬祖追远，崇拜先祖列宗的特点。总之，城市是构成中原文明的重要因素。

良渚文化与红山文化则以独立的大型礼仪性建筑来体现他们的文明，中原地区那种布局严整的城市在这两个文明区里几乎不见。

红山文化的大型礼仪性建筑可以东山嘴大型石砌祭坛遗址和牛河梁“女神庙”及积石冢群遗址为

代表。1979年春，考古工作者在辽西大凌河流域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村发现了一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整个遗址为一完整的建筑基础，依布局可分为中心、两翼和前后两端等部分。中心部分为一座大型方型基址，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位于遗址北部正中。基址四边有石墙基围成。在方形基址的两翼分别有两道南北走向、相互对称的石墙基。在遗址的前端（南部）有一个石圆形台址，正圆形，直径2.5米，周围以石片镶边，向外一边平齐。伴随这个祭坛出土的遗物有陶器、玉器、骨器、蚌器、石饰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陶塑人像，其中有小型孕妇塑像2件，裸体；大型人物坐像上、下身各一块。<sup>⑪</sup>

1983年至1986年，考古工作者又在距东山嘴大型石砌祭坛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和多处积石冢群。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地势较高。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构成。多室建筑物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建筑物在南，为附属建筑。两处建筑物在一条中轴线上，相距2.05米。北面的主体建筑，结构比较复杂，包含一个主室和几个相连的侧室、前后室。在主室的两侧，出土彩绘泥塑人像的头、肩、臂、手、乳房残件和动物像“猪龙”的头、蹄等。其中一尊基本完整的女神头像，大小与真人接近，头像面部的艺术刻画既强调外形轮廓的美观柔和，又追求内蕴神态的情感流露。其眼珠是用晶莹碧绿的玉珠镶嵌而成。发掘者据此推断该建筑物为“女神庙”。

牛河梁的积石冢分布在近30个山颠高坡上。这些积石冢，面对着河川，向阳，与位于凌源牛河梁的女神庙以及位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的大型石砌祭坛遥相呼应。每座积石冢内，一般都有数十人“列棺”而葬。他们因身份不同而被分别安放在大小各异的石砌棺中，数十个石棺上都覆盖石块构成一个整体，形成积石大家。积石冢呈圆形，四周围绕着上百个筒形彩陶器。<sup>⑫</sup>

关于大型石砌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的性质，学术界有许多讨论。东山嘴大型石砌基址立于山梁顶上，基址内有成组、成群的立石及铺石，以及有陶塑人像群，发掘报告据此认为：“这显然是当时人们从事包括祭祀在内的社会活动的一个中心场所。”俞伟超先生以遗址所费的工程量及其独立的位置两个角度推测这个祭祀场所已体现了较高的文明程度：“对五千年前的红山居民来说，要修建这样一大片祭祀场地，显然要花费巨大的劳动，一个氏族、一个部落，恐怕难以承担”。而且“这个山嘴上，除了祭祀遗迹外，并无生活的居住遗址；而在附近的一些地段，也缺乏同时期的生活遗址。这就提供了一个信息，即当时的居民大概要长途跋涉到这里来进行祭祀活动，而这个场所，又大概不是一个氏族、一个部落所专用的。”<sup>⑬</sup>由此看来，修建这个遗址的远古社会单位，至少也是一个酋邦社会了。

同样，牛河梁的女神庙也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周围没有居民生活区，说明这个神庙是一个共同场所。发掘报告还据女神庙中所出泥塑群像推测：“这些形象有的可能象征当时社会上的权势者，有的或许是受到崇敬的祖先。根据群像之间大小和体态的差别判断，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积石冢群中各墓葬规模的差异，反映了当时红山文化中社会等级的产生。有学者认为，每个冢内可能埋葬着同一氏族组织的成员，中心人物可能是部族的首领或其中受尊敬的长者。

东山嘴大型石砌祭坛的年代距今已有5500年左右，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遗址的年代距今约5500至5000年间，而就上面的讨论可知，当时也进入了一个具有权力集中的公共设施，和财富地位分化的等级社会。因此，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国最先进入文明起源的文化区：“这些考古发现已远远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涵盖解释的内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sup>⑭</sup>

红山文化这种特有的大型独立的宗教礼仪性建筑，一直延续到相当于中原夏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之中。在辽宁凌源萧杖子村的南山坡前，20世纪9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祭祀遗址。遗址北高南低，东西最宽处132米，南北最宽处92米，有东西向石墙八道，南北

向石墙四道。整个石砌建筑形成一个类似回首腾飞的鹏鸟。在距石砌祭祀遗址西北 400 米的一个山头上，建有一个敞口向西呈 M 形的石砌建筑。距遗址东北 120 米处还有一个不规则的圆形祭坛。发掘报告据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和遗址本身特征，分析指出，上述石砌建筑“与当时人们祭祀或原始崇拜有关，……是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祭祀遗址。”<sup>⑯</sup>这处凌源萧杖子石砌祭祀群遗址东北向距牛河梁女神庙遗址 22 公里，东南向距东山嘴大型石砌祭坛 44 公里。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砌建筑和圆形祭坛的发现，证明从红山文化时期以来，燕辽地区的土著居民，一直保持着大致相同的宗教祭祀传统，从而构成了燕辽地区独有的文明演进模式。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也以大型祭祀遗址为其文明特色。这些祭祀遗址大多是人工堆筑而成的高台，学者们称其为“土筑金字塔”。良渚文化中这种典型的“土筑金字塔”式的大型祭坛有浙江余杭县内的瑶山祭坛、汇观山祭坛和上海青浦福泉山祭坛。概括起来看，这些祭坛有如下特点：

(1) 这些祭坛一般都建在山顶上，都呈方形，大多由三层方台逐层建成。发掘报告指出，祭坛建在山顶上，又台上加台，具有“高上加高”直至“通向上天之意”；而“坛作方形，和传统的‘地方’说也许不是偶然的巧合”，因此，这些祭坛应当是“以祭天礼地为主要用途的祭坛”。<sup>⑰</sup>这些分析与遗址中所出的外方内圆的玉琮所体现的观念相一致。玉琮外方像地内圆像天，正是沟通天地的法器。

(2) 祭坛一般露天而筑，四周有树林。这与后世文献所载大致吻合。如《白虎通义》所说：“社无屋……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墨子·明鬼》所载：“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从社。”

(3) 这些祭坛上，一般都伴有大型墓葬，墓中的随葬品则以琮、钺、璧等大型玉质礼器为主。而小墓从不杂处在祭坛内。

良渚文化大型祭坛的性质应该与大型墓葬与内中所出玉琮、玉钺、玉璧等礼器及其“神人兽面纹”等联系起来考虑。董楚平先生指出：“神权是世俗权力的反映，大规模祭祀活动是社会权力大规模集中的一种反映。现已发现的多处祭祀遗址，都与大墓共存。大墓的主人正是大规模祭祀活动的主持人。参加这些祭祀活动与佩戴宗神标志一样，都是当时贵族的特权。”<sup>⑱</sup>

良渚文化的大型祭坛，不仅就其内涵看，是一个神权、政权、军权高度集中的具有酋邦性质的文明古国的中心场所，而且再就其精心设计、认真施工的角度看，也充分体现了它的文明程度。正如宋建先生所指出：“营造高台墓地的工作量很大，如按照反山长 90 米、宽 30 米、高 4 米，则需要搬运一万多方土，此外还要平整土地，推土夯实，都须耗费大量工时。因此，高台墓地同嵩山地区的城堡城市一样，也是大型工程建筑，决非使用者依靠自己的力量所能够建成的，必须用某种特殊的手段调动、组织大批劳动者。说明良渚文化与嵩山地区的社会组织水平比较接近。”<sup>⑲</sup>严文明先生也从建筑基址的角度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良渚遗址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块圣地。”<sup>⑳</sup>

良渚文化的大型高台祭坛及大墓没有在其后的马桥文化中心延续下来。相反，在文献记载中的有关夏商周三代的社坛，却可在良渚文化祭坛中找到印证。据文献记载，中原地区的社祀宗教礼仪活动为夏人所首创，且为商周王朝所承继：

《墨子·明鬼下》“尝上观乎《夏书·禹誓》，曰‘大战于甘……’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予共行天之罚也。……’是以赏于祖而僇于社。”

《论语·八佾》：“鲁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史记·封禅书》：“自禹兴而修社祀，……郊社所从来尚矣。”

《史记·殷本纪》：“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

《古本竹书纪年》：“夏桀末年，社折裂，其年为汤所放。”

至于夏商周三代社坛的基本状况，文献也有所记载。如：

《风俗通义·祀典》：“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报功也。”

《白虎通义·社稷》：“天子有大社焉，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以黄土。”

《墨子·明鬼下》：“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

《庄子·人间世》：“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

根据以上文献，陈剩勇先生在《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曾将夏商周三代社坛的特征概括为六点：“①封土为社，即祭坛是由泥土垒筑起来的；②社坛一般呈方形，体现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③垒筑社坛的泥土是多种颜色的；④社坛是露天的；⑤社坛一般筑在高地上；⑥社的周围有大树丛。”陈先生还将这些特征与良渚文化大型祭坛联系起来，认为中原夏商周社坛正是渊源于良渚文化祭坛。

### （三）小结

以上的讨论，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中华上古文明的确是多源并起，各有特色而又相互影响的。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到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区、长江下游、燕辽地区的文明起源与演进过程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特征值得注意：

其一，就文明因素看，中原地区的文明因素以青铜器、城市和文字为特征，长江下游的文明因素则有玉器、大型祭坛和文字，燕辽地区的文明因素则以玉器和大型祭坛为主要标志。三个地区就其相同的角度看，中原文明与良渚文明都有文字，良渚文明与燕辽文明都有玉器和大型祭坛。就其相异处看，中原文明的青铜器、城市与良渚文明、燕辽文明的玉器、大型祭坛形成对比。而良渚文明与燕辽文明的大型祭坛又有具体不同。如良渚大型祭坛以泥土垒成，呈方形结构，而燕辽地区的大型祭坛则以石块筑成，且多为圆形结构。

其二，就文明起源时间及其走向看，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最先进入文明起源阶段，良渚文明在其起源阶段则最呈辉煌景象。但当中原地区由龙山文明起源走向夏商周文明辉煌、燕辽地区的文明也由红山文化的起源，经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过渡发展，而步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北方青铜文明时，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则在马桥文化时代在本地区消失，而其玉器与大型祭坛则又在中原夏商周文明方国里找到了种种延伸发展的迹象。中原文明则以其积极包容的态度，在接纳良渚文明并与燕辽地区夏家店文明等交往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文明，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

①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张光直作品系列”版。

②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③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④李伯谦：《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⑤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绪论：理论与方法”及第10章《文明的道路与区域特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⑥李京华：《关于中原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及相关问题的几点看法》，《文物》1985年第12期。

⑦《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⑧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第76页。

⑨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5年第5期；董楚平：《吴越文化志》第二章《东南文明的兴起、扩散与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湖南出版社，1994年。

⑩⑪宋建：《嵩山地区与太湖地区文明进程的比较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⑫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⑬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⑭见《座谈东山嘴遗址》，《文物》1984年第11期。

⑮苏秉琦：《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110页。

⑯《凌源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祭祀遗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2月23日。

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⑱董楚平：《吴越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29页。

⑲严文明：《良渚随笔》，《文物》1996年第3期。

责任编辑：郭秀文

# 宋代民间“信巫不信医”现象探析

李小红

[摘要] 信巫不信医作为一种医疗陋俗在中国古代社会由来已久。在宋代，它不但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而且遭到强有力的抵制。在宋代大力禁巫兴医的情况下，由于传统观念和医学落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信巫不信医的现象禁而不止，广泛存在于宋代民间，给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宋代 民间 信巫不信医 巫医 医学

[作者简介] 李小红，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宁波大学历史系讲师，浙江 杭州，310028。

对现代人而言，生病求医、打针吃药乃是一种普通常识，但并非由来如此。在巫、医不分的中国上古时代，巫兼行医职，医术、巫术二位一体，自然也就无所谓信巫不信医的问题。随着古代医学的发展和专职医生的出现，巫术的虚伪、巫医的欺骗也因此日渐暴露。可人们出于种种原因，生病后依然求巫作法而不是求医吃药治病。这种“信巫不信医”<sup>①</sup>的现象至少从战国以来便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时至今日，在一些偏远乡村仍不难看到。之所以选择宋代作为考察的范围，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信巫不信医问题在宋代，一方面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及有力的抵制，另一方面是禁而不止，仍然相当严重。分析其原因与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深入认识宋代社会。其二，宋代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书信中谈到：“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今日之现象，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以造成，什八九可断言也。”<sup>②</sup>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现象，非但对认识当时，甚者后世社会都大有裨益。其三，与前代相比，宋代文献中留有更多有关信巫不信医的记载，为本论题的展开提供了条件。本文试从社会对信巫不信医问题的关注和抵制出发，探讨宋代信巫不信医现象禁而不止的状况及其原因、影响。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指正。

—

信巫不信医作为一种医疗陋俗，自战国以来就不断有人就其危害提出批评。战国名医扁鹊，将“信巫不信医”归为疾病“不治”的六个原因之一予以批评。<sup>③</sup>东汉思想家王符揭露道：“疾病之家，……或弃医药，更往事神，故至于死亡，不自知为巫所欺误，乃反恨事巫之晚，故惑细民之甚者也。”<sup>④</sup>一些有识的官员还试图加以抵制。不过，这些批判和抵制并未在社会特别是主流社会中形成共识。其时，巫医的医疗职能不仅得到上至皇帝、官僚士大夫，下至匹夫细民的承认，甚至为封建国家所认可，至少到唐代还是如此。今人朱瑛石先生指出，在隋唐官制系统中至少存有三类带有浓厚巫觋色彩的巫官：一是祭祀系统中的巫，二是太卜署中的巫，三是太医署中的咒禁博士等。<sup>⑤</sup>

在宋代，民间信巫不信医问题不仅引起了主流社会的关注，而且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央与地方政府良性互动、禁巫与兴医双管齐下的治理机制。

早在宋初刚统一岭南时，有鉴当地风俗鄙陋、信巫不信医泛滥的情况，知邕州范景文“下令禁止，出俸钱市药物，亲为和合，民有言病者给之。获痊愈者千计，乃以方书刻石龛置厅堂，部内化之”。<sup>⑥</sup>而赵宋中央，既“诏以方书、《本草》给之”，<sup>⑦</sup>又要求“本郡长吏，多方化导，渐以治之。无宜峻法，以致烦扰”。<sup>⑧</sup>如果说这一时期地方官与中央在信巫不信医问题上的共识尚是不谋而合的话，那么自宋

仁宗以后则是有意识作为的结果。一方面，朝廷根据地方官的奏请，针对民间信巫不信医问题多次颁行禁约。在《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中，有关巫觋的禁约达十几条，其中淳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条、政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条、绍兴十六年二月三日条、嘉泰二年十二月九日条直指信巫不信医问题，涉及到两浙、江南、川峡等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01 天圣元年十一月戊戌条也记载，宋廷应知洪州夏竦之请，“诏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广南东西、两浙、福建路转运司：自今师巫以邪神为名，屏去病人衣食、汤药、断绝亲识，意涉陷害者，并共谋之人，并比类诅咒律条坐之。”天圣三年，根据淮南江浙荆湖发运使的请求，朝廷又将此诏令推行于淮南。<sup>⑨</sup>另一方面，地方官遵照中央诏令，在辖区内大力禁巫兴医。这类地方官有王嗣宗、刘若虚、夏竦、蔡襄、刘彝、蒋静、叶安仁、陈宓、真德秀等等。

在宋代官员看来，民间信巫不信医陋习的泛滥，源于巫医活动的猖獗和医药的落后，因而他们的治理活动也主要从禁绝巫医和发展医学两个方面展开。在禁绝巫医方面，宋廷不断颁行禁约，取缔民间巫医的活动，严惩违法巫医。在禁绝巫医的过程中，不少官员逐渐认识到，一味禁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应该“晓人以医巫之谬”，从观念上消除巫医对民众的影响，才能“使之归经常之道”。<sup>⑩</sup>为此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揭露巫医之谬、迷信巫医之害。如真德秀作《劝农文》揭露道：“巫觋兴妖，本以自利，尔顾惑之，可谓不智。禁汝医药，以戕尔躯；诱汝祭赛，以空尔庐。甚至采牲，以人为畜，陷汝于刑，陨身覆族！”<sup>⑪</sup>知静江军张栻劝诫民众说：“访闻愚民无知，病不服药，妄听师巫淫祀，……至于师巫之说，皆无是理，只是撰造恐动，使人离析亲党，破损钱物，枉坏性命。”<sup>⑫</sup>

在大规模禁绝巫医的同时，赵宋政府还十分注意医学的发展和医药知识的普及。正如四库馆臣曰：“有宋一代于医学最为留意。”<sup>⑬</sup>宋代政府发展医药事业的措施主要有：健全医疗机构，推行医药救济；改革医学教育，提高医学和医生的地位；修订药典，校勘医书；革除医疗陋俗，普及宣传医药知识，等等。<sup>⑭</sup>在宋代抵制信巫不信医陋习的措施中，弘扬医学是禁绝巫医的有力补充，这种寓禁绝于提倡的做法，为当时不少地方官遵行。他们或者大力培养地方医学人才，或者置方书于交通要道，方便民众传抄，促进医药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或者由政府出钱购药，分施于民。有的官吏甚至自己掏钱市药予民。如曹宪知开江县，“乃出私钱，市药剂，有病者辄遣吏烹煎，临饮之，民初强从，既稍有瘳，全活者十七八”。<sup>⑮</sup>

## 二

民间信巫不信医问题在宋代首次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及强有力的抵制，那么，问题是否得到有效的解决呢？其情形不容乐观。首先，信巫不信医陋习一直为两宋政府高度关注这一事实本身，便是最好的说明。再者，在宋代文献中，关于民间信巫不信医的记载比比皆是。

广南地区，地处偏远，民风僻陋，经济文化向来落后，其信巫不信医之风不难想象。《独醒杂志》卷 3 称广南“风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疠。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进药饵，惟与巫祝从事，至死而已，方书药材未始见也”。宋初知邕州范文在当地禁巫兴医，称收到了“部内化之”之成效。仁宗时陈尧叟为广南路转运使，“岭南风俗”仍是“病者祷神不服药”，经陈尧叟的努力，有了“自后始有服药者”的可喜进步。<sup>⑯</sup>可直到宋高宗绍兴年间，右朝奉郎朱同知南雄州任满还朝，仍称“岭南无医，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束手待毙”，希望朝廷“取古今名方治瘴气者集为一书，颁下本路。”<sup>⑰</sup>

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实自古而然”，<sup>⑱</sup>在宋代政府大力禁巫兴医的情况下，信巫不信医之风依然不改。宋代巴地巫风相当炽盛，信巫不信医的陋习遍及该地各州县：在潼川府路，广安军“俗信巫，疾病不加医药”；<sup>⑲</sup>在利州路，《宋史》卷 300 《周湛传》载戎州“俗不知医，病者以祈禳巫祝为事”。尤其是夔州路的涪陵，《宋史·地理五》称，在川峡四路中，“涪陵之民尤尚鬼俗，有父母疾病，多不省视医药”。同书卷 267 《李惟清传》亦称涪陵民“病不疗治，听于巫觋”。直到南宋嘉泰二年（1202 年），权知万州赵师作在上奏中还谈到：“峡路民居险远，……凡遇疾病，不事医药，听命于巫。”<sup>⑳</sup>在荆湖南、北路，《宋史·地理四》说“归、峡信巫鬼，重淫祀”；江陵府亦是“病者先巫后

药”。<sup>①</sup>又据北宋末年大臣周邦式的上奏：“荆楚之俗自古信师巫，然而近世为尤盛。……有疾病，不敢求医药，专信其下禁。”<sup>②</sup>

如果说上述地区，或者因为偏僻落后，或者因为传统因素的作用，致使信巫不信医之风禁而不止的话，那么，作为宋代经济富庶之地、文化发达之邦的两浙路、江南东西路、福建路，情况又如何呢？首先看两浙地区，在北宋有处州病者“不事医药”<sup>③</sup>、润州民“不先医而先巫”<sup>④</sup>之类的记载。即使到南宋，两浙路贵为京畿重地，仍有大臣上奏说：“近来淫祠稍行，江浙之间此风尤炽，一有疾病，唯妖巫之言是听。”<sup>⑤</sup>毗邻的江东、西路，亦不乏信巫不信医的现象。宣州“病者不医以事祈禳”。<sup>⑥</sup>至于福建路，依《宋史·地理志五》记载，“其俗信鬼尚祀，重佛屠之教，与江南、二浙略同”。又神宗时名臣且为闽人的蔡襄之言：“闽俗左医右巫，疾家依巫索祟，而过医之门十才二三。”<sup>⑦</sup>其信巫不信医的情形于兹可见一斑。

此外，除辽、金辖区以外的宋代北方地区，尽管关于民间信巫不信医的记载不多，难以窥其全貌，但仍不难发现其踪迹。《宋史·王嗣宗传》记载，至道（995年）初，王嗣宗为淮南转运使，“扬、楚间有窄家神庙，民有疾不饵药，但竭致祀以徼福”。后来知陕西路邠州，妖巫挟城东灵应公庙“为人祸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祷之”。又淮南西路的蕲州，民“有病用巫不用医”。<sup>⑧</sup>

宋代民间信巫不信医风习不仅流播广，而且染及众。宋人王炎“不信医方可活人，但随巫语去迎神”<sup>⑨</sup>的诗句，正是当时人们信巫不信医情况的写照。也许人们通常认为，只有那些贫穷而又愚昧无知的“愚民”才“不信医方”而信“巫语”。其实不然。南宋湖州归安县，县令黄莘就当地衣冠之家迷信巫医游仙夫人的情况批评道：“信巫不信医，此愚俗之病，衣冠右族，岂宜沦胥？”<sup>⑩</sup>在福建，又有士人李学谕状告巫者黄六师诅咒其父，地方官胡石壁责备李学谕道：“既为士人，当晓义理，岂不知人之疾病，或因起居之失节，或因饮食之过伤，或因气血之衰，或因风邪之袭，但当惟医药之是急，不当于鬼神而致疑。而乃谓其父病之由，起于师巫之咒，……此何等齐东野人之语，而发于学者之口哉！”<sup>⑪</sup>可见，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中，信巫不信医者大有人在。

由上可见，在政府大力禁巫兴医的宋代，无论穷乡僻壤，还是通都大邑；无论市井小民，还是官僚士人，都不乏信巫不信医现象。

### 三

如果将宋代之前信巫不信医陋习的泛滥归结为政府禁巫不力、医药落后等原因，那么，在宋代政府大力禁巫、医学已有相当发展的情况下，信巫不信医的现象为何依然广泛存在于宋代民间社会？或者说人们为什么仍然信巫不信医？其实，这不过是民众主观观念和客观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在民众的观念上，巫医治病根生蒂固，而对医却半信半疑，决定了他们生病后在巫、医的选择上往往更倾向于巫。

自中国上古时代以来，人们相信鬼怪致病，迷信巫医驱祟疗疾的功用。而对于医，早在《礼记·曲礼》中便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之说，反映了民众脆弱的医药观念。在宋代抵制信巫不信医陋习的过程中，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禁巫和兴医两个方面，而疏于对民众迷信巫医、巫术观念的改造。所以人们生病后，更多时候想到的是求巫作法，驱祟治病。宋人龚鼎臣谈到，巴、楚等地的民众患病后，“率以谓天时被是疾，非医药所能攻”，故不惜财货，求巫祷神，即使病情长期不得好转，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非但不以巫术无效，反而“莫不自咎事鬼神之未至。或幸而愈，乃曰：由祷之勤也，荐之数也。不然，乌能与天时抗乎？”对于这种情况，龚鼎臣分析道：“其患非它，由觋师之胜医师耳！呜呼！觋者岂能必胜诸医哉？其所胜之者，盖世俗之人，易以邪惑也。”<sup>⑫</sup>言下之意，民众之所以信巫不信医，根源在于民众内心的迷信观念。

从《夷坚志》有关记载来看，人们在巫、医的选择上除了信巫不信医外，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既信医又信巫。“巫、医并致”，与其说是信医，无宁说是信巫不信医的另一种表现。因为在民众的观念中，其天平始终倾向于巫。对此，元人揭傒斯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楚俗信巫不信医，自三代以来为然，今为甚。凡疾，不计久近浅深。药一入口不效，即屏去；至于巫，反复十数不效，不悔，且引咎痛自责，殚其财，竭其力，卒不效且死，乃交责之曰：是医之误，而用巫之晚也。终不一语加咎巫，而败恒归于医。效不效，巫恒受上赏，而医辄后焉。<sup>⑬</sup>

可见，由于传统疾病观念和医疗习俗的作用，在宋代民众的心目中，巫的影响远胜于医，即使求医，也抱以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故而往往认为求医耽搁了求巫的时间，致使疾病得不到治疗。所以，民众的观念是宋代信巫不信医现象禁而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在民众的实际生活中，求巫容易求医难，影响了民众对巫、医的选择。

宋代虽然大力禁巫，但在宋代民间仍然活跃着一支相当庞大的巫医队伍。殿本《宋史·刘彝传》称，刘彝在处州“斥淫巫三千七百家”。据《元丰九域志》卷5“处州”条记载，处州辖丽水、龙泉、松阳、遂昌、缙云、青田六县，计32乡3镇2银场，有主客户89358户。也就是说，平均每24户就有1家为巫。巫医数量之惊人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北宋李觏禁不住发出了“今也巫医、卜相之类，肩相摩、毂相击也”<sup>⑭</sup>的感叹。这些巫医，植根民间，与民众朝夕相处，深知他们的疾苦及想法，而且召之即来，收费相对低廉。

在大量巫医存在的另一面，却是民间严重的缺医少药。宋代虽然大力发展医学，但其重医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乐观。哲宗时右正言虞策在上疏中谈到：

嘉祐诏书复开元故事，郡置医生，熙宁以来，县亦如之。然郡县奉行未称诏旨，有医生之名，无医生之实，讲授无所，传习未闻。今之要藩大郡或罕良医，偏州下邑，遐方远俗，死生之命委之巫祝。纵有医者，莫非强名，一切穿凿，无所师法，夭枉之苦，何可胜言。<sup>⑮</sup>

可见，宋代的重医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无论从官医的质还是量上看，都远不能满足广大民众的需要。由此，首先造成医药费的昂贵，贫穷人家无钱求医买药。《夷坚支乙》卷7“王牙侩”条中提到的“鄱阳乡民”郑小五，全家染上疾疫，“欲召巫买药，空无所有”。不仅贫穷人家如此，甚至士大夫之家也无力承担。在《宋史·侯可传》中，侯可的朋友谈到：“吾父病，医邀钱百千，卖吾庐而不售。”士人王迈亦有诗云：“爱女有家后，沉痼未下床。闻巫羞左道，市药探空囊。”<sup>⑯</sup>寥寥数句，形象地刻画了当时人们那种求巫怕人笑话、买药又无钱的尴尬景况。所以许多人只好选择收费相对低廉的巫医。其次，许多地处偏远地区的民众无处求医买药，只好就近求巫。如陈渊《默堂集》卷21《陈伯瑜宣义行状》中谈及南剑州之沙县的情况说：“所居去城市稍远，俗不饵药，唯以巫祝为尚。”南宋泉州安溪县令陈宓根据当地情况更详细地论道：“然医药之利，民所未知，盖缘山乡僻远，仓猝有疾，求药于百里之外，药又非真，如服土壤，以病深之人，服不效之药，此医药之功，所以未收，巫鬼之惑，所以益甚，而人丁所以未繁也。”<sup>⑰</sup>

此外，医生以医药治病，属于技术治疗的范畴；巫医以巫术治病，属于信仰治疗的范畴。中国古代医学发展到宋代，无疑已有了相当地发展，但与现代医学相比，相去甚远。对于许多疑难杂症，现代医学尚且束手无策，更遑论宋代医学。而对于一些当时医学所不能治疗的疾病，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疾疫”、“祟”、“怪”等异常病症，巫医比医生更有办法。如《夷坚三志辛》卷3“程山人女”条记载，乐平螺坑市织纱卢匠之妻患病，“里中江巫言能治，即披发跣足，跳梁而前，名鼓吹角，以张其势。……于是使饮符正其心神，饵药以涤其肠胃，逾月始平。”由于这类疾病大多源于病人心理或精神方面，非单纯用医药所能奏效，所以江巫通过饮符等巫术解除病人的心理负担，再辅之以医药，效果自然更佳。所以，当医药无效时，绝望中的人们往往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巫医。其虽然具有使病者及其家属抱有一线希望而不致于坐以待毙的积极意义，但客观上起了助长巫医声势的消极作用。

#### 四

宋人之所以信巫不信医，有其主观、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但无论如何，该陋习的泛滥，给当时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对此，时人多有揭露，其中以夏竦的议论最具代表性。北宋仁宗天圣元

年（1023年），知洪州夏竦在其《上仁宗乞断巫觋》的奏疏中指出：

民之有病，则门施符篆，禁绝往还，斥远至亲，屏去便物。家人营药，则曰神不许服；病者欲食，即云神未听飨；率令疫人死于饥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余祟所凭，人不敢留，规以自入。若幸而获免，家人所资，假神而言，无求不可。其间有孤子单族、首面幼妻，或绝户以图财，或害夫而纳妇。浸淫既久，习熟为常，民被非辜，了不为怪。奉之愈谨，信之愈深，从其言甚于典章，畏其威重于官吏。<sup>⑧</sup>

概而言之，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首先，毒害病者的身心健康，影响民众的生活。民众信任巫医，但巫医却利用民众的迷信心理，假借神意，骗取钱财，根本不顾病人的生死，甚至故意置病人于死地，以占人家产、夺人妻子。如南宋初年江浙民众有病“不求治于医药，而屠宰牲畜以祷邪魅，至罄竭家赀，略无效验而终不悔”；<sup>⑨</sup>孝宗时夔州路的民众，“凡遇疾病，不事医药，听命于巫，决卜求神，杀牲为祭，虚耗家财无益，病人或抵死，犹谓神之未至。故凡得疾，十死八九。”<sup>⑩</sup>

其次，败坏社会风俗，破坏社会秩序。北宋末年，曾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的周邦式指出：“江南风俗循楚人好巫祠，闾巷之民，一有疾病，屏去医官，惟巫觋之信，亲戚邻里畏而不相往来，甚者至于家人犹远之而弗顾，饮食不时，坐以待毙。”<sup>⑪</sup>对此，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分析后认为，家属、亲邻为避免疾病传染、置病人于不顾的做法，于理可恕，但于情不合。<sup>⑫</sup>而民众对巫医“从其言甚于典章，畏其威重于官吏”的情况，不仅有碍于当时的社会秩序，而且也很容易为人所利用，故夏竦的奏疏以“盖奸臣逆节，狂贼乱规，多假鬼神，摇动耳目。汉之张角，晋之孙恩，偶失防闲，遂至屯聚”的议论开章，以“伏乞朝廷严赐条约，所冀屏除巨害，保宥群生，杜渐防萌，少裨万一”的请求结尾，全疏的重点在民众迷信巫医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

第三，妨碍医药的普及，引起医学的倒退。学术界有“医学源于巫术”的说法，揭示了二者的渊源关系。但自从医学走上独自发展的道路后，巫便更多地以反对医药、妨碍医学发展的面貌出现。《夷坚支戊》卷3记载：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春夏间，常州“疫气大作，民病者十室而九，（知州张子智）多治善药，分诸坊曲散给，而求者绝少，颇以为疑，询于郡士。皆云：‘此邦东岳行宫后有一大殿，土人奉祀瘟神，四巫执其柄。凡有疾者，必使来致祷，戒令不得服药，故虽府中给施而不敢请。’”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巫医的蛊惑，人们往往对医药持怀疑态度。民众的这种想法，反过来又引起部分医生治病方法的改变。正如元人揭傒斯谈到：“故医之稍急于利，信于人，又必假邪魅之候以为容，虽上智鲜不惑。”<sup>⑬</sup>这种由医向巫的倒退，在宋代并不少见。而医生的这种做法，对医学发展的负面影响尤大，使朝廷不得不下诏禁止：“医师疗疾，当按方论，若辄用邪法，伤人肤体者，以故杀伤论。”<sup>⑭</sup>中国古代医学之所以发展缓慢，在此得到最好的诠释。

①③司马迁：《史记》卷105《扁鹊仓公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2729页。

②《学衡杂志》，上海中华书局，第13页。

④王符：《潜夫论》卷12《浮侈》，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10页。

⑤朱瑛石：《“咒禁博士”源流考——兼论宗教对隋唐行政法的影响》，载《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开宝四年十月戊寅，中华书局点校本。

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开宝八年十一月己丑。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雍熙二年闰九月甲戌。

⑨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0之一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⑩⑪蔡襄：《端明集》卷29《圣惠方后序》，第584页。

⑪真德秀：《西山文集》卷40《劝农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33页。

⑫张栻：《南轩集》卷15《谕俗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52页。

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3《医家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断句本，第866页。

- ⑩李经纬：《北宋皇帝与医学》，《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3期，第3页。
- ⑪刘邠：《彭城集》卷36《尚书驾部员外郎曹君墓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56页。
- ⑫《宋史》卷284《陈尧叟传》。
- ⑬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9，绍兴十九年六月辛酉，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5064页。
- ⑭⑮吕祖谦：《宋文鉴》卷127《述医》，中华书局，1992年，第1780页。
- ⑯范镇：《东斋纪事》卷4，中华书局，1982年，第36页。
- ⑰⑲《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三。
- ⑱刘摡：《忠肃集》卷10《荆南府图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58页。
- ⑲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14《乞禁师巫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09页。
- ⑳《宋史》卷334《刘彝传》，第10729页。
- ㉑苏颂：《苏魏公文集》卷64《润州州宅后亭记》，第687页。
- ㉒㉓《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二。
- ㉔韩琦：《安阳集》卷49《故尚书祠部郎中集贤校理致仕赵君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32页。
- ㉕苏颂：《苏魏公文集》卷58《朝散大夫累增户部侍郎赵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23页。
- ㉖王炎：《双溪类稿》卷5《居民多疫为散药》，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9页。
- ㉗袁燮：《洁斋集》卷14《密阁修撰黄公行状》，四明丛书本。
- ㉘《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4《巫觋以左道疑众者当治，土人惑于异者亦可责》，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547页。
- ㉙㉚揭傒斯：《文安集》卷8《赠医氏汤伯高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18页。
- ㉛李觏：《盱江集》卷16《富国策第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页。
- ㉜《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2，元祐七年四月丙子，第11272页。
- ㉝王迈：《臞轩集》卷14《爱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6页。
- ㉞陈宓：《复斋集》卷20《安溪县劝民服药戒约巫师文》，武英殿四库全书本。
- ㉟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98《上仁宗乞断巫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1056页。
- ㉟《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六七。
-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4《与王吉州论郡政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38页。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咸平五年八月乙酉，第1148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上接第21页)

最后，梁启超提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他批评对传统文化盲目崇拜和虚无主义两种态度，同时提出总结、发挥中国文化应借西方文化做途径，因其方法严密，而且思想解放有久远传统，内容丰富，很值得参考。具体来说，他对文化的发展规划了四个步骤：“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sup>①</sup>面对中西文化的各种复杂问题，梁氏洞察利弊，高屋建瓴，理出了清晰的思路，主张一方面要充分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大力学习和运用西方的先进学理和科学方法，对我们的原有文化进行有系统的总结，并吸收西方文化的优良东西来补充，最终达到东西方文化融合，创造出一种新文化，扩充到世界，为全人类作出贡献。——他的设计方案鲜明地不同于文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突出地体现出辩证思想和“不懈地向上”的精神，这种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自觉认识，无愧是代表了五四时期的时代智慧。

① 《欲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38页。

② 据梁敬𬭚：《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载《传记文学》（台北）第八卷第五期。参见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第五章，第一节。

③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80—881页。

④⑤⑥⑦⑧⑨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12、15、16、16、115、35—37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 洪仁玕简论

张 莹 张 磊

〔摘要〕洪仁玕独特的经历和思想，鲜明而又集中地展示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时代特点与发展趋向，而他在太平天国后期所提出的纲领和方案，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中叶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趋势。虽然在洪仁玕的思想与纲领中也存在着问题，但他不愧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农民阶级的代表。从洪仁玕这个人物切入课题，重新审视和剖析19世纪中叶爆发的那一场历史巨变，也许可以解除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一些令人困惑的思虑。

〔关键词〕洪仁玕 太平天国 《资政新篇》 思想和方案

〔作者简介〕张莹，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410；  
张磊，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050。

关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研究，曾经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无论是有关资料或成果，数量颇丰。同时，这桩历史事件虽已离开现实达一个多世纪，但对它的研究却往往受到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变化的明显影响，时而被溢美拔高，抑或被溢恶贬低。关于太平天国历史人物的评价，尤为如此。

科学的研究中不同意见的争论，应当视为积极的现象，一个正确论断或观念的获得，往往需要多次反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学术民主与百家争鸣才是研究工作繁荣进步的前提与条件。只要坚持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发扬优秀的学风和文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锲而不舍，必然会越来越全面、真实、深入地认识历史及其规律。

为了解除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些令人困惑的思虑，我从洪仁玕这个人物切入课题，先由个案着手，重新审视和剖析19世纪中叶爆发的那一场历史巨变。

—

洪仁玕是洪秀全初期政治活动的追随者，又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袖。他的独特的经历和思想，鲜明而又集中地展示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时代特点与发展趋向。可以断言，洪仁玕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早期代表人物，他在学习西方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远超过洪秀全等。

这并非是偶然的，洪仁玕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思想与实践。归根结底，人是环境和情势的产物，虽然前者也会给后者以不可忽视的影响——二者的关系应是互动的。

## 二

洪仁玕于1822年生在广东花县，是洪秀全的从弟。曾在村塾中授课，与冯云山等同为洪秀全初期活动的追随者。1851年金田起义时，洪仁玕因故未能参加。后因逃避清政府的迫害，辗转流亡香港，在那里“授书夷牧”。1854年赴沪，准备前往天京。但因“洋人不肯送”和小刀会起义军“不信为天王之弟”，<sup>①</sup>终未成行。洪仁玕只得再返香港，担任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

直到1859年，洪仁玕才在外人资助下乔装商贾，经粤、鄂、赣等省抵达天京，受到了洪秀全的重用。然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其时已处于降弧阶段。杨韦内讧严重削弱了天国政权，石达开的出走又“将合朝好文武官兵带去”。<sup>②</sup>而作为后期支柱的李秀成、陈玉成则未掌握军政大权，于是出现了洪氏亲贵擅专的不良政治局面。在这种情势下，洪仁玕的政治、军事活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所提出的变革主张。因为“开新朝，必须颁新政”，洪仁玕把自己的主张和方案集中

于《资政新篇》，呈交洪秀全并公开颁布。《资政新篇》的许多建议得到了洪秀全的首肯，但是，同逼近天京的清军进行殊死战斗已成为太平天国的主要任务，这场农民战争也不久覆灭。《资政新篇》与《天朝田亩制度》都未见诸实践，而其原因则大相径庭。

1864年天京城陷时，洪仁玕正奉诏赴浙调兵。他立即急返赴难，在湖州与逃亡的洪天贵会合后转入江西。但在优势的清军追击下，兵败被俘。这年十月，洪仁玕在南昌被“凌迟处死”。<sup>③</sup>作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最具时代特征和顺应历史趋向的思想家，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 三

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后期所提出的纲领和方案，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中叶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趋势。严峻的现实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古老的帝国开始处于从封建“末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崩解过程；但新的历史阶段的帷幕的拉开既非因生产力的突变所导致，亦非以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为契机，而是由资本主义的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所启动。强大的外铄作用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使之形成畸变的、过渡的社会形态。西方国家的入侵在客观上造成传统的社会经济的分解和资本主义的萌发，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以“残酷的统治”截断了中国社会正常的发展途径。外国侵略者与本国统治者逐步相结合，阻抑了任何真正的变革，维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使中国缺乏完整的独立、起码的民主并陷于贫困落后的境地。毫无疑问，只有挣破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枷锁，中国才能获得拯救和发展。但是，无论是统治阶级的“洋务”或“新政”，乃至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和农民战争，都不能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只有完整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引导旧中国循着民主革命——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阶梯上升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于封建“末世”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可能及时产生完整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必须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思潮，并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先驱者们为了拯救与发展祖国不得不承担艰巨的任务，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这是历史的必然。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印度被不列颠统治后的命运时所指出，中国人民也同样未在失掉“旧世界”的同时“获得一个新世界”，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收取“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

显然，洪仁玕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和意义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就在于此。他生在“富而通”的广州附近，又在香港生活和工作了相当时期，对于西方的了解，在同代人中是颇为罕见与突出的。环境对人物的塑造具有重大的作用，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也都诞生于珠江三角洲——如以广州为圆心，他们的故乡的相距半径均为百里左右。当然，洪仁玕自身的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他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善于观察和思索，不局限于传统观念，志在“革故鼎新”。因之，在剧变的近代中国还处在发轫阶段，他已窥见了诸多端倪，开始感悟到时代的脉搏。他出身于农家并投身于农民战争，但又是接触和了解世界较多的知识分子。所以能够超越了农民的眼界和观念，脱出了“向后看”的农业社会主义，淡化了宗教色彩，成为太平天国的一抹亮色。如果断言《天朝田亩制度》的未能实现是由于农民阶级不能开拓历史进程的新局面，那么《资政新篇》仅成文献则是因为缺乏相应社会阶级基础——市民阶级尚未成长起来。缺乏先进社会力量的引导，农民是不可能真正“革故鼎新”的。

显然，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变革主张构成《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洪仁玕的有关思想和方案颇具超前意义，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的眼界和见解。与《天朝田亩制度》相较，《资政新篇》无疑高出了一个阶段或层次。事实上，《天朝田亩制度》用农业社会主义的丝缕所编织成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好图景体现了农民的自发的思想，冲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包含了某些民主主义的因素。但是，处于近代化——它的基础是社会化的大生产——的时代背景和趋势下的回归自然经济的构想只能是空幻的，甚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不应苛求于农民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分散的、个体的

落后生产方式限制了他们的思维，而 19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仍处于萌芽状态。至于洪仁玕的超越，则是同他的经历分不开的，即外铄的作用十分重大，正如容闳所指出：“盖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sup>④</sup>他开始摆脱了农民阶级的思维定式，意识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要仿习西方和进行变革。他称赞俄国彼得大帝到国外学习“邦法、大船、技艺”，所以“百余年来，声威日著。”日本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必出于巧焉”。因之，中国必须“因时制宜，审势而行”，学习外国的“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应当准许“牧司等并教授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sup>⑤</sup>

在经济方面，洪仁玕提出的政策大体仿效西方。他主张发展工业，“兴器皿技术，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并“限制他人仿作”。他重视采掘业，“兴宝藏，凡金银铜铁锡盐琥珀蠟壳琉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小则准乡，大则准县，大大者准省及省外之人来采也。”<sup>⑥</sup>他还主张“兴车马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孚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之利”。<sup>⑦</sup>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洪仁玕关注金融、财政、邮政、保险等举措：“兴银行，倘有百万家财者先将家赀契式禀报入库，然后准领一百五十万银纸，刻以精细花草，盖以国印图章，或银贷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三厘。……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邮政不可轻视，应“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新闻馆以报时事长变，物价低昂。……邮亭由国而立，余准富民纳饷禀明而设”。亦需“兴市镇公司，主官严正，以司工商水陆关税”。西方的保险事业，显然引起了洪仁玕的关注：“外国有兴保人物之例，凡物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定每年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sup>⑧</sup>

洪仁玕的经济主张尽管还较粗糙，但却显然具有资本化的趋向，在社会化的大生产面前，不再感到恐惧与感伤。然而，这种经济纲领还是缺乏相应的社会条件。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开始有商人投资机器制茶、碾米等产业，但市民阶级仍是较小的群体，洪仁玕的经济主张毕竟超前于社会生活的实际。而他所依据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则在本质上倾向于平均主义，认为“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

洪仁玕的政治纲领没有逾越君主制度。但是，对于西方国家的“邦法”、“国法”的了解，蒙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接受了杨韦内讧的惨痛教训，赋予他的政治主张以新的内涵。洪仁玕希冀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sup>⑨</sup>他反对“据立”的“结盟联党”，因为这只会引起严重的消极后果，使得“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持之端”，形成“弱本强末”、“假公济私”的祸患。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则必得加强中枢的实力，同时，“朝发夕至”的火车、轮船及“以泄奸谋”的新闻纸都是这种政治体制赖以存在的重要手段。

当然，洪仁玕的“权归于一”的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因素。他认为“上下情通”极为重要，可使“中无壅塞弄弊者”。此外，还需十分关注“由众下而达于上位”的问题。他为此提出“以收民心公议”的“新闻馆”和“暗柜”，作为通达的中介。

政治清明显然为洪仁玕的理想，他建议设置类似监察机构的新闻官，其职责为“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新闻官具有独立性，“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sup>⑩</sup>他认为这样可使得“奸者股票在诚，忠者清心可表”。此外，还必须“禁私门请谒，以杜卖官鬻爵之弊”。又使官吏各得“俸植”，严惩贪赃枉法的罪行。

为了辅助地方政权，强化行政能力，洪仁玕倡建“市民公会”这种类似地方自治机关的组织，以办理“教育”与“拯困扶危”事宜。同时，民众可举“公义者”为乡官，统率乡兵，管理“洒扫街渠”、“打架攘窃”和“处理民情曲直”。<sup>⑪</sup>显然，这种辅助性组织对提高地方政权的效能有所裨益。

洪仁玕的政治主张，正如他的经济方案一样，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香港和欧美国家的一些政治体制的环节为他所效法，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相较，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因素。如果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美国的议会制、联邦宪法和总统选举等政治体制的重要部分，那么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则侧重于可行的举措。他不仅对西方的政治体制作了肯定性的评价，而且希图引入“天国”。

洪仁玕的文化思想，无疑是《资政新篇》的重要部分。他对传统的封建观念和文化持有一些程度的批判态度，尽管往往带有宗教的色彩。在他看来，儒教并非完满无缺的：“儒教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皆不如福音真道，有公义之罚，又有慈悲之赦，二者兼行。……此理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广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则理明欲去，而万事理矣。”<sup>⑫</sup>在这节并不明确的论述中，洪仁玕对“执中”的中庸主义表示了不满，因为这种观念导致人们循规蹈矩、安于现存的社会秩序，不去进行抗争。他称赞了“福音真道”的“罚”与“赦”，认为对恶人应予惩办；而善良的人们要求改变痛苦生活是合理的，当以宽容允诺待之。正因如此，先前的“一切文契书籍”——包括六经在内，必须删改，各使“弃伪从真，主浮在实”，<sup>⑬</sup>以合于“天情道理”。

洪仁玕指责了导引人们脱离现实，在“清心寡欲”中寻求解脱的佛教和道教，认为从消极出世中谋得幸福的活动只是“妄作”，因为“欲避人于寡欲，不知己心内亦有时往来萦惑于胸中者，舍其本而趋其末，大误世人”。<sup>⑭</sup>同时，他还反对偶像崇拜等陋习，断言它们全是无知觉的木雕泥塑。祀奉偶像只会“招灾”、“变祸”。由此产生的愚昧迷信，更会不利于社会生产——膜拜“田祖”、“社稷”不会带来农业丰收，而痴信风水则有碍开发矿藏。

对当时流行的陈腐的文学的批判，成为洪仁玕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19世纪50到60年代，充斥文坛的是空洞无物、朽败和雕琢的文学。宋明理学的禁锢，吟风弄月的浮薄，百无聊赖的呻吟……表现为“八股”和“神味格律”等形式。无论是八股文、桐城派古文、仿宋的同光体诗与艳体诗词之类，都充溢着没落的气息。洪仁玕对这一切持否定态度，指斥“徒事清谈、抛离事实”的“八股六韵”，认为“三代故习，故言无补，与其读之而今人拘文牵义，不如不读。”<sup>⑮</sup>他嘲笑那些浅薄无聊的诗词：“诗家多大话，读者喜荒唐，花柳轻浮句，偏私浅嫩肠。”<sup>⑯</sup>与文学内容相关的文体引起了他的注目，他毫不含糊地揭示陈腐文字的弊病：“一语也，而抑扬其格”；“一事也，而参差其说。”结果，只会造成“低昂远判”、“曲直难分”的后患。舞文弄墨“无益于事，而大害于事”。所以，“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sup>⑰</sup>洪仁玕对文体强调了朴实的准则，在当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洪仁玕多次强调指出：诵习诗书的主要目的应是服务于社会和实践，文化的效能之一当是“寻求经济之方策”。在学风方面，他反对“日摹经卷”的腐儒习气，确信“仰俯观察之间，定有活泼天机来往胸中，非古医中所有者”。<sup>⑱</sup>只有这样，著述方能“实述其事”、“朴实明晓”和“语语确凿”，做到“毋庸半字虚浮”、“不得一词娇艳”。他在这里实际上把学风与文风联系起来，倡导面向现实的精神。

关于一些迫待解决的社会陋习，洪仁玕的主张显然受到了西方的观念与举措的影响，他谴责人口买卖和蓄奴现象，认为“外国有禁卖子为奴之例。……故准富者请人雇工，不得买奴贻笑外邦。……生女难养，准为女伺，长则出嫁从良”。<sup>⑲</sup>收养他人子女，“不得作奴视之”。他允许“雇工”、“女伺”存在，但准备立法消除人口买卖和蓄奴。至于其他的社会陋习，他也建议禁绝：“禁酒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先要禁为官者，渐次严禁在下，绝其栽植之源，遏其航来之路。”<sup>⑳</sup>还须“禁庙宇寺观……藉其资为医院。又要禁演戏、修斋建醮……转助医院、四民院、学馆等，乃有益于民生实事”。此外，更须“革阴阳八煞之谬，名山利薮，多有金银铜铁锡煤等宝。……动言风煞，致珍宝埋没不能现用。……可不惜哉”。洪仁玕认为革除陋习能够“拯民出于迷昧之途”。而“大有利于民生国用”。

洪仁玕颇为重视劳动者对生产的推动，要求消除“惰民”——“除九流惰民不务正业，……准其

归于正业，焚去一切惑民之说，若每日无三个时辰工夫者，即富贵亦是惰民。”<sup>①</sup>对于不事生产劳动的寄生者，必须采取严厉措施，“准父兄乡老擒送进诸绝域，以警颓风之渐也。”与此同时，他也关注社会救济事业，主张“兴跛盲聋哑院，……请长教以鼓乐书数杂技，不致为废人也”。又“兴鳏寡孤独院，准仁人济施，生则教以书诗各法，死则怜而葬之”。<sup>②</sup>

关于医疗卫生事业及市政建设，洪仁玕亦曾论及：“兴医院，以济疾苦。”至于“屋宇之制”则应“坚固高广”，无需“雕镂刻巧”。街道应当直捷，“新造”及“再建重新者”以之为范，旧路“亦可改直”。<sup>③</sup>

在洪仁玕的思想与纲领中存在着两个重大的问题。首先，他对西方国家的侵略性认识不足。他虽曾因英、法军队“防守”上海而十分愤懑，并对外国商人、传教士斥责了这种“违反了中立的态度”。<sup>④</sup>但他轻信了列强的虚伪，幻想“上帝”的儿女们能够互助。如同当时许多的先进中国人士一样，他也天真地相信只要“内修国政”和“示以信义”就能使西方国家改善对华关系。在《资政新篇》中，他甚至推举了不少英、美传教士，相信他们能够帮助中国的改革。在半殖民地化业已明显的情势下，洪仁玕的这种轻信与幻想的态度肯定具有消极意义。其次，洪仁玕的著述中几乎没有关于土地问题的意见。而土地问题是占最大多数的农民所迫待解决的中心问题，《天朝田亩制度》的重心亦在于此。他没有对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表示异议，但没有在自己——作为农民战争领袖——的政纲中提出土地问题终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缺陷。可以理解的原由是，他赞成《天朝田亩制度》中有关土地的政策，而《资政新篇》主要是对先前天国政策的修改和补充，所以不再重复并无异议的土地政策。

洪仁玕不愧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农民阶级的代表。同时也体现出处于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的最初探索。

在19世纪50年代，尽管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敏感分子开始觉醒，但仿效西方以改革社会的观念与实践远未形成大潮，维新运动的高潮还有待30年后。因此，洪仁玕的思想和纲领带有了先驱的意义。这决不是偶然的。他从贫苦的村庄出走，得以接触了外部世界，而又成为农民战争的领导人物，因而具有了超前的意识和见解。

洪仁玕的思想和纲领带有清晰的农民阶级的印记，他对西方的学习也大体停留在物质、制度文化层面，较为浅陋和不完整，但其进步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由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统治者开始勾结，镇压农民战争及其政权，加以洪仁玕的思想和纲领缺乏相应的社会物质基础，他的命运——同太平天国相同——不可避免地以悲剧告终。历史上的许多改革家和前驱者的结局往往令人扼腕，洪仁玕就是一个例证。

洪仁玕的遭际可以理解，这是“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不可能实现的悲剧的冲突”<sup>⑤</sup>的体现。

①《洪仁玕自述》，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第846页。

②《李秀成自述》，《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第178页。

③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三。

④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7页（徐风万等译）。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第528、534、532—533、536、532、617、525、526、536、536、536、537、537页。

⑯⑰⑱⑲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太平天国》，第616、611、607、604、616、607页。

⑳呤呐：《太平天国亲历记》，《太平天国》，第292—294页。

㉑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第68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 浅论近代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的发展

李芳清

[摘要] 近代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以广州港、香港为主要港口，以工业消费品、农产品等为主要产品，以英、美、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对象。其发展受到历史传统、地理条件、经济环境、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深刻影响。其历史启迪是：发展对外贸易，必须抢抓机遇、主动出击、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区域联合、集成优势、部门协同、全民皆“兵”。

[关键词] 近代 珠江三角洲 对外贸易

[作者简介] 李芳清，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405。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对外开放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之一。为了给我国的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下面就近代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特征、主要原因、历史启迪作简要论述。

## 一、近代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特征

近代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最基本的特征是当时的贸易是不平等贸易。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珠江三角洲的对外开放总体上是被迫的、被动的，贸易逆差很大，我方长期居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其基本特征大致有：

第一，就对外贸易港口而言，广州港、香港是最主要的货物中转站和集散地。近代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港口较多，如澳门、拱北、三水、江门等地均有大小不同的港口。广州的对外贸易港口是华南最大的河口港，具有江海直达、水陆联结的特点，港口运输和内河运输、铁路运输、公路运输互相衔接，四通八达，成为联结国内外的枢纽。广州港以内河航运为主，港口以白鹅潭为中枢，有东、西、南三条主要河道，连接东江、西江和北江。香港（仅就本岛而言）具有天然深水良港，地处珠江口外，转口港地位是在实行自由港政策后逐步确立起来的。1900年，香港在中国外贸总额中占41%，而中国内地在香港外贸总额中则占33%；同年，进出香港的船只达10940艘，总重量为14022167吨。<sup>①</sup>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短短几年的战争间隙里（不包括战争期间），香港转口贸易也发展较快。1930年，香港对外贸易总值为8.1亿元，比1921年的4.3亿元增长了88%。<sup>②</sup>

第二，就对外贸易产品而言，进口商品主要是工业消费品，出口商品主要有农产品、手工业品、五金和矿产品。近代珠江三角洲进口的商品除钢铁、铁器、机器、轮船及成套设备外，主要有：水泥、煤、火柴、煤油、棉纱、洋布等当地缺少而当时需求量又较大的工业消费品。出口的商品则有油、鲜果、蔬菜、肉食蛋品等农产品，这些商品出口的数量很大，但创造的价值不是十分显著；有丝绸、陶瓷、爆竹、草席、草包、砖瓦等手工业品，当时南海、顺德的缫丝业与广州、佛山的丝绸产业相当发达，石湾的陶瓷行销省内外并出口外洋；还有五金和锑、钨、锰、铜等矿产品，1918年，五金及矿产的出口值为3665514关两，占当年广州出口总值的7.2%。

第三，就对外贸易对象而言，英、美、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于支配地位。1840—1874年，珠江三角洲的对外贸易对象以英、美、德三国特别是英国及其附属殖民地国为重点。清朝末年，在广州，英国殖民主义者除扩充了英国商馆之外，还在沙面设置了租界，设立了十多间专门经营对华进出口业务的洋行，并拥有一切治理租界的特权，并在广州先后开设了船坞、海运、洋行、银行等各种企业。1874—1949年，珠江三角洲的对外贸易对象以荷兰、挪威、瑞典、葡萄牙等国家特别是英、德、

法、日、美等国家为重点。1946年1月至1947年6月，广州港从英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商品除各色洋布、棉纺品外，还有毛制品、人造丝、金属及矿砂、机器及工具、车辆和船艇、金属制品、酒类、颜料、油漆、书籍、化学产品、燃料、玻璃等80种。<sup>③</sup>

## 二、近代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发展的原因

近代中国屡遭外敌入侵，政治动荡，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严酷的现实背景下，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发展非常艰难。但它的发展水平还是略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个中原因，主要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有良好的外贸传统和外贸基础。从明清时期开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珠江三角洲便出现了不少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1757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海禁”后，又下令全国的进出口贸易由粤海关一口经营，粤海关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第二年，设立了“十三行”，全国的对外贸易都要经过十三行办理。十三行垄断全国对外贸易时期，为珠江三角洲地区训练了大批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

第二，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珠江三角洲濒临南海，城镇密集，水道发达，河流出口多，水运、海运便捷，是亚太贸易往来的要冲。近代以来，珠江三角洲交通运输业得到了长足发展。1921年，在粤注册的民营轮运企业即拥有资本225万元，包括粤航公司、四邑轮船公司、粤海航运公司三家最大的公司。这三大公司拥有多艘千吨级以上的轮船。有些航线上，华商轮船总吨位超过了外轮，甚至将外轮排出航线。还有通往主要城市的公路、铁路等。这些，都为内销或出口提供了方便。

第三，有浓郁的商业氛围和广阔的商品市场。一方面，珠江三角洲的商人足迹遍布天下，形成了名噪全国的“广州帮”等经商群体，“广货”一度名扬全国并行銷海内外。例如，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除了三年外（1880年、1925年、1926年），每年广东生丝出口均占全国生丝出口的20—37%。另一方面，海内外的商人、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进入珠江三角洲。海内外商人络绎不绝到珠江三角洲经商，国人称之为“走广”。据有关史料记载，清末外省输入广州、南海的商品以大米为大宗，每年价值达840万银元，占输入商品总值的一半。海外商人来的也很多，因为这里既有珠江三角洲丰盛的物产，又有全国的“通番之货”。

第四，受到外敌入侵的强烈刺激和强烈伤害。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割占了香港，葡萄牙篡夺了澳门的管辖权，广州成为“条约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龙被割让给英国，淡水等成为新的通商口岸；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后，法国开始租借广州湾，界内一切全归法国管理，英国在珠江三角洲取得了九龙半岛及其附近岛屿包括大鹏湾和深圳湾在内的租借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卷土重来，1929年英商进出广东口岸的轮船、货物分别比战前的1913年增加30.5%和88.3%，美国增辟了经过香港和珠江三角洲沿海港口的远洋航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中国为主要战场之一，珠江三角洲满目疮痍，在经济上被伤害之深，可谓史无前例。

第五，中国有识之士提出了一些进步的经济思想主张和经济改革措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但客观上也促进过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改革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筹办过被称为机器局的兵工厂，先后设立过广东陆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曾以“西法”练兵，曾在澳门出版过《知新报》；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运动、北伐战争中，《天朝田亩制度》等农民革命家的经济主张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利用外资的思想、商业经济思想等，都对珠江三角洲的对外贸易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 三、近代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发展的历史启示

通过勾勒、分析近代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原因，对比现实生活进行反思，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历史启迪：

第一，发展对外贸易，必须抢抓机遇，主动出击。鸦片战争后，伴随着打开中国大门的虎门的炮

火，珠江三角洲被迫开放了被帝国主义的炮舰所冲破的广大市场，帝国主义国家往往把输入给我们的工业品的价格抬高，而把我们的出口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价格压低，使得珠江三角洲地区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贸易逆差不断加大。这些情况表明，“被动就要挨打”，就要受欺侮，这是历史的血的教训。现在中国政治地位空前提高，而且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贸易是以平等互利为前提的。有这样好的条件和机遇，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要主动进取，以避免像过去那样被人“推着走”、“牵着鼻子走”。

第二，发展对外贸易，必须应对挑战，趋利避害。近代珠江三角洲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是相当严峻的。但是，珠江三角洲人民在种种挑战面前没有屈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抓住战争间隙，珠江三角洲贸易一度繁荣。1913年广东对外贸易高达1.9957亿海关两，相当于1894年的2倍多。1937至1938年，广东的社会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安定，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又在经历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后迅速回升。1938年广东外贸45200万元，相当于1936年的2倍。这些情况表明，即便是面临严峻的挑战，也不是无所作为的。只要我们勇敢地应对挑战，主动积极地把握好有利因素，尽量避免可能带来的种种危害，我们就能取得长足的进步。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应该学习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的先驱们，勇于应对挑战，善于趋利避害。

第三，发展对外贸易，必须区域联合，集成优势。在近代珠江三角洲整个对外贸易过程中，以广州、香港、澳门为龙头的各城市联系合作是十分密切的。珠江三角洲对外开放较早，历史上对外经济联系密切，内部经济联系也十分密切。到近代，历史的因素在推动珠江三角洲产品出口和传统产品生产方面仍然起了很大作用。澳门作为广州的外港，在历史上也曾风云一时。到近代虽然地位有所下降，但仍不失为珠江三角洲对外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最值得一提当然是近代迅速崛起的后起之秀香港。香港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商品走向国际市场上的集散地，也是所有外来商品走向珠江三角洲的集散地。这些情况表明，对外贸易应该弘扬团队精神，加强区域联合，一致对外，应该集中优势，各个击破。现在，香港、澳门已经回归祖国，深圳已崛起为新兴城市，我们尤其要重视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广深港澳四地在对外贸易中的紧密配合。

第四，发展对外贸易，必须部门协同，全民皆“兵”。近代珠江三角洲的对外贸是被迫的、消极的，带有浓重的殖民色彩。但毋庸讳言，这种被迫的开放，客观上也对珠江三角洲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起了某种促进作用。综观近代珠江三角洲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对外开放，特别是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方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对外开放中，经济、政治、文化是互动的，经济中有政治与文化，政治与文化中有经济。为了使我国的对外贸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从事经济工作特别是对外贸易工作的同志要特别主动，要注意经济中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从事政治、文化领域的工作的同志也要协同作战，大力支持，注意政治、文化中的经济内涵，此外，全体公民都要真正树立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的比过去更强的对外开放意识，在对外开放的战场上应该全民皆“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历史和时代的期待和重托。

①②刘泽生：《香港古今》，广州文化出版社，1988年，第146、150、151页。

③程浩：《广州港史》（近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302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政治学 法 学•

# 孟子民本政治理论的内在坎陷

林振武

[摘要] 本文从政治哲学角度考察孟子民本理论，认为其理论存在如下坎陷：从经济（民生）角度认识民，忽略了民的政治权利；寻找权力来源时，主张权力天本，民成为天的表征，民本实乃为民作主；民的权利在常态政治下缺乏表现形式；从人性中寻找政治学基础，体制设计呈相对空白状态。

[关键词] 民本 民生 权力表现形式 人性政治论

[作者简介] 林振武，嘉应学院政法系讲师，哲学硕士，广东 梅州，514015。

在先秦诸子的政治学说中，孟子的“民本”思想引人注目。冯友兰认为民本“乃孟子政治及社会哲学之根本意思”，<sup>①</sup>有研究者将之称为“先秦民本思想的高峰。”<sup>②</sup>自从唐韩愈对孟子大力表彰后，其学说对中国社会政治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古代中国反对暴政的重要理论根据，<sup>③</sup>甚至在近代中国的民主化浪潮中，孟子的思想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sup>④</sup>但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孟子的民本理论进行分析，其民本政治理论内部存在着一些坎陷。

## 一、孟子“民”的权利特征

孟子从民生角度考察民，把民定位为“养生丧死而无憾焉”的经济人，只注意到民的经济权利，忽略了民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要求。

首先，在孟子“民”的多重涵义中，我们注意到民生即民是一个经济主体（或经济人）是其最基本的涵义，或者说民的最基本和最重要权利就是经济权利，这是孟子惟一正面论述的民的权利。孟子反复强调的是民的基本生存需要，如把菽粟比之水火。可以说，他是从满足民的物质生活需要角度来设计民的。而政治方面孟子强调的是民的能力而不是民的权利；孟子把道德作为民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不是本质特征，这是孟子对孔子理论的一个重大修改。在孔子的理论中，民的根本特征是其道德属性，经济主体的涵义次之。

其次，从孟子的理论体系来考虑，我们看到孟子仁政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对民生的关切。孟子认为仁政最基本的内容就是让人民拥有土地、拥有财产，“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滕文公上》）“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滕文公上》）

第三，从后人对孟子思想的理解上，也可以看出民的经济人含义。朱子说：“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sup>⑤</sup>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民生作为政治第一要务，无论统治者或理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把民与经济、生存联系起来。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sup>⑥</sup>“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sup>⑦</sup>晁错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sup>⑧</sup>二程说：“使人遂其生养之道，此大本也。”<sup>⑨</sup>朱子说：“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sup>⑩</sup>陆九渊说：“行仁政所以养民。”<sup>⑪</sup>在民间，中国百姓都强调民以食为天。亚当·斯密曾经评论说：“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sup>⑫</sup>

从民生的角度来理解民的本质，或者说政治以民生为目的，这种说法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只把民生看作是民的惟一特征和要求，就会忽略人的政治地位和权利。把古希腊政治哲学拿来比较一

下孟子的理论，就会发现这一理论的坎陷。亚里士多德认为，财富不能构成公民的特征，而是公民的前提，公民概念应该从政治中去理解。他说：“单纯意义上的公民，就是参与法庭审判和行政统治的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要求。”<sup>⑯</sup>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参予政治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过程，也是一个人德性完满的必由之路。一个人只有参与了某一政体，他才是一位公民。而既能自己出色地统治，又能体面地受治于人是公民的良好德性和重要标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产生的差别：在古希腊，政治是生命第一要务；但在中国，生存是民至高无上的目标。

以上分析说明，孟子政治哲学在研究最基本的概念“民”时，把着重点放在民生的角度上，仅涉及到民的道德特征和一些政治能力，而没有论述民的政治权利。这种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民生）的不平衡是孟子民本政治理论的重大坎陷。

## 二、民与政治权力的起源

由于民没有政治主权，使孟子在研究权力来源时不得不转向天，民成为天意的表征，在君权面前民成为被呵护和怜悯的对象，为民作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旋律。

孟子作为民本路线的重要代表，在权力起源问题上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离娄上》）“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下》）有研究者认为孟子的民本思想具有人民主权的思想，如胡适提出：“孟子的政治哲学很带有尊重民权的意味。”<sup>⑰</sup>

在这里有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需要加以考察：孟子民本权力起源论的含义是什么？他根据什么理由提出这种观点？

对于第一句话历代少有注释。对第二句话，朱子的解释是：“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是民为重也。”<sup>⑱</sup>实际上，这里表述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大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观点。但这句话的经验含义是什么呢？从孟子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民本权力起源论的含义是：得到人民支持的统治者就能获得政治权力。孟子用成汤和西周获得天下的历史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成汤对民实行各种仁政，包括帮助弱者，讨伐无道，结果“民之望，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滕文公下》）周人早期统治者大王，当时住在“邠”的地方，受到外族侵犯，大王用尽各种和好政策，都没有效果，只好对百姓说，外族人是要我们的土地，有道德的人不能因为养人的物而使人受到祸害，我也不能因为土地而让你们受到灾难，所以我准备离开这里搬到岐山去。百姓听了都很感动，纷纷说：“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梁惠王下》）这里的模式就是：统治者对百姓予以各种恩惠，百姓支持统治者，从而使统治者取得天下。

这里有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孟子并不认为任何人只要自己有德行，获得人民支持就可以获得政治权力。人民的支持仅是获得政治权力的必要条件，如果要成为现实，还必须有另外的因素。比如这个人本来就是统治者，或者是受到统治者的推荐。有人问，按德行孔子不是很高吗？为什么他不能取得天下，孟子回答说：“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万章上》）孟子对政治权力有一种神圣的敬畏，他丝毫没有认为民是权力的来源。

那么孟子在什么意义下认为民与政治权力有关呢？孟子提出两条理由：其一，人民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尽心下》）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其二，“民”的意愿是天意的表征。万章问孟子，舜为什么会有天下，是谁给的？孟子说，是天给的。万章又问，是不是天亲自给的？孟子说，不是，天不会说话，天用一种象征来表示自己的意思，这些象征包括神接受其所献上的祭祀，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但最重要的是人民能接受其为统治者。比如舜在尧死后，逃到南河的南边，但天下人仍把他找回来，“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万章上》）事实上，孟子强调的是，只有得到民支持的统治者才具有合法性，但权力并不起源于民，而是源于天。梁启超把古代中国的民本政治理解为“间接的天治主义”<sup>⑲</sup>是很精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这是仅从经济角度理解民而忽略其政治权利的必然结果。

用西方近代民权学说来观照孟子的理论，将会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因为主权在

民的思想是正好与天本主义学说相对立的。罗素曾经说过：“事实上，除这个想象的契约外，他们再想不出什么可替代王权神授说的东西。”<sup>⑯</sup>按照民权论的观点，只有人民才拥有权力。天赋人权是唯一的权力，这是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具有的，它包括诸如自由财产和生命安全等等。由于种种原因（如安全与和平的需要），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人民之间相互订立契约，交出一部分权力组成公共权力。因此统治者的权力源于人民的授与，正如17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家和政治作家密尔顿说：“国王和管理者的权力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不过是派生出来的，是获得的，是人民为了所有人共同的善而委托于他们的，而从根本上说这种权力仍然保留在人民手里。”<sup>⑰</sup>杰斐逊说：“政府是经过受其治理的人民的同意才获得权力的。”<sup>⑱</sup>因此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它是为了保障天赋人权而存在的。正如美国《独立宣言》所言：“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sup>⑲</sup>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民”并不是权力的来源，从孟子的理论逻辑中推论不出权力起源于民，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也看不到权力民源的痕迹。民本决不是人民主权，民是权力眷顾的对象，在权力面前，民是一个被动的受与者，“为民作主”是这种政治思想具典型意义的表述。这是孟子政治哲学的又一坎陷。

### 三、孟子民本的政治表现形式

在孟子的政治学说中，民的重要地位得不到常态政治下的体现，孟子只设计了非常态政治下的民的政治权利的表现形式。

1. 拥戴权。孟子认为，人民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能主动选择贤明的统治者，因此，民用盼望和投奔仁君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从而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兴盛或衰亡。梁襄王问孟子，谁才能统一天下，孟子说：“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梁惠王下》）

2. 革命权。既然仁政是统治的合法性理由和根据，那么，在统治者违反了仁政原则后，人民有权以各种方式来罢免君主和更换统治者。孟子说：“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尽心上》）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是不是臣弑其君？孟子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当然，孟子认为，对于犯有过错的君主，最好先行进谏，如多次反覆仍顽冥不化，“则易位。”（《万章下》）从宗法血缘的观点出发，孟子认为最好由本族的“贵戚之卿”来进行易位行动，但这决不是绝对的限制。

3. 舆论权。民在政治上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这种权利主要表现在对官吏的评论上，君主应按民的舆论来选拔或撤除官吏。孟子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下》）

4. 不合作权。孟子认为，在君王犯有过错，但又还不到推翻其统治程度时，人民有权采取不合作的办法，离开其国家，另投明君。“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万章下》）“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离娄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孟子在设计民的政治权利时，侧重于政治变态时的对策，而缺乏常态政治下的设计。也就是说，民的政治权利多数是在统治者未能很好履行其职责时而使用的，而不是让民有一种权利使君的统治能正常运行。孟子非常注意不要让暴君来压迫人民，所以当暴君出现时，他毫不犹豫斥责他们，直到用暴力方式将其革除。这一点上孟子的革命性是很强的。但是，在常态政治下，人民只有一项舆论权，而这舆论权也仅是一种缺乏制度化形式保障的清议而已。这点孟子连子产都不如，子产还设计了一种学校制度，使民有说话的地方。民既然没有正常的政治参与权，缺乏有效的监督权，也没有表达政治意愿的正常程序和途径，也就失去了在和平的条件下纠错的基本条件。可以说民的政治权利表现形式的空白是孟子政治哲学又一大坎陷。梁启超曾说：“故执政者若违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之法，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sup>⑳</sup>这真是

真知灼见。

#### 四、民本的根据——人性政治论的利与弊

孟子的民本理论以仁政为其主要内容，而仁政源于人性中的恻隐之心，人之性善是仁政的心理学和伦理学基础。也就是说，之所以施行仁政，并不是受到外来压力，而是人性中自然而然的内在冲动，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孙丑上》）

孟子非常强调政治家的道德修养，这种理论并没有什么问题，康德说：“真正的政治若不遵从道德将寸步难行。”<sup>②</sup>但是，如果把政治改善的唯一希望寄托于这点，就很值得加以探讨了。

亚里士多德说：“故一名好的立法者或真正的政治家就不应该一心盼求单纯意义上最优越的政体，他还须考虑到切合城邦实际的最优良的政体。”<sup>③</sup>比如柏拉图，他虽认为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是人（哲学王）拥有全部的权威，但在无法实现时退而求其次，就要确立法律的权威。波普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认为，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如此，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孟子最大的希望就是统治者对民行仁政，但是，他没有能在制度设计上解决这个问题。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君权的限制以内心修养为主；他赋予君主过重的责任。麦迪逊理论的假设提到，如果不受到外部制约的限制，任何既定的个人或个人群体都将对他人施行暴政，而任何权力的集中都将导致外部制约的解除。对于近代民权论者来说，政府权力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人民是自由的。但是，孟子之所以限制君权，是因为民是被照顾的对象。中国古代社会在政治体制上缺乏创新，长期以一种简单的垂直式集权制作为主要的政治体制，这种理论起了很大作用。唐君毅先生认为中国虽无民主制度，但儒家有“最高的民主精神”，“必发展为政治上之民主制度。”看来这种观点过于乐观。梁漱溟先生认为，顺着原有的历史条件，中国不会走向民主，而是另走一条路，这种看法更为切合实际。刘述先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少一个曲折的过程，乃误以为政治只是伦理的延长，以至客观精神永远发展不出来。”<sup>④</sup>这个评论用于孟子政治哲学也甚为恰切。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第145页。

②宋祚胤：《〈先秦民本思想〉序》，游唤民：《先秦民本思想》，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页。

③例如明朝李东阳弘治六年的《应诏陈言奏》，整篇都用孟子的理论来对皇帝进行建议和批评。

④近代从严复的《辟韩》，谭嗣同《仁学》，陈天华《警世钟》都用孟子的民贵君轻的说法来批判专制主义，倡导民主。

⑤⑥朱熹《孟子序说》，见朱注《孟子章句集注》，引自宋元人注《四书五经》，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

⑥《贞观政要·君道》。

⑦《贞观政要·务农》。

⑧《论贵粟疏》。

⑨《经说·卷二》。

⑩《朱文公文集·庚子应诏封书》。

⑪《陆九渊集·杂说》。

⑫亚当·斯密：《论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转引自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⑬⑭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5、176页。

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56页。

⑮⑯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5页。

⑰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2页。

⑱转引自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⑲《杰斐逊文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8页。

⑳《独立宣言》，引自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93页。

㉑康德：《永久和平论》，转引自李小兵《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主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㉒刘述先：《从民本到民主》，见《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中国广播出版社，1992年，第32页。

责任编辑：叶金宝

# 董仲舒的思维方式及其政治归趋

赖美琴

[摘要] 以天地人一体化为依据,董仲舒构建了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董仲舒政治哲学带有明显的趋和、求同、调适、平衡的特征,成为汉代巩固君权、实现“大一统”政治的重要手段。这种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给中国封建主义政治以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天人相参 整体直观 和 中 大一统

[作者简介] 赖美琴,惠州学院教授、博士,广东 惠州,526000。

## 一、天地人一体化的思维方式

董仲舒认为,天地人三者互相贯通、不可分割,融汇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提出天人相参的宇宙观。他说:“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sup>①</sup>为什么天地人三者会构成这样一种关系?因为“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sup>②</sup>也就是说,天地人是构成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容和因素,没有天地人三要素的相依相成,人类社会就不复存在。而且,在天地人三要素中,天人是相副的。“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sup>③</sup>“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sup>④</sup>天人为什么相副?天人关系如何形成?董仲舒对此作了解释。他认为,天的内涵极其博大,涵括了整个宇宙和社会,由自成系统、彼此具有内在生成关系的“十端”组成。“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sup>⑤</sup>“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sup>⑥</sup>天通过阴阳五行与人相联系,于是有了人一样的意志和情感。然后,天又依照自身的形态、规律造出了人,使人具有类天的形体和道德、感情、意志。不过,董仲舒认为,在天地人体系中,人不是消极被动的因素,而肯定人在宇宙中处于中心的地位。“人下长物,上参天地”,“人主之大,天地之参也。”<sup>⑦</sup>

天人相参的宇宙观,反映了秦汉时代人们在思维方式上的重要变化。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有了较多的认识和了解。既承认客观规律、尊重客观规律,又重视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成为当时社会的思想潮流。思想家对此予以充分的关注,“人与天地参”成为他们思考的重要课题。例如,《中庸》认为,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淮南子·要略训》认为,理论学说、思想体系的建立须“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社会政治的治理,五帝三王所定的政教措施亦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吕氏春秋·序意》也说:“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由此可以看到,秦汉时代人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思想家们进行理论的建构以及有关社会政治的看法。注重以天地人三要素综合来观察事物,以整体的观点思考政治问题,成为该时代思维方式的鲜明特点。

董仲舒是汉代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其关于天地人一体化的思维,是汉代思维方式变化的典型表现。董仲舒把天地人看成为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整体,认为天是由复杂多样的因素构成的协调有序发展的体系,强调天地人三者的整体建构和整体功能的发挥,构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种把天与人看成外在相同、内在相通、天人相副的观点,带有明显的整体性和直观性的特征,是一种新的思想观点和思维方法。如果我们去掉其中“天人感应”的神学唯心主义糟粕,显然这种观点和方法带有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和辩证思维的科学因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中不

厌其烦地阐述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和联系，正是体现了董仲舒思维方式的整体性特征。它也从广泛的意义上昭示人们，不管任何人、任何阶级，要在社会立身处世、生存发展或是治国谋政，都必须把天地人诸种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分析、认识和处理，不能只取一端，不及其余，否则就会陷入片面性、极端性之中。

## 二、“大一统”的政治诉求

董仲舒天地人一体化思维方式在政治观上的表现之一是以天为摹本。董仲舒把天、地、人看成万物之本，认为天地是人类社会生存的根本条件，人类的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都离不开天地，融天地人于一体的观点和方法，实质是一种天人政治观。这种天人政治观以天人相副的类比手法，强调人必须仿效于天，社会的精神生活、社会的等级秩序的确定、社会政治的治理等都必须源于天、本于天。当然，董仲舒思想的落脚点并不在于天，而在于人和人类社会，在于汉代的社会政治。其出发点主要是试图从天人关系入手解答时代的政治难题，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长治久安找到“致治”之途。因此，针对汉代中期封建中央皇权与地方诸侯王之间、统治阶级内部核心阶层之间以及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董仲舒提出了相应的政治改革思想和政治改革主张。其主要内容有：（1）以“王道之三纲”<sup>⑧</sup>为准则，规范社会政治关系和等级秩序。“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天之亲阳而疏阴”。<sup>⑨</sup>（2）把“以德治天下”作为治国原则，行教化、施仁政，实现封建统治手法的转换。“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sup>⑩</sup>天之“任德不任刑也。”<sup>⑪</sup>“教，政之本也。”<sup>⑫</sup>“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又）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sup>⑬</sup>（3）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sup>⑭</sup>等具体措施，以缓和阶级利益的尖锐对立和剧烈冲突。“夫天亦有分予。予其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者足”。“使诸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sup>⑮</sup>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到，董仲舒所提出的政治改革思想和政治主张，都以“天意”、“天理”为立论依据，人类社会政治也就是“天”治。这样，天即成为董仲舒推行其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最重要手段。

董仲舒天地人一体化思维方式在政治观上的另一表现就是“中”、“和”的价值取向。在董仲舒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中可以看到，他是力图以阶级关系、阶级利益的调整，以统治方式、政治措施以及意识形态的改变来实现社会政治的稳定、和谐，达到其“中”、“和”的政治价值追求。因为董仲舒所说的“王道之三纲”，即后来《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中所说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将整个封建社会复杂多样的身份和关系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君、父、夫一方为天生的主宰，臣、子、妻一方为天生的从属。这样就从思想上、道德上、制度上三个方面解决了谁主谁从、谁统治谁的问题，它有利于汉代封建统治阶级进行社会的控制和管理，使社会关系有序、规范。“以德治天下”，这体现了董仲舒对儒家以德治国原则的承传，使儒家思想从此登上了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实现了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转换。但是，董仲舒主张以德治天下并不意味着君权的削弱和君主专制的弱化。他所反对的仅是步秦始皇之后的专任刑罚。实际上它是以统治手法的转变来凝聚民心，是维护君主专制政治更高明的“儒术”。阳儒阴法、王霸并用才是董仲舒“以德治天下”思想的本质。董仲舒突出的是教化的政治功能。其目的是以广泛的宣传教育使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规范人心、敦厚风俗的重要手段。使百官成为君主的忠臣，百姓成为君主的顺民。这是刑杀难以企及的统治效果。施仁政，严禁统治者与百姓争利，主张封建统治者实施这种所谓“调均”政策，是因为董仲舒深知只有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要求，才能保证统治者物质利益需求的满足和政治巩固所必须的社会基础。这是董仲舒为防止封建统治者竭泽而渔从而导致社会动乱、政治危机的所谓“妥协”、“退让”之策。董仲舒认为，这些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是治理汉代社会政治的良方妙药，贯彻了这样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大汉帝国就可以实现“中”与“和”的理想局面，达到融洽和谐的最佳政治状态。“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sup>⑯</sup>从实践上

看，董仲舒的这些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确实对调整汉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关系，规范当时的社会秩序，维护汉代政治的稳定，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董仲舒天地人一体化思维的归宿点是“大一统”政治理想。董仲舒虽然不像集法、术、势于一身的法家杰出代表人物韩非那样讴歌极端的君主专制，但他也是君权至上的推崇者。其政治思想、政治主张都以维护君权为最终目的。他说：“《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sup>⑦</sup>“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sup>⑧</sup>“一”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又是天地运行的规律。与此相应，人类社会也应是一统政治，君权的至上性、神圣性是天经地义的。董仲舒还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sup>⑨</sup>“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sup>⑩</sup>“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sup>⑪</sup>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以君权天予说为君权至上作论证，并非神秘主义的简单回复，它实际上是维护君主一统政治的理性表现。因为它既肯定了“三纲”的合理性，使君主处于社会各种关系的最顶端，还肯定了“天为君纲”，利用天威给君权以一定的约束，从而更好地维护了君主统治。由于董仲舒在对历史教训的思考中已经认识到，君主个人的权力过大往往会使走向反面，桀、纣与秦王的悲剧早已证实了这一真理。怎样以“天”制君？董仲舒又重提“天谴说”。他说：“《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sup>⑫</sup>“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sup>⑬</sup>董仲舒认为社会政治之道与天道是一致的。“天”关心着、监督着君主的所作所为，视其好坏予以一定的奖惩责罚。如果君主实行仁政德治、勤勉爱民，这就是行天之道，天就会呈“祥瑞”、予以奖励。如果由于君主滥用权力胡作非为或政策措施不当，引起社会不满甚至产生社会政治动乱、危机之时，使国家有“失道之败”，这就是“逆天”，天就会以灾异予以责罚。“天谴说”虽非董仲舒的发明，但是把“天谴说”应用于政治实践，成为警示君主注意调整阶级利益关系，及时处理政治矛盾、化解危机，从而成为巩固君权的手段，确以董仲舒为典型。不过，董仲舒以“天”制君的政治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它除了能对君主形成某些道德上或心理上的威慑外，并没其他的约束力和强制力。

人类历史的演进证明，在社会政治稳定时期，即事物变化处于量变阶段，它体现的是矛盾统一体处于平衡、协调的状态。要保持和巩固这种政治统一体，相应的是整体至上、和谐为本的思维。在社会的动荡和变革时期，即事物变化进入质变阶段，面临的是矛盾统一体的分解、破裂以及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要使新生的、进步的、革命的力量战胜反动的、腐朽的、没落的势力，实现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型，相应的则是对立、对抗的思维。大秦帝国的产生虽然结束了中国诸侯割据、动荡纷争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但是秦氏父子没有适时实现政治指导思想上的转换，而是继续奉行法家思想，甚至把韩非的绝对专制主义推到极至，实行皇帝极权和重罚主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结果不时而亡。董仲舒从秦帝国的速亡中认识到了极端的专制和暴政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十分清楚人民在“穷急愁苦”时为生存而表现出来的无法驾驭的反抗力量。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思想家，他更多的是考虑如何维护统治阶级整体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使大汉帝国统治巩固、持久。董仲舒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正是封建地主阶级由志得意满、激情冲动走向理性深沉、自觉成熟的集中表现，深刻反映了汉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封建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

①②《春秋繁露·立元神》。

③《春秋繁露·阴阳义》。

④⑤《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⑤《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⑥《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⑦⑩⑫《汉书·董仲舒传》。

⑧⑨⑪《春秋繁露·基义》。

⑫《春秋繁露·精华》。

⑬《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⑭《汉书·食货志》。

⑮《春秋繁露·度制》。

⑯《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⑰《春秋繁露·重政》。

⑱《春秋繁露·天道无二》。

⑲《春秋繁露·玉杯》。

⑳《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㉑《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责任编辑：叶金宝

# 简评刑法与伦理的关系

黄瑞敏

(中山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广东 广州, 510275)

在当代中国的刑事立法中, “以礼入法”已经没有丝毫痕迹了, 举凡犯罪、刑事责任、刑罚都不会因为当事人身份关系而有所不同, 当然, 以身份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犯罪除外。然而, 人们却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即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对立, 及其造成的对法律的规避。这里所谓的民间法是指一种潜在的, 在社会中衍生的、为社会所接受的规则。民间法的资源并非完全来自民间, 民间法必定会受到历史上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比如儒家传统。

现代社会要确立司法的权威性, 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获得公众的信任。专业性的法律家对司法领域的垄断性控制, 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发展趋势。然而司法的垄断使得司法系统趋向于封闭和官僚, 日益与民众隔膜, 使民众对司法丧失信任, 从而最终摧毁司法权威性的根基。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实现司法的社会化, 以确立司法的权威性。尊重法律的文化, 尊重习俗, 才能推动民众价值和情感的输入, 从而使法律制度合法化。<sup>①</sup>因此, 合理的确定刑法的伦理底限, 在笔者看来是十分必要的。

## 一、刑法与道德

刑罚与伦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 但是, 它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 都是被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在维护社会方面, 道德与法律共同执行着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的职能。因此, 刑法的适用不能完全脱离伦理的因素。日本著名的刑法学家小野清一郎认为, 伦理规范是国家法律的根底。法属于人伦的、伦理世界中的一种规范秩序, 是被政治和权力所保障的秩序。凡是伦理秩序都是扎根于人类存在的基础的, 特别是法秩序, 更是和人类存在中的现实利益相结合的。<sup>②</sup>因此, 应当把刑法作为根本上是以伦理的, 即人伦关系中的实践的道理或条理为根基的东西。

道德虽然直接源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利益关系, 并终将随其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 这种源与流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因果决定论关系, 而是相互作用和制约的辩证关系。同时, 道德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现象, 带有强烈的民族习惯性和特殊性, 在发展过程中往往有着特殊的历史惰性。新的道德观念和旧的道德观念常常构成某种内的文化紧张和文化冲突, 这种紧张和冲突本身就作为一种文化事实长期存在。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冲突也是如此。冲突的存在本身说明在现有的条件下传统道德存在的合理性, 社会主义道德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与传统道德相协调而不是否定后者。因此, 在刑法的民族性问题上, 就必须客观解决社会主义刑法与仍普遍存在的以家庭血缘为基础的人伦道德的关系问题。

我国刑法对同居相为隐不为罪持否定态度, 但在当前家庭仍是社会基本细胞, 人伦关系仍是人际关系之基础的情况下, 如何处理好人伦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矛盾, 仍是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对于亲属犯罪予以包庇者一律定罪处刑, 与当前社会的伦理道德不符。两者不能合理的定位, 使得司法实践中, 与此相联系的法条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 二、刑法与文化

“文化”是一个涵义极为丰富的概念。广义文化可分为三层次: 表层的器物文化; 中层的制度文化; 深层的精神文化, 即狭义文化, 专指人类实践重大精神创造活动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心理、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人伦观念、审美情趣等。

刑法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其次才是一个法律现象。从终极关怀上讲，要求刑法最后、最高、最深层次的阐释与论证，必须采用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因为刑法是由文化塑造出来的。刑法文化就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决定的、在历史进程中沉积下来的，并在人们关于刑法认识和刑法实践活动中流变着的、普遍而恒常的集体性精神模式、指向。<sup>③</sup>

思维方式是文化合理性的基础。一种稳定的、模式化的文化在它所影响的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暗含于思维方式中的东西视为合理。在一定意义上，刑法文化主要就是一种集体性思维方式。文化对人的作用具有不自觉性、无意识性。而法律、刑法在创制与适用，犯罪及人们对犯罪的反应都受到文化的作用。犯罪行为实际上是犯罪者个体背离集体文化的一种反映，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文化失调的一种反应。在刑法上，某些行为之所以被认为是犯罪，是因为这些行为和社会的主流文化、集体性利益有矛盾。

文化一经形成，就会稳定地、连续的发挥作用，以潜意识的形式沉积在人们的心里，以无形而巨大的力量和容纳修改着新的社会关系。隐形的刑法文化早已渗入中华民族的记忆库存中，顽强地发挥着作用，释放着能量。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于其习俗之中，习俗对法律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的作用。法律如果违背习俗将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法律不失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在这种过程和事业中，规则只有在制度、程序、价值和思想方式的具体关系中才具有意义。从这种广阔的前景出发，法律渊源不仅包括立法者的意志，而且也包括公众的理性和良心，以及他们的习俗和惯例。<sup>④</sup>孟德斯鸠将习俗比喻为“一般的精神”，将法律比喻为“特殊的制度”，他认为，推翻前一个比变更后一个更危险。法律必须在原有的文化中寻找其立足点。

中国文化强调“人”，有悠久的人文的传统，但是这里所说的“人”不是个体的人，而是集体的人，是纯粹的道德人。“仁者，人也。”<sup>⑤</sup>可见，在中国文化中道德对于人来说是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在道德、仁、礼相连的网中，个体不是独立自由的，而是具有“分亲疏”的等差人际关系。

在考察中国古代刑法时会发现，伦理刑法是一种文化现象，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会被延传成为传统。伦理刑法传统的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培育这一刑法样式的社会生活基础的存在。伦理刑法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然而，“近现代中国经济生活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体系。”<sup>⑥</sup>小农经济仍然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宗法家族制的社会构造是伦理刑法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至今中国的商品经济建设也没有完全摧毁这种社会组织基础，在一些地区宗法家族的势力仍极强大。儒家学说是伦理刑法的意识形态基础，今天儒家学说虽然不再是官方意识形态了，然而它仍然潜隐在普遍的社会意识中。更重要的是，文化是人创造的，传统总是人的传统，而人是历史的存在的。“历史事实证明，任何发展只能是内在于文化传统的历史性演进。一旦脱离文化传统，任何善良的设想与行为都有可能获得相反的结果。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存在，文化在历史中凝聚为思想与实践的传统。这个逻辑表明人的确是传统的存在，是在传统精神的推动下自己发展自己的存在。不可能有离开人的传统，同样不可能有离开传统的人。”<sup>⑦</sup>

因此，笔者认为，建立具有伦理底线的刑法，既是促进社会法制文明的要求，也是法治社会保障人权的司法需求，更是实现司法谋取更大社会利益的正当做法。

<sup>①</sup>参见劳东燕《自由心证制度的当代命运》，《刑法学评论》2001年第9卷。

<sup>②</sup> [日] 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

<sup>③</sup>许发民：《刑法文化与刑法现代化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

<sup>④</sup>参见 [美]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sup>⑤</sup>参见《中庸 19 章》。

<sup>⑥</sup>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sup>⑦</sup>高清海、胡海波：《文化传统的当代意义》，《新华文摘》1998年第4期。

•文化 教育•

# 为了每位学生发展的高中课程改革

刘达中

[摘要] 目前开始进行的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关系到我国人才培养大计，目标是要发展每位学生的兴趣、特长和潜质，将会对相关改革产生影响，它体现出结构多样化、内容多层次、注重多实践以及学分制等构成体系的特点，有利于满足社会对人才多样性和创造性的需要。

[关键词] 高中新课程 课程改革 广东 实验区

[作者简介] 刘达中，国家督学，广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咨询组成员，广东省教育学会，510035。

日前，一位教学研究员就高中课程改革有关问题与笔者讨论，恰逢《学术研究》约写有关高中课程改革的文章，现将讨论整理付稿，供读者参考。

研究员问：广东省于2004年秋将启动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实验，此信息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教育界尤为关注。2007年高考也可能适应这种课程改革而由广东单独命题。您认为，我省进行这种改革的意义在哪里？

刘答：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全国的前列。相应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高考改革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九年义务教育沿海版教材、丁有宽小学语文教材、中小学信息技术教材和小学英语教材的开发与建设；标准化考试、“3+X”、“3+X+综合”的高考改革，都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这些改革，推进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对在统一基本要求前提下的教材多样化、对学生在高考中的选择性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也积累了经验，为继续开展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打下了基础。

随着知识经济新时代的到来，面对新科技的迅猛发展，现行基础教育课程存在的观念滞后、内容陈旧、结构单一、要求划一、管理一统等一系列的弊端越来越凸现出来。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实施，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教育部于2001年6月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同时，颁布了义务教育新课程方案及18个学科课程标准。2003年4月，又颁布了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及15个学科课程标准。2001年9月，我省深圳市南山区作为全国38个实验区之一，开始做义务教育新课程方案实验。去年9月，我省实验区扩大到31个县、区。今年9月，将扩大到75个县、区。明年9月，全省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将全部进行新课程方案的实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有勇气、有决心、有信心全面投入关系到人才培养大计的课程改革实验，可以说，这次课程改革也是“为了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

研究员问：课程改革涉及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标准、课程实施、课程资源、课程管理、教材教法、评价体系、师资建设、保障系统等方面。您认为，这次高中课程改革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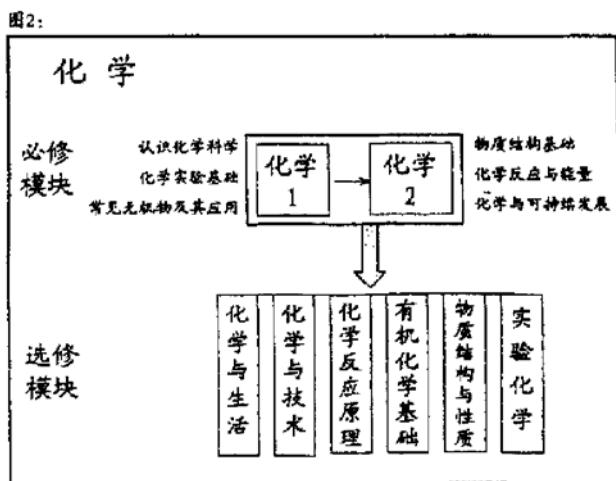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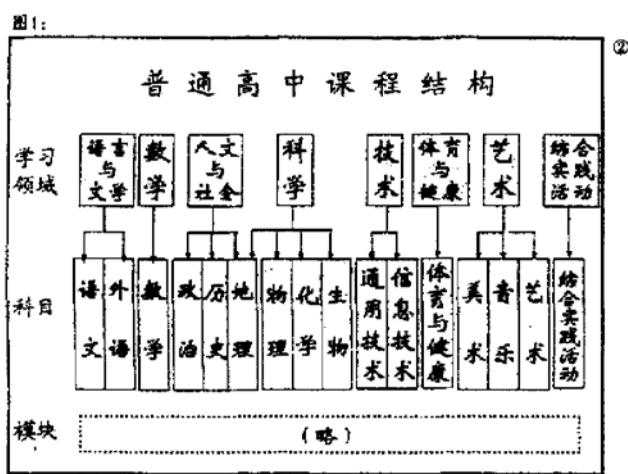
刘答：“课程改革的目标是围绕人的培养目标来设计和确立的。”<sup>①</sup>党的十六大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我国教育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技术创新人才。课程改革正是“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而涉及上述诸方面改革的复杂而细致的系统工程。这里，不可能就上述诸方面改革作全面深刻的阐述，但我想试用“四多一制”来概述这次课程改革的突出特点：“多样化、多层次、多实践、多选择，学分制。”就是说，这次改革，体现了课程结构多样化、课

程内容多层次、课程实施注重多实践，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潜质去面对课程教材作多种选择，为此，建立了学分制的课程管理评价体系。

研究员问：传统的高中课程结构的显著特点是“同一性”。它要求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学校、每一位学生都按同一的要求学习同一的课程，而且，以同一份高考试卷作为“过滤器”，将“不合格者”滤掉。这种单一型的课程结构的弊端是显然的。新的高中课程结构如何体现其多样化？意义何在？

刘答：课程结构的多样化，是社会要求教育培养多样化人才的需要，也是由人的多样性决定的。新课程结构的多样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 课程设置多样化。如图1所示，普通高中课程由学习领域、科目、模块三个层次构成。新课程设置八个学习领域，每一个学习领域由课程价值相近的若干科目组成，每个科目由若干模块组成。学习领域的设置，要求学生每一学年在所有领域都获得一定学分，既防止学生过早偏科，又避免并学的科目过多，确保打好基础。而且，在学习领域中，“综合实践活动”是与各学科课程领域有本质区别的新课程领域。



2. 课程实施多样化。组成科目的每个模块都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并围绕某一特定内容，整合学生经验和社会生活内容，构成相对完整的单元。在组成科目的模块中，又分必修课和选修课，如图2所示。必修课在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共性，选修课在于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

模块的设置，利于解决学校科目设置相对稳定与现代科学迅猛发展的矛盾，有利于学校充分利用教师、场地、设备等资源，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为学校有特色的发展创造条件；有利于学生自主选择课程并能够及时调整，形成个性化的课程习修计划。

3. 课程管理多样化。学校课程改变了课程管理大一统的现状，分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国家课程体现国家意志；地方课程满足地方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校本课程展示学校办学宗旨与特色。它规定以10%—20%的课时让学生选修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这就为创造性地实施国家课程，因地制宜地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以及学生有效选择课程提供了保障。

4. 课程教材多样化。任何有条件的团体或个人，都可以根据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编写教材，经教材审定部门审定通过，就可供学校选用。这样，教材多样化的局面就可逐步形成。

研究员问：课程内容的层次性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在“3+X”、“3+X+综合”的高考改革中，学生对“X”学科有了选择，但在“3”个必考学科中，却都是同一个尺度的要求，显然，这是不利于禀赋、兴趣、志向不同的“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新的高中课程如何体现课程的层次性？

刘答：高考中用同一张数学试卷、同一个尺度对不同专业志向的所有考生进行筛选，迫使每一位

学生都只能按同一标准去学习数学。这样的课程标准和考试评价方法，使许多具有良好潜质的文学家、艺术家等人才难以造就出来。<sup>③</sup>

新的课程标准充分考虑学生学习水平的差异及学习兴趣的不同，依照社会发展对人才类型的不同需求、学生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学习水平，设定了多种课程的内容标准。如数学课程就设定了“高、中、易”三种标准让学生自主选择。相应地，在高考改革中，将对不同专业的考生，给予不同标准要求的数学试卷。这样，就形成“人人要读数学，但读不同的数学”的局面。其他必修课程也依据个人的兴趣、特长和发展需求选择相应的标准来学习。在阶段学习中还可根据实际情况作调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为每一位学生的成长提供了最佳的课程模式。

这种多样化、多层次的课程设置、课程标准和考试办法，在世界不少国家已有探索、实践。在世纪之交，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的新需求，许多国家正在深化这方面的教育改革。如德国原来的课程设置由于选择性不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抨击，导致了这个国家上世纪 90 年代“让每一个学生的特长得到充分发展”的全面课程改革。美国总统也于 2001 年初发表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改革计划。我国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是在继承我们的课程有较好的“基础性”的前提下来实现层次性、选择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应在坚持使学生普遍达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有一定的层次性和选择性，并开设选修课程，以利于学生获得更多的选择和发展的机会，为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高中数学课程为例：<sup>④</sup>

1. 必修课程。分必修 1、必修 2、必修 3 三个模块，共 8 个学分，是高中生必须学习的内容。一般在高中一年级学习。

2. 选修课程。由数学 A、数学 B1、数学 B2、数学 B3、数学 C1、数学 C2、数学 C3、数据处理及数学与社会这 9 个模块构成。

3. 课程组合。学生的志向与自身的条件不同，不同高校、不同专业对学生数学方面的要求也不同。学生可自主选择不同的课程组合。

第一种：获得必修课程的 8 学分，并在选修课程中任意选择 2 个模块获得 4 学分。它是高中学生毕业的最低要求，也可作为进入高职、体育、艺术院校的最低要求。

第二种：获得必修课程的 8 学分，在选修课程 C1、C2、C3 与数据处理模块中获得 7 学分，在其它模块中获得 4 学分。它是进入人文社科类院校的最低要求。

第三种：获得必修课程的 8 学分，在选修课程 B1、B2、B3 和数据处理模块中获得 10 学分，在其它模块中获 4 学分。它是进入理工经济类院校的最低要求。

数学 A 课程是为对数学有兴趣，希望获得较高数学素养的学生设计的。选修数学 A 课程获得 4 学分后，可取得证书作为进入某些院校、某些专业的重要参考。这有利于具有较高数学禀赋的学生脱颖而出，也有利于某些院校选拔对数学有较高要求的人才。

研究员问：“重理论灌输、轻实践活动”也是传统课程的一大弊端，新课程体系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刘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在学科课程实施中，高中新课程加强了实验、实践、探究的活动。如普通高中数学课程内增加了“数学建模”、“探究性课题”、“数学文化”三个板块，贯穿于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各个模块之中，为学生探索实践、动手动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纲要》在规定新课程结构时提出：“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作为必修课，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及劳动与技术教育。”综合实践活动以“必修

学分”作保障，强调学生亲身经历和体验，在“做”、“考察”、“实践”、“探究”等一系列的活动中发现和解决问题，体验和感受生活，发展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实践活动的开发和实施过程中，鼓励学生自主选择，为其个性充分发展创造空间。探究实践活动是与学科课程本质不同的新课程领域，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结构性的突破。

许多国家都把综合实践活动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列入课程结构之中。这个课程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如在主题探究或课题研究方面——有自然探究领域、社会探究领域：粮食、人口、资源、土地、能源、有害物质、人类健康与疾病、市场、就业、社区历史、民族文化、经济危机、生存危机等；在社会实践方面——有社会服务、社会考察、社会公益活动等；在生活实践方面——有生活技能训练、生活科技运用与创造活动等。在实施这门课程中，必须根据时代、社会、社区和个人发展的实际，引导学生选择实践学习的项目，还要建立科学、合理、可有效操作的评价机制。

研究员问：新课程体系注重多样化、多层次、多实践，使学生有更多的自主选择的发展空间。“学分制”正是适应这种“多”和保障这种“多”的一种课程评价和课程管理的科学机制。关于课程评价、考试改革、特别是高考命题、招生改革等方面又如何适应新课程体系而确立呢？

刘答：课程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新课程的实施必然牵涉到课程评价、教学评价、学习评价及各类考试的变革，也牵涉到教师角色的转换、教学方法、学习方式的转变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我省曾提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编写要与教育科学研究、教法学法改革、考试及评价改革（含高考改革）、师资培训培养、信息软件建设、教参及教仪开发等同步开展。三几年后的高考命题与招生的改革将是大家十分关注、教育部门非常重视的研究课题。我们在上面介绍的数学课程组合中，已为高考的命题、招生提供了变革的思路。高中实行学分制，也将对高校招生产生作用。有的国家在高考招生命题中解决“多样性”、“多层次”问题的办法或可为我们作借鉴。我这里有一份澳大利亚高考物理试卷，共 52 页，每页一道题。前 25 题是每位参加物理考试的考生必答的，后面题目是根据不同教材来命题的。每种教材一道题。考生只要答自己学习的教材那一道题就行了。多答的则作为录取的参考。这个国家每年高考前，会向社会公布在该区域招生的每所高校每个专业需考什么学科、哪一个“层次”的学科。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实际选择报考的学校与专业。考完后，还可根据考试成绩对报考志愿作一次调整。由于学生的学习、实践、考试、升学以至就业，都有很多的选择，这就给每位学生的成长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这次课程改革被认为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课程改革时代。这种改革，不只是教育内部的事，而是一个社会化的工程。它意味着我国学习型社会的形成与不断完善。负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广东省，从明年秋起“率先”全面启动高中课程改革实验，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事情。笔者在调研中，听到许多同志建议，希望在全社会进行课程改革大宣传、大讨论，使民众了解课程改革的实质和意义，转变思想观念，形成社会合力。最早投入课程改革实验的深圳南山区的同志还建议，建立由社会各有关方面专家组成的课程改革专门委员会。专委会设立若干个相关的学术机构与工作机构，对高中课程改革的重大问题以及与课改有关的衔接问题、配套问题，提供决策研究，开展科学有序的工作。有些问题，可在社会公布、讨论。专委会或可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定若干年换一届，每届换出一定比例人员，以保持人员的相对稳定性和改革工作的整体性、连续性和长期性，确保课程改革获得更大成功。

①钟启泉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②朱慕菊：《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介绍》，2003 年 2 月演讲稿。

③刘达中：《关于素质教育的思考》，《人民教育》1993 年第 10 期。

④国家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制订组：《〈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框架设想（征求意见稿）》，《课程、教材、教法》2002 年 4 月。

责任编辑：陶原珂

# 评新保守主义思潮 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调

刘炎生

[摘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开创中国的现代文化、艺术，树立科学精神，推进民主建设等，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她在开辟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路的同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更不能说她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新保守主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否定，违背了事理本相。

[关键词] 五四新文化运动 传统 新文学 新保守主义

[作者简介] 刘炎生，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631。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我国学术界早已有了定论。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却出现了一股新保守主义思潮，强调继承传统，对它持否定的看法。这是完全违背事理的本相的。很有必要加以澄清，以正视听。

这种看法，最先出现于海外的学者。如，林毓生1986年出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全盘性反传统”，并说“五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激进地拒斥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余英时于1988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纪念讲座中，发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讲演，认为“‘五四’的领袖则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直截了当地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特色：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杜维明称“五四”和义和团是偏颇的“两极”。<sup>①</sup>唐德刚则说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胡适在内，都是感情用事的，而这种行为在“文革”时“勃然再起”。<sup>②</sup>

在他们的影响下，国内也有一批学者极力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如：郑敏于1993年第3期《文学评论》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认为“我们20世纪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和对语言理论的缺乏认识，决定了这些负面的必然出现。”“凡是经过我们自己时代的文化革命的人都不难识出这股涤荡污泥浊水的‘革命’气势，和砸烂古迹，打倒孔家店的激烈情绪，并在回首当年时，心有余悸地理解这股在‘革命’的名义下掩盖的对文化的摧毁和后患无穷的急躁。”又如陈来也曾在其《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sup>③</sup>一文中说：“‘文化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学人也有类似的说法，此处不一一列举。

从这些论调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过激的，全盘性反传统的，产生了深远的恶劣影响，使过激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成为主流思潮，甚至导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过激和全盘性反传统的呢？王元化曾发表《为“五四”精神一辩》<sup>④</sup>一文，表示不同意“全盘性反传统”的说法，可谓申张了正气。他认为说“五四”是“反传统”的，这有过于笼统之嫌，而且论述有欠深入；其实，应该说“五四”只是反对不好的传统的，不宜笼统称之为反传统。理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先驱者没有提出过全盘抛弃文化传统的主张。相反的

是，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一定的分析并区别对待的，即有否定，也有肯定。这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sup>⑤</sup>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sup>⑥</sup>两篇具有宣言意义的文章中，有充分的体现。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固然称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但没有完全否定传统的文学，而是有不少的肯定，认为“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千古也。”这明明肯定了庄周、陶渊明、杜甫、辛弃疾和施耐庵的作品，没有丝毫贬抑。同时，他又认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这不也是对中国自周秦至明代的文学发展变化和各有特色作了肯定吗？此外，他还指出：“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显然，他对唐宋诗词和元代戏剧予以充分的肯定，胡适在倡导文学革新时，根本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学的问题。其实，他最为不满和否定的，只是陈腐不堪的骈体文之类和“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

同时，胡适曾主张，“今日之中国”，“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之文学。”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不能看作不要传统，或全盘性反传统。因为文学贵在新颖，独创，不用说摹仿古人不好，就是摹仿今人也难以出类拔萃。至于他有过“全盘西化”<sup>⑦</sup>的主张，那不过是一时用词有欠准确而已，未能准确地表达其本意。所以，他后来公开检讨承认这说法有语病，并改之为“充分世界化”。<sup>⑧</sup>这也表明他虽然提倡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但并非要把传统文化全部否定。

此外，在语言文字方面，胡适曾提倡“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和“不避俗字俗语”。所谓“务去烂调套语”，即“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所谓“不用典”，即反对借用“陈言”来代替“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所谓“不避俗字俗语”，即提倡用白话和俚语写作。与此同时，他还主张“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可见，他是从总体上反对用文言写作，但不等于不要吸收仍具有生命力的文言词汇。

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的有关主张比胡适的言论更为激进，但也不是全盘性反传统的。怎样看待他提出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呢？（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提倡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是指用写实方法写作的跟社会和国家民生有关的文学，这显然是正确的主张。而他反对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尽管有嫌宽泛，不很严密，但不能理解为全盘否定传统文学。因为在这三种文学前面都有限制词，界定了范围，即那些“雕琢的阿谀的”、“陈腐的铺张的”和“过于迂晦的艰涩的”封建文学，才属于必须“推倒”之列。

同时，在陈独秀所作的具体阐述中，对我国古代文学也有不少肯定。譬如，称“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言，非不斐然可观。”“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垛之习，风会所趋……一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唐代诸小说家作品的内容“丰富”。“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施耐庵、曹雪芹等皆为文豪。而他极力排斥或“推倒”的只是汉赋、骈文、八股试帖、排律、载道之文，明代前后七子和八家文派的“刻意模古”诗文，以及桐城派和江西

诗派等。可见，陈独秀的思想的确颇为激进，但并不是持全盘性反传统的态度。

至于当时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校长蔡元培，则一直持着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原则，既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又不反对研究和弘扬国学。那就更不是全盘性反传统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说成“过激”和“全盘性反传统”的一个所谓根据，是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态度问题。“五四”期间，林纾就曾指责新文化运动先驱者“覆孔孟，铲伦常”。<sup>⑨</sup>其实，这是言过其实的，新文化先驱者只是反对孔教，而且是无可非议的。所谓孔教，是康有为于1902年在新加坡开始提倡的，并集捐了二十余万元建了一座孔子大庙，曾受到梁启超的非议和反对。1912年10月，康有为又在北京组织孔教会，自任会长（张勋为名誉会长）。次年6月，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不久，孔教会代表陈奂章、严复、夏曾佑等上书参政两院，提交了“请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称“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由来也。”“中国之道德源于孔子……故中国当仍奉孔教为国教。”1913年6月，袁世凯通令各省“尊崇孔圣”，“举行祀孔典礼”。9月，袁世凯亲至孔庙，身穿古代大礼服，头戴平天冠，行三跪九叩大礼，演出民国以来第一出祀孔丑剧。1916年8月，袁世凯暴卒后，国会在宪法会议上就要不要将孔教定为国教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由国民党员为主组成的宪法商榷会予以反对，而参、政两院中却有一百多名议员坚持将孔教定为国教，成立了“国教维持会”，通电全国，“吁请”各省督军支持。于是，各地守旧势力、尊孔会、军阀政客、宿儒、士绅纷纷上书赞成定孔教为国教。康有为趁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政府，呈请“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跪拜礼。”同年，他又致电北京政府，请求“立饬各省祀孔子，则行跪拜礼”，认为“万国礼教无不跪，中国国民不拜天，不奉耶、回，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用？”可见，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守旧派，将孔子学说尊为孔教，进而又定为国教，完全把它弄成一种宗教迷信，要全国上下顶礼膜拜。而且，这也起到了为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服务的作用。因而，新文化阵营曾坚决加以反对。易沙白率先在《青年杂志》一卷六号上发表《孔子评议》一文，陈独秀先后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答俞颂华（宗教与孔子）》、《再答俞颂华（孔教）》和《答〈新青年〉爱读者（孔教）》<sup>⑩</sup>等文。吴虞曾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sup>⑪</sup>等文。鲁迅则发表了《随想录·三十三》、《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狂人日记》<sup>⑫</sup>等文章和小说。统观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指出孔子的思想学说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和人生的需要，抨击历来的统治者利用礼教“吃人”，反对利用孔教称帝复辟，揭露孔子本人有可非议之处。对于孔子及其学说，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认为“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sup>⑬</sup>“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及忠恕之道不足取”。<sup>⑭</sup>吴虞除了表示不能接受胡适称他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说法外，还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sup>⑮</sup>李大钊肯定孔子在其所处时代“确是为其社会之中枢，确是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是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sup>⑯</sup>蔡元培则明确指出：“惟《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孔教会专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亦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sup>⑰</sup>要是从时代发展需要的高度来看待新文化阵营对孔教的批判，无疑是无可厚非的，更不能把它视为新文化运动“全盘性反传统”的“罪证”。

也许可以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过激和全盘否定传统的所谓根据，是钱玄同当时说过“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他于1918年5月14日致陈独秀的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并提出以世界语代替汉语。应该怎样看待他的这些看法呢？我认为，前者是针对守旧派而发的愤激之言，而且桐城派散文是以艰涩的文言写的尊古蔑今之文，刘师培玩弄的“文选”则大都是骈体之类，均属可以反对之列的。对于后者，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汉字的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在《新民说》中指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不统一，是言文分，不是言文合，存在许多弊端。他说，“言文分，则非

多读古书，通古义，不足以语于学问，故近数百年来学者，往往瘁毕生精力说文尔雅之学，无余裕以从事于实用……言文分而主衍形者，则苍颉篇三千字，斯为字母者三千，说文九千字，斯为字母者九千，康熙字典四万字，斯为字母者四万。夫学二三十字母，与学三千、九千、四万之字母，其难易相去何如。故泰西、日本妇孺可以操笔札，车夫可以读新闻，而吾中国或有就学十年，而冬烘之脑袋如故也……我国民既不得疲精力以学难学之文字，学成者故不及什一，即成者，而犹于当世应用之新事物新学理，多所隔阂……而思想之传播所以独迟也。”<sup>⑯</sup>这见解，无疑是十分中肯而透彻的。而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的理由，跟梁启超的观点大致相同。他说，“我要爽爽快快地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今日在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sup>⑰</sup>他们所说的，无疑是客观存在的。即是说，主张废除汉字并不是胡言乱语的，而是有其理由的。二是汉字必须加以改革是势在必然，改革的路径则是先实行简化，待条件成熟时实现拼音化。正因如此，陈独秀在回答非难者时指出：“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字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曾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断定汉字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sup>⑱</sup>这也足以说明钱玄同的主张并非毫无道理的。三是主张废除汉字的人只有钱玄同一人而已，其他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都没有表示赞同。<sup>⑲</sup>

可以认为，历史的走向已经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激进的，但不是过激的；是否定不好的传统的，但不是全盘性反对传统的。因为它是站在时代的前列，适时地切实地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主张，代表了先进的文化思想，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进步方面。而且，既反对文言传统和封建文化的其它陈腐传统，又对传统文化中的好的方面作了明确的肯定。正因为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起到了促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并与世界先进文化接轨的伟大作用。正如郁达夫所论断的：“第一，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五四的一役，而打破了中国文学上传统的锁国主义；自此以后，中国文学便接上了世界文学的洪流。如封建思想的打倒，德谟克拉西的提创，民族解放的主张等等，是风靡世界的当时的倾向。……第二，五四运动，在文字上促生的新意义，是自我的发见。欧美各国的自我发见，是在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就因为受着传统的锁国主义之累，比他们推迟了七八十年。自我发见之后，文学的范围就扩大，文学的内容和思想，自然也就丰富起来了。北欧的伊孛生，中欧的尼采，美国的霍脱曼，俄国十九世纪诸作家的作品，在这时候，方在中国下了根，结了实。第三，文言的废除，白话的风行，不过是一种表现形式的更新，它的意义当然也有相当的重要，但只以这一点来说五四与文化，是不能抓住五四运动的重心的。”<sup>⑳</sup>

再说，发生于 1965 年至 1978 年间的文化大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其性质和后果都是根本不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进步的正确的健康的文化革新运动，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开辟新天地的伟大运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中国文化和文学实现了天翻地覆的变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它促使人们认识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落后和僵化，接受了具有现代性的新文化新文学。对我国社会进入新的时代并走向现代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它，便没有我国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没有它，更是不可能有现代中国社会。这可谓众人皆知的常识。而文化大革命却是由发展到巅峰造极的极左思潮导致的一场政治大动乱，一场文化大灾难，是完全错误的，极其荒唐的，造成了国家民族和文化事业的大浩劫、大破坏、大毁灭。它借批判封、资、修的思想文化为名，不仅完全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否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文化（只肯定鲁迅）和建国后的文化（只肯定样板戏），自然也全盘否定了西方文化，造成了几代的中国人既没有传统文化知识，也无西方文化知识。这样严重的后遗症，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得到弥补。可

见，新保守主义思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过激”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完全是荒谬的论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精神，是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自由和自主的精神。这样怎么可能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和野蛮呢？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能找到半点民主科学和自由自主精神的影子吗？

新保守主义思潮为什么要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拉扯在一起加以妄论呢？说到底，无非是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来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达到他们要不加分析地维护传统的目的。可是，他们的唯传统论，其实是一种新保守主义，并不是当今时代的先进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永放光辉，无论他们发出怎样具有迷惑性的论调，也是无法否定的。此外，万事万物都是沿着不断更新的方向发展的。中国文化也一样，只有坚持走不断更新之路，才会有愈来愈光辉灿烂的前景。新保守主义思潮一味强调固守传统，其实是开历史的倒车，否定文化必须不断革新和不断向前发展。

总之，新保守主义思潮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歪曲是无法令人置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光辉是永恒的，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

①②③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④《五四·多元的反思》，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

⑤《新青年》1917年1月第2卷第5号。

⑥《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

⑦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

⑧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精品选》（8），光明日报出版社。

⑨林纾：《致蔡鹤卿书》，载1919年3月18日北京《公言报》。

⑩《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⑪《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⑫《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⑬陈独秀：《再答常乃德（古文与孔教）》，《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⑭陈独秀：《答〈新青年〉爱读者（孔教）》，《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⑮《吴虞集》，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85页。

⑯《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79页。

⑰蔡元培：《答林琴南书》，载1919年3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

⑱《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684页。

⑲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⑳㉑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

㉒郁达夫：《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之历史的意义》，载1933年7月《文学》创刊号。

责任编辑：陶原珂

## •文学 语言学•

# 论中国现代作家从启蒙者到被改造者的角色易位

靖 辉

[摘要] 中国现代作家面对大众经历了一个从启蒙主义者到被改造者的角色易位，本文通过对这一角色易位过程的描述，重点分析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观念、历史条件的外力作用以及中国现代作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特征，旨在探究造成中国现代作家角色易位的内在与外在原因。

[关键词] 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 大众 生存状态 无根性 原罪感

[作者简介] 靖辉，广东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讲师，广东 东莞，523106。

## —

中国现代文学发韧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从两个方面的变革开始新文学的行程。文学的内容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影响，新文学在反对封建的“文以载道”的同时，重在以启蒙主义传播新思想；文学的形式以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企望建立新的审美形式。陈思和先生认为：对新文学而言，“用白话文建构起一种新的审美精神，它摆脱了传统文学中‘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陈腐观念，使文学与人的自觉联系起来，在现代意义上重新界定何为文学。”<sup>①</sup>“文学的启蒙”是以现代白话文新文体创建新的美感形式与审美精神，启发读者对美的敏感与重新发现，进而提高和更新民族的审美素质，增强民族的创造活力。“启蒙的文学”是传播新思想的载体，旨在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服务，这是一种非文学的任务：诸如把时代的主题演化成创作的思想主题，唤醒民众，教育民众，把倡导或反对社会上某种现象作为创作的目的，通过艺术形象为社会问题寻找答案，以起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功用。从这一点上看，尽管“启蒙的文学”反对封建的“文以载道”，但是它依然将文学理解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并没有从本质上完成对文学自身的回归与还原。“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原本是以全新的文学形式和内容反对封建文学的“文以载道”的，但是当他们热衷于“文学的启蒙”并自觉地把文学作为传播启蒙思想、唤醒民众的工具和手段时，又不自觉地将文学创作置于了新一轮的“载道”任务之中。“启蒙的文学”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主流话语具有崇高的意义，但是它一开始就暴露出了自身的缺陷与不足。就“启蒙的文学”的内容和其所要实现的目标而言，这些多半应当是思想哲学领域或社会学领域的题目，文学自身无力承担这份重任。对这一点，当时大多数作家尚缺乏理性的自觉。甚至，弃医从文时的鲁迅最初也过高地估计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在创作《呐喊》时才意识到文学无法承受社会启蒙之重任，他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sup>②</sup>许多研究者在引用鲁迅先生这段话时大多注意到了鲁迅为什么要弃医从文的问题，而忽略了追问鲁迅“那时”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而在创作《呐喊》时的“现在”是否依然坚持这种认识和判断。从鲁迅听从将令的“呐喊”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文学艺术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社会功效的自我怀疑。文学艺术不可能从根本上成就“启蒙”与“救亡”的伟业，作家期望以文学启蒙民众无形中夸大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尽管如此，中国现代作家还是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这一使命，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及他们的艺术创

作永远值得后人的敬仰和瞩目。

启蒙主义者必须是时代的先驱和思想的智者，思想和心理上的优势是启蒙主义者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否则他们凭什么启蒙民众呢？然而，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的这份自信尚缺乏存在的现实社会依据和坚实的思想哲学基础，他们的这份自信其实来自于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特定的时代氛围，一旦时代境遇发生变化，他们便很难固守启蒙主义者的初衷，继续保持思想和心理上的优势与自信。

## 二

在多灾多难的中国现代历史中，“文学的启蒙”本来就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土壤和从容的文化心态，抗战又即刻终止了“文学的启蒙”的发展。因为，“文学的启蒙”的非功利性和纯美意识无法适应被战争磨砺得粗放了的感情，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它更显得不合时宜，“启蒙的文学”本身具有的启蒙与救亡的内在冲突很快尖锐地暴露了出来。启蒙主义者所看到更多的是民众身上的痼疾和一切负面的东西，而抗日救亡运动所需要的则是正面肯定和张扬民众身上的民族主义激情和抵御外强的力量。思想启蒙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也很快显露出它的不合时宜和尴尬。在全面抗战的炮火中，文人越来越感觉到作为思想启蒙原有文化意义上的优越感在一天天消遁，从战争的现实中，他们开始感悟到知识分子角色的渺小，同时发现民众群体力量的积极和伟大。于是，那种刚刚建立起来的作为作家必不可少的主体意识，在群情激奋的时代变得无足轻重了。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我渺小感和对民众群体价值的重新评估，构成了其后不久知识分子在实际生活和态度立场上与民众（主要是农民）相结合的心理前提和倾向。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sup>③</sup>毛泽东的《讲话》顺应了抗战时期形成的中国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他将文艺理解为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把文学艺术视作军队和武器，进一步从政治理论的角度强化了中国现代作家向工农兵学习，接受大众改造的意识。抗日战争的客观历史条件以及毛泽东的《讲话》的政治理论导向，使中国现代作家的主体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开始竭力改变自我并轻易地否定自我。从中国现代作家在自我和时代关系上的这种主动的调整和改变中，可以看出他们自身的状况：这种调整和改变是他们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浓重的民族忧患情结的产物，也是他们作为文人在全民抗战形势下束手无策而心理失衡的无奈的结果。他们对于自己作为启蒙者责任的回避，其后果与他们的初衷相悖。当救亡成为全民族压倒一切的奋斗目标时，爱国救国情绪消解、取代了启蒙意识，这似乎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而合理的选择。但是，启蒙主义的退隐，并不意味着启蒙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时代已经多余，因为，民族的新生和解放不仅包括驱逐外国的入侵，同时也包括民族自省与反思后达到的精神涅槃。在落后的中国，突发的战争过快地改变了文化发展的进程，使思想启蒙刚刚负起先锋的任务很快便引出了新的道路。抗战时期大多数现代作家对启蒙思想某种程度的轻率丢弃，预示了他们后来作为知识者群体丧失了社会生活中应有地位的命运。

战争对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的影响是深远的。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文化心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扬，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以及对大众（工农兵）不加节制的赞美和讴歌等等，一度成为新中国的主流文化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文学艺术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得到进一步确认，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两种文化价值的冲突在主流话语中被更加对立化。在《讲话》中已经表现出这样的倾向：虽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作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但在思想战线上，则把“小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大资产阶级并列在一起，比如说：“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sup>④</sup>“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

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sup>⑤</sup>等等，这种阶级阶层的政治划分，明确表明“五四”新文学的主要体现者中国现代作家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必须由启蒙先锋转变为被改造的对象。

知识分子是理性的化身，他们本应有能力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作家的艺术良心明确区分开来。社会责任建立在作为公民的道德观念之上：关心祖国命运，维护社会正义，以社会主人的态度加入到社会建设之中；艺术良心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职业道德，作家必须坚持自己的艺术操守，保持自己对社会、自然、人生的审美感受，以最精致的作品来实现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价值。公民的身分与艺术家的身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既不是互相矛盾的，又是不可互相替代的。“战士”与诗人的统一不在于诗人用诗去战斗，而在于他既能写出真正有“美学价值”的诗，又在人格上是一个推动着社会进步的战士。可是，现实的挤压使中国现代作家总是习惯于把这两种标准混淆，他们首先确立一个“为人”的标准，又以“为人”的标准来要求“为文”。然而，作家毕竟是从事文化活动的精英，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理性精神的自觉与自信。中国现代作家群启蒙意识的自我失落，说明在他们的主体意识中哲学理性思想的储备不足。历史需要深刻的自省和反思！

### 三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中国现代作家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现代延续，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赋予了他们新时代的色彩，但中国文化的传统因袭依然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发生着巨大作用。美国当代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sup>⑥</sup>按照爱德华·W·萨义德的观点，我们可以把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 具有表明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能力，这其中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知识分子是敏感的、有思想、有洞察力的人，一是知识分子是具有一定话语权的人，否则他们的话语无从体现也不能够说明他们的能力；2. 知识分子是代表公众意愿的，这里的公众意愿不是指“众多人”，而是指“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类正义与社会良知；3. 知识分子是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人。从以上内容看，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及“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质的差异的。从中国古代的食客文化到“学而优则仕”再到整个科举制度，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来处于从属和依附的地位，他们或是为某个权贵的幕僚和谋士，或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对皇权的尽忠使他们的思想和思维不能游离于统治者的意志之外，因此，当统治者的意志与公众的意愿发生冲突时，他们更多地代表统治者的意志，不可能成为公众意愿的代言人。他们也有痛苦和嗟叹，但他们的痛苦和嗟叹往往来自于为统治者服务尽忠的政治抱负不为统治者所接受和认可，屈原的投江自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并不是源于他们生存状态的改变，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动荡使得走马灯似的军阀政权一时无力实施严密的思想控制，无暇在文化领域实施高压专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统治比较松动、相对比较自由的一个时期，加之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才使“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了短暂却相对自由的思想和思维空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使他们既不同于农民阶层（尽管他们生活困苦，但他们毕竟拥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土地），也不同于真正的官僚统治者，他们是权利资本的拥有者。这种极为尴尬的生存状态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是“无根性”。对此，毛泽东曾有过一个著名的比喻：知识分子不过是毛，依附在哪个阶级上，就为哪个阶级服务。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而言，“国家”就是最灵便的寄托和依赖，但是“国家”毕竟太抽象，而皇帝乃一国之君，因此，无论是对上的“忠君”还是对下的“爱民”，从国家和民族那里传统知识分子为自己找到灵魂的寄托。因此，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既是传统知识分子长期的文化属性所内化的一种心理情结，又是他们心灵和情感的归宿和根系所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多元的外来文化，使20世纪初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获得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启蒙主义视角。不过，“启蒙”只是手段，“启蒙”是为了“救亡”，“救亡”

才是目的，启蒙与救亡均来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深层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危机意识。极具现代意味的启蒙主义与传统的国家民族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种至高无上的情愫，启蒙主义则是刚刚开始放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获得后自身发展尚未成熟的理性。既然启蒙主义最终是为了实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想，一旦它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发生矛盾，“救亡”压倒“启蒙”便在情理之中。大众（工农兵）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的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次次地提醒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论是抗日救亡还是改造社会，大众才是真正社会实践的主力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亲身经历中看到了农民阶级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正越来越充分地发挥着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力，离开他们，中国革命将一事无成。这一发现使现代知识分子的“原罪感”浮出了水面，他们感到了自身的软弱、游移和犹豫，同时滋生了对自我的谴责、批判和否定。他们的自我渺小感很快便取代了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那份自信。何其芳在散文中这样记叙了自己到延安前后的心理活动：“我是想经过它到华北战场去，我还不知道我自己需要从它受教育，我那时是那样狂妄，当我坐着川陕公路上的汽车向这个年轻人的圣城进发，我竟想到了倍纳德·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但到了这里，我却充满了印象。我想应该接受批评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这个进行着艰苦的伟大的改革的地方。”<sup>⑦</sup>丁玲在经历了革命斗争实践的洗礼后颇有感触地说：“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代的一些摇摆，一些斗争，比起工农兵的战斗来，的确是显得单薄无力得多。知识分子在这样庞大的作为人民主体和工农兵队伍里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表扬了。”<sup>⑧</sup>艾青的话似乎更能代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我们出身的阶级，给我很大的负累，使我至今还不可能用一个纯粹的农民眼光看中国的农村。”<sup>⑨</sup>缺乏现实力量的个体生命和群体最容易改变和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忏悔和言过其实的自贬正是来自他们现实存在的“无根性”和心理深处的“原罪感”。他们再也无法固守启蒙主义者的崇高与自信，从而发自内心以至最终不得不接受被改造者的社会角色。

中国现代启蒙主义作家的话语，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动荡与变迁，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意味——崇高与卑俗。崇高时，因缺乏充分的理性而流于浪漫自信；卑俗时，同样因缺乏理性而出现自贬和互虐。建国后，在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高压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躲过批判的风头，违心地发表过自我批判（自贬）和批判他人（互虐）的文章。如今看来，他们当年所谓的错误多半是正确的，他们大都是受难者，可他们大多又是声讨者、发难者。面对他们的历史灾难，我们的情感也变得极为复杂，因为，一个人的精神的高洁与灵魂的高贵并不取决于他是否曾经受难。

知识分子不是任何一种社会势力的附庸，而是社会公正的维持者，精神价值的守护者。鲁迅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顺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sup>⑩</sup>鲁迅明确要求知识阶级成为超越利害的意义追寻者和未来开创者。用现代知识分子的理念衡量中国现代作家，他们不仅具有社会存在的无根性的尴尬，而且存在理性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不应随风而逝，它应当成为一面镜子，中国作家从中不仅应当反思那个时代和社会，更重要的是审视自己的灵魂。

<sup>①</sup>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9页。

<sup>②</sup>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17页。

<sup>③④⑤</sup>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

<sup>⑥</sup>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第16—17页。

<sup>⑦</sup>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23页。

<sup>⑧</sup>《丁玲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42页。

<sup>⑨</sup>转引自刘锋杰《蜕变与回归——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对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02页。

<sup>⑩</sup>鲁迅：《关于知识阶级》，见《鲁迅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90—191页。

责任编辑：陶原珂

# “鉴赏学”的前驱 ——读刘逸生先生《唐诗小札》

黄天骥

〔摘要〕 刘逸生先生《唐诗小札》对诗歌“鉴赏学”的开拓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强调审美受体的主观能动性，倡导让读者参与诗歌意境的再创造；二、坚持并灵活运用“知人论世”的观点去理解作品；三、在诗歌鉴赏中广泛并纯熟运用比较的方法。这些方法的运用，使《唐诗小札》具有了开拓中见严谨、渊博中见轻灵的学术风格。

〔关键词〕 刘逸生 《唐诗小札》 诗歌鉴赏学

〔作者简介〕 黄天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怎样鉴赏诗词，这在我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常常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从解放前上溯到唐宋，文坛上最流行的是评点式的读诗方法，大量的“诗话”、“词话”在分析诗词作品时，仅以片言只字，点到即止；有些话语玄而又玄，甚至会让一般读者越读越糊涂。疏于具体的分析，缺乏系统的阐述，是我国传统“诗话”、“词话”等文艺批评最大的弱点。“文革”以前，对古典文学深有研究并且通谙诗词创作的学者，往往缺乏理论的锻炼，在分析、讲授诗词时更多是跳不出评点式的窠臼。当然，詹安泰、王季思教授都发表过阐释、鉴赏柳永《雨霖铃》和杜甫《羌村三首》等论文，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可惜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从事不多。至于当时年轻一辈的学者，倒是接受过系统的理论教育，但在古籍学养未深和“左”的路线影响下，对诗词的分析，往往只强调政治性、思想性。评论者或是不懂或是剥离诗词赖以生存的艺术性，于是，诗词作品的分析往往成为历史、政治的图解。“文革”以后，许多学者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努力发掘诗词作品的艺术魅力，以期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坛上更出现一股“鉴赏热”。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留意研究“鉴赏学”，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评论的思想、方法。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刘逸生先生《唐诗小札》已经在诗歌鉴赏的问题上作了可贵的研究。《唐诗小札》虽然不是一部理论性的著作，但是，作者通过对唐诗赏析的实践，相当系统地阐述了诗词鉴赏的观点、方法。可以说，《唐诗小札》实际是揭橥我国诗词鉴赏学的一部著作。

在我国，上世纪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文坛深受欧、苏文艺理论的影响，分析艺术作品时从“反映论”出发，往往把形象性、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作为评论的标尺。就分析叙事性文学而言，这不失一种颇为有效的方法。但是，把它用于赏析抒情诗，则是行不通的。因为，抒情诗的创作只在于表情达意，并非要刻画什么形象、典型。假如以此为准则或由此入手分析诗词，简直就是胶弦鼓瑟，不着边际，不得要领。《唐诗小札》的可贵之处，是根据诗词的创作特点来鉴赏分析诗词。为什么我们当年阅读《唐诗小札》时有眼前一亮和如饮醇酒的感觉，这正是由于刘逸生先生披却中空，找到了符合诗词创作规律的鉴赏方法，解决了分析诗词的难题。

刘逸生先生《唐诗小札》“重订后记”中提出：“欣赏者既是涵泳于诗的境界中，同时又和诗人一起丰富了诗的境界”。这一观点，贯穿在他赏析唐诗的所有篇章中，成为他建构鉴赏学框架的重要支柱。在这里，刘逸生先生认为欣赏者对作品的认识，既要与它呈示的境界相符合，又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丰富诗的境界。因此，诗词的欣赏，并非仅是读者被动的接受，而是在接受的基础上主动的再创造。强调审美受体的主观能动性，是刘逸生先生为“鉴赏学”这一学科率先提出的基调或准则。

诗词鉴赏，属于诠释的学问。中国诠释学，从来与西方的诠释学有所区别。我国传统的诠释学，

一直把经典视为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是可以衍生而并非固定化的文本。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正是对我国诠释学本质最明确的概括。这一传统同样适用于对一些具有经典价值的诗词的赏析。何况，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往往是依靠观察和想象构造作品的意境。意境由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而呈现。懂得缔造意境的诗人，更多会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运用“虚”的手法启发读者的想象力，“使读者自得之”（王国维语），让读者参与创造，从而领略作品的真谛。刘逸生先生在赏析刘禹锡的《乌衣巷》时指出：“看中国画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明明画的是一段素白，连淡得无可再淡的水墨也没有渲染上去，而观赏者的眼睛分明从素白的地方看出别的什么来”，又说：“画家们就是利用这虚中见实，或虚实相生的技巧，让观赏者通过自己的联想和想象，看出画面上本来没有而在生活上却是实有的东西”。据此原理，刘逸生先生作为读者，从诗人刘禹锡所提供南京“乌衣巷”、“朱雀桥”燕子飞来飞去荒凉冷静的景色中，联系“王谢堂前”、“寻常百姓”和景物所包含的情感内容，便想象到诗中蕴含着“豪门权贵的没落的必然性”的内涵。通过这样的分析，刘逸生先生实际上告诉读者：鉴赏诗词，是要像他那样切入作品，用自己的想象力，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参与诗歌的再创造，补充并且“看”到诗人故意留下的空白。虽然在《唐诗小札》里，刘逸生先生只是在具体地分析作品，但在分析的过程中，却能给读者以重要的启示，提供了符合中国诗歌创作特色的评论和鉴赏方法，为上世纪 80 年代“鉴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强调鉴赏者参与作品意境的再创造，并不是说鉴赏者可以随心乱想，而是必须根据作品意象的客观实际，从作者呈示的内容出发。在这里，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的情感、经历对诗歌的内涵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刘逸生先生在赏析唐诗时，非常注重“知人论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唐代诗人的创作。

读《唐诗小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刘逸生先生对“知人论世”观点方法运用的纯熟。他分析唐代的边塞诗，分析陈子昂、杜甫、李白、李商隐的诗作，总是言简意赅地把作品产生的背景、作者写作时特定的经历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样做，为的是让读者更清楚地看到诗人创作的心态，更准确地理解诗作里包涵的意象。例如分析人们所熟知的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刘逸生先生便向读者介绍了李白参加永王璘军事行动，后来被贬夜郎，不料又被赦免的经历。在让读者了解李白“满怀枉屈，无从申说，心情真是坏到极点”的基础上，刘逸生先生结合着诗的意象，点明此诗之所以呈现轻快脱俗风格的来由。当李白听到一声大赦，“恢复了自由人的身份，他多么渴望回到朋友和家人身边，共同庆祝重获自由的欢乐呵！而长江的滔滔流水，似乎也乐意帮助诗人早日完成心愿。它就在诗人的脚下，突然踩大了油门，以从来没有的速度猛烈地向三峡冲去”。很清楚，正是由于刘逸生先生深入阐述了《早发白帝城》的创作背景，这才能让读者透彻地理解它所蕴含的特质。

对一般接受过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人来说，“知人论世”并不难理解，但要掌握得好，能纯熟灵活地运用，却需要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刘逸生先生在《唐诗小札》中过人之处，在于不仅把一定的时代背景与诗人的创作有机地联系起来，而且把握住诗人全部诗作的总体风格，从中观察分析某一首具体作品的特点，引导读者在理解作者“全人”的基础上，领略作品的艺术表现的特征。像指出钱起特别爱用鸿雁来造句，“在他的诗集里，如‘雁拂天边水’、‘孤云带雁来’、‘雁宿常连雪’、‘寒雁别吴城’、‘共羡雁南飞’、‘客心湖上雁’、‘回云随去雁’、‘数雁过秋城’等等，带鸿雁字样的句子，不下三十余处”。从了解到钱起对雁有特别的喜爱与敏锐的感受入手，刘逸生先生在分析《归雁》一诗时，便让读者领略诗人感情深挚以物喻人的创作特征。又像分析杜牧的《山行》，刘逸生先生指出，杜牧笔下的秋天，和古代一般诗人笔下常见的秋天有点不同。杜牧极少悲秋、叹秋之作，他对秋天经常是喜爱、欣赏的。当刘逸生先生概括了杜牧诗作的全部特色，他在诗中所表现的向上乐观的情绪，所表现的“霜叶红于二月花”那种俊爽豪逸的态度，就能使读者有更深切的理解。此外，刘逸生先生在分析王维的《山居秋暝》时又指出：“王维的山水诗有个很突出的特点，用热闹的字面不是写出热闹的境界，而是写出幽静的境界”，“同样是水飞、云起、鸟啼、花发，在别的诗人笔下，也许只能是热闹

的铺排，而在王维笔下却恰好就是幽静的意趣”。显然，刘逸生先生在赏析钱起、杜牧、王维的作品时，首先熟悉了他们全部创作的经历，他所理解的“知人论世”，是包括一定时代文坛创作的态势以及作家创作的总体面貌在内的。站在这样的高度赏析具体的诗作，当然便笔花四射，游刃有余，能够给读者提供鉴赏的钥匙。

刘逸生先生在鉴赏中贯彻“知人论世”的观点，但又反对把它变成“自造的一个僵硬的套子”。因为，历代有些“选家”，动辄以诗人的生平经历往诗作上套，笺释作品的“微言大义”。例如分析李商隐的诗，便因为他当过令狐绹的书记，张采田之类注释者整天疑神疑鬼，想方设法把李诗往令狐绹的身上靠。这样的“知人论世”，纯属走火入魔。刘逸生先生告诉读者，“知人论世绝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提醒大家，“知人论世”应该作为一个原则，应该在对诗人及其时代总体认识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不能机械地、穿凿地把诗句的片言只字，生吞活剥，硬是与诗人某一经历挂钩。刘逸生先生的意见，对从事诗词鉴赏者来说，很有启发作用。

在《唐诗小札》中，刘逸生先生鉴赏唐诗，还注意运用比较的方法。

比较文学是上世纪 20 年代开始引入我国文坛的一门学问。一直以来，人们较多致力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或不同国家不同地域文化的比较。无疑，通过比较，可以使不同部类的文化、文学的特点，得到更加清晰的体现。其后，学者们也逐渐把比较的方法引入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把相同题材的作品相互比较，在比较中使论题更鲜明一些。在这方面，刘逸生先生不是始作俑者，但在鉴赏诗词中广泛并纯熟运用比较的方法，他取得的成绩，可说是同侪中的佼佼者。

刘逸生先生以比较的方法赏诗，办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分析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便与畅当的《登鹳雀楼》比较，指出畅当的五绝，只是单纯描写鹳雀楼的景色，王之涣则不肯把意境仅仅局限在眼前景物上，而是更进一步地要把读者带上一个更开阔、更高远的境界。这一来，王之涣诗所包含的哲理意义，便远非畅诗之所能及，通过比较，让读者明白王诗之所以流传千古的真谛。在分析祖咏的《终南望余雪》时，刘逸生先生指出，这首原来要写八句的试贴诗，只写了四句，便戛然而止，因为祖咏发觉只用四句，已经把意思写完，就坚决放下笔杆，不肯多添一个字了，由此可见诗人对诗歌创作精炼性的追求。与此同时，刘逸生先生把许浑的《金陵怀古》与之比较，引用谢榛的见解，指出许诗八句中的四句写景，纯属可有可无。又以白居易的《晚岁》与之相比，指出诗共十六句，把自己的许多境况和感想，包括家庭、仕宦、年龄、疾病、儿孙，甚至眼昏、腰瘦及学佛、思乡等等，一一罗列，显得十分累赘。刘逸生先生把许、白的诗作，与祖咏的四句诗相互比较，这一来，祖咏在创作上的严谨作风，风格的精炼严密，便得到清晰的显现。

有趣的是，刘逸生先生在分析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时，竟把汤显祖的名剧《牡丹亭》中“惊梦”一出，与之对比。他指出，杜丽娘遵守家教，从来不解愁的滋味，一旦进入花园，目睹明艳的春光，那感情却突然受到景色的诱发，蕴藏在内心中被压得紧紧的对美满生活追求的渴望，一下子像火山喷发似的倾泻出来了。由此，刘逸生先生引导读者去理解王昌龄一诗的深意，指出那“不知愁”的闺中少妇，她的内心世界和杜丽娘相似。她“忽见陌头杨柳色”，就像杜丽娘看到花园里“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一样，压抑在少妇心头的离愁别恨，便被“陌头杨柳色”打开了缺口，倾泻而出。在这里，刘逸生先生把名剧所描写的规定情景，与《闺怨》两两比照，指出两者异中之同，同中之异，这样，《闺怨》一诗的深意，便在读者眼中鲜明地呈现出来。

《唐诗小札》使人获益最多的，是读诗的方法。以上仅从倡导让读者参与诗歌意境的再创造，坚持并灵活运用“知人论世”的观点去理解作品，以比较的方法分析作品等方面，回顾了刘逸生先生《唐诗小札》在鉴赏学领域中作出的开拓性贡献。同时我们也看到，《唐诗小札》所具有的开拓中见严谨、渊博中见轻灵的学术风格，恰是岭南文化特色的一种体现。广东学术界有理由为产生《唐诗小札》这样影响及于全国的专著自豪，也有义务继承刘逸生先生为文坛留下的可贵财富，使他开拓的鉴赏学领域的道路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深入。

责任编辑：呼 韩

# 论唐五代小说与诗话的关系

罗立刚

[摘要] 唐末五代的笔记小说出现了“志文”的新特点，“志文”内容明显增加且相对集中，甚至出现了以文坛史料为主要内容的笔记小说，这对同为杂体文的诗话的兴起，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这类“志文”小说与一般笔记小说在结构上大体一致，但以诗文为中心的情节安排，则使之具备区别于一般笔记小说的特征，并最终导致诗话著作的出现与繁荣。

[关键词] 唐五代 笔记小说 诗话

[作者简介] 罗立刚，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上海，200436。

## 一、唐五代小说的“志文”特性

唐末五代的笔记小说出现了“志文”的新特点，这对同为杂体文的诗话的兴起，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在唐小说体制变化的过程中，实际上潜藏着“诗话”从小说分离出来的趋势。

这里所谓“志文”，是借鉴南北朝小说“志人”、“志怪”名目而考虑到晚唐五代小说题材内容的实际，相应造出的一个词。“志文”中的“文”，主要包括文坛轶事、文人故事以及诗文趣事等与当时文化界密切相关的内容，简单地说也就是“文事”。说部而涉及文事者，由来已久。《西京杂记》中有司马相如、卓文君故事，又有扬雄论作赋语。《世说新语》专列“文学”一类。唐人刘肃撰《大唐新语》，仿《世说新语》之例，易“文学”为“文章”，所记文事亦多。刘餗撰《隋唐嘉话》，其中记文事者有30余条。李肇续作《唐国史补》，标榜“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其中叙述文事更多。张鷟撰《朝野佥载》，“志文”亦多达五十余条。由此可见，唐人小说开始呈现出由重“志怪”向重“志文”转化之迹。中唐传奇大盛，笔记小说趋入底谷，志文之风渐熄，唯传奇中多书生恋爱故事，夹录诗文，算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晚唐五代，传奇渐衰，笔记小说再兴，数量大增，内容更加丰富，“志文”色彩更加浓厚。结集流传至今且有代表性者计有《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大唐传载》、《刘宾客嘉话》、《教坊记》、《幽闲鼓吹》、《因话录》、《云溪友议》、《松窗杂录》、《玉泉子》、《唐摭言》、《中朝故事》、《金华子》、《开元天宝遗事》、《戒鉴录》等。诸书虽然所记或侧重实录史事或倾向神怪荒诞，但重视文事记载却是一样的。将这些笔记小说与此前同类作品相比，可以发现，此时笔记小说作者对当时的文坛轶事非常关注。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记载文事的成分明显增加。《刘宾客嘉话》作者韦绚于序言中记其所录为“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文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之类”，专门提到“文人剧谈”，全书“志文”者多达30余处。《大唐传载》记事简约，作小说看不免梗概粗率，而其中记文坛事也有近20处。《幽闲鼓吹》一书，三分之二篇幅为“志文”内容，《云溪友议》、《唐摭言》、《云仙杂录》更多。南唐刘崇远《金华子》，其书于将相之贤否、藩镇之强弱以及文章吟咏、神奇鬼怪之事，无不备载，特别是文章吟咏成为作者关注重点之一。后蜀何光远《鉴戒录》记唐及五代间事，以蜀事为多，其记事详赡与当时小说的简约不同，虽标目似与文事无关，但内容大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与文事相涉。而且，就晚唐五代这一时期看，其“志文”的成分还呈现出从晚唐到五代不断增强的趋势。据此可见，晚唐五代小说作家在发扬小说“志怪”、“志人”传统的同时，在题材内容方面又进行了新的开拓，而

这一开拓相对集中于“志文”方面。“志文”内容的不断增加，可说是当时“志文”小说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

其次，在这期间出现的一些增补前人笔记小说的作品中，“志文”的成分也大为增加。比较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与郑处诲的《明皇杂录》，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二书皆记玄宗朝事，据《新唐书·郑余庆》传载，其孙“（郑）处诲字廷美，文辞秀拔……。先是，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处诲谓未详，更撰《明皇杂录》，为时盛传”，<sup>①</sup>可知郑处诲是有意针对李德裕之作加以增补的。对校二书，前者志怪的成份明显较后者为重，郑作则“志文”色彩十分明显。《次柳氏旧闻》全书17条，仅明皇赞李峤诗一条与文事相关。《明皇杂录》增至84条，<sup>②</sup>其中“志文”者有28条之多。特别是前二卷28条，有16条为文事，超过半数。其中如“苏颋文学该博”、“萧颖士恃才傲物”、“姚崇算张说”、“唐玄宗赐张九龄白羽扇”、“李龟年之遭遇”、“雨霖铃曲”、“杜甫之死”诸条，皆不见于《次柳氏旧闻》。其记事生动有趣，笔法灵活，看似饭后谈资，实是文坛趣事，后来多入诗话、词话之中，并非偶然。后继者如五代人王仁裕再作《开元天宝遗事》，亦记明皇时事，因为作者心存鉴戒，主旨所限，绝不枝蔓，篇幅较《明皇杂录》为小，但其中记载文事也多达20余条，特别是集中记载诗人李白游长安故事，较《明皇杂录》又有进步。其他如《云仙杂记》杂取前代笔记小说汇为一书，所引之书如《文笔襟喉》、《文览》、《文房宝饰》、《渊明别传》、《诗源指诀》、《凤池编》等，其内容皆与文事相涉。《云仙杂记》“志文”所占比重甚大，若将有关琴、棋、书、墨等文人雅事计算在内，则数量更多，几占全书80%以上。又有《玉泉子》一书，其内容“多采他小说为之……不尽其所自作也”，<sup>③</sup>全书“志文”者亦占三分之二犹多。

最后，此时某些笔记小说中“志文”的内容还有相对集中的趋势。《中朝故事》分上下卷，上卷多君臣事迹及朝廷制度，下卷杂录神异怪诞之事，其中上卷所记即颇与文事相涉。赵璘《因话录》六卷五部分，第一卷宫部，记帝王事，第二、三卷商部，记公卿百僚，第四卷角部，记不仕者，第五卷徵部，多记典故而附以谐戏，第六卷羽部，主要是一时见闻杂事无所附丽者。五部之中，商部独占两卷，其中第二卷记文事最多，最为集中，其他如角部记僧道、徵部记典故等处于文事亦多提及。

除“志文”内容相对集中外，晚唐五代甚至出现了专门收集文坛史料故事的笔记小说。前面提到《幽闭鼓吹》一书，其性质即如此。此外，较著名者还有范摅《云溪友议》三卷、王定保《唐摭言》十五卷。《云溪友议》前有《序》文，记撰写缘起，谓因游历四方，有感于“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于远思矣”，又追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之意，所以编写此书。“因所闻记，虽未近于丘坟，岂可昭于雅量，或以篇翰嘲谑，率尔成文，亦非尽取华丽，因事录焉”，每条以三字为题，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坛故事。王定保《唐摭言》则更专门：“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sup>④</sup>不仅与文事相涉，而且还具体到与文风士林密切相关的科举制度上。以如此集中的篇幅、如此严肃的态度对待文人文事，就现存资料而言，在前此的笔记小说中是没有过的，其在笔记小说内容方面的开拓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趋势，应引起注意。

总之，在新创作的笔记小说中，大量涉及文事；在整理前人笔记小说时，特别重视并采集与文事相关的内容；“志文”内容相对集中甚至出现以文坛史料为主要内容的笔记小说，这是晚唐五代笔记小说的三种发展趋势。

这种趋势，为“志文”的笔记脱离一般笔记小说的范畴，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种文学批评方式——“诗话”作了很多的铺垫。因为从本质上讲，诗话最初跟笔记小说一样，同为撮录杂事的杂文体，皆具“集以资闲淡”的功能，在“诗话”之名出现以前，两者实难严格区分。所以《四库全书》列《云溪友议》于说部，其《提要》却云：“然六十五条之中，诗话居十之七八。太抵为孟棨《本事诗》所未载。”可见四库馆臣们并没将诗话与笔记小说完全割裂开来进行孤立的分析，而是将之视为彼此互通的。但是，他们仅仅看到二者的暗通沟合，却并没有注意到二者之间存在着过渡与分离的轨

迹。因此，《四库全书》又错误地把具小说性质的《本事诗》列入诗文评，而把《教坊记》这样具有诗话性质的作品看成小说列入说部。

## 二、《本事诗》的小说性质与《教坊记》的诗话性质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一·序》将诗文评分为五大类型：“（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钟）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这里且置前三类不论，只就《本事诗》与“诗话”的分类来看，这样的分类，虽然特别突出了《本事诗》在批评史上的独特地位，实际上却未必科学。从前引文字可以看出，这两类有很多可沟通之处。“旁采”与“体兼”的用语，完整的意思应该是“重本事而旁采故实”、“记诗话而体兼说部”。若如此，则“本事”与“诗话”应该有明显区别。事实却并非如此，前面论述晚唐五代笔记小说具诗话成分，已证明了这一点；前引四库《云溪友议》提要定该书有十之七八为“诗话”，也表明两者之间关系十分密切。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事诗》入“诗文评”类，而后之著作袭《本事诗》之例者，如明徐伯龄撰《蟫精隽》十六卷、宋无名氏《古杭杂记诗集》四卷，又皆入说部。还说史部纪传类《唐才子传》“杂采孟棨《本事诗》、范摅《云溪友议》荒唐之说，无当史裁”，更指列入说部的《云溪友议》“大抵为孟棨《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传”，似乎又把《本事诗》作为说部著作对待。

依此可以判断，《四库全书》不仅没有将《本事诗》所创例的“旁采故实”的批评方式与“体兼说部”的“诗话”著作区分开来，其别《本事诗》于说部的努力，反而在自相矛盾的叙述中显示出《本事诗》浓重的说部因缘。为了揭示《本事诗》的小说性质，本人曾经专门搜讨过《本事诗》所记41条内容入于说部的情况，发现所有内容都曾入于说部，其中以《说郛》、《说略》、《太平广记》三书最多，《天中记》、《类说》、《古今说海》亦复不少。即以《本事诗》中“情感第一”所记12条内容为例。乐昌公主：入《太平广记》、《天中记》、《说郛》；窈娘：前见元、白《长庆集》，后入《太平广记》、《天中记》、《说郛》（按《本事诗》前已见记载者，以“前”、“后”区别之，下同）；卖饼者妻：入《太平广记》、《天中记》、《说郛》；玄宗宫人制衣：入《太平广记》、《类说》、《说郛》；朱滔营中河北士人：入《类说》、《说郛》；顾况红叶题诗：入《古今说海》、《太平广记》、《说郛》、《说略》；戎昱眷妓：入《太平广记》、《说郛》；韩翃与柳氏，前见传奇《柳氏传》，后入《唐摭言》、《太平广记》；李相绅镇淮南：入《类说》、《说郛》、《太平广记》；刘禹锡因诗得妓：入《宾退录》、《云溪友议》、《类说》、《说郛》、《太平广记》；李逢吉夺御史妓：入《天中记》、《类说》、《说郛》、《太平广记》；崔护人面桃花：入《天中记》、《类说》、《说郛》、《太平广记》。虽因资料浩繁，遗漏尚多，但据此即可见出《本事诗》的说部性质。

与《本事诗》性质不同的是崔令钦的《教坊记》。该书所记虽非诗文故事，却与后来词曲史料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前人以其中“多开元中猥杂之事”而将之入小说家类，但全书除记载了大量当时宫中乐舞曲名外，另有六条记当时乐舞制度，五条记乐舞曲名来源，这些部分全无情节、人物，无小说之要素，算不上小说。余下仅四条记教坊中乐舞家故事，算与小说略有瓜葛。而在整本书中，这区区四条所占的比重实在太轻了。将此书系于小说一类，定性无疑是错误的，至少是牵强的。虽其大量集中介绍与开元间乐舞相关的典章制度以及乐曲名称、乐名考源等内容与小说无关，却皇后世“诗话”（包括诗、词、曲等韵文）的体貌，故而无论从其篇幅看，还是就所记内容分析，《教坊记》都不是一部小说集，而只是如四库评欧阳修《六一诗话》那样“体兼说部”的“诗话”性质的作品，其性质与后来的“词话”、“曲话”相同，笔法也基本一致。

辨明《本事诗》小说性质与《教坊记》诗话性质的不同，也就弄清了晚唐五代时期诗话与小说相互沟通的事实。二书虽然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当时笔记小说重“志文”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却同样起到了催化“诗话”脱离笔记小说相对独立的作用。在今天看来，古人对于《本事诗》与《教坊记》的分类明显有误，但若还原到历史的本原，又不能不说这种误解有其历史原因：《教坊记》

被视为小说，主要是误读了崔令钦附记中“非无元龟，自有人鉴”的惩劝意识，加之所记内容为教坊妓院中事，不登大雅之堂，又略有小说内容，而后世又长期轻视词曲批评，故未能如《本事诗》那样受到应有尊重，仅归小说家言。与之相反，《本事诗》则因为有一个较好的接受环境而被一再抬高了，其与“诗话”相通，重在“志文”，本身具有“资闲谈”的功能，容易引起文人的注意，另外，成书之后不久，《六一诗话》即出现，遂使后世追溯诗话之源时，片面强调其诗话特征而忽视了其笔记小说的性质。

### 三、“诗话”结构的独特性

笔记小说作为杂体文，一切题材皆可纳入，少受约束，而同样作为杂体文的诗话，只不过是将笔记小说的题材“压缩”到文事方面，其“志文”也无所不包，文坛的故事、本事、轶事、趣事、怪事，文体的源流、正变、更替、特色，文学的史料、典故、掌故、旧闻等，应有尽有，也是略无限制。但题材的相对集中，只能表明创作者审美趣尚所在，并不意味着文体质性的改变。文体形貌特征的形成，与题材关涉甚少，而与其内在结构密不可分，因此，考察诗话与笔记小说的关系，在对其形貌体制以及题材内容统一性与相似性作分析之后，还有必要对两者的结构作深入的透视。

笔记小说的结构一般都很简单，绝大多数以顺叙为主，叙事有条不紊，部分或全部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结果等记叙文诸要素。又由于体制短小，离首见尾，所以言简意赅，一般不作铺垫，而是直取肝肺，在对时间、地点及人物略作交待之后，即到故事的高潮、事件的核心。人物形象的刻画，常常是在故事的高潮部分见分晓，不另作烘托映衬。事件交待完毕，即告结束，或以一两句极简略地交待结果。其结构一般可以按要素的多寡概括为四种：

1. 要素最少：人物——事件——（评价）。
2. 要素较少：时间——人物——事件——（评价）。或：地点——人物——事件——（评价）。
3. 要素较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评价）。或：时间——地点——人物——事什——结果——（评价）。或：时间（地点）——人物——人物关系——事件——（结果）——（评价）
4. 要素较完备：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发展、高潮）——结果——（评价）。

虽然分为四种形式，但其基本结构却是“人物——事件”，加上“评价”之后，则成“叙——议”双层纵深的结构。而其他几种结构形式，只不过是要素的增加，其基本结构形态并没有变化。

与一般笔记小说相比，“诗话”性质的作品，虽然在结构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却增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要素——诗（文）。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 《云溪友议》卷中“谭生刺”条：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时人比于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竟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举子谭铢者，吴门秀逸之士也，因书绝句以贻后之来者。睹其题处，经游之者稍息笔矣。诗曰：“虎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

#### 《本事诗》“征咎第六”：

崔曙进士作《明堂火珠》诗牍帖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当时以为警句，及来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谶也。

#### 欧阳修《六一诗话》：

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辎輶，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非足下肥妻子乎？”闻者传以为笑。

从这三条材料可以看出，其结构依然是单层次或双层次，但原来笔记小说“人物——事件——（评价）”的结构在“志文”小说或“诗话”中变为“人物——与诗相关的事件（诗、文）——（评价）”，题材范围有所集中，而且，作为一个结构要素，诗在这类作品中不可缺少。若将上引三条材料

中的诗去掉，故事就不完整，情节亦不生动。也就是说，“志文”小说或“诗话”的故事情节安排，往往围绕着诗文来进行。仍以《本事诗》为例，该书几乎每条都有完整的故事梗概，曲折的情节安排，首尾完具，形象鲜明，但是，与前此笔记小说不同的是，作者同时照顾到诗，所引之诗一般全录，而且几乎每个故事又都是围绕着诗歌创作的缘由、诗情的兴起、诗歌内涵的解读展开，所谓“本事”，即诗之本事，而这个“本事”正是诗之“话”了。从这个角度看，后人重其“诗话”而忽略其小说本质，也情有可原，因为其结构已呈“人物——以诗为中心的事件”凝固之势。而“诗”这一内核的结构性凝固，正是诗话区别于一般笔记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足以表明“志文”小说已经从创作主体的审美情趣与题材选择深入到文本结构的内部层面，即对材料产生“人物——以诗为中心的事件”这样的结构性要求。正是由于这种结构性的要求，使得这类作品具有了区别于一般笔记小说的特性，使“诗话”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文体成为可能。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式，“诗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名称虽然迟至宋代才正式出现，其源头则在晚唐五代笔记小说那里。与“诗式”、“诗格”之机械板滞相比，“诗话”批评具有内容丰富、形式活泼等新的特征。诗话与笔记小说，无论是文体、结构、笔法、用意，还是内容、题材等方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所谓“诗话”，实际上就是以“志文”为特色、以诗文为核心结撰的笔记小说。晚唐五代笔记小说中“志文”内容的不断增加，笔记小说中“志文”类作品以诗文为核心的结构性“凝固”，都说明诗话类著作脱离笔记小说单成一体，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宋人在此前提下，标示“诗话”之名，是水到渠成之事。

当然，“诗话”的内涵在宋代之后还有一个不断发展与丰富的过程。宋代“诗话”从欧阳修“资闲淡”始，后来的发展，或保持这一特色，或渗入唐人“诗格”、“诗式”方面的内容，朝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还有一部分“诗话”理论色彩很浓，这表明“诗话”的内涵日渐丰富。“诗话”内涵的丰富，也是使“诗话”与笔记小说关系显得隐晦难明的一个重要因素。

---

①见《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五《郑余庆传》附，中华书局，1975年，第5062页。

②此据中华书局版今人田志柱校注本，其中包括“卷上”14条，“卷下”14条，“补逸”12条，“逸文”31条以及“辑佚”13条。

③《四库全书总目·玉泉子》。

④《四库全书总目·唐摭言》。

责任编辑：呼 韩

# 广州市普通话现状思考

许光烈

[摘要] 本文以普通话水平测试和普通话意识抽样调查的统计为基础，分析了广州市普通话的现状，指出了这种现状存在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广州市 普通话意识 普通话水平

[作者简介] 许光烈，中山大学博士生，广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405。

## 一、广州市的普通话现状

自1998年10月起，广州市以普通话水平测试为契机，加大了普通话工作的力度，目前，广州市已有测试员105人，其中国家级22人；省级83人。普通话测试工作开展四年多来，至今已经测试70000余人。广州市常设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市长陈传誉任语委主任，语委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同时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管理体制。应该说，广州市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州人的普通话水平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普通话的使用范围正在逐步扩大。

同时，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广州市的普通话形势还有许多问题摆在我面前。

1. 广州市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广州市在普通话水平测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请看下表：

表一 广州市2001年、2002年已接受普通话水平测试者成绩

项目	级别	人 数		比例	备注
		2001年(11652人)	2002年(51451人)		
二级	甲等	2097 (包括二甲以上)	4249 (包括二甲以上)	10. 1%	
	乙等	4864	15128	31. 7%	
三级	甲等	4415	28209	51. 7%	
	乙等	276	3541	6. 0%	
未达三乙		0	324	0. 5%	

从表一的统计数据来看，在63103人中，只有6346人的测试成绩达到或高于二级甲等，仅占总人数的10%（能上一级的更是凤毛麟角），其余90%都在二甲之下。另外，我们了解到，现在已接受测试的绝大部分是教师和学生，这些人是广州市普通话水平最高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状况尚且如此，如果在社会上大面积开展测试，整体水平更低。所以，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实是不容乐观的。

2. 广州人的普通话意识。在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过程中，比如说“读单音节字词”，当应试者读错某个音节而需要改读时，大部分会不自觉地说一声“唔系”（白话“不是”）。以色列社会语言学家B. 斯伯尔斯指出：“双语者通常宁愿选择一种语言用作功能行为，例如计算、做数学题、做梦（一些人梦中也在说话，其他人则不会），诅咒或默默祷告。”<sup>①</sup>就是在这些不自觉的语言选择中，能够反映出人们的语言意识。

我们采用著名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语言社会调查的方法，对广州市政府某些

部门的普通话意识进行了随机调查。请看下表：

表二 广州市电话问候语（你好）调查简表

单位	电话	打电话时间	问候语形式	备注
民政局值班室	83333528	2002/12/13 (8: 20)	白话	
交通局值班室	86010100	2002/12/13 (8: 40)	白话	
教育局值班室	83335381	2002/12/30 (8: 40)	白话	“么野事”
卫生局值班室	81086035	2002/12/30 (8: 50)	白话	
国土局值班室	83336546	2002/12/30 (8: 56)	白话	
商业局值班室	83124010	2002/12/30 (8: 59)	白话	
地税局值班室	83637000	2002/12/30 (9: 03)	白话	不能用普通话交谈
司法局值班室	83350707	2002/12/30 (9: 05)	白话	
物价局值班室	83317042	2002/12/30 (9: 07)	普通话	
外经贸局值班室	81097472	2002/12/30 (9: 10)	白话	

在被随机调查的 10 个部门中，只有 1 个使用了普通话，占 10%；9 个使用了“白话”，占 90%。当然，社会调查受许多不定因素的影响，数据反映的情况不一定非常精确，但是却能反映出基本情形。这种社会调查不能也不必穷尽所有的应查对象。上表至少反映出，广州市政府某些部门的普通话意识是不强的。语言使用的取向，我们称之为语言态度。广州市某些政府部门持相同语言态度的人们形成一个语言社团，同时，这一语言社团又影响或引导并代表着广州市的基本语言取向。拉波夫认为，语言社团的一致性并不表现在语言行为的一致上，而是表现在相同的语言态度上。<sup>②</sup>“白话”语言社团的语言态度是整个广州市语言态度的一个缩影，也是广州市普通话意识的一个缩影。

以上的调查和分析告诉我们，广州市的普通话工作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 二、广州市普通话现状形成的原因

1. 历史原因。广州处于粤方言区，广州话是粤方言的代表。由于广东地处岭南，历史上多年远离中原文明，加之地方官员对官话重视不够，粤方言一直被作为主要交际用语，所以官话流通程度不高。虽然有东晋——隋唐、唐代——宋代、宋末——明初中原往广东的三次大迁移，但由于所形成的客家文化的特点，来到岭南的中原官话并未对当地方言形成太大的影响，而是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方言——客家话。偶有内地流民的迁徙及官员的贬谪，但在浩瀚的岭南土著人的海洋中并未能也不可能形成主流，“白话”仍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外地官员来此任职，则“官民上下语言不通”，以至于清雍正皇帝专发谕文责令官员执行公务必须使用官话，责成广东福建等省的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并在这两省设立“正音书院”，福建做得十分认真，然而广东并未重视此事。“今天福建省普通话流通程度高于广东省，大概与此不无关系。”<sup>③</sup>

2. 现实原因。造成普通话在广州不够普及的现实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济热潮的冲击。广州一直是中国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的大潮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更加注重实实在在的效益，而无暇去顾及那些不能直接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的素质或文化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人们报考专业方面得到证实。在人们追求金钱的狂热中，语言面貌是一个提不到议程上的话题。

其二，语言环境的复杂。广州市多年来一直是“白话”居主导地位，广州的电台、电视台很多以“白话”播音，报纸杂志广告充斥着大量的粤方言词语及习惯表达法，普通话的地位并不突出。广东省内有粤方言、闽方言和客家方言，由于地处沿海，生活中又流行着许多外来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省市的人带着各自的家乡话大批来到广东，尤其是广州，这便形成了广州市的复杂语言环境。

其三，人们认识的偏差。在这种环境下，由于操“白话”的人占广州人口绝大多数，况且改革开

放之后来广州投资的华侨多讲“白话”，所以一度形成了以讲“白话”为时尚的风气。一些“白话”词语广泛流传，如“老公”、“搞掂”之类。广州的经济红火起来之后，广州人的普通话水平并未同步提高，而为了与广东商人做生意，一些外地人开始学习“白话”，甚至北京的招工广告竟有会讲广州话者优先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白话北上”的现象。这种现象导致人们认识不到普通话的重要性，从而放松对普通话的追求。

其四，普通话意识的薄弱。人们在生活和交往中使用“白话”，代代相袭，习以为常。许多大学生在校期间讲普通话，在家里则讲“白话”，刚刚培养起来的普通话意识，一个假期便土崩瓦解。这样，在拉锯般的几个回合之后，普通话意识便模糊了。而在工作中，也有大量当地公务员用“白话”交际，甚至一些教师仍使用“白话”授课，某些同事之间甚至认为讲普通话是脱离群众，只有讲“白话”才显得亲密。人们对语言文字方面的政策法规及相关知识知之甚少，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在2000、2001、2002年的普通话宣传周期间，笔者分别给《广州日报》打电话，问及此事，值班编辑竟然不知道何为普通话宣传周。所以，宣传周期间只见几组测试员在街道、学校进行宣传的忙碌身影，却很少见媒体的热情参与。

### 三、我们的设想

在了解了现状和产生这种现状的原因之后，我们探索一下解决问题的对策。

1. 营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充分发挥电台、电视台以及报刊杂志等媒体的宣传作用，重视教育战线及窗口行业的普通话示范作用。提高人们的普通话意识，让人民大众从心里承认普通话的地位，从而选择它，并自然地使用它，形成一个全社会都讲普通话的大环境。语言环境对语言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语用学家维索尔伦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就是交际双方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言语行为者本着言语适应的原则来调整自己的语言选择。查尔斯的言语适应论把“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一方改变自己原有言语习惯或语体，以更接近说话对象的言语或语体”的现象称为“言语趋同”。语言形式（共同语或方言）的选择也是如此，在我们进行电话调查的过程中，虽然对方绝大多数用白话来问候，但是当我们用普通话回答的时候，他们都改用普通话来交谈。这种情形说明，如果交谈的一方主动使用普通话，另一方则会遵从这种适应原则来使自己的选择与对方“趋同”。而对于讲普通话的一方，则是有意识地运用“言语趋异”的原则，故意使自己使用的语言形式变得与说话对象不同，以“保持说话人自己的社会身份特征和群体特征”。<sup>④</sup>操普通话的人尤其是测试员有意识地使用普通话，这是形成普通话大环境的主要方面，这些人的普通话意识是让整个社会都动员起来的“鲇鱼”，应依靠这种“鲇鱼效应”来促进普通话大环境的形成。我们应借助普通话宣传周发出倡议，在教育界形成一种机制，让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而不仅仅是教学语言。

2. 扩大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影响。这包括壮大测试员的队伍和提高测试员的业务素质两个方面。  
(1) 壮大测试员的队伍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目前，广州市仅有测试员105人，在数以十万计的等待测试的人员面前显得杯水车薪，更不要说800万广州市民。大力培养测试员、扩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的队伍，乃当务之急。而符合测试员标准的人并不很多，这在南方尤其突出，因此，对省级测试员的普通话水平，“南方方言区1946年1月1日以前出生的，可放宽到二级甲等”<sup>⑤</sup>，可见这是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无奈之举。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高校学生中培养一批推普积极分子（或曰推普员），条件成熟的便让他们做测试员。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和年轻人的热情能够保证他们很快适应并胜任这项工作，测试员的队伍很快就会壮大起来，普通话测试工作将会以成倍的速度向前推进。同时，一批批大学生推普积极分子和测试员走向社会，普通话大面积传播，有助于讲普通话的社会风气迅速形成。(2) 提高测试员的业务素质是保证质量的基本前提。测试员的业务素质直接关系到测试水平，也是普通话测试得到社会认可程度的重要指标。理论的匮乏会导致效率和质量低下，光凭热情是办不好事情的。作为一名测试员，不仅要知道什么是对错，而且要知道为什么对错。定期举办测试员提高班，能从客观上帮助测试员提高业务素质，同时测试员也应当主动学习一些基本的语言理

论，用以指导自己的测试工作，不断提高测试水平。测试员的普通话意识很重要，能约束自己在公开场合（包括测试的间隙）讲普通话，这应该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孙家正说：“大家（测试员）是语言法规方面的执法员，同时也起着示范作用。”<sup>⑥</sup>可见，测试员不仅要“执法”，更要“守法”。

3. 重视测试研究，巩固测试成果。当前，广州的方言研究成果非常突出，然而，广州的普通话研究却几乎是一片处女地。事实上，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我们会发现许多问题，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均有反映。如果仔细进行研究，总结出其中的规律，用以指导测试，尤其对辅导测试的教学工作，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研究这个问题，方法很重要，比如研究语法方面的差误，仅把普通话语法和白话语法做简单对比，则很难出新意；而用中介语理论、语言层次理论来观察分析这个问题，便别有洞天。施其生先生对此有深刻的见解：“研究语法差误，若能注意其发生的阶段性和普遍性，对于语言教学无疑大有好处”。<sup>⑦</sup>语言沙龙、测试研讨会等，对总结广州市的普通话测试规律提高测试效率和质量都是大有裨益的。若能把有关材料建成数据库，则对测试更有意义。

此外，加强测后检查工作是巩固测试成果的重要手段，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普通话的使用情况。我们有必要知道，应试者测试定级后是否把普通话作为生活语言和工作语言。请看下表：

表三 对广州市海珠区 38 所中学 50 位语文教师的调查

情景	普通话	白话	普通话白话混合	备注
在课上	50			
在课下	18	22	10	
在家里	19	30		1人潮汕话

由表三可知，在课上，50位已接受测试的语文教师都用普通话，在课下完全使用普通话的却只有18人，而在家里竟有30人使用白话。据了解，即使在课上，有些语文教师讲课用普通话，布置作业或布置班务时仍用白话。可见，巩固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成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测试完成并非大功告成。从学校做起，对某些指标进行量化评比，定期在师生中进行普通话知识讲座和普通话竞赛，以防止“回生”现象，这恐怕是巩固测试成果的第一步；明确普通话等级证书的有效期限也会有一定的作用。测试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要考虑的并非仅仅是提高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过关率，其终极目的是确定一种标准、指出一个方向、培养一种意识，完善口语表达，提高综合素质。

①Bernard Spolsky < Sociolinguistics> : Bilinguals usually prefer one language for functions such as counting, doing arithmetic, dreaming (some people dream in language, others don't), cursing, or praying silently.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 第46页。

②徐大明等：《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74页。

③参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语言文字工作百题》，语文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④刘正光：《言语适应理论研究述评》，《语言文字应用》2001年第2期。

⑤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语文建设》1997年第12期。

⑥1995年11月27日在第四期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考核培训班上的讲话——见宋欣桥《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实用手册》，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6页。

⑦施其生：《方言区语法差误成因探讨》，《方言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

责任编辑：陶原珂

## •学术动态•

# 移民历史，记热血华人 ——《美国梦》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涵平

(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 广东 广州, 510310)

华人移居美国, 据史书记载, 最早始于1785年, 即美国刚刚立国不久。然而直至20世纪末, 随着华人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华人祖国的日渐崛起以及中美关系的逐步改善, 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才逐渐出现了一些专门记载华人移民北美的历史著作, 如麦礼谦的《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邓瑞冰的《寂寞的辫子——被遗忘的勇敢中国人》等。但这些作品多为境外华人学者所著, 且主要以史家笔法进行“面”上的梳理与概括。而真正由大陆本土作家写作、采用生动形象的艺术手法、以华人移民的个人奋斗经历为主线来展示积淀丰富的移民历史, 熊国华的《美国梦——美籍华人黄运基传奇》应该是第一部(花城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基于此, 2003年3月22日, 广东教育学院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花城出版社和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了《美国梦》学术研讨会。会议在广东教育学院举行, 来自海内外的40余位知名学者、作家和评论家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移民史写作的文化意义、传主选择的典型特征和传记创作的艺术收获等论题, 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获得了许多富有价值的学术共识。正如该院院长刘劲予教授的欢迎辞所说:“无数海外华人用自己的艰辛奋斗发扬和光大了中华文化, 本次会议的召开就是对他们的肯定和崇扬。”会议的进程正实现了这种期待。

《美国梦》的传主黄运基先生, 是美国著名华文作家、报人、翻译家、政治评论家和华侨领袖。1932年出生于广东斗门县, 其上两代均是华侨, 他自己于15岁移民美国, 现为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会长、《美华文学》杂志社社长、美国时代有限公司总裁、思华有限公司董事长。其人生历程和无数移民一样, 都是从生活的最底层艰苦奋斗, 最终立足生根, 而始终伴随着痴心爱国的心路历程和实践经历。他在上世纪50年代即主张中美建交, 曾受到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政府的长期迫害, 仍倾心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团结一大批爱国华人, 他是“美中人民友好协会”5位创始人之一, 不遗余力地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他多次资助留学生, 不辞辛劳地热情接待中国访美作家, 被誉为侨界的“孟尝君”。他曾随里根总统访华, 多次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还不断地进行文学创作, 已出版长篇小说《奔流》, 另一部长篇《狂潮》即将面世。由于他在新闻、出版、翻译、文学创作等多方面的突出贡献, 旧金山市市长将1998年2月1日命名为“黄运基和美华文化人报日”。

可以说, 他的经历浓缩了海外华人光荣奋斗的历史, 展现了华人爱国思乡的美好情怀, 以及海外华人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不断拓展的生存能力。

为此, 蒋述卓教授认为, 《美国梦》的写作具有一种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种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移民史的写作由过去侧重于揭示辛酸苦难转向成功与贡献的描绘;二是把过去侧重经济领域的人物塑造改变为对移民在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典型描写。这两种转变大大拓展了华人研究和华文文学研究的视野, 也必将在这些领域带来更丰硕的研究成果。黄伟宗教授则认为, 几个世纪以来, 广东迁居他国的移民数量特多, 他们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成功人士, 其经历和情感与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对他们的重视与研究是凸现广东地域文化色彩的重要课题。因此，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既要重视中华文化的整体影响，还要细察地域文化的亲和力，两者的结合才能使这一研究富有立体性。在这方面，过去做得不够，因而《美国梦》的写作有开拓性的价值。许翼心研究员则从比较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他说：“移民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可为什么华族的移民不像有些民族的移民那样采用海盗式的掠夺或武力征服？而是如水滴石、如根破土那样平和而又顽强进取——就像黄运基所做的那样，用辛辛苦苦、踏踏实实的拼搏在异国他乡立地生根？这体现了华人怎样的品格以及华人身上的中华文化的何种特色？《美国梦》的写作似乎是在寻找答案，但我认为这种探索的路还很长，还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在世界性的视野中去抓准中华文化的特质。”来自美国的著名作家刘子毅先生则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海外华文作家用自己的创作展示了独特的生存境况和情感状态，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人性的或文化的重要问题，但海外华人迫于生活压力很少有人具备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些问题，因此作为海外学者，他对祖国的研究者们有着殷切的期待。《美国梦》的写作本身正体现了这种民族道义。

传主的选择历来是传记文学创作成败的关键，也是传记作品价值的重要体现。与会者一致认为，黄运基先生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正如曾敏之先生概括的：“黄运基先生是一个既无私又无畏的人，他的人品、文品和事业都可以称得上是海外华人的典型，因此他无愧于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饶凡子教授更有一段诗情洋溢的评价：“年逾古稀的黄运基先生，始终以一个热血青年的奔流姿态，用汗水和泪水在异国土地上浇灌出灿烂鲜艳的成功之花，从而贡献了一段令我们华族为之自豪的历史。这是一个迁徙者寻梦、圆梦、再寻梦的奋斗史，其中闪耀着寻梦者在异质文化映照下的灿烂心光，透显出开拓者在追求正义和真理的过程中蕴含着的深厚理思。这段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熔炼着历史风云的传奇经历，应该以文学的形式进入我们民族的辉煌记忆。黎山晓教授对黄运基的人生价值作了这样的小结：“黄运基的一生是诗性的人生，也是血性的人生。他是民族精神的守护者，人性高峰的攀登者，传统美德的实践者，光辉未来的眺望者。因此，《美国梦》塑造了一个感人至深、意义深远的移民形象。”因此，黄运基先生这一典型人物的选择赋予了《美国梦》非同一般的价值。

有可记之人，有可传之事，还需一支生花妙笔，将事写真，将人写活。作家洪三泰认为，《美国梦》写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将个人命运和历史风云结合起来，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和特殊的时空条件下展现一颗独特的灵魂。作者对传主移民经历中每一次重要事件的描写都拓展至整个华人移民史的宏大背景中，拓展至中美关系史的风云际会中，去展示纵横交错的历史勾联，去描绘一人背后的众生群相，从而在历史烟云中将黄运基的个人奋斗史凝铸成华人移民史的典型标本，凝铸成中美关系史的生动见证。饶凡子教授更是如数家珍般列举了作品的诸多细节，认为正是这些细节的生动描绘，既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又使全书形成了血肉丰满、情感流淌的立体架构，从而使全书在高度真实的基础上又洋溢着动人的文学性。邹建军教授则指出，《美国梦》的作者本身是有成就的诗人，又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副教授，以这样的身份来写传记，其作品自然充溢着诗的空灵与潇洒，又体现出学者的严谨与见识，诗意的描绘、真情的感悟与哲理的升华交融在一起，使《美国梦》展现出一种别样的风采。陈涵平博士从写作技巧的角度概括了《美国梦》的另一艺术特征，即传记作者摄取了文学创作在新世纪所展现的多种新理论、新方法，如时空交错的跳跃式结构、杂色多样的拼贴叙述、带有新历史主义色彩的历史叙事等等，从而使创作显露出一种强烈的现代性。作家于力则指出了作品的两点不足，一是对这一特定人物深层的文化心理挖掘不够，人物意义的理论阐释还显得单薄；二是意识形态色彩较浓而普遍的人性色彩偏弱。

研讨会结束前，传主黄运基先生和作者熊国华均作了发言。黄先生认为，与会者热情中肯的评价不仅仅是对他个人、也是对整个海外华人群体的肯定。熊国华则坦言，是黄运基先生的人品和事迹感动了他，才使他有了强大的写作动力和写作热情，他真诚地希望他的作品也能感动所有的读者。

责任编辑：陶原珂

# 新世纪第二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综述

周娟

(暨南大学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新世纪第二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暨第八届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于2003年4月11日至14日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由该校中文系与香港大学语言学系联合主办,香港理工大学中文与双语学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合办。与会代表60余人。研讨会收到硕士或博士生提交的论文60多篇,经匿名审读评选出20篇获得资助并发给奖状,北京大学的詹卫东和浙江大学的税昌锡荣获一等奖。

研讨会举行了学术报告会,陆俭明的《语言事实与分析方法》通过大量的语言实例证明了理论与方法的拓新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特别强调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更新是汉语语法研究发展的必要前提。詹伯慧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在回顾了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历史以后指出:方言语法研究,必须坚持调查,调查,再调查;比较,比较,再比较。石定栩的《语用、语义与句法互动的范围》以受事出现在动词前的“O—V”结构为考察对象,对语用和语义因素影响句法的作用范围作了有益的探讨。他们的精彩报告,给与会代表很大的启示。

此次会议共接收论文46篇,所涉及的课题较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否定范畴的研究,探讨汉语句子中否定的复杂语义表现以及一些特定的否定句式。例如戴耀晶的《关于汉语否定句的语义确定性问题》,通过对词语语义特征、“名词+名词”偏正结构、“动词短语+动词短语”在肯定句和相应否定句中的不同表现的分析,指出肯定句的语义具有单义性,否定句的语义具有歧义性。张谊生的《羨余否定的类别、成因与功用》从表达的角度把现代汉语羨余否定式分为四类八种,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羨余否定的五种成因,比较了羨余否定式和对应肯定式之间的语用差异。邵敬敏的《“别”字句语法意义及其对否定项的选择》通过对大量语言事实的分析,修正了前人认为“别”字句只表“禁止”的观点,归纳出“别”字句的三种基本语法意义。此外,萧国政、朱英姿的《现代汉语双动结构的信息构成与信息否定》在分析“VP<sub>1</sub>VP<sub>2</sub>”一类语言片段信息结构的基础上,对其信息否定的类型与途径进行了探讨;尹世超的《说否定性答句》则讨论了疑问句否定性答句的类型及相关问题。

2. 对焦点范畴的研究,涉及信息焦点、对比焦点,或把否定范畴和焦点、范畴结合起来讨论。例如陆丙甫、徐阳春的《对汉语“话题突出”的反思》通过对疑问性和周遍性话题的分析,指出这两类话题焦点的共同特点是高度的可别性而不是话题性,认为汉语的主要特点与其说是话题突出,还不如说是对语用的可别性更敏感。Haihua Pan 和 Peppnia Lee Po-lun 的《Focus and Negation in Chinese》指出了否定结构的非线性分析的局限性,提出应从辖域的角度对否定词“不”、“没”与焦点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解释了这两个词在非焦点否定结构和焦点否定结构中的辖域限制。此外,玄琨的《论焦点标记对焦点敏感算子的制约作用》指出焦点标记在确定焦点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可以在算子的辖域内外制约算子的语义指向,但有时焦点敏感算子自身的特点会对焦点标记的这种制约作用产生影响。张蕾的《“把”字结构否定焦点转移的成因与影响》也借助焦点理论从否定范畴的角度对“把”字结构的一些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3. 对语义指向、特征的研究。如税昌锡的《论语义指向的内涵》从配、向、指、联四个方面讨

论了语义指向的内涵。蒋静忠的《形容词作定语语义指向浅析》在对形容词语义指向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异指”、“同指”、“分指”、“共指”等概念。徐以中的《副词“只”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探讨》则专门就与副词“只”的语义指向有关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在语义特征方面，李葆嘉的《汉语的词语搭配和义征的提取辨析》通过分析四对近义词的语义搭配，对语义分析的基本步骤和义征提取的一般程序作了理论探讨。刘楚群的《形容词的动态性语义特征》分析了具有动态义形容词的语义特征，并比较了典型形容词和典型动词的动态性语义特征。杨海明的《名词性状因子的构成与“副+名”框架的提取》则探讨了名词诸多语义特征在“副+名”框架内由里及表的投射状况。

4. 对其他重要范畴的研究。例如陈昌来的《工具的语法地位、类别、隐现规律及其焦点显现的认知解释》分析了工具成分在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中的地位，归纳了工具成分的认知类别，探讨了工具成分在话语中的隐现规律及其原因。周静的《反递范畴的形式、语义聚合与扩张》以反递句式“不但不A，反而B”所表达的预期与结果为线索，考察了反递范畴的形式、意义、认知基础与历时发展。周国光的《汉语时间系统习得状况的考察》通过对汉族儿童习得时间名词、时间副词、时态助词、方位词及其相关句法结构的状况的考察，分析研究了儿童习得汉语时间系统的过程和机制。赵春利的《论现代汉语语气范畴》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提出了“语气是说者基于一定的心理状态在借助话语表述一定的心理指向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意向”的看法，指出现代汉语的语气体系具有强、中、弱三个口气等级的表述、表疑、表情、表意的四分系统。

5. 对某些特定词语和句式的研究所。在词语研究方面，张宝胜的《副词“还”的主观性》通过句重音探讨“继续”、“持续”义的副词“还”的主观性和“元语言”性。岳中奇的《也说“胜”和“败”》从语义价和认知的角度对“胜”与“败”在“X+胜+Y”和“X+败+Y”中的同义问题重新解释。王黎的《说“一连”和“连连”》从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比较了这两个词的用法。在句式研究方面，刘焱的《“X比Y还W”句式的语用制约与认知基础》归纳出该句式的“常规比”、“递进比”、“反差比”及“极端比”四种语义类型，分析了句式的比较项、比较结果以及语用特点和认知基础。王国栓的《“来+VP”“VP+来”两格式中的“来”》则比较了两种格式的来源和共时表现。

6. 对某些词法问题的研究。例如朱彦的《论汉语复合词的语义结构分析》用形式语言描写了复合词词素义间的述谓关系，对复合词述谓结构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原则和规则。吴长安的《单音词指称与陈述相互转化的标记模式与语义类型——兼谈单音词的词汇地位》主要阐释了转化的标记模式、语义类型以及哪些单音词易于走向指称与陈述的相互转化的问题。

7. 对某些方言语法现象的研究。例如彭小川、赵敏的《广州话“晒”与普通话相关成分的比较研究》通过与普通话“完”、“光”、“了<sub>1</sub>”的对比，重新归纳了“晒”在粤方言中的语法意义及其功能的类型学意义。张林林的《九江话中的指示代词》则探讨了九江话中指示代词的特定用法。

此次会议的论文不仅涉及的范围较广，而且反映了当前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如下发展态势。

1. 注重静态基础上的动态研究。这种动态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重从历时的角度考察语法化的形成与发展，例如刘街生的《“的话”及其相关问题探讨》、胡勇的《说“怀疑”》等。二是注重从语用的多角度进行研究，例如黄河的《汉语日常口语中打招呼的限制因素》从说话人主观心理的现实性、打招呼时周边条件的制约性以及汉语口语语法的特点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2. 注重描写的解释研究。特别是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转喻”等理论来解释，如赵媛的《“吃”后非受事宾语的认知基础与句法实现》和宗守云的《“进+处所宾语”言外之意的认知分析》等。

3. 注重理论与方法的拓新与发展。这一方面比较引人注目的文章有沈阳、董红源的《“直接统辖”与结构内第三人称代词“他”的所指规则》和詹卫东的《广义配价模式与汉语“把”字句的句法语义规则》。前者扩大了“约束原则”和“统治原则”对汉语句法结构中人称代词“他”的所指关系的解释范围；后者提出了广义配价模式。

责任编辑：陶原珂

# 企业存在理论的研究综述

杨学军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广东 广州, 510275)

企业为什么存在是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在有关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文献中, 似乎并没有认识到强调企业存在的必要性。<sup>①</sup>科斯是第一个按照市场价格机制下交易费用的方法研究企业存在的人。他开创了现代企业理论之先河, 将企业视为“一系列契约的连接”, 之后的学者在其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近年来, 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 以知识为基础组织生产经营, 已成为新型企业的象征, 并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sup>②</sup>本文将沿着企业理论演进的脉络对企业存在这一问题的理论解释进行梳理, 以更清晰地把握企业的经济性质和为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 一、古典理论对企业存在的解释

企业的起源是分工, 即企业是分工的产物, 这是亚当·斯密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斯密用缝衣针工厂的例子分析了专业化分工问题, 指出分工是生产率进步的源泉。他发现, 只要交易机会继续存在, 专门制造一种商品以便与其他专业人员制造的另一种商品交易, 就可以赚取利润。马克思将他的企业理论置放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框架之内, 从比较分散生产与集中生产这两种形式入手, 将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简单协作、分工协作所带来的利益。在马克思看来, 协作之所以在企业起源上具有重要意义, 是因为协作能产生一种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自然力)。另一方面, 马克思提出了经济运行过程要节约流通费用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这正好体现出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性质的认识上存在某些共同点。<sup>③</sup>

## 二、新古典理论对企业存在的解释

在新古典理论中, 企业被简化为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生产转换函数。“如果说标准理论提供了关于企业存在的解释, 那么, 这种解释可能只是一个技术上的解释。生产要素需要有某种组合, 某些生产规模也比其他规模更有效率。”<sup>④</sup>德姆塞茨认为, 仅就“企业只不过是一个专业化的生产单位而已”从这句话来说, 新古典理论对企业本质的看法应当是没错的, 只是由于这一看法隐含在价格制度背后而不被人们所重视, 或者说对价格制度的过分关注使人们忽略了被概念化了的企业这一生产性本质。专业化理论对企业存在解释的基本思路是:“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与自给自足相比为其他人生产是有效率的; 这种效率是由于有规模经济、专业化活动以及低而不高的交易费用的优势。”但是, 新古典理论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把各种资源结合起来制造某种最终产品以达到规模经济的观点仅仅是对生产决策的解释, 它很难解释对一个生产组织的需要, 更不要说对一个有长期合同、所有者承担风险和对参与生产过程的人的层级或集中协调等特征的生产组织的需要了。<sup>⑤</sup>

## 三、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存在的解释

1. 企业存在的交易费用论。<sup>⑥</sup>科斯对企业存在的交易费用论解释, 是结合对奈特观点的批评进行的。奈特之前的学者认为利润来自行为所承担的风险, 而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 获得经营利润, 这就是企业的效率所在。奈特的研究说明风险不是利润的来源, 而不确定性才是未来可能的利润(或损失)的来源。在奈特看来, 企业是一种在所有者—管理者与企业雇员之间优化风险分配的机制, 企业的产生降低了社会风险费用, 提高了社会总效用。奈特的最优风险分摊理论对企业存在的解释是建立在降低费用和提高生产率的基础上的, 在这一点上,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与其是相同的。但是, 奈特所根据的是通过风险的重新分摊来减少风险费用, 而科斯所根据的是通过用管理协调来代替价格导向协调而减少协调费用。科斯指出, 当经济主体相互作用时, 会产生“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包括协商谈判和履行协议所需的各种资源的使用, 包括制定谈判策略所需信息的费用, 谈判所花时间, 以及防止谈判各方欺骗行为的费用。在企业之外, 市场机制起协调作用; 在企业之内, 市场协调为企业家协调所替代。当企业内组织生产的组织管理费用低于通过市场交易的费用时, 企业作为一种节约费用的组织形式就会出现。简而言之, 他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与市场交易相比它能够以较少的费用来完成这些交易。

2. 企业存在的交易效率论。这一观点是以间接定价理论为代表，通过引入交易效率的概念对企业存在进行解释的。交易效率的概念是与交易费用相联系的。不同商品在市场进行交易时，其市场交易费用也不同，原因在于不同商品在进行市场上精确定价、精确计量、精确转移产权的程度不同。张五常认为企业并不是用非市场方式代替市场方式，而是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因为中间产品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会产生极高的交易费用，而劳动市场的交易费用相对较低，企业的出现就在于用交易费用低的劳动市场代替交易费用较高的中间产品市场，中间产品通过企业获取的收益相当于对其进行间接定价。借助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这三方面的因素，杨小凯和黄有光建立了关于企业的一般均衡的契约模式。这个模型对企业的产生问题具有良好的解释性。企业产生的社会费用的节约就在于——企业和非对称剩余控制权和收益权可用来将最低交易效率的活动卷入分工而同时避免对这类活动的产出和投入直接定价，而剩余收入就是这类活动的间接价格。该理论将企业的产生解释为一个随经济的交易效率提高，从自给自足的情况演进而来的过程，弥补了交易费用理论只可以解释现实中企业与市场共存现象，但不足以完善地解释企业为什么能从市场中演进而来的缺陷。

3. 企业存在的交易维度论。威廉姆森用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等三个交易的基本维度来解释了经济活动的规制结构。他认为当这些变量处于较低水平时，市场是有效的协调手段，而企业的出现则是不确定性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程度高的结果。另外，规制结构的选择要考虑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的综合作用。也就是说，选择企业生产的形式必须使企业的生产费用与交易费用之和达到最小化。

4. 企业存在的监督费用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企业理论所分析的不是交易费用而是监督费用。他们为企业存在假定了一种技术条件——许多人联合生产更经济——并加入了一种行为或者激励问题。当技术条件（收益递增和测度投入品贡献的费用很高）使得所有权和监督职能集中于中央，比没有监督时的收入分享制度或低生产率的小规模生产更有优势时，企业就出现了。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说明企业是一种节约费用的监督装置，在这一点上，超出了科斯含混的交易费用论解释。巴哲理论的核心是节约在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上测度中间产品费用。他假设在每个生产阶段上评价产出价值很困难，而监督投入品可以提供关于中间品价值的有用信息。生产线上的工人可以组织为许多独立的只有一个人的企业，或者整合到一个企业中去，从而就避免监督职能的高费用的反复进行，这样，企业作为集中监督活动的形式就出现了。

#### 四、企业能力理论对企业存在的解释

企业能力理论秉承亚当·斯密生产分工理论，突出研究企业的能力分工，并不像科斯的企业理论那样强调交易费用。企业能力理论在知识特性的基础上解释企业的存在。根据其角度的不同，可分为以下两个观点。

1. 企业存在的比较优势论。这一观点是资源基础理论对企业存在的解释。资源基础理论从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出发，认为一个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与其他两种组织相比具有优越性，这两种组织是市场（即外部交易的集合）和其他企业。该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企业的竞争地位是由其独特的资源条件决定的，企业之间是存在异质性的。因此，多样化的异质企业继续存在是因为它们各自所控制的资源是异质的，某种资源可能更适合某些企业而不怎么适合另外一些企业。例如，A 投入可能被 X 企业拥有而不可能被 Y 企业拥有，是因为 A 投入与 X 企业结合能够产生更多利润。本质上，这一思想与威廉姆森资产专用性思想是一致的。异质性的含义也就是资产专用性。尽管与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观点存在共同之处，但是资源基础理论却与威廉姆森的理论明显不同。资源基础理论承认资产专用性的重要性，但并不把防范机会主义行为视为企业存在的根源与核心目的，资源基础理论更多地把企业看作是积极的价值创造者而不是消极的机会主义行为防范者。

2. 企业存在的知识整合论。这一观点以知识基础理论为代表。德姆塞茨认为，企业存在代表一种对知识经济学基本非对称的反应，知识获取比使用需要更强的专业化，因此，生产需对处理许多具有不同类型知识的个体专家进行协调。但市场不可能确保这种协调作用，因为市场无法面对：(1) 隐含知识的不可流动性；(2) 潜在购买者占用显性知识的风险。这样，企业作为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机构而存在，因为这种机构能够创造使多个个体整合其特有知识的条件。这种把企业的作用看作是整合知识的机构的观点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很不相同的，交易费用论认为企业存在是因为它们能够避免同市场交易相关的费用；而知识基础理论则关心与特殊交易类型（包括知识）相关的费用。然而，最根本的差别在于，知识基础理论强调企业是管理团队生产的组织，而非交易的机构。Ghoshal 与 Moran (1996) 认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优势不是简单地避免交易费用，而是以与市场很不相同的逻辑控制某种特定经济活动的独特优势。

#### 五、小结

现代企业理论的主流把企业存在的原因归结为节约交易费用，与新古典理论从规模经济、专业化的角度解释企业

存在的原因相比，这一认识还是很深刻的。而科斯等现代企业理论家关于企业存在的著述中，“企业”的含义是整体意义上的，而不是单个企业。企业能力理论的一个分支——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一个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与其他两种组织即市场和其他企业相比具有优越性。这一观点从企业的异质性出发，把“其他企业”也纳入分析中。其目的是想阐明“单个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即为什么这个企业的资源未被分配至其他企业。从这一点来看，企业能力理论的解释更深入了一步。另一方面，不同理论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又存在着交叠，例如，威廉姆森在捍卫现代企业理论的同时，认为现代企业理论与新古典理论、企业能力理论既是对手又是互补者，而后者更甚于前者。福斯（Foss, N）等人也指出，许多企业能力理论的解释性概念可以直译为现代企业理论的形式。同样，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等人超越了单一交易费用节约论，提出了专业化协作的作用，这不能不说吸取了新古典理论的部分观点。德姆塞茨在对“新古典理论中企业的再考察”中指出，“为了卖给其他人的专业化生产对解释现实企业的存在是适合的。”这说明有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到新古典理论中可取的观点并将其吸收运用到对现代企业的分析中。<sup>⑦</sup>

---

①参见哈罗德·德姆塞茨著，梁小民译：《企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②参见毛蕴诗、庄拥军：《论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要素动员方式》，载《经济与管理研究》2002年第1期。

③参见伍山林：《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企业性质理论的若干比较》，载《财经研究》1999年第1期。

④⑤参见路易斯·普特曼、兰德尔·克罗茨纳：《企业的经济性质》，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3页。

⑥为更简明扼要地指出该理论对企业存在的解释，本文根据其阐述的内容或所使用的分析工具的典型特征提炼其观点。

⑦例如国内学者黄桂田、李正全提出了一个回归古典的企业理论分析框架，参见黄桂田、李正全：《企业与市场：相关关系及其性质——一个基于回归古典的解析框架》，载《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

责任编辑：黄振荣

# 岭南人文图说之一——埠头

(番禺小谷围岛)



北亭村古码头之一

码头是除了祠堂外乡民重要的休憩和聚会之地。裕昌古亭下的南亭码头，有船到南村、裕昌三角，江中有洲中岛“海心岗”，是当年自梳女举行梳粧仪式的地方。如今这一带依然曲歌唱晚。



穗石村南海神祠，是岛上仅存的一间

穗石南海神祠是穗石八景之一，俗称“风烟水月”。原供奉洪圣王，与南海神庙的意义一脉相承。其石门联：“南海咏雅诗三千年重新见宇，西河宗礼记九万派更接交深”。门柱联：“此地控海扼喉之胜地，其神历转碑苏印而弥光。”可见当日气势不凡。根据穗石村老村长介绍，这一带两岸村落原有十多间南海神祠，诞日在农历二月十二、十三两日，其面底的江面从箭堤而船舶码头和驳站。



穗石村东约码头

“史籍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尽管今天的岭南乡尚交通发达，但在以水通财、以水为财的生活观念下，码头依然是重要和热闹的。本乡人称码头为“横水渡”，遍布岭南水乡的各式码头不仅服务着民生，还营造着水光潋滟的水乡风貌。



北亭村望宅埠头

通常，乡人把码头称为埠头或者渡头，有青石版、老榕树、旧木船以及咿呀的橹声。从蛮山的大学埠头摆渡到对面的官洲岛，所花无几，足以使人享受波光湖声、水声橹声和半日闲情。这埠头又有石刻“大学望宅埠头”。据说，清末这埠头周遭就是盛极一时的官山堆，二、五、八坡已集合着附近土华、仑头等24乡的贫富，只是1903年禺华市墟开墟后才渐次没落，因此当日有“私家码头”不足为奇。



东岸中的南亭村海心岗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月刊  
2003 年第 7 期(总第 224 期)  
出版日期:7 月 20 日

---

社 长:李恒瑞	网 址:www.xsyj.com
主 编:郑英隆	电子邮箱:xsyj@xsyj.com
编辑部主任:雷比璐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编辑出版:《学术研究》杂志社	国内总发行: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地 址: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邮 编:510050 电话:020- 83846163	邮发代号:46- 64
排 印:广州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国外代号:M 268(北京 399 信箱)
广告经营许可证:粤工商广字 010349	定 价:8.00 元
刊 号: CN44- 1070	 <u>ISSN1000- 7326</u>

---

[期刊基本参数] CN44- 1070/c\* 1958\* m\* 大 16\* 148\* zh\* P\* ¥8.00\* 3200\* 36\* 2003- 7